WAR HISTORY STUDIES

战争史研究（二）

第42册

主编 阎京生
副主编 刘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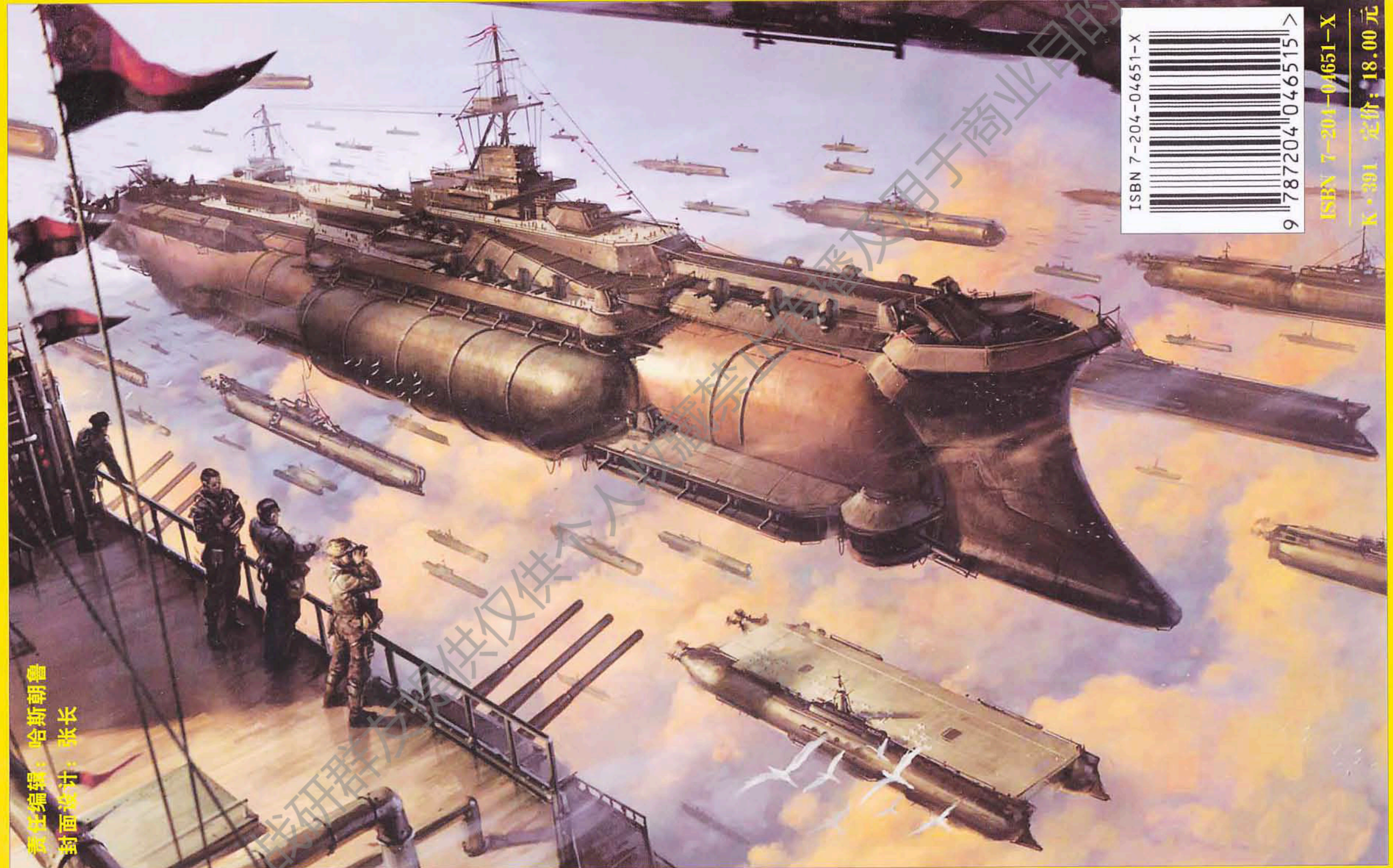


战研群友投稿仅供个人收藏交流严禁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责任编辑：哈斯朝鲁
封面设计：张长

ISBN 7-204-04651-X

ISBN 7-204-04651-X
K·391 定价：1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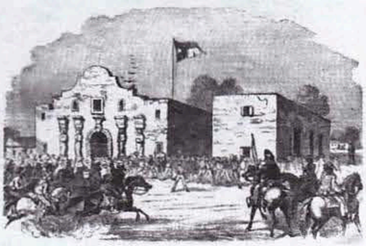
苍穹之船 02–37
齐柏林飞艇史话（上）



果壳里的战争 38–60
1961 年葡印果阿之战



法兰西巡逻兵 61–71
法国海军布干维尔级殖民地炮舰



“牢记阿拉莫！” 72–96
1836 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始末（上）



曙光中的启明星 97–119
1917 年俄国革命（下）

法兰西杜鹃 120–136
拿破仑三世与第二帝国的兴亡（四）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4 5 号
《战争史研究》发行部　联系人：赵琦
发行部电话：010-88561472
邮购部电话：010-88560080
邮政编码：100048
编辑部信箱：war.history.studies@gmail.com
（邮购、购买过刊等事务请垂询发行部）
如有错页、漏订、脱页等现象，请与本刊发行部联系调换

合作论坛：超级大本营
http://lt.cjdby.net/forum-118-1.html

苍穹之船 齐柏林飞艇史话（上）



我堕入未来，
至那肉眼看不见的所在；
窥见梦幻中的世界，
及所有即将来临的奇观；
我看见苍穹充满贸易，
挂着魔帆的商船，
以巨大痛苦滑落下去的是
紫色朦胧中的飞行员，
听见空中传来呼喊，
那如雨般可怕的水珠，
来自各国空中海军的英勇鏖战。
南刮的暖风细声细语地传遍全球，
各族的旗帜被卷入暴雨雷电；
直至战鼓不再擂鸣，战旗在
人类的议会，世界联盟中不再飘展。
多数人的理智警卫地将
躁动不安的王国主宰，
慈善的大地啊，在宇宙法则的包揽中
进入安详的梦幻。

——《洛克斯莱大厅》，阿尔弗雷德·丁尼生（英国桂冠诗人），1835年

轻于空气的飞行器

尽管实施飞行的个别基本元素以及存在了许多个世纪——例如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就有了风筝，公元1300年左右又出现了与螺旋桨形状相似的竹蜻蜓——但是实现飞行的梦想仍然困难重重，可望而不可即，直至二十世纪初方才经历了种种曲折而发明了真正的飞行机器。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类没有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达芬奇在1485至1510年之间便已经懂得了飞行方面的许多知识，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深信实现飞行的方法是呆板地模仿鸟类。许多勇敢的人，或者说是蛮干的人，为了追求这个不现实的美梦，穿上仿制的鸟翼和带有羽毛的衣服，从塔顶或悬崖上往下跳，结果是非死即伤。

除了这些实干家之外，还有诸如拉纳·德·泰尔齐（Feancesco Lana de Terzi）这样的思考者。他于1670年用意大利文写出了他的设想：成群的航空器在城市上空飞行，投掷大量武器以攻击其下方没有防御能力的市民。

不久之后的1709年，一位名叫洛伦佐·德·古斯芒（Bartolomeu Lourenco de Gusmao）的葡萄牙神父用滑翔机模型和热气球进行实验，获得了成功。此后，人们迫切要求飞行的具体表现逐渐减少，直至1783年又出现了法国的雅克·蒙戈费耶尔（Jacques-Etienne Montgollfier）和约瑟夫·蒙戈费耶尔（Joseph-Michel Montgolfier）两兄弟。

以造纸为业的蒙戈费耶尔兄弟注意到充满热空气的纸袋能够升起来的现象。当时他们并不懂得这是因为热空气密度较小的缘故，但却意识到了它的实用价值。1783年6月4日，蒙戈费耶尔兄弟在亚麻布里面糊上纸，做成了一个直径10.6米的热气球，并在其家乡阿诺奈的集市上进行了首次气球升空。他们在气球颈口下面悬挂了一只火盆，里面点燃了湿羊毛、稻

○ WINDWARD



章和麦秸，因为兄弟两人认为热烟才是使气球升空的动力。他们让8个人用力拉住气球的绳子，然后一齐松手。这个气球最终上升到1830米的高度，飘飞了2300米。

事实上中国的孔明灯要比蒙戈费耳的热气球早近千年。五代时南唐的莘七娘在随军队攻打闽国时就曾经用竹篾扎成方架，糊上纸，做成大灯，底盘上放置燃烧着的松脂，灯就靠热空气飞上天空，用作军事联络信号。这种公元十世纪就出现的薄壳灯笼与八个世纪之后出现的蒙戈费耶尔热气球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或者技术上的巨大差距。但是蒙戈费耶尔气球在西欧很快被发展为升空技术，而在中国，由于实验科学未受到推崇，以至于近千年光阴流逝之后，莘七娘的松脂灯仍停留在“细细竹篾做骨架，薄薄棉纸糊四周”的原始状态，无非为节日平添几分喜庆气氛而已，没能为人类航空科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蒙戈费耶尔兄弟试制热气球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巴黎，那里的科学家决定对其加以改进。其结果是雅克·夏尔和尼古拉·罗贝尔教授的充以氢气的气球。1783年8月27日，夏尔的第一只氢气球进行了首次飞行，落在巴黎郊外的一个小镇上。由于是用硫酸滴在锌板上制造的氢气，花了三天的时间才充足气球，因此这个从天而降的怪物带有强烈的硫磺气味，被当地的农民视作魔鬼的化身。他们找来本堂神父，请求他念咒驱魔，但神父也吓得战战兢兢不敢上前。最后一位胆大的农民向气球开了几枪，它开始漏气，于是农民们在神父的带领下一拥而上，用干草叉把气球戳成了碎片，然后拖在马尾上游街示众。

蒙戈费耶尔兄弟闻讯后赶到巴黎，决心以热气球与氢气球较量。1783年9月19日，一个精心装饰蒙戈费耶尔大气球停立在凡尔赛宫前，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宫廷大臣和市民们齐聚在气球的周围。热气球带着一只山羊、一只鸭子和一只公鸡进行了升空试验，留空时间8分钟，飞行了3.2公里。除了公鸡的腿被羊踢伤外，另外两只动物都安然无恙地返回地面。路易十六兴奋异常，赏赐给蒙戈费耶尔兄弟圣米迦勒勋章和每年400里弗尔的年金，并且下令以后法国所有的热气球都称为“蒙戈费耶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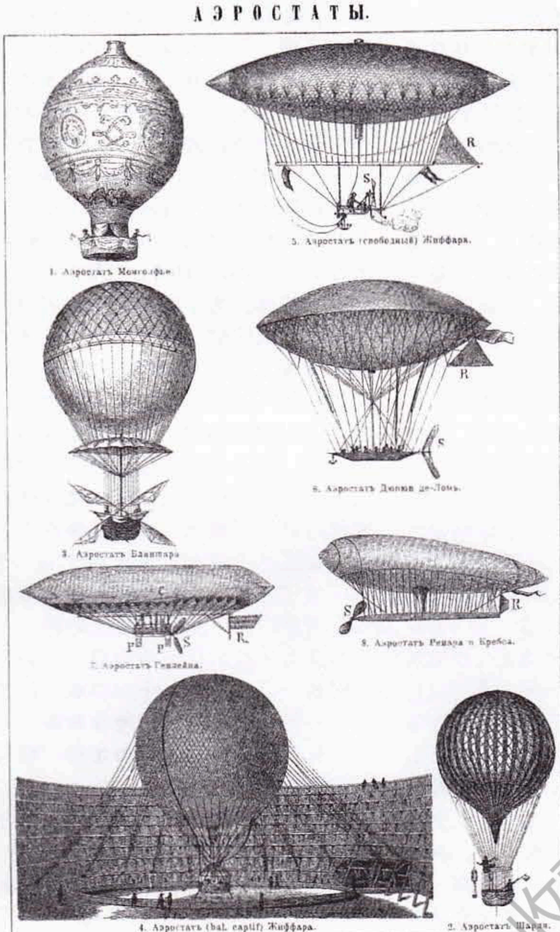
当时认为把人带到天上去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于是路易十六决定让死刑罪犯上去试试，条件是赦免其死罪。但是蒙戈费耶尔兄弟的一位贵族支持者德·罗齐埃反对这个决定，认为“人类第一次升空上天的荣誉不应该由罪犯获得”。最后由罗齐埃和其好友阿尔朗斯侯爵进行了人类的首次飞行。10月15日，蒙戈费耶尔兄弟在巴黎郊外的布洛涅森林升起了第一个载人热气球。气球上升到450米高度，飞行了25分钟，最终在巴黎的意大利门附近降落。为了表彰这些人对航空科学作出的贡献，法兰西科学院授予蒙戈费耶尔兄弟以通讯院士的称号，罗齐埃和阿尔朗斯也被选入科学院。

蒙戈费耶尔热气球实现首次载人飞行后，夏尔教授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意，而是坚持搞氢气球。他发现高度越高则气压越低，此时气囊内的氢气会膨胀，于是在气球顶部留出一个活门放气开口，可以用拉绳使过多的氢气逃逸出去，并最终安全降落。气球用涂有橡胶的丝织品制成，外面罩上网囊，下面悬挂一个可以载人的吊篮，使得重量可以均匀地分布在气球上。夏尔教授的设计成为此后一切气球的蓝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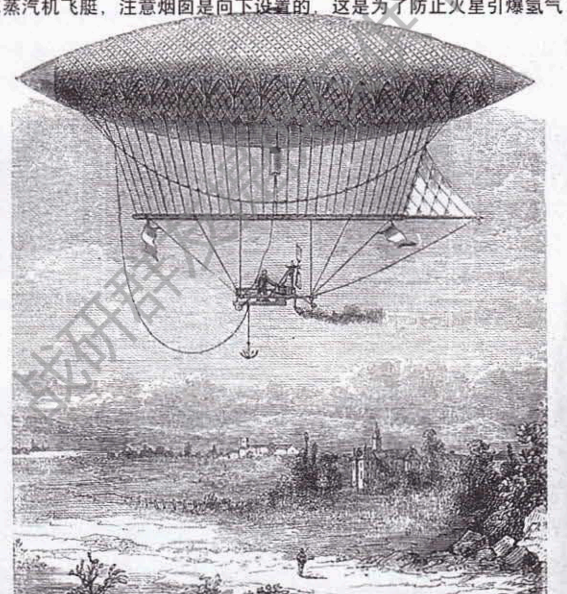
1783年12月1日，夏尔和罗贝尔两人进行了第一次氢气球载人飞行，从巴黎市中心的杜伊勒里宫花园起飞，在空中飘行了43公里的距离，平安降落在巴黎郊外一个叫尼莱－拉瓦利的小镇上。这个气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依靠的是一种比空气轻许多的气体，而不是用加热的方法使普通空气“变轻”。此后研制的各种改进型气球以及飞艇都集中在使用较轻



蒙戈费耶尔兄弟的首次载人气球升空试验，1783年10月5日



上图为早期的气球飞行器，自左至右、自上至下依次为蒙戈费耶尔气球、热法尔飞艇、布朗夏气球、杜普伊·德·洛梅气球、汉莱因气球、雷纳德和克雷布斯气球、热法尔气球、以及夏尔的氢气球。下图为热法尔蒸汽机飞艇，注意烟囱是向下设置的，这是为了防止火星引爆氢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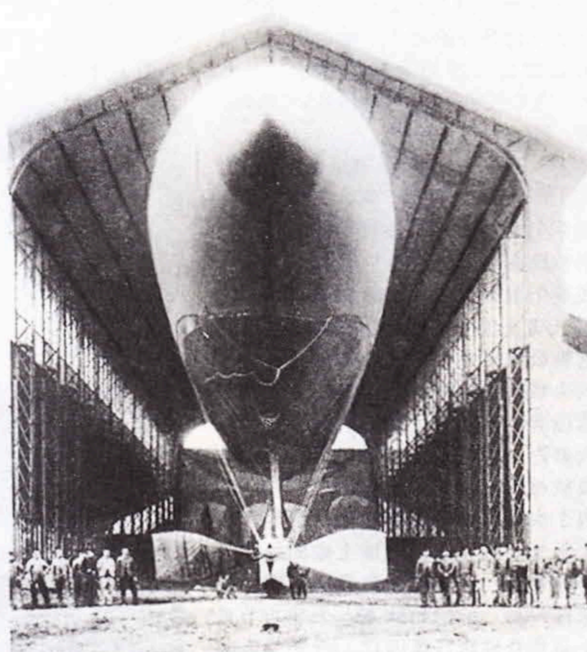
Aérostat à vapeur de Henri Giffard.

的气体、而不是热空气上。夏尔此后致力于研究气体的特性。他发现气体的体积不变时，一定质量气体的压强和其绝对温度成正比。这就是物理学中有名的夏尔定律。此后盖·吕萨克又发现气体的压强一定时，一定质量气体的体积和其绝对温度成正比。这被称为盖吕萨克定律。这样，空气静力学这门学科开始出现了。它系统而正确地阐明了气球是由于热空气和氢气轻于外界空气，从而产生空气静力，才能升空的。

然而那时候的气球实在是一种十分笨拙的装置。它要么系留在地上，要么就得受风力的摆布。为此人们曾做过努力，设法为气球提供某种形式的动力，使其能够在空中作机动飞行。一开始人们尝试像海船那样用风帆来操纵气球飞行方向、并增加其前进的速度，但是气球本身已经是随着风在飘飞，再加上帆也是起不了多少作用。氢气球的发明人之一罗贝尔教授曾经想过用人力在空中划桨前进，并且建造了一个长16米、直径9米的鱼形气囊，由7个人坐在吊篮里划桨前进，但七个小时里只歪歪扭扭地前进了几公里。1834年，法国的莱诺伯爵制造出长39米、用20个人划桨的气球，还是没能获得成功。尽管如此，可操纵动力气球的研究工作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人们意识到把气球做成球体形状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它在空气中的阻力很大。结果球形气囊逐渐延长为雪茄形，机动飞行能力也因此好了许多。

1852年，法国人亨利·热法尔制造出一个长44米、最大直径12米的气球，采用煤气作为升空气体。这个气球的惹人注目之处是安装了一台重160公斤、功率3马力的蒸汽机。尽管试验证明这个气球能够以8公里的速度前进，但是操作起来十分笨拙，而且很难逆风飞行。此时还是没有重量足够轻、且能够产生相当动力的实用的动力装置。尽

"法兰西"号飞艇，长51米，用铅酸蓄电池驱动一台6.6千瓦电动机。1884年8月9日首飞，历时25分钟，最大时速24公里



管在法国陆军资助下建造的“法兰西”号飞艇已经在1884年利用一台8马力电动机驱动着飞艇前端的大型螺旋桨进行了飞行，但直到1885年和1886年，两位名叫卡尔·本茨和戈特利布·戴姆勒的德国人分别发明了实用的汽油发动机，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

1888年，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沃尔福特（Frederich Woelfert）把一台戴姆勒汽油内燃机装到了飞艇上，改进了飞艇性能。从此以后，飞艇（这是动力气球变为长形以后的名称）[注]的发展便越来越快。侨居法国的巴西富人阿尔贝托·桑托斯－杜蒙（Alberto Santos-Dumont）建造了18艘以内燃机为动力的飞艇，其中第6号飞艇于1901年在30分钟之内从巴黎西郊的圣克鲁飞到埃菲尔铁塔，并绕塔一周后返回，从而赢得了10万法郎奖金。

“法兰西”号和桑托斯－杜蒙的飞艇都属于软式飞艇。意思就是说，它们是没有内部骨架的，充气之后自然膨胀起来，要靠充气的压力才能保持外形，放气之后又会瘪下去。最早的一些飞艇采用牛肠皮膜衬在两层棉织物中间来防止漏气，一艘飞艇的蒙皮就需要上万头牛的肠皮膜。由于造价昂贵，因此也有人尝试采用涂有橡胶的棉布，但用这种方法只能制造出搭载一两个人的小型飞艇。要想制造更大的飞艇，就必须在内部装上金属骨架来保持外形。

随着冶金化学的进步，到十九世纪末已经能大规模生产又轻又牢的铝和铝合金了，它很适合于制造飞艇的骨架。1897年11月3日，由犹太裔匈牙利工程师大卫·施瓦茨（David Schwarz）设计的一艘飞艇在柏林南郊的坦珀尔霍夫练兵场首次试飞。与当时普遍采用棉织物夹牛肠皮

桑托斯－杜蒙的第6号飞艇正在环绕艾菲尔铁塔飞行



【注】英文中表示“飞艇”之意的最常见的词是“airship”，它涵盖了所有有动力的飞艇范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用来表示飞艇的英语词叫“dirigible”，这个词来自法语，直译的意思是“可操纵的”。事实上法语将飞艇称作“balloon dirigible”，也就是“可操纵的气球”，这个词直接揭示了飞艇与气球之间的渊源。德语称飞艇为“Luftschiff”，和英文“airship”一样都是由表示“空中”、“航空”的air/luft和表示“船”的ship/schiff这两个词直接组合而成的。日耳曼语系的荷兰语、挪威语、瑞典语等语言中“飞艇”的构词与之相近。而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拉丁语系语言则像法语一样，用“dirigible”这个词来表示飞艇。俄语和保加利亚语“飞艇”一词也是“dirigible”的直接音译。日语称飞艇为“飞行船”，中文旧时也将飞艇称为“飞船”，但后来出现大型水上飞机之后，“飞船”这个词慢慢地被用来称呼水上飞机了，“airship”逐渐被约定俗成地称为“飞艇”。实际上英文称大型水上飞机为“airboat”或者“flying boat”，直译的话这才应该是“飞艇”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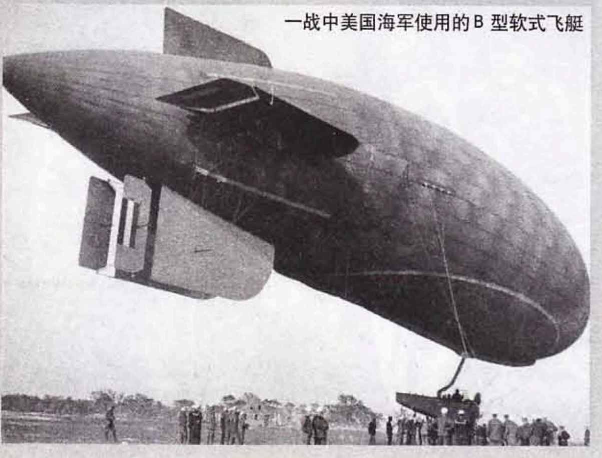
在“airship”这个大范畴之下，飞艇还可以按照有没有金属龙骨、以及龙骨的多少，进一步分为软式飞艇（non-rigid airship）、半硬式飞艇（semi-rigid airship）和硬式飞艇（rigid airship）。软式飞艇的整个艇体是一个气囊，靠气囊内填充的浮升气体来保持飞艇的外形，内部没有应结构的支撑构架。现代的软式飞艇在主气囊内通常还有两三个内充空气的副气囊，在温度升高、主气囊压力膨胀时，可以排出副气囊里的空气，而不必将主气囊中宝贵的浮升气体放掉。由于软式飞艇气囊内所充的气体超压很少，在飞行中承受的迎风气流压力较大，往往会把头部压瘪，为此在气囊头部往往装有一组轻合金的纵向加强骨架来保持外形。软式飞艇通常尺寸较小，总重最小只有几百公斤，最大的也不超过40吨，气囊放气后便于折叠收藏。

美英也将软式飞艇称作“blimp”，这是个拟声词，其来源据传是1915年艾伦·坎宁安将军（安德鲁·坎宁安海军元帅之弟，二战时为英国空军元帅）在视察一座飞艇库里的软式飞艇时，用手捻摸其涂胶蒙皮材料，对于这种不熟悉的质感发出了“blimp”的惊叹声，随后成为飞艇部队人员的笑料，并将软式飞艇称为“blimp”，这个称呼后来传到了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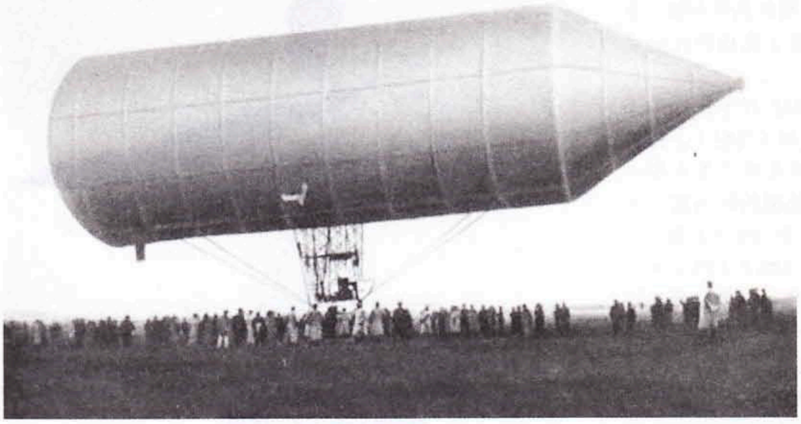
硬式飞艇具有一个完整的金属结构骨架，依靠金属骨架来赋予其气动外形。浮升气体容纳在骨架内的十几个或更多的小气囊内，即使其中一个或几个气囊漏气，飞艇也可以保持升力。这种结构最适于建造大型飞艇。如果其基本结构能够保证承受住来自飞行速度和浮升气体的自身压力，则其尺寸从理论上讲将不受限制。半硬式飞艇是在法国和意大利兴起的，构造介于软式飞艇与硬式飞艇之间，通常艇体上半部是软式，头部、尾部及艇身下半部有梁架和框架。半硬式飞艇的载重量虽然比软式飞艇大些，但是比硬式飞艇小得多，制造起来也并不省事，因此问世后普遍不受重视。除了意大利曾经大力发展半硬式飞艇外，其他国家很少研制这种飞艇。最著名的半硬式飞艇是意大利的翁伯托·诺比列飞艇公司在1920年代建造、用于北极科学考察的“挪威”号、“罗马”号和“意大利”号。

齐柏林伯爵建造的LZ-1号飞艇是硬式飞艇的鼻祖，此后德国、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等国都建造过大型硬式飞艇。由于齐柏林公司在硬式飞艇技术上始终处于领先地步，并将其发展至臻于顶峰的境地，因此英语当中有时也用“齐柏林”（zeppelin）一词代指所有的硬式飞艇，正如过去英文用“施乐”（xerox）代指复印、如今用“谷歌”（google）和“脸书”（facebook）代指网络搜索和网络交友一样。此外，英文中还有一个单词aerostat（来源于法语），指的是包括飞艇和气球在内的所有轻于空气的飞行器。

一战中美国海军使用的B型软式飞艇



大卫·施瓦茨的铝壳硬式飞艇在柏林坦珀尔霍夫练兵场首飞的情景





Hauptmann Graf Zeppelin.
Adjutant des Königs von Württemberg.

任符滕堡国王武官时的齐柏林伯爵

膜的飞艇不同的是，这艘铅笔形状的飞艇使用厚2 毫米的薄铝片当外壳。它依靠内部气体的压力来使金属外壳保持受压状态，以避免在飞行中折皱，同时又不像软式飞艇那样在地面放气后可以折叠。这种飞艇后来被归类为全金属外壳飞艇，由于不实用而很少制造了。

施瓦茨的这艘飞艇装有一台12 马力的发动机，铝片外壳固定在网格状的铝管骨架上，内充氢气。在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试飞中，由于铝皮接缝处漏气，在飞行了6 公里后坠毁。大卫·施瓦茨本人已经于1897 年年初在维也纳街头因心脏病发作而突然去世，一位德国人在这次试飞成功后从其遗孀那里购买了施瓦茨留下的所有笔记、资料和设计图纸。这个德国人的名字叫斐迪南·冯·齐柏林。

齐柏林伯爵的事业

斐迪南·阿道夫·海因里希·奥古斯特·冯·齐柏林伯爵（Ferdinand Adolf Heinrich August Graf von Zeppelin）1838 年出生于巴登大公国南部康斯坦茨湖畔的小城康斯坦茨，其祖上是来自波罗的海沿岸梅克伦堡地区齐柏林村（Zepelin）的贵族。斐迪南的父亲弗里德里希是符滕堡王国的宫廷总管。1853 年，齐柏林进入斯图加特理工学院（polytechnikum，以教授化学、物理、工程、建筑等实用学科为主），两年后进入路德维希堡的军校学习，之后进入符滕堡王家军队服役。

1863 年在美国波托马克军中任观察员的齐柏林（左二）



1863 年，齐柏林离开符滕堡前往美国，以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在北方的“波托马克军”中观战，曾经目睹了塔戴乌斯·洛维的气球部队对南军阵地进行侦察的详细过程。不久之后，洛维把齐柏林送到另一支气球侦察部队，其负责人约翰·施坦因纳是个德国人，对这位来自符滕堡的同胞详细讲解了气球飞行原理。齐柏林从此迷上了气球，认为通过对气球的改进，有可能使人类在空中自由飞行。

1865 年齐柏林回到德国，担任符滕堡国王卡尔一世的侍从武官，并进入符滕堡陆军总参谋部工作。在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当中，他都曾经指挥符滕堡骑兵部队参加到战斗当中，但在其余的时间里从未放弃对可操纵气球的钻研。1885 年，齐柏林被任命为符滕堡王国驻德意志帝国公使，后来又成为德国国会议员，1890 年晋升为骑兵中将。不过，在翌年的德国陆军秋季大演习中，齐柏林指挥一个骑兵师，遭到普鲁士总参谋部冯·克莱斯特上将的“不称职”评价，导致其在符滕堡国王面前失宠。齐柏林最终决定脱离军界，辞去一切官职，专心致志地研究气球。

齐柏林根据在美国南北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的经验，认为气球将对未来的战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也像同时期的许多发明家一样认识到无动力气球的缺陷，并开始研制可操纵的气球，也就是飞艇。但与当时流行的软式飞艇不同，齐柏林致力于内部装有骨架结构的硬式飞艇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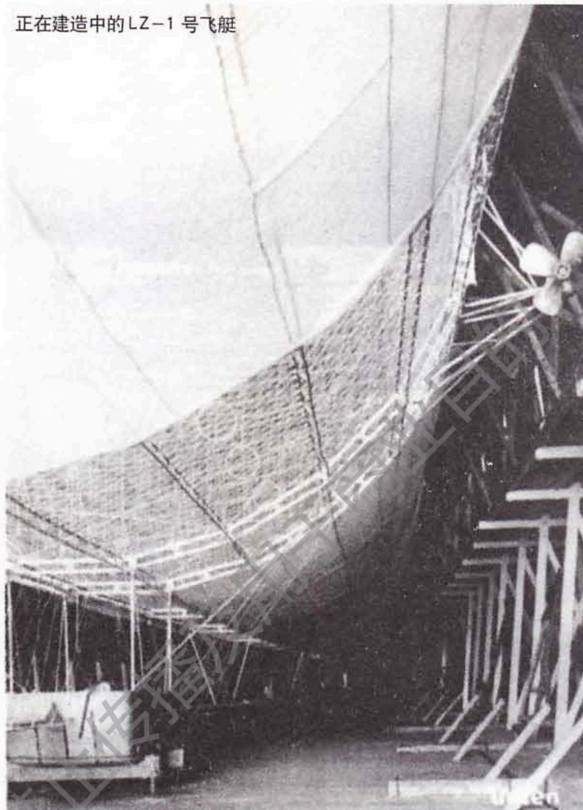
齐柏林家族虽然地位显赫，但是除了康斯坦茨的一块地产以外并没有多少动产和资本。为了研制飞艇，齐柏林把日常生活开销也节省下来，穿的是旧衣服，吃廉价食品，但节衣缩食省下的钱毕竟有限，因此他在1895 年向德国总参谋部写信，请求资助。但是德国军方没有人认真对待齐柏林的研究工作，反而认为他是想入非非，一定是得了神经病。在总参谋部那里碰壁后，齐柏林又求助于德皇威廉二世。当时威廉二世任命了一个科学发展委员会，成员包括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气象学家理夏德·奥斯曼等著名科学家，他们不顾德国军方的反对，提议德国工程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对齐柏林的硬

式飞艇研究项目进行资助。

齐柏林伯爵在1898年8月13日拿到了德国第98580号皇家专利权。该专利名为“可操纵的航空飞行器，内有堆叠的固定支撑物”。其内部支撑结构由铝制成，包括纵向的龙骨和长桁，横向的环形框架和张线。在外部蒙皮之内有数个独立的气囊，填充氢气。飞艇下面挂有可以载人的吊舱，并且装有推进引擎。

齐柏林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现有的引擎动力不足以推动飞艇克服空气阻力。他从1895年起就不断给戈特利布·戴姆勒写信，催促其研制功率更大的引擎。冶金学家卡尔·伯格负责向其提供制造骨架所需的硬铝合金。1898年5月，齐柏林、戴姆勒、伯格等人合伙成立了一家名为“航空技术推广协会”(Gesellschaft zur Foerderung der Luftschiffart)的公司，其中齐柏林伯爵出资44.1万马克，几占其财产总额的一半，大部分是用祖传的房产抵押换来的。

有了公司之后，齐柏林赶忙建造酝酿已久的第一艘硬式飞艇。这艘飞艇以铝为骨架，外面包以亚麻布和丝绸，再涂上橡胶。内部分为16段，每段自成一舱，放置用亚麻布和胶制作的16只气囊，共容纳了12000立方米的氢气。飞艇的长度是126米，直径11.4米，下方有两个铝制吊舱，各安装一台功率为15马力的戴姆勒发动机，带有4叶螺旋桨，驾驶人员也在发动机吊舱中进行操作。飞艇带有300公斤的压载物，可以搭载5人。这艘飞艇的名字是LZ-1号，LZ是德文“齐柏林飞艇”(Luftschiff Zeppelin)的缩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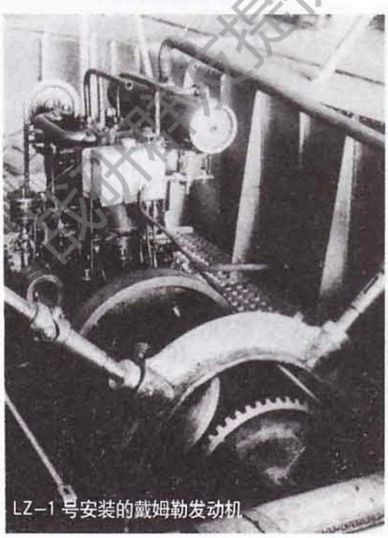

正在建造中的LZ-1号飞艇

当时还没有过如此之大的飞艇，航空界也有许多人认为齐柏林飞艇的试飞注定要失败。为了避免飞艇与地面上的建筑物或树木碰撞，决定在水面上试飞，齐柏林伯爵为此选择了自己家乡的康斯坦茨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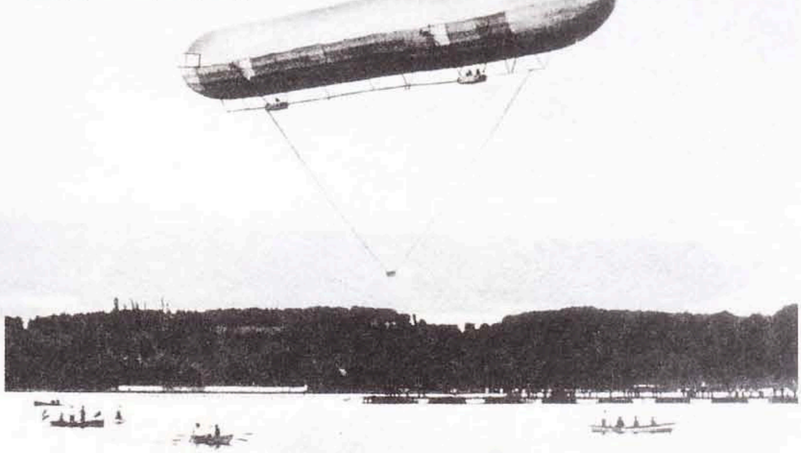
LZ-1号的第一次试飞是在1900年7月2日晚上8点03分。由于地面人员没有经验，再加上绳索搅乱，使得舵面把握不准，因此飞艇起飞不顺利。它在410米的高度上飞行了6公里，耗时17分钟，折合时速为22公里（每秒6米），从而打破了法国“法兰西”号飞艇保持了16年的飞行速度记录（每秒3米）。不过，由于驾驶人员没有操作经验，LZ-1号在降落到湖畔时又碰在一堆木柴上，撞破了蒙皮。

但是齐柏林不是轻易气馁的人，经过两个月的修复，LZ-1号又可以飞行了。这次他事先在康斯坦茨湖中搭起一个浮动艇库，由木料建成，架设在95个浮筒上，长152米，宽24米，高21米，两边开有11个窗户。办公室、寝室和储藏室设在艇库的一端。这个水上艇库的一端用锚链固定在水中，能够自由转向，使得入口常在下风的一方，但锚链曾被风吹断过多次，艇库也几乎被风吹到岸边。最后用了四吨半混凝土块和两个大铁锚，才使其稳定下来。10月31日，修好的LZ-1号飞艇再次试飞，这次达到了32公里的时速，滞空时间为28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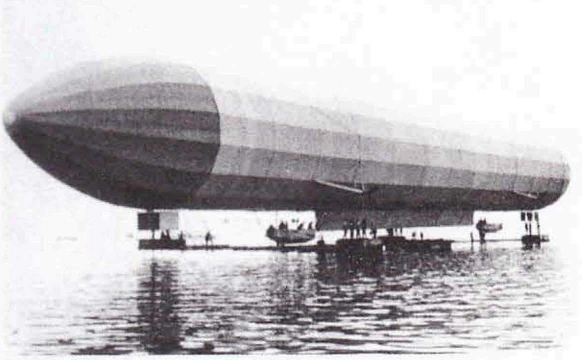
LZ-1试飞成功后，齐柏林伯爵名声鹊起，但是他并没


LZ-1号安装的戴姆勒发动机

在康斯坦茨湖上飞行的LZ-1号飞艇，1900年10月31日



LZ-2 号飞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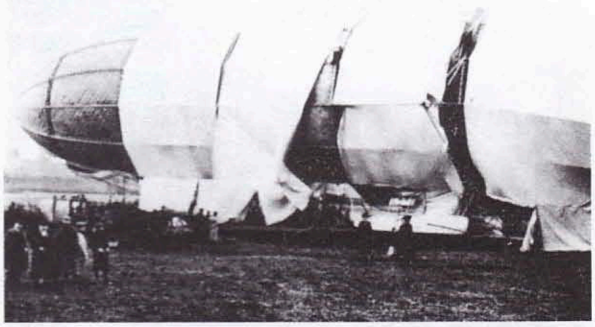


有在一片赞扬声中裹步不前，而是想法改进LZ－1号在试飞中暴露出来的毛病，想尽各种办法来筹款建造第二艘飞艇。

128米长的LZ－2号飞艇比前一艘有更坚固的骨架，并且安装了两台功率更大的84马力发动机。1905年11月30日，齐柏林仍准备在康斯坦茨湖进行试飞，并用浮动艇库把飞艇拖到湖中。但是由于湖水太浅，艇库不能随意活动，只好用小船来拖飞艇。恰巧此时湖面上刮起大风，小船竟然随飞艇被拖到了空中。飞艇上的人员急速把绳索切断，可是绳索又缠住了飞艇，使得艇身失去平衡，头部扎进水里，试飞失败。齐柏林把飞艇运到岸上，花了六个星期才修好。

1906年1月17日，LZ－2号飞艇再度试飞。这天的天气不坏，但是由于驾驶员过于注重上升高度，使得飞艇升到了1500米以上的高度，遇上猛烈的西南风。驾驶员缺乏经验，不能继续飞行，好不容易降落在康斯坦茨湖边，又在夜间刮起了大风，把LZ－2号彻底吹毁了。

坠毁在康斯坦茨湖畔基斯列希村的LZ-2号飞艇，1906年1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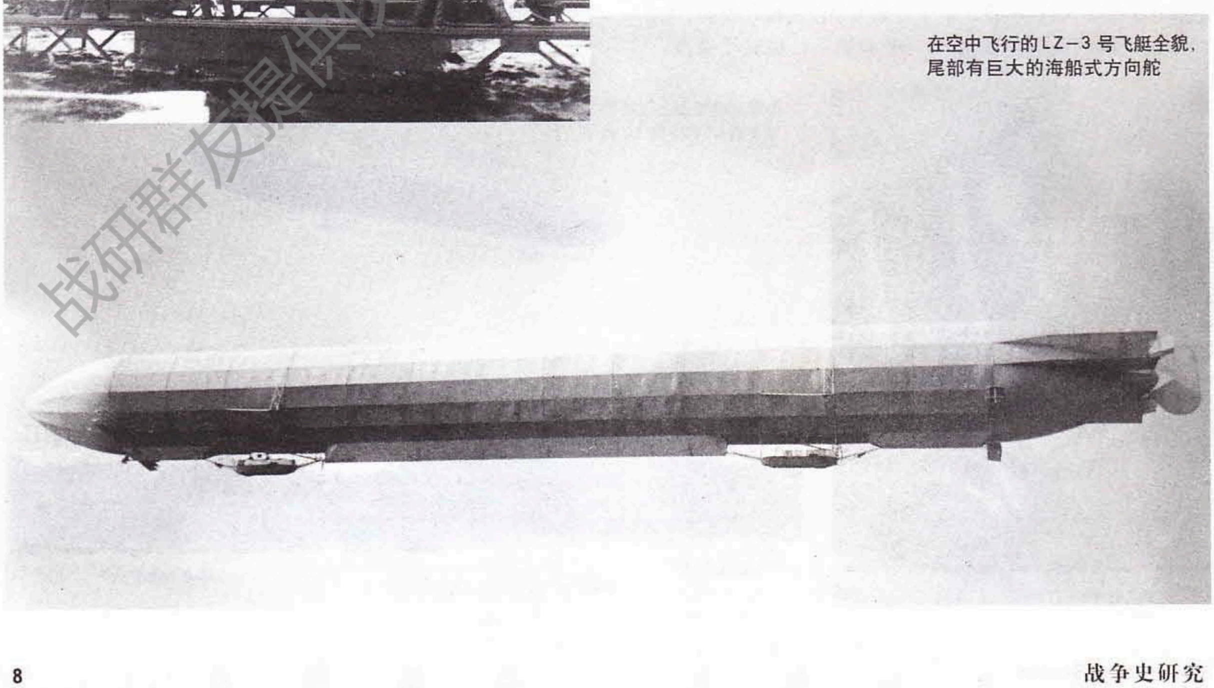


齐柏林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制造LZ－3号飞艇，并在1906年10月9日首次试飞。虽然试飞那天一副螺旋桨脱落，还把气囊划破，但是并没有导致飞艇坠毁。这说明齐柏林设计的气囊隔舱是有很大的安全性的。LZ－3号的首次飞行时间为两个小时，之后又进行了一次长达8小时的持续飞行，时速达58公里。此后LZ－3号一直在边飞行边改进，每改进一次，性能就增加一分。其载员人数从11人增加到14人，续航时间增加到12小时，航程也增加到180公里。1908年德国陆军买下这艘飞艇，将其命名为Z－1号飞艇，编入飞艇训练部队，一直使用到1913年才退役。德皇威廉二世还授予齐柏林伯爵“黑鹰骑士团”勋章，并奖给他50万马克奖金。

LZ-3 号飞艇的驾驶舱



受到激励的齐柏林在度过70岁生日之后，决定建造能够持续飞行24小时的LZ－4号飞艇，德国军方也表示只要能制造出来，军方就会购买这艘飞艇。1908年7月1日，LZ－4号飞艇在康斯坦茨湖上试飞成功，70岁高龄的齐柏林伯爵亲自驾驶这艘飞艇越过康斯坦茨湖进入瑞士领空。接下来他准备进行24小时滞空飞行试验。



在空中飞行的LZ－3号飞艇全貌，尾部有巨大的海船式方向舵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8 月 4 日早晨，LZ－4 号从康斯坦茨湖畔的腓特烈港起飞，中午 12 时平安到达美因茨。当天傍晚，在特雷布尔－格因斯海姆降落，调试了发动机的几处小故障，然后在晚 10 时起飞，继续飞行。在返回腓特烈港途中，LZ－4 的发动机再度发生故障，于是在斯图加特附近的埃席特丁根降落，对发动机进行修理。修好之后，由于补充氢气的时间过长，再加上未注意天气预报，LZ－4 在起飞时遇到了横切强风，其地锚被连根拔起，将飞艇拖行了 50 多米，被树枝刮破了气囊，导致氢气外泄。由于围观群众中有人抽烟，最终引发了大火。幸亏当时乘员都没有登上飞艇，因此无人伤亡。

LZ－4 号的这次飞行创造了 21 小时的世界纪录，但功败垂成，未能实现 24 小时飞行的目标。齐柏林伯爵伤心至极，但他的业绩和精神却受到了德国民众的敬佩。《法兰克福时报》的记者雨果·艾克纳（Hugo Eckener）在 LZ-4 失事后赶到现场进行采访，他本来是飞艇的激烈反对者，采访的目的也是为了拍摄几张照片，配合反飞艇的宣传。但是当他拿起照相机，对准 LZ－4 号的残骸时，发现七十高龄的齐柏林正含泪用斧头砍折飞艇，每挥动一下斧头，老人脸上就露出一阵难言的痛苦。这情景深深感动了艾克纳，他冲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齐柏林的双手。

从此之后，艾克纳成了齐柏林最有力的支持者、合作者，并在其去世后接掌了齐柏林飞艇公司的运营。他将 LZ－4 号失事的现场状况客观地报导出去之后，又把齐柏林伯爵为了发展飞艇而奋斗的事业进行了一番宣传，立即在德国民众中引起捐助热潮。齐柏林在一个星期就收到了 280 万马克的捐款，德国政府也拨给他 50 万马克作为下一艘飞艇的预付款。齐柏林伯爵最终收到的捐款总额高达 609 万 6555 马克，他用这笔钱成立了齐柏林飞艇建造公司（Luftschiffbau Zeppelin GmbH），并成立了齐柏林基金会，为今后的飞艇研究和制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雄厚的经济后盾之后，齐柏林飞艇的制造工作开始变得越来越顺利，建造速度也越来越快。1909 年齐柏林制造了 LZ－5 号和 LZ－6 号两艘飞艇，LZ－5 号是为德国陆军建造的，命名为 Z－2 号。

1910 年 4 月 22 日，在德国中部黑森地区著名的矿泉疗养地巴德洪堡，Z－2 号飞艇与帕西法尔飞艇公司制造的 PL－3 号飞艇，以及格罗斯－巴森纳赫飞艇公司制造的 M－1 号飞艇一同接受了德皇威廉二世的检视。这三艘陆军飞艇列队从空中缓缓飞过，降落在附近的林堡镇。4 月 24 日早晨，无人看守的 Z－2 号锚链突然断裂，飞艇被风吹走，向东边飘去，最终在 10 公里外的威尔贝格山撞到了树上，气囊被戳破，飞艇也最终坠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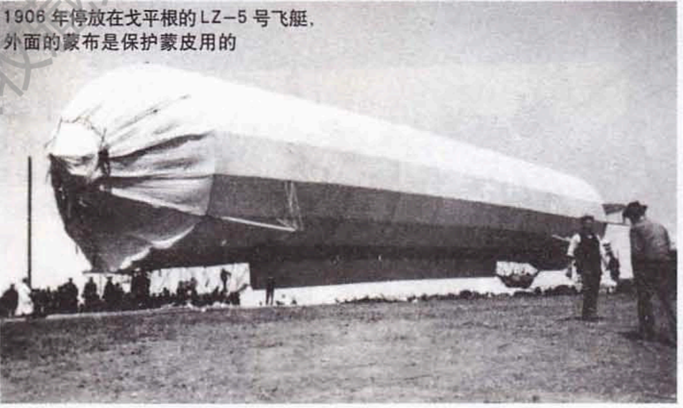
LZ－6 号是第一艘搭载无线电发报机的飞艇，也是齐柏林伯爵为了航空客运而专门建造的一艘试验飞艇。1909 年 11 月 16 日，在德国政府的协

贴着康斯坦茨湖湖面飞行的 LZ－4 号飞艇





康斯坦茨湖上的浮动艇库，LZ－4 号正在缓缓移出



1906 年停放在戈平根的 LZ－5 号飞艇，外面的蒙布是保护蒙皮用的

坠毁在威尔贝格山的 LZ－5/Z－2 号飞艇




建造中的LZ－6号飞艇，可见其铝制骨架


1909年时的LZ－6号飞艇，摄于哈勒


1909年齐柏林伯爵陪同德皇威廉二世参观LZ－6号飞艇，摄于柏林－泰格尔练兵场


LZ－7“德意志”号，齐柏林公司的首艘客运飞艇，中段增设了客舱。右图为坠毁在条顿堡森林的LZ－7号残骸

助下，由法兰克福市长弗朗茨·阿迪克斯出面，成立了“德国飞艇运输公司”（Deutsche Luftschiffahrts Aktiengesellschaft），简称为DELAG。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家航空客运公司，总资本为300万马克，其中260万马克来自法兰克福市和杜塞尔多夫市的市政府，另外40万马克资本则由腓特烈港的齐柏林飞艇公司以LZ－6号飞艇折价提供。这艘飞艇于1910年在艇库中失火焚毁，此后齐柏林公司又为DELAG公司建造了LZ－7“德意志”号飞艇。这艘飞艇首次在中部设置了客舱，两侧各布置10张藤条座椅，驾驶及乘务人员共12人。

DELAG公司在1910年开辟了从法兰克福至巴登巴登和杜塞尔多夫的空中航线，LZ－7号在当年6月19日进行了首飞。但是仅仅九天之后，这艘飞艇就在从杜塞尔多夫飞往法兰克福途中，在空中遭遇强风，被吹至著名的条顿堡森林（Teutoburg Wald）——公元9年，日耳曼人首领阿尔米纽斯在此战胜了罗马皇帝瓦鲁斯——并在森林中坠毁，所幸飞艇上的20名旅客全部安然无恙。

此后四年间，齐柏林公司又为DELAG建造了LZ－8、LZ－10、LZ－11、LZ－13和LZ－17共五艘客运飞艇。时乖命蹇的LZ－8“德意志二号”飞艇投入运营后不到两个月，就在降落的时候撞到艇库，骨架严重损坏而报废。在为德国陆军建造了LZ－9号飞艇（德国陆军编号为Z－2，直接沿用1910年坠毁的LZ－5的编号）之后，齐柏林飞艇公司又在1911年为DELAG公司建成了客运飞艇LZ－10“士瓦本”号（Schwaben）。它的外观与LZ－7和LZ－8号大同小异，全长140米，高16米，宽14米，气囊容量为17800立方。飞艇中部的客舱可以搭载20名乘客，前部为驾驶吊舱，后部为引擎吊舱，各安装2台145马力迈巴赫引擎，最高时速78公里，续航能力37小时，最大航程1400公里。

在其一年零两天的运营生涯里，“士瓦本”号一共飞行了364航次，搭载了6045名乘客，飞行了4.5万公里。1912年6月28日，“士瓦本”号在杜塞尔多夫机场遇到大风，艇体折为两半，泄露出来的氢气遇到火花后爆炸，燃起熊熊大火，烧伤了30多名地面工作人员。

当DELAG的下一艘齐柏林式客运飞艇，LZ－11“维多利亚·路易丝”号（Viktoria Luise）于1912年2月19日举行处女航时，这家航空公司已经将其空中航线网络扩展到柏林、巴登－奥斯、哥达、汉堡、德累斯顿和莱比锡等城市，并且同北德意志－劳埃德轮船公司携手成立了海上－空中联运航线。“维多利亚·路易丝”号被称为“幸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运飞艇”，在其三年的运营生涯中一共飞行了489航次，运送了9783名旅客，飞行了54312公里。1914年一战爆发前夕，这艘飞艇被德国陆军征用，改为训练飞艇，1915年10月解体。

1912年4月25日首飞的LZ-12号飞艇是德国陆军的订货，服役之后的编号为Z-3，它在1914年8月1日退役。腓特烈港飞艇工场接下来制造的LZ-13号飞艇也是DELAG公司的，命名为“汉萨”号（Hansa），首飞日期是1912年7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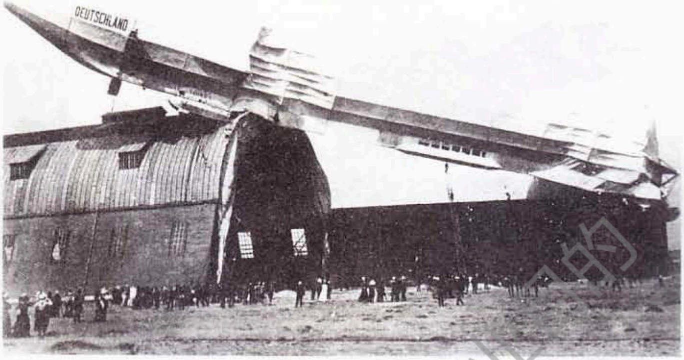
“汉萨”号的气囊容量为18700立方米，安装4台迈巴赫引擎，乘客人数为24人。1912年9月，齐柏林伯爵亲自驾驶这艘飞艇从汉堡起飞，前往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的马尔默。这是DELAG公司第一次将其航线延展到德国境外，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国际航空客运。“汉萨”号除了搭载旅客之外，还携带了一批邮件，这也是世界上首批航空邮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汉萨”号也像“维多利亚·路易丝”号一样被德国陆军征用，加装了两挺机枪，曾经多次轰炸法军阵地，并在波罗的海上空执行侦察任务。1915年“汉萨”号改为训练飞艇，翌年退役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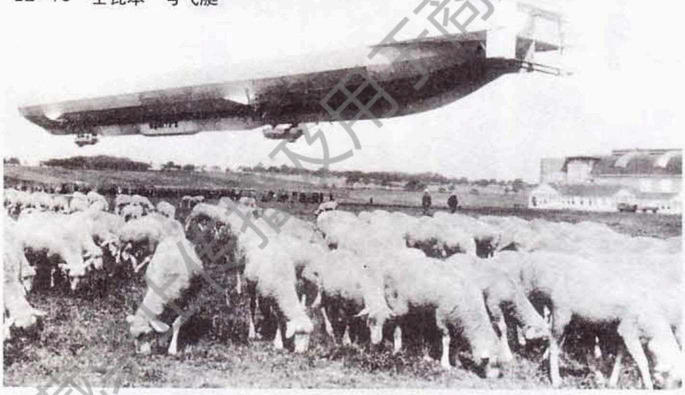
接下来的LZ-14号飞艇是德国海军的订货，海军编号为L-1。1913年9月9日，这艘飞艇在赫尔戈兰岛上空遇到雷暴，断裂为两截之后坠落到海中，20名乘员中有14人淹死在海中。这也是齐柏林飞艇首次发生重大的乘员伤亡事故。德国陆军订购的LZ-15号飞艇在1913年1月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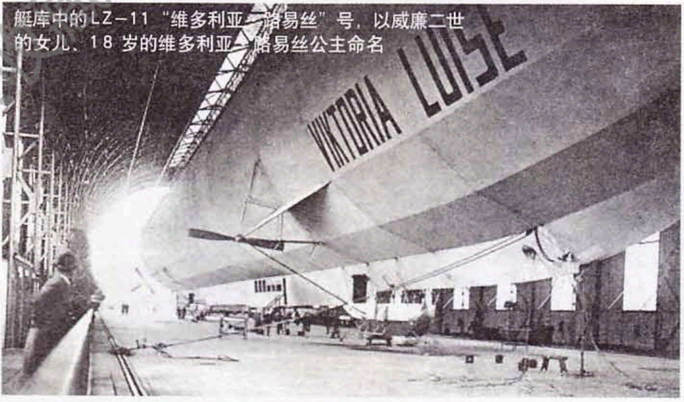

LZ-10“士瓦本”号的客舱

1911年5月6日在降落时撞到艇库后损毁报废的LZ-8“德意志II”号



LZ-10“士瓦本”号飞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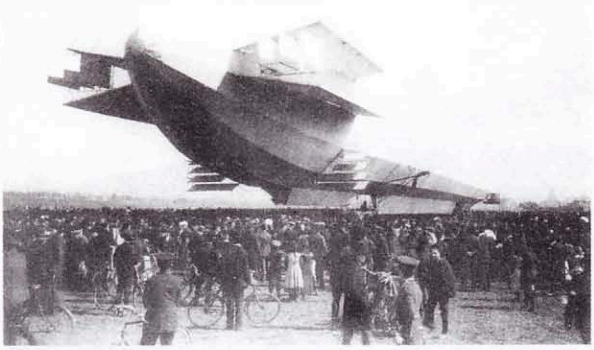




艇库中的LZ-11“维多利亚·路易丝”号，以威廉二世的女儿、18岁的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命名


旅客在腓特烈港登上LZ-11“维多利亚·路易丝”号飞艇的情景

LZ-13“汉萨”号飞艇





1913年英国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八世，戴鸭舌帽者）与齐柏林伯爵一道观看LZ-13号飞艇起飞



“汉萨”号的客舱



1913年首飞的LZ-17“萨克森”号是齐柏林公司在一战前建造的最后一艘客运飞艇

日首飞，3月19日在降落时损毁报废。

LZ-16号也是德国陆军飞艇，编号为Z-4，它在1913年4月3日曾经因浓雾而飞到法国境内，被拘留了一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艘飞艇曾经执行轰炸华沙的任务，后来在1916年解体。

1913年5月3日首飞的LZ-17“萨克森”号（Sachsen）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齐柏林公司建造的最后一艘客运飞艇，此后齐柏林公司接受的全部订单都是为德国陆军和海军建造飞艇，直至1919年才重新为DELAG公司建造用于客运的LZ-120号。在被德国陆军征用之前，“萨克森”号在419次飞行中一共运送了9837人次的旅客，飞行了39919公里。德国陆军在这艘飞艇上加装了炸弹挂架和无线电室，还在吊舱中安装了机枪。经过改装的“萨克森”号可以携带820公斤炸弹，连续飞行12小时。这艘飞艇在1916年秋天退役解体。

大战中的齐柏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陆军和海军都建立起了自己的飞艇部队。德国陆军的齐柏林飞艇以字母Z编号，配以罗马数字（本文为阅读方便起见改成阿拉伯数字）。由于罗马数字比较繁杂，因此从Z-13号飞艇（LZ-35）起改以LZ字头编号，但从LZ-39号起，这个编号系统又变得与齐柏林公司本身的飞艇建造序列号不一致，通常是以齐柏林序号再加上30，例如德国陆军LZ-74号飞艇是齐柏林公司的LZ-44号，德国陆军的LZ-85号是齐柏林

1913年停放在莱比锡－莫茨考机场上的LZ-13“汉萨”号飞艇



公司的LZ－55号，以此类推。陆军采用这种编号是为了防止敌国推算出德国飞艇的真正建造数量。至于德国海军的齐柏林飞艇，则以字母L（德文“飞艇”的字头）编号。

在一战爆发时，德国陆军一共有6艘齐柏林飞艇，分别是Z-4（LZ-16）、Z-5（LZ-20）、Z-6（LZ-21）、Z-7（LZ-22）、Z-8（LZ-23）和Z-9（LZ-25），此外还有从DELAG公司征用的“汉萨”、“维多利亚·路易丝”和“萨克森”3艘商用飞艇。德国海军在开战时只有一艘齐柏林飞艇L-3号（LZ-24），但是在1914年的其余五个月里，德国海军又获得了5艘齐柏林飞艇。从1915年起，齐柏林公司以差不多每月1.5艘的速度为德国陆军和海军建造新飞艇。其中大多数飞艇采用标准化图纸建造，可以分为M型、N型、O型、P型、Q型、R型等几个系列。这些不同型号飞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尺寸、气囊容积、引擎、速度和续航力、以及载弹能力上面，至于其外观则基本上大同小异。除了齐柏林飞艇之外，德国陆军及海军还使用舒特－朗茨（Schuette-Lanz）公司制造的木制龙骨硬式飞艇，编号为SL。

德国陆军的飞艇在开战后便开始执行轰炸任务，以图打击敌方士气。1914年8月5日夜，Z－6号飞艇成功地轰炸了比利时的列日要塞，8月26日，“萨克森”号和Z－9号飞艇对安特卫普实施了一周的轰炸，8月30日空袭了巴黎。这是战略轰炸的滥觞。在东线，德国陆军的Z－4号飞艇在开战后轰炸了华沙至圣彼得堡的铁路，Z－11号飞艇轰炸了华沙市和格罗德诺城。

除了对敌国城市进行战略轰炸之外，德国陆军也用飞艇执行侦察任务，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齐柏林飞艇贮满了易燃气体，为了获得有价值的战术情报，必须下降到可能被炮火击中的高度。1914年8月21日，Z－7号和Z－8号在阿尔萨斯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法国陆军用步枪击落，Z－8号被法国士兵俘获，随后炸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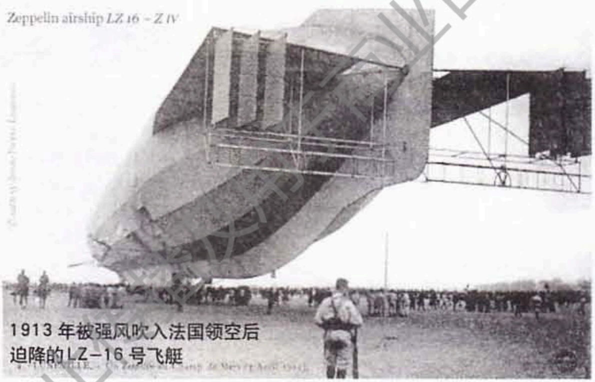
德国海军飞艇部队在1914年的主要任务是对英国海军舰队的动向进行侦察，这样德国海军的舰队可以避开与英国主力舰队的正面遭遇，而设法消灭主力舰队的分遣队。英国皇家海军充分认识到这些齐柏林飞艇的重要威胁，因此在战争初期便决定将齐柏林飞艇消灭于它们在德国的基地上。

1914年9月22日，英国皇家海军航空兵第1联队首次空袭德国，目标是杜塞尔多夫的齐柏林飞艇库。但是这次空袭并不成功。因浓雾所阻，只有1架飞机发现了目标。由于高度过低，投下的两颗小炸弹也没有爆炸。该联队在当年10月从比利时的奥斯坦德撤到法国敦刻尔克以后，决定对杜塞尔多夫的齐柏林飞艇库再进行一次攻击，同时轰炸科隆的飞艇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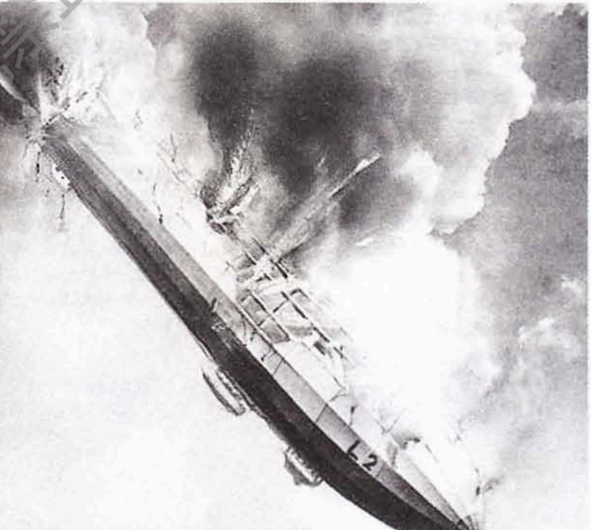
这次袭击拟于10月8日进行，由皇家海军航空兵仅有的3架索普威思·泰伯乐德（Spowith Tabloid）式飞机执行这一任务。泰伯乐德式飞机是当时最“现代”的飞机，星形汽缸式发动机外面有流线型整流罩，有完整的蒙皮结构，翼展只有7.77米。1913年11月首次在亨登做飞行表演时，以145公里的最大时度和每分钟366米的爬升率而轰动一时。到1914年10月，皇家海军航空兵有3架泰伯乐德式飞机，其中167号和168号属于皇家海军航空兵第1联队，准备去轰炸杜塞尔多夫的飞艇库的就是这两架。

由于目标距离太远，因此两架飞机没有把敦刻尔克作


为德国海军建造的LZ－14/L－1号飞艇在赫尔戈兰岛因恶劣天气坠毁



1913年被强风吹入法国领空后迫降的LZ－16号飞艇


1913年10月17日在柏林－约翰内斯塔尔机场上空起火坠毁的LZ－18号飞艇

LZ－18号的残骸。这也是一艘海军飞艇，编号为L－2。艇上28人全部遇难



舒特－朗茨飞艇与帕西法尔飞艇

1908年齐柏林伯爵的LZ－4号飞艇失事后，在德国掀起了一阵“飞艇热”。在此背景下，由奥尔登堡公爵资助，北德意志－劳埃德商船会社的造船学专家约翰·舒特教授（Johann Schuette）和木材商卡尔·朗茨博士（Karl Lanz）在1909年共同创立了舒特－朗茨飞艇公司（Luftschiffbau Schuette–Lanz），公司总部设在巴登大公国的曼海姆，制造厂在莱比锡。1911年，该公司制造的SL－1号飞艇在曼海姆附近首飞。其长度为131米，气囊容积19000立方米，搭载4台戴姆勒发动机，外形与齐柏林飞艇相似，主要的区别在于使用轻木和复合板材料制造飞艇的龙骨。由于性能优良，德国陆军在1912年收购了这艘飞艇。1914年舒特－朗茨公司为奥地利陆军建造了SL－2号飞艇，曾在一战中轰炸波兰和俄国。SL－3号飞艇是德国海军的订货，此后德国海军一共接收了8艘SL飞艇，德国陆军接收了6艘。

德国海军的舒特－朗茨SL－22号飞艇，1918年6月5日首飞，全长198.3米，直径23米，气囊容积56350立方米，安装5台240马力迈巴赫发动机，最大升重37.5吨，1920年解体。舒特－朗茨公司对飞艇的许多技术改进被齐柏林公司沿用



舒特－朗茨飞艇在技术上与齐柏林飞艇不相伯仲，在结构设计、安全性和适航性等方面甚至更先进一些。但是德国海军发现，由于海上空气中的潮气容易使木制骨架的各粘接部位开胶。此外，木材在一定尺寸规模的硬式飞艇设计中是一种理想的材料，但超过这个尺寸后，铝和硬铝就在结构应力和张力方面显示出优势。因为这一原因，舒特－朗茨公司从SL－23号飞艇开始也改以硬铝作为骨架材料。

由于德国政府及军方与齐柏林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更加垂青于技术上较保守的齐柏林飞艇，舒特－朗茨公司最终在与齐柏林公司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在1918年，舒特－朗茨公司有4艘陆军飞艇和1艘海军飞艇竣工后被德国军方以“缺乏驾驶人员”的借口拒收。该公司在一战期间为军方建造的其他飞艇也没有收到货款，这一大笔欠款在1918年德国君主政体垮台后就被自动勾销掉了。再加上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建造飞艇，因此使得舒特－朗茨公司的业务陷入危机。

舒特－朗茨公司在二十年代初曾经设计过3艘跨洋客运飞艇，分别是全长228.5米的SL－101“大西洋”号、长298米的SL－102“泛美”号和长274.5米的“太平洋”号（齐柏林公司建造过的最大飞艇“兴登堡”号长度只有245米），计划投入德国至纽约和南美的空中客运航线，但都因为协约国禁止德国建造大型飞艇的禁令而胎死腹中。1927年舒特－朗茨公司还参加过美国海军“阿克伦”号和“梅肯”号硬式飞艇的设计招标，但最终败于美国古德伊尔公司。此后舒特－朗茨公司转营汽车、木材和金属锻造业务，至今仍在营业。约翰·舒特教授在1924年曾经起诉魏玛共和国财政部，要求偿还飞艇欠款，在败诉后宣布破产。但他此后一直没有放弃设计飞艇的努力，直至1937年还试图为意大利设计飞艇，最终在1940年去世。

除了齐柏林公司和舒特－朗茨公司外，由奥古斯特·冯·帕西法尔创立的帕西法尔飞艇公司也是德国最主要的飞艇制造商之一，从1909年到1919年一共建造了22艘飞艇，主要是软式飞艇，也有半硬式飞艇，其中PL－13“雄飞”号由日本购买，PL－18在1913年卖给英国海军，作为巡逻飞艇一直使用至1917年，其性能颇受好评。PL－19原本也是英国海军的订货，一战爆发后被德国海军接收，此外还为德国海军建造了PL－25号，这也是帕西法尔公司建造的最后一艘软式飞艇，此后它改为建造半硬式飞艇。一战结束后帕西法尔公司一蹶不振，在三十年代末建造过3艘小型广告用飞艇，随后就倒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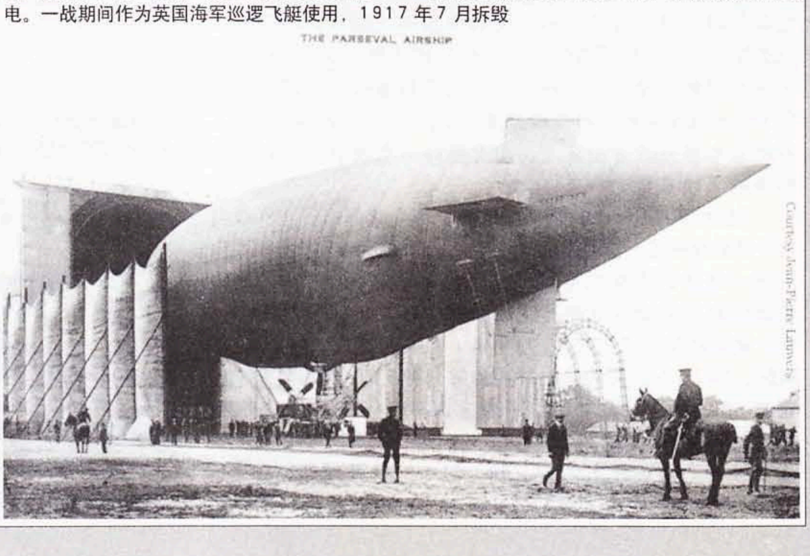


约翰·舒特（左）和奥古斯特·冯·帕西法尔（右），摄于1929年



1910年在巴德洪堡举行的飞艇检阅仪式，汽车中是德皇威廉二世和威廉皇太子。天上的两艘飞艇分别是齐柏林LZ－5号和帕西法尔PL－3号

下图为帕西法尔公司建造的PL－18号飞艇，是英国海军的订货，1913年4月2日首飞，全长80米，直径15米，容积1万立方米，安装两台180马力迈巴赫引擎，乘员9人，带有机枪和无线电。一战期间作为英国海军巡逻飞艇使用，1917年7月拆毁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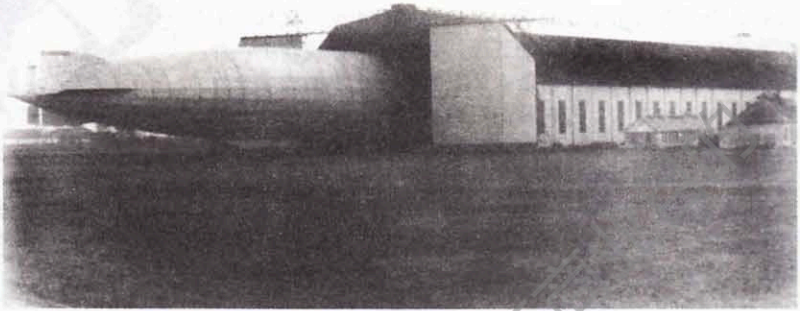
为出发基地，而是于10月8日飞到比利时安特卫普郊外的威尔里克机场。不幸的是，那里的机场已在德国炮火控制之下。两位英国海军飞行员，斯潘塞·格雷少校和马里克斯中尉在加油之后驾驶飞机从弹坑累累的机场起飞。格雷飞往125英里以外的科隆，马里克斯飞往杜塞尔多夫。

格雷运气不佳，科隆的地面笼罩着一层薄雾，遮盖了飞艇库，使这次空袭化为泡影，但他看到了一处很大的火车站，对其进行了轰炸。而在科隆以北40公里的杜塞尔多夫，马里克斯发现下面的情况很理想。他没费多大力气就发现了一座庞大的飞艇库，随即向下俯冲，投下了携带的两颗20磅炸弹。当他开足马力爬高时，回头看到从飞艇库里喷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直径足有150米。马里克斯的两颗小炸弹击中了艇库，在艇库内爆炸。库内正停放着新建成的Z-9号飞艇（齐柏林公司建造序号LZ-25），其气囊内28320立方米的氢气立刻被点燃，这架飞艇和艇库立即化为乌有。Z-9号是齐柏林公司在和平时期建造的最后一艘飞艇，也是开战后被英国摧毁的第一艘齐柏林飞艇。

摧毁Z-9号飞艇是英国空军第一次袭击德国本土的成功战斗。自从开战以来，德国海军的飞艇为所欲为，像影子一样尾随着英国舰队，形影不离，而像老牛爬行一样笨重的英国水上飞机又对它们无可奈何。总之，齐柏林飞艇对皇家海军的威胁有增无减，因此摧毁Z-9号一事使英国海军感到特别宽心。况且英国陆军航空队隶属于陆军，眼下已随同英国远征军调到比利时和法国作战，由海军负责保卫英国本土。英国海军部认为德国随时可以用齐柏林飞艇空袭英国港口和军事目标。无疑，这种猜想是正确的。

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在1914年要对夜间飞行的齐柏林式飞艇进行截击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对杜塞尔多夫的成功空袭鼓舞了英国海军部，他们决定对腓特烈港的齐柏林公司主要生产基地进行一次先发制人的攻击。腓特烈港是齐柏林伯爵本人的出生地，也是齐柏林飞艇制造公司的总部和生产基地。到1914年，这个地方不仅建了几座巨大的装配库和氢气工厂，还有占地很大的车间和一个巨大的飞艇库，显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目标。

一战当中的腓特烈港齐柏林飞艇库，LZ-26号飞艇正缓缓从库中移出



这次空袭是一次最重要的战略轰炸，英国海军部对此精心策划，非常保密。选用的飞机是阿弗罗504型。这是一种了不起的飞机，在皇家空军服役达15年以上。它虽然是双翼机，但结构简单而结实，重量只有420公斤，而且非常容易驾驶。为了实施腓特烈港作战，3架新的阿弗罗504型飞机（873号、874号和875号），加上海军的179号飞机，在阿弗罗飞机工厂所在地曼彻斯特组成了一支特别飞行队。

1914年10月，谢泼德少校受命担任空袭腓特烈港行动的指挥官。飞机将从距瑞士边境不远的贝尔福起飞，距离目标约190公里。这4架阿弗罗式飞机各携带4颗20磅炸弹，这在1914年算是很重的战斗载荷了。它们在英国本土试飞完毕后，分解装到一艘轮船上，于11月13日运到了法国的勒阿弗尔港。这些仍然装在板条箱里的飞机被装上平板列车，运到一家停产的工厂，然后在夜幕的掩护下用军用卡车运到贝尔福的一个法国陆军飞艇库。第二天下午，4架阿弗罗式飞机在那个庞大的艇库里重新装配起来，然后加油，装弹，每架飞机携带4颗炸弹。飞行员于11月15日早晨到齐，但恶劣的天气使作战推迟了。

11月20日早晨，气温为零下7摄氏度，法国技师向发动机中灌注了热蓖麻油。在刺骨的寒气中，4架阿弗罗双翼机开始滑行，其中3架成功升空。179号飞机驾驶员坎农少尉发现他的飞机发动机每分钟不到100转，沉重的负荷使这架阿弗罗式飞机没有离开地面的迹象。坎农关了油门，顺着风滑回起飞点准备再试一次。他急切地要使179号飞机起飞，结果却令飞机在地面上打滑，打坏了尾橇。因为要花很长时间修理，只好把它推回艇库拆卸修理。其余3架阿弗罗式飞机从中

停放在法国贝尔福机场、准备空袭腓特烈港的三架阿弗罗504轰炸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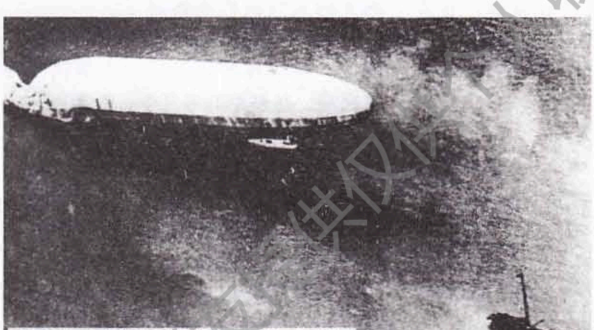
立国瑞士的巴塞尔上空通过，在11点30分飞到腓特烈港上空，看到了齐柏林飞艇库。11点55分，3架阿弗罗飞机从1200米高度俯冲到290米，投下了炸弹。布里斯格少校驾驶的飞机在目标上空遭到地面炮火的猛烈射击，中弹后着陆被俘。

在递交给英国海军部的报告中，轰炸腓特烈港的飞行员们认为这次攻击十分成功。他们宣称一座生产氢气的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火焰直冲蓝天，装配车间也被炸中，炸毁了艇库里面的飞艇。但是实际上只有一座车间挨了一枚炸弹，损失并不大，齐柏林工厂的两座大飞艇库也没有被击中，离它最近的一枚炸弹落在了20米远的地方，只是震裂了其中一座艇库的一扇窗户而已。

尽管物质损失微乎其微，但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于11月23日在一份关于空袭腓特烈港行动的证词中还是对下议院说："这次作战飞行了250英里，深入德国领土150英里，飞越重重峻岭，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持续飞行，战果可观。"瑞士当局强烈抗议这些英国飞机侵犯了他们的中立，因此英国决定放弃对腓特烈港的后续攻击。

对腓特烈港的袭击虽然是由皇家海军航空兵实施的，却是使用陆军飞机，从陆上机场起飞。当时皇家海军航空兵的活动只限于水上飞机侦察巡逻，主要从英国本土的一些基地起飞，在北海一带进行巡逻。不过，当时水上飞机的续航力小，作战距离也因此受到限制，要使水上飞机能到更远的地方作战，必须有能搭载它们的母舰才行。1914年8月，英国海军部把英吉利海峡的3艘渡轮"恩加丹"号、"里维埃拉"号和"女皇"号改装成水上飞机母舰，每艘可以搭载3架水上飞机，虽然搭机不多，但是航速较高，达21节，足以随同舰队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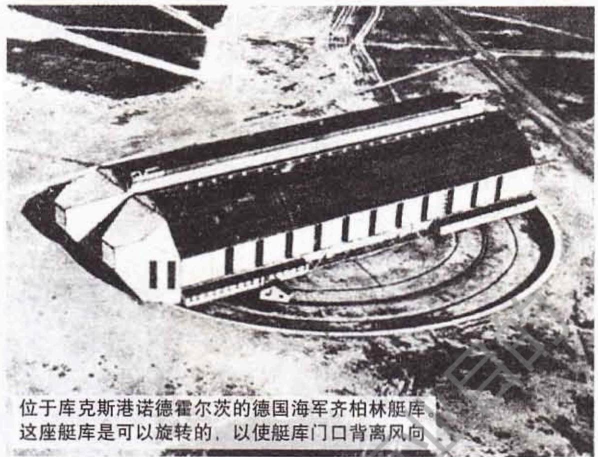
1914年11月，英国皇家海军决定用这3艘水机母舰对



1915年空袭英国后因发动机故障而迫降在海面上的LZ-43/L-12号飞艇，正由拖船拖往德军占领的比利时港口奥斯坦德



德国海军齐柏林飞艇的露天式驾驶吊舱



位于库克斯港诺德霍尔茨的德国海军齐柏林艇库。这座艇库是可以旋转的，以使艇库门口背离风向

库克斯港以南诺德霍尔茨（Nordholz）的齐柏林飞艇基地发动一次空袭。这次空袭有两大目的：第一，消灭德国海军的齐柏林飞艇及其基地；第二，至少消灭一部分停泊在威廉港内的德国舰队，或者诱其出港作战。在英国海军部看来，后一个目的是整个作战的核心，水上飞机实施空袭是"次要的，附带的，尽管也很重要……"这次水上飞机攻击定于1914年圣诞节这天进行。

由"恩加丹"号、"女皇"号和"里维埃拉"号组成的攻击部队，在2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的护航下，于12月24日17点从哈里奇出发。10艘潜艇也在海上掩护水面舰艇，同时准备执行救援飞行员的任务。在这次空袭中，除了主要目标——库克斯港的齐柏林飞艇外，飞行员还要提供其他一些特殊目标的情况：易北河1号灯船位置，希林航道船只的锚泊位置，威廉港内的军舰数量和舰级，栅栏障碍情况，水雷场航道布标情况，以及英国舰只能够攻击的德国海军各锚地的目标等等。

7点30分，机翼标有大红圈机徽的7架水上飞机升空，飞向40英里以外的库克斯港。7点35分，水上飞机的隆隆响声刚刚在远处天际消失，从赫尔戈兰岛方向飞来一艘齐柏林飞艇，它是德国海军的L-6号（齐柏林公司序号LZ-31。下文括号中的LZ编号均为齐柏林序号）。这艘飞艇向"女皇"号水机母舰投了几颗炸弹，但均未命中。英国巡洋舰"大胆"号用152毫米炮还击，有几颗炮弹在L-6号附近爆炸，把它赶走了。

飞机飞到东弗里西亚群岛上空时，下面雾气茫茫，只好一再降低飞行高度，直到飞行员和观察员能看到模糊的沙丘轮廓为止。雾越来越浓，飞行员不得不失望地在雾层上面飞行，浓雾把地面完全遮住了。7架攻击机当中，没有一架发现诺德霍尔茨的德国海军飞艇库。水上飞机编队于是转向西南，飞到威廉港，发现港内一空如洗，但港外的雅德水道（Jade River）锚地内锚泊的军舰历历在目，共有7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和许多驱逐舰。面对猛烈的高射炮火，水上飞机把几颗炸弹投向一艘巡洋舰和一处水上飞机泊地，但是没有给德方造成任何损失。

只是由于大雾遮住了诺德霍尔茨，才使那里的齐柏林飞艇免遭来自海上的轰炸，但皇家海军的这次攻击几乎立即产生了反响。15天后，曾经对使用飞艇轰炸英国本土犹豫不决的威廉二世终于拿定了主意，授权空袭不列颠的目标。不过，空袭"严格限于军事制造厂、兵工厂和船坞，

总之，限于军事设施……伦敦城不准轰炸。”德国海军有3艘齐柏林飞艇用于执行这一任务，分别是L－3（LZ－24）、L－4（LZ－27）和L－6号，都是L－3型飞艇。该型飞艇长185米，氢气容量22656立方米。虽然它们速度慢，最大时速只有80公里，但实用升限达3050米，能持续飞行30多小时，对于坐在敞开式吊舱里和炮位上执行作战任务的成员来说，无疑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经过严格配平的齐柏林飞艇不像普通飞机那样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也不能在多云天气或夜间进行仪表飞行。然而它们由于续航时间长，能够在白天从基地起飞，而在夜幕掩护下飞到英国上空，然后又在白天返回德国降落。那时还远没有雷达这类观测设备，防御一方的飞机只能靠目力观察进行拦截，而在夜间进行目力观察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齐柏林飞艇也遇到了麻烦，地面吹来的强风常常使它们无法操纵。

大风把首次空袭不列颠岛的日期推迟到了1915年1月13日。那天，3艘齐柏林飞艇起飞，去攻击英国的目标，但北海上空的恶劣气候使它们不得不折回，没有到达英国海岸。六天以后，天气好转。L－3号（艇长汉斯·弗里茨海军少校）和L－4号（艇长霍尔芒德海军少校）从汉堡附近富尔斯巴特尔（Fuhlsbuettel）的两个大飞艇库中拖出，飞往英国东海岸以西300英里的亨伯。当它们通过易北河口时，能够旋转的诺德霍尔茨艇库转向逆风，第3艘齐柏林飞艇L－6号从艇库中拖出。该飞艇的艇长是伯朗德范尔海军上尉。在这架飞艇上还有一位重要乘员——德国海军飞艇部队司令彼得·施特拉塞上校（Peter Strasse）。他此前曾力劝德皇准予用齐柏林飞艇空袭英国本土，这次的攻击计划也是他制定的。

L－6号升空后穿越北海，飞向泰晤士河口，13点30分从荷属弗里西亚群岛的特瑟尔岛上空飞过，不久，另外两艘飞艇也从这里飞过。刚飞到北海上空，L－6号的发动机出了故障，被迫返回诺德霍尔茨，甚至连英国海岸也未看到，施特拉塞和同机乘员十分扫兴。其余两架齐柏林飞艇在天黑后接近英国，于20点飞过英国海岸，没有被地面发现。

由于英国人没有实施灯火管制，所以下面的城镇被飞行员看得一清二楚。在埃塞克斯上空过了一会儿后，飞行员在诺福克以南140公里上空的预定点判明了自己的位置。这两架飞



1915年时的L－6号飞艇（LZ－31），翌年9月在加氢时与L－9号飞艇一道失火焚毁。远处是L－11号（LZ－41），它在1916年参加了日德兰大海战



L－9号飞艇（LZ－36），曾4次空袭英国，共空投炸弹5683公斤。此外还执行了74次侦察和巡逻任务



彼得·施特拉塞（1876－1918），一战时的德国海军飞艇部队司令。出生于汉诺威，15岁时加入德国海军，1913年调入海军飞艇部队，其司令弗里德里希·梅青在L－1号飞艇事故中淹死后，施特拉赛继任此职。一战中指挥德国海军飞艇对英国进行空袭，被认为是远程战略空袭之父。纳粹德国海军的第二艘“齐柏林伯爵”级航空母舰的预定舰名就是“彼得·施特拉塞”号

艇大概在这之后就分道扬镳了。L－3号在1500米高空冒着雨雪飞行，20点30分在渔港大雅茅斯投了几颗炸弹。德国皇帝关于限于轰炸军事目标的旨意没有被严格执行，投下的炸弹摧毁了许多住宅，炸死居民2人，炸伤了一些人。

L－3空袭大雅茅斯时，L－4号向北飞向东盎格利亚，大约在22点经过海滨胜地亨斯坦顿，沿大东铁路线飞到沃什的一个小村黑查姆，投了一颗炸弹，炸弹在开阔地爆炸，没有造成伤亡。这架齐柏林飞艇又飞过10公里以外的桑德林厄姆。那里有英王乔治五世居住的乡间住宅，所以后来就传说这次空袭的目的是要炸死英王，不过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乔治和威廉二世同是国君，又是表兄弟，威廉是不会对另一位君主下此毒手的。而且L－4号当时并不知道乔治五世住在桑德林厄姆。它一直飞到能看到金斯林恩灯光的地方，于23点投下了剩下的两颗炸弹，炸毁了本廷克街的一排房屋，炸死一名妇女和一名少年，炸伤了这个少年4岁的妹妹，另外还炸伤了12人。

1915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里，德国海军的齐柏林飞艇不断地对不列颠岛进行零敲碎打的空袭。4月间，攻击

考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用于商业目的

了英格兰东北地区的布莱恩，埃塞克斯郡的洛斯托夫特和莫尔登，伊普斯维奇和伯里圣埃德蒙兹。轰炸虽然造成了一些伤亡，但都不严重。当年5月，在P 型飞艇投入使用后，德皇威廉二世解除了不准轰炸英国首都的禁令。但是规定轰炸只限于伦敦塔以东，也就是工厂和船厂密集的东伦敦地区，严禁飞行员把炸弹投到伦敦西区（可能是害怕击中白金汉宫）。

5月31日，齐柏林飞艇首次成功地轰炸了伦敦。当时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处于浓雾弥漫之中。执行轰炸任务的包括LZ－37号和LZ－38号两艘陆军飞艇，但是LZ－37号途中出现结构损伤，不得不中途返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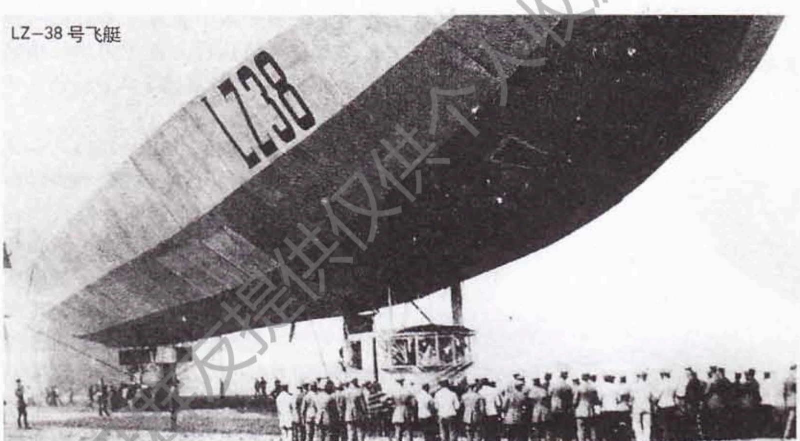
LZ－38号此前曾两次试图轰炸伦敦，但都没能发现目标，改为轰炸拉姆斯盖特和滨海绍森德，一共炸死6个人。这次LZ－38进入目标区域之后，熄灭了发动机，以免被地面的英军发现。晚上10点30分，艇长林纳尔茨发现西边地平线上有一条光带，那里就是伦敦。他下令让飞艇从西方向伦敦迂回，在1300米高空把炸弹投了下去。当时没有什么瞄准仪或导航器，所以艇员一听到投弹命令，就稀里糊涂地把炸弹往下扔。LZ－38号一共向伦敦投下了91枚小型燃烧弹（由铝热剂、苯和焦油制成）、28枚炸弹和2枚手榴弹，只炸死7人，炸伤35人，建筑物损坏也不大，根据保险公司事后评估，损失只有18596英镑。

6月6日至7日夜间，德国海军的L－9号飞艇也试图轰炸伦敦，但是没有找到这座城市，因此轰炸了赫尔河畔金斯顿城（Kingston upon Hull），炸死64人。这次空袭的结果在居民中掀起了反德浪潮，德国人开设的商店门窗被捣毁，店铺洗劫一空。

负责保卫不列颠的皇家海军航空兵对英伦三岛上空的齐柏林飞艇无所作为。高射炮火无能为力，战斗机也只能坐等战机，在夜间接到齐柏林飞艇来袭的报告后才起飞（没有飞行仪表），凭目力观察进行截击。这只能是碰运气。其实，就连这样的截击也只有少数几次。英国飞行员很快就发现，齐柏林飞艇扔掉压载后1分钟能爬高300米，比战斗机的爬升速率大得多，当时的战斗机很少有一分钟能爬100米的。直到1915年6月，英国人没有击落过一架齐柏林飞艇。

对付德国人空袭的唯一可行办法是采用29年后盟军对付德国V－2火箭的那种战术，即攻击齐柏林飞艇起飞的基地。此前英国人曾经采取这种战略消灭或重创过齐柏林飞艇。为了进一步取得战果，皇家海军航空兵第1中队的4架飞机于1915年6月7日，也就是L－9号轰炸赫尔的同一天，从敦刻尔克基地起飞，去轰炸比利时布鲁日附近的贝尔赫姆阿加瑟，以及布鲁塞尔附近的埃维尔这两处飞艇基地。


因击落LZ－37号飞艇而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英国海军飞行员雷金纳德·沃恩福德（1891－1915）


LZ－38号飞艇


德国海军的L－10号飞艇（LZ－40），曾五次空袭英国，投下9900公斤炸弹。1915年在库克斯港诺德霍尔茨飞艇基地遇强风损毁

英国海军飞行员不知道的是，这两处基地的3架齐柏林飞艇（德国陆军的LZ－37、LZ－38和LZ－39）已在头一天晚上起飞去空袭伦敦，但起飞后不久，LZ－37和LZ－38的发动机都出了毛病，正在返航。LZ－37号在返航途中经过比利时奥斯坦德上空时，被沃恩福德少尉发现。他当时驾驶第1中队的3253号莫兰－索尼埃L型单翼机(Morane－Saulnier)，机身下挂6颗20磅炸弹，爬升速度受到限制。如果被齐柏林飞艇发现，后者可以轻而易举地爬升到比它更高的高度。

沃恩福德在2440米高度跟踪这架深灰色的齐柏林飞艇达40分钟之久。在布吕赫附近，齐柏林飞艇开始向基地降落。沃恩福德在它上方600米垂直俯冲下来，齐柏林飞艇的上部炮手发现后立即射击，其他炮手也随后开火。沃恩福德不得不离开，但仍保持高度上的优势，他开足马力，使飞机升到3350米的升限。

遭到突如其来的攻击后，齐柏林的艇长没有恋战，决定加紧返航。炮手停止了射击，这架庞大的飞艇开始降落。可能是由于飞艇漏了氢气，艇长才下这样的决心。沃恩福德离这架

飞艇1000米，保持着600米的高度优势，他关了油门，静静地滑向这架飞艇。这时敌艇的高度大约为2100米，正在快速下降。沃恩福德坐在翼展只有10米的单翼机里，在飞艇上方45米处拉动了投弹开关，投下了6颗炸弹。5颗炸弹没有投中，第6颗刚好击中目标，接着是一声震天撼地的大爆炸，LZ－37完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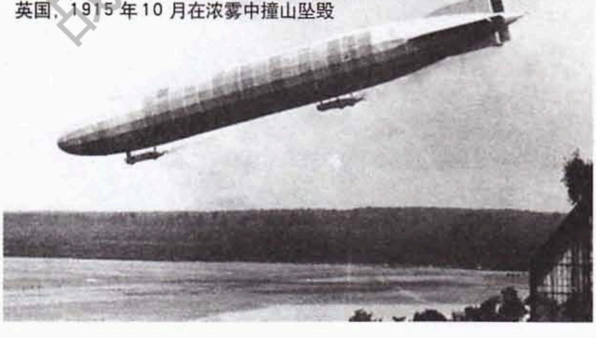
氢气爆炸的震动使沃恩福德的飞机翻了个儿，他系着安全带，从座舱里掉了下来，掉在机翼上。这时他看到那艘齐柏林飞艇像一根巨大的火炬，拖着燃烧着的蒙皮倒栽葱坠了下去。熊熊燃烧的LZ－37最后掉到了根特城一所修道院的外面，两名修女和几个孤儿遇难。沃恩福德又爬回飞机，但发动机已经熄火，一直没有发动起来。他在漆黑的夜空中滑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迫降在距德国前线30英里的一块田野里。令人惊叹的是，莫兰式飞机居然完好无损。沃恩福德用火把照明，找到了发动机的毛病，原来是一根油管的接头漏油。他随即排除了故障。在迫降35分钟后又起飞向敦刻尔克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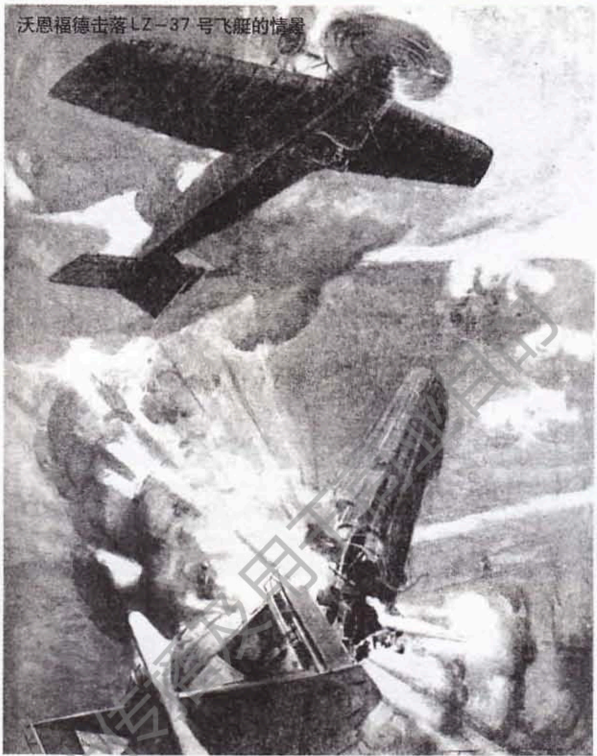
不到36小时后，沃恩福德收到了英王乔治五世的贺电，他获得了英国最高的军事荣誉——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不幸的是，4天后，沃恩福德驾驶法曼式飞机载着美国记者哈里·尼达姆在巴黎上空飞行时，决定玩一个大坡度盘旋。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飞机发生横滚，他俩都未系安全带，从飞机里掉下来摔死了。

10月13日，德国海军派出L－11、L－13、L－14、L－15和L－16共五艘飞艇，对伦敦展开另一次空袭。L－15号丢下的一枚炸弹在查令十字街附近的莱修姆剧场爆炸，因此这次轰炸后来被称为"剧院空袭"。L－13、L－14和L－15这三艘飞艇一共丢下2400公斤炸弹，在伦敦的河滨区炸死149人（另两艘飞艇轰炸了诺福克郡和赫特福德郡）。这次轰炸引起英国公众的强烈抗议，说德国人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公开出版的漫画，把德国人描绘成用刺刀挑


德国陆军LZ－72号飞艇（LZ－42），只作为训练飞艇使用

德国陆军LZ－74号飞艇（LZ－44），曾四次空袭英国，1915年10月在浓雾中撞山坠毁




沃恩福德击落LZ－37号飞艇的情景

死儿童的邪恶猛兽，用德语"骇人听闻"一次来描写齐柏林飞艇乘员的罪行。这也是德国飞艇部队1915年对英国本土的最后一次空袭。在这一年里，德国陆军和海军的飞艇部队一共空袭英国20次，投下37吨炸弹，炸死181人，炸伤455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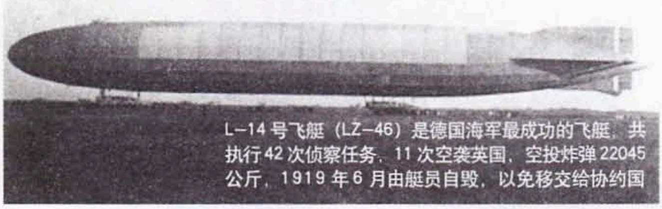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次大规模空袭在一夜之间所造成的民众伤亡，都比齐柏林飞艇轰炸英国的全部战果要严重得多，所以齐柏林飞艇1915年在英国公众中引起的那么大的公愤，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在齐柏林飞艇空袭英国之前，战争都是由士兵进行的，就英国而言，大多数战争是在外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没有袭击过睡在床上的无辜百姓。可是德国却这样干了。齐柏林飞艇对英国本土的空袭是军事上的分水岭，是第一次在新的"总体战"概念下进行的。在总体战中，制造恐怖是一种手段，而交战双方的全体居民都像战场上的军人一样，成为合法合理的攻击目标。

英国皇家海军虽然很关注齐柏林飞艇对英国城镇空袭造成的后果，但实际上更担心齐柏林飞艇在军事上的另一种作用（更为重要的作用）：它们像影子一样尾随着英国舰队，用无线电随时报告英国舰艇的动向。正如费希尔海军上将在1916年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他抱怨说："齐柏林飞艇时刻用无线电报告英国舰队的每一个行动，英国主力舰队无法驶出斯卡帕湾采取任何带有突然性的行动。"

英伦上空的火炬

到1916年时，德国海军有两种型号的齐柏林飞艇。L－11号（LZ－41）到L－24号（LZ－69）被称为P型飞艇，长163.5米，气囊容量为31900立方米，安装4台240马力迈巴赫引擎，最高时速97公里。这一型飞艇前后一共建造了22艘，构成了德国远程空袭的主力。更新的是L－30系列


LZ-26 号飞艇（Z-12 号）是德国陆军最成功的飞艇之一，在法国北部和东线执行了 11 次空袭任务，共空投 20000 公斤炸弹，1917 年 8 月解体


L-14 号飞艇（LZ-46）是德国海军最成功的飞艇，共执行 42 次侦察任务，11 次空袭英国，空投炸弹 22045 公斤，1919 年 6 月由艇员自毁，以免移交给协约国


德国陆军 LZ-77 号飞艇（LZ-47），曾八次空袭英国和法国，投弹 12610 公斤。1916 年在凡尔登战役中试图轰炸一处铁路枢纽时，被法国陆军火炮摧毁

飞艇，也被称为 R 型或者“超级齐柏林”，其编号从 L－30（LZ－62）一直到 L－34（LZ－78）。德皇和总参谋部对 R 型飞艇寄予厚望。它们不是老式齐柏林飞艇的简单改进，而是全新的设计。这种新飞艇长 198 米，气囊容量 55000 立方米，装有 6 台 240 马力的迈巴赫引擎，时速高达 100 公里，而且可以装载更多的炸弹。但在速度和爬升高度上，它们并没有超出其前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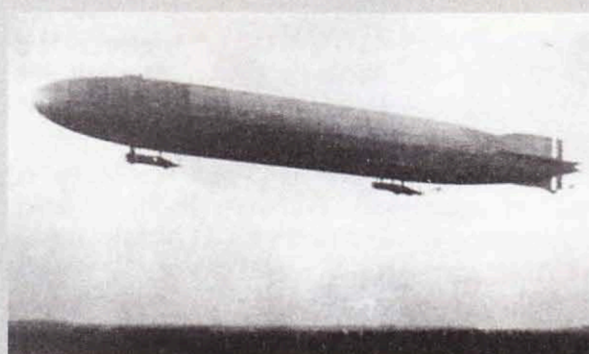
1916 年夏天，英国人研制多年的 3 种机枪子弹正式列装。其中两种分别以发明者的名字命名为“波默瑞”（Pomery）和“布洛克”（Brock），是高爆子弹。另外一种，“白金汉”，是填充白磷的燃烧弹。这些子弹如果单独向飞艇射击，效果有限得很。但是把它们混合起来之后，则变成了一种致命的武器：高爆子弹打穿飞艇的气囊，让逃逸出来的高纯度氢气与空气充分混合，然后再由燃烧弹将这一大团混合气体引爆。这种混装子弹成了对付德国飞艇最有效的武器。飞艇一旦被这种子弹击中，通常不能幸免。曾经目睹过德国飞艇坠毁的人说，夜空中熊熊燃烧的飞艇照亮了整个天空，如同供奉瓦尔哈拉圣殿诸神的火炬一样，缓缓地向地面落去，场面极为壮观。由于对齐柏林飞艇的袭击束手无策，英国一度民心士气低落。现在皇家空军找到了雪耻的手段。

1916 年夏天，新的 R 型飞艇开始加入德国海军的空袭部队。彼得·施特拉塞策划集中手头的所有飞艇对英国搞一次倾巢出动的空袭。他坚信，德国飞艇部队倾倒在英国目标上的密集炸弹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这场战争。齐柏林飞艇是德国的战争宠儿，人们狂热地崇拜这些巨大的机器，每次对英国的空袭总能赢得全德国的一片欢呼鼓噪之声。英国人则对这些打不到、够不着的东西恨之入骨，以至于当 L－19 号飞艇（LZ－54）坠毁在北海的时候，附近的英国渔船“斯蒂芬王”号无视“救助海上遇难者”的古老原

【注】L-19 号的齐柏林公司序号为 LZ-54，于 1915 年 11 月 27 日首飞，服役后执行过 14 次飞行任务，主要是在北海上空对中立国商船实行临检。它属于 P 型飞艇，装有四台 180 马力迈巴赫 C-X 引擎，后来换为 240 马力迈巴赫 HSLu 引擎，其中 1 台布置在前吊舱，3 台布置在后吊舱。可以携带 1600 公斤炸弹，飞艇上装有若干 MG08 机枪作为自卫武器。1916 年 1 月 31 日，L-19 号与另外 8 艘飞艇结队出发，对英格兰进行空袭。在返航途中，L-19 号的 4 台发动机中有 3 台出现故障，随后飘入荷兰领空，在弗里西亚群岛的阿默兰岛上空遭到荷兰防空部队的炮击。不久之后这艘飞艇在北海上迫降。

2 月 2 日清晨，英国拖网渔船“斯蒂芬王”号驶近漂浮在海上的 L-19 号飞艇。艇长奥多·洛维（Odo Loewe）用流利的英语向船长威廉·马丁求助，但遭到后者的拒绝。马丁事后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辩解说，他的渔船上只有 9 名船员，而且没有武装，担心德国艇员劫持自己的船驶往德国。此外“斯蒂芬王”号当时正在英国海军部禁止打渔的禁区里捞鱼，船长担心把德国飞艇人员带回英国后，非法打渔的事会被当局发现。于是这艘渔船扬长而去，弃德国遇难艇员于不顾。洛维艇长把相关情况写入一个漂流瓶中，六个月后在瑞典被发现。L-19 号不久就连同其艇员一道沉入了海底，几具德国艇员的尸体后来被冲到了丹麦的海岸上。

马丁船长的行为在英国和世界舆论中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和争吵。一些人谴责他违背“救助海上遇难者”的古老航海法则，但伦敦主教却赞扬了他的行为。一些协约国评论认为轰炸英国的德国飞艇艇员被英国渔船丢下淹死，是“恶有恶报”，德国方面则对此猛烈抨击，还专门拍摄了一部以此事为题材的反英电影。“斯蒂芬王”号返航之后被英国海军征用，改装为一艘 Q 船，1916 年 4 月 25 日被德国鱼雷艇 G-41 号击沉，船员全部被俘。德国人起初以为船长菲利普斯少尉是丢下 L-19 号不管的负责人，准备将其作为战犯进行起诉，但后来从一份英国报纸上发现菲利普斯少尉与马丁船长实为两人，遂将其作为普通战俘对待。马丁船长则在 1917 年因心脏病而死在家中。洛维艇长丢下的漂流瓶如今是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的展品，“斯蒂芬王”号的一条救生带和其英国海军军旗则在德国库克斯港附近诺德霍尔茨的海军航空博物馆中展出。





则，坐视德国艇员被海水淹死[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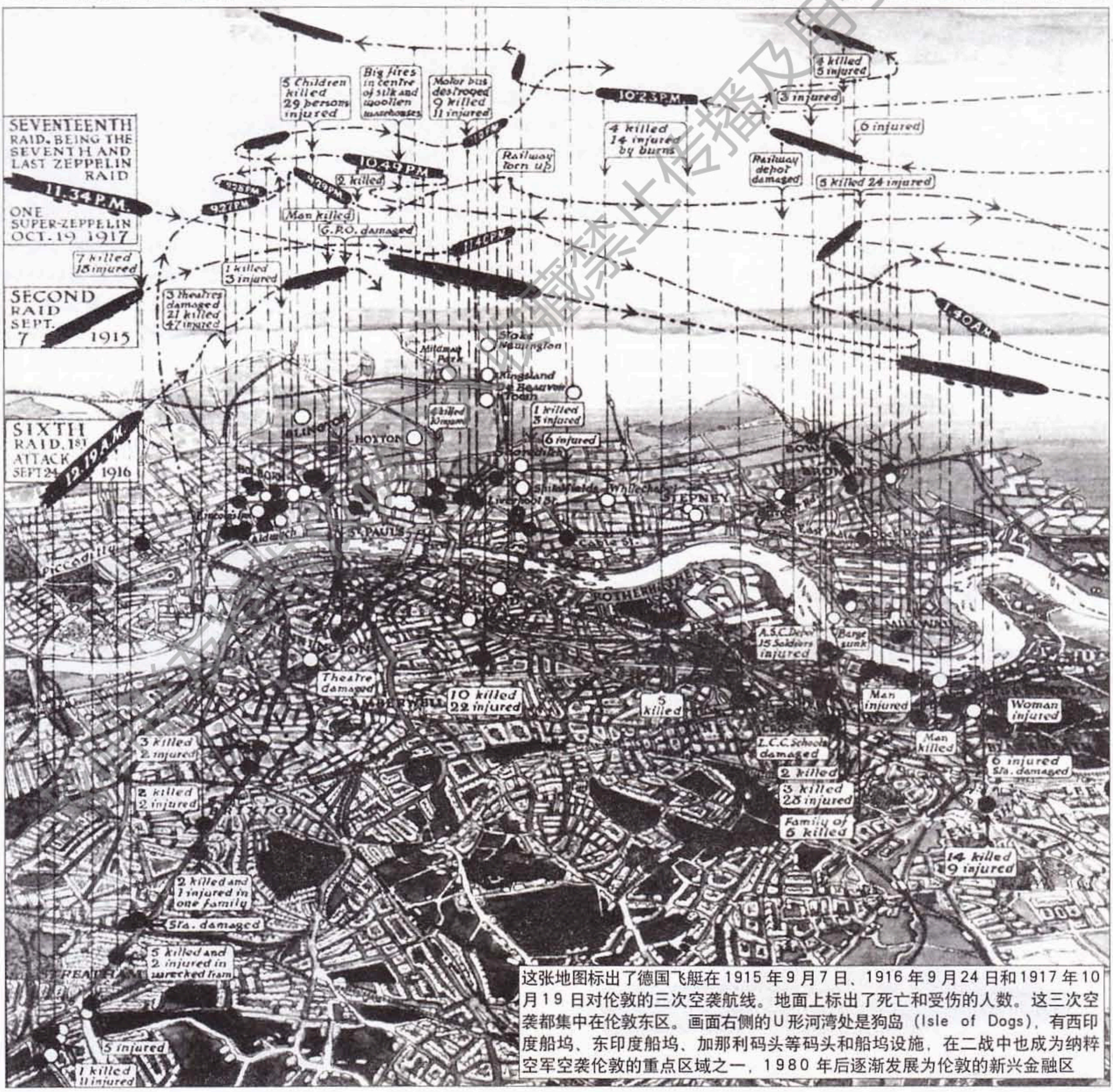
在1916年夏季之前，空袭英国的德国飞艇基本上都是双艇或三艇编队，有时单枪匹马，各自寻找目标，炸完了就跑；而在R 型飞艇服役后，德国海军改为派出大规模的飞艇群进行密集轰炸，其中R 型飞艇主要用来轰炸伦敦。

对英国的第一波攻击有3次，发生在1916年7月31日、8月2日和8月8日。德国飞艇队夜间抵达英国上空轰炸目标，第二天清晨返回德国的基地。无论从战果还是飞艇数量上来看，这头三次攻击都没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漆黑夜色下，这些飞艇上的乘员高估了自己的战果，甚至连扔在海里的炸弹溅起的浪花，都认做了爆炸的房屋或工厂。

8月24日和9月2日进行了第二轮攻击。这两次的规模比以前大得多。9月2日那次空袭，德国海军的12艘飞艇——L-11、L-13、L-14、L-16、L-17、L-21、L-22、L-23、L-24、L-30、 L-32 和SL-8号——在傍晚从基地起飞，同行的还有4艘陆军飞艇：LZ-90、LZ-97、LZ-98和SL-11号。这16艘飞艇一共携带了32吨炸弹。

德国陆军的LZ-98号飞艇在艇长恩斯特·莱曼的指挥下，从格拉夫桑德的泰晤士河口上空进入英国（莱曼后来曾担任LZ-127“齐柏林伯爵”号和LZ-129“兴登堡”号艇长）。在确信到达伦敦东区船坞上空后，他投下了炸弹，然后调头向东北飞去。在途中，他们遇到了皇家空军少尉威廉·罗宾逊驾驶的一架驱逐机，但是LZ-98号很快就钻进了云层里。

LZ-90号飞艇从弗林顿上空进入英国，轰炸了哈弗希尔。威廉·施拉姆指挥的SL-11号从正北方向飞到了伦敦上空，轰炸了伦敦近郊的圣奥尔本地区。它被安装在芬斯伯里和维多利亚公园的探照灯抓住了。SL-11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探照灯，正在向北逃脱的途中，遇到了刚刚让LZ-98从手中溜掉的罗宾逊少尉。罗宾逊从后面接近这艘灰色飞艇，向它发射了两个混合子弹夹，但是没有看到丝毫击中目标的迹象。罗宾逊调头再次接近SL-11号，瞄准飞艇侧面发射了第三回合。这一次他看到飞艇内部似乎有一丝



这张地图标出了德国飞艇在1915年9月7日、1916年9月24日和1917年10月19日对伦敦的三次空袭航线。地面上标出了死亡和受伤的人数。这三次空袭都集中在伦敦东区。画面右侧的U形河湾处是狗岛（Isle of Dogs），有西印度船坞、东印度船坞、加那利码头等码头和船坞设施，在二战中也成为纳粹空军空袭伦敦的重点区域之一，1980年后逐渐发展为伦敦的新兴金融区





SL－11号飞艇艇员向罗宾逊射击的情景。右图为威廉·罗宾逊少尉

亮光，紧接着变成一团迅速扩散的火焰，引燃了飞艇外面的蒙布。几秒钟之内，SL－11号飞艇就变成了一支照亮天空的明亮的大火炬。它熊熊燃烧着，缓缓坠向考夫雷村的场面，不仅让全体伦敦市民饱了眼福，而且也被后面陆续到达伦敦的那些飞艇看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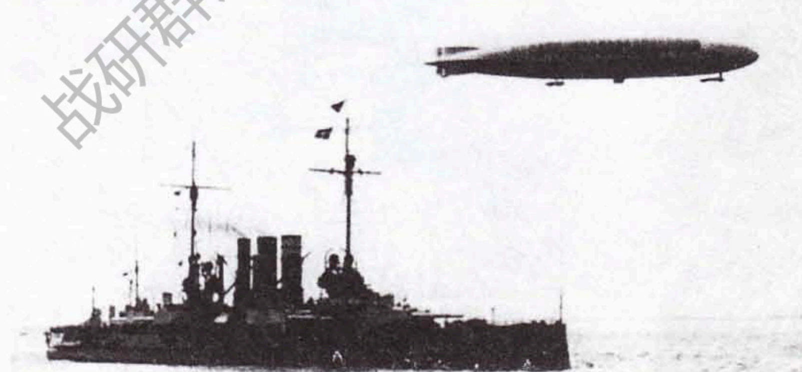
在SL－11坠毁的时候，埃里希·萨默菲尔德上尉指挥的L－16号飞艇离它才不到一英里远，犹如夜幕下的布景一般，被SL－11号燃起的熊熊火光映衬在夜空中。这引起了盘旋在附近的英国飞行员很大的兴趣。萨默菲尔德下令全部发动机开足马力，稀里哗啦扔下全部炸弹，然后拼了老命往北跑，在英国飞行员到达之前跑出了火光的照耀范围。

30英里以外，L－21号的艇长弗兰肯伯格也目睹了SL－11被击毁的全部过程。他和他手下30名艇员全都看见了南方的两艘飞艇，英国飞机围绕着其中一艘飞来飞去，然后就是火光和爆炸，之后一架英国飞机（罗宾逊少尉）发射了红绿两色信号弹。其他的德国飞艇都象L－16号一样匆匆忙忙扔光了炸弹，然后调头东窜。一共17吨德国炸弹扔到了英格兰乡下的土壤里。这次轰炸给英国造成了21000英镑的损失，德国则付出了16条人命和一艘价值93000英镑的飞艇。

对英国的第三波攻击于9月23日开始。12艘德国海军飞艇于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从德国的库克斯港基地起飞。海军的艇员们还沉浸在对三周前SL－11被击落的可怕回忆中，飞向英国的旅程笼罩在一片不祥的阴影下。但是艇长们则自信得多——SL型飞艇是木制龙骨，而一个出色的海军飞行员可以娴熟地驾驶他的真正的齐柏林飞艇躲开英国人的攻击。海军飞艇部队中新型的L－30级飞艇在L－31号艇长海因里希·马蒂（Heinrich Mathy）的带领下，在北海上空转向正南方，驶向英格兰海岸。他们的航程要穿越防空火力最为密集的伦敦地区上空。其他7艘比较小的旧式飞艇——L－13、L－14、L－16、L－17、L－21、L－22和L－23号，则直接飞向英格兰中部的米德兰郡。这支队伍中只有L－17号在诺丁汉的轰炸取得了一点可怜的战果。

阿洛伊斯·包克指挥的L－33号头一个到达英国首都上空。他的炸弹大多丢在了泰晤士河河弯和斯特拉特福德。地面发射的一发炮弹穿进艇身，造成了一些结构损坏，但是没有引爆飞艇。投弹结束后，L－33号清空了压载的沙包和水袋，以每分钟800英尺的速度急速上升到飞机飞不到的高空中，放出了烟幕，然后准备逃回德国——一次完美空袭似乎就要完成了。但是不幸的是，它遇到了一架英国战斗机，又挨了几梭子混合燃烧弹。吓破了胆的包克上尉下令飞艇立即着陆。他们降落在埃塞克斯郡的乡间。德国飞行员引爆了成功降落的飞艇，然后向赶来的英国人投降了。

从“东弗里斯兰”号战列舰上空飞过的L－31号飞艇。右图为其艇长海因里希·马蒂（1883－1916）





1小时以后，9月24日凌晨0时15分，马蒂指挥的 L－31号来到了伦敦上空。马蒂用无线电向国内报告说，他发现东方有一艘在地面上燃烧的飞艇（包克的L－33号）。马蒂在斯垂特汉姆、布瑞克斯顿和肯宁顿上空盘旋游弋，把大多数炸弹丢在了那里的公路上，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伦敦。1点15分，他发现在伍里奇的地面上有另外一艘飞艇。这是维尔纳·彼得森上尉指挥的L－32号，也正在地面上猛烈燃烧。马蒂给国内的报告简明扼要，但是他无法阻止艇员目睹这幅场面，并造成心理创伤。

L－32号在北海上盘桓了大约一个小时，才驶入英格兰内地。彼得森发给国内的最后一则消息内容非常混乱，但是后来分析， L－32号发生了引擎故障，在修复之前一直在空中来回兜圈子。它在排除故障、于泰晤士河上空驶出云层后，立刻就被英国飞行员发现了。伦敦东区的地面探照灯也集中到它的身上，向飞行员指示这个大靶子的位置。彼得森大概意识到了面临危险处境，因为他迅速地扔光了炸弹和压载物，并且调头向北海方向飞行。弗雷德里克·索维利少尉驾驶着一架 BE2c 4112 双翼机飞向这艘被探照灯照得光辉灿烂的庞然大物。和罗宾逊少尉一样，索维利飞了四个来回，射光了整整三个弹夹，直到看见火光破过L－32的织物蒙皮喷射出来为止。L－32里面上百万加仑的氢气熊熊燃烧，像火焰喷灯一样喷射出大团火球，徐徐坠向地面。艇上全部人员遇难。

L－32起火之后，索维利发射了一枚红色信号弹，然后降落在一家农场的草地上。皇家海军的情报人员最先出现在那里，不顾氢气爆炸燃烧的火焰和高温，在铝合金龙骨和残骸中穿来跑去。作为报酬，他们从火焰中抢救出了一本违反保密规定带上飞艇的德国海军密码本。没人知道彼得森为什么允许携带这本密码本上艇。这真是送给皇家海军密码破译人员的天赐礼物。

L－32和L－33的坠毁对德国飞艇部队的士气影响很大。陆军的飞艇被击落是一码事，而两个海军的飞行老手、全体乘员和两艘崭新的新式飞艇在同一个晚上被击落，其意义要严重得多。两天之后，在开始另外一次空袭前，原定指挥L－23号的甘策尔上尉因为其“古怪行为”而被临时免职。在出发前，他的勇气丧失殆尽，于是被留在了地面，送回水面舰艇部队服役。霍斯特·冯·巴特勒指挥的L－30号小心翼翼地靠近了海滨城市克雷默，把炸弹全部扔进了海里，然后调头返航。

这次空袭中唯一的闪光点是马蒂指挥的L－31号大胆地轰炸了朴次茅斯海军基地，一个德国飞艇以前从来没有光顾过的地方。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地面探照灯光过于猛烈，马蒂把炸弹扔在了港口区，而不是重要得多的海军船厂。英国人从无线电讯号中得知在他们头顶上盘旋的是著名的“卤莽马蒂”，不禁为轰炸的场面没有想象那么猛烈而诧异，因此一致认为这只是马蒂的一次侦察飞行。


L－32号艇长维尔纳·彼得森

第三波攻击的最后一次空袭发生在1916年10月1日。11艘飞艇从德国出发，但只有两艘L－30型获准轰炸伦敦。L－30号再次报告说击中了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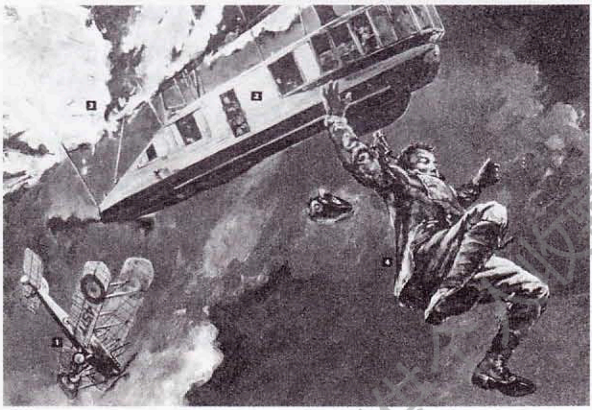
1916年9月，L－32号飞艇飞越库克斯港附近雅德河航道上空的情景



战研储备仅供个人收藏交流传播不可用于商业目的



在地面探照灯灯光笼罩下的 L－31 号飞艇，艇体内的氢气气囊已经燃起烈焰。对于这种在空中起火的飞艇来说，其艇员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烧死，要么摔死。海因里希·马蒂选择的是跳下去（下图）。他掉在地面上时还有呼吸，但不久就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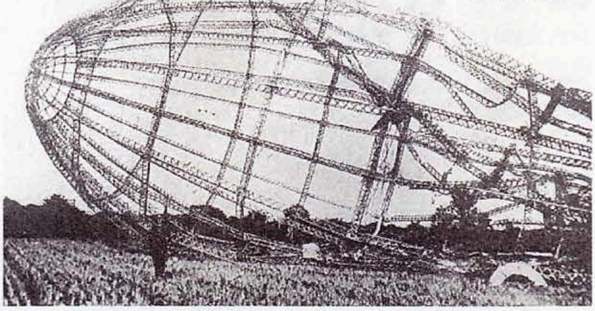
—和以往一样，甚至都没能给英国乡村的土地草场留下点弹坑之类的纪念。L－31 号从东北方向抵达伦敦上空，在马蒂的命令下关闭了发动机，企图静悄悄地飘过那些竖起耳朵聆听“嗡嗡”声音的探照灯操作员。凌晨 0 点 30 分，马蒂重新开启发动机，马上被下面的探照灯笼罩了起来。4 架英国战斗机朝他飞过来。

在地面开火的同时，马蒂扔下了所有的炸弹，然后向西边飞去。他几乎已经逃脱了。这时，皇家空军的邓普斯特少尉驾驶着飞机从他身下飞过。邓普斯特马上掉过头来，将一梭子混合燃烧弹打进了 L－31 号的龙骨。突然，一条红色的火龙从它的鼻子里喷射出来。L－31 号如铅锤一般地垂直落下，几乎将邓普斯特和他的飞机一起带到地府去。邓普斯特驾驶飞机侧翻了好几个跟头以图规避，燃烧中的德国飞艇擦着他的鼻子向下坠落。L－31 号坠毁在波特斯巴尔。当地农民飞快地跑到现场。他们发现在熊熊燃烧的飞艇旁边，地上躺着一个人，全身没有烧伤。发现的时候他还活着，但是不久就死了。他的身份识别牌上刻着“KaptL－t. Mathy. L－31”。

在 1916 年 10 月 1 日早晨之后，德国飞艇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光临大不列颠的上空、取得一定战果而不受丝毫损害。随着英国歼击机防御的加强，齐柏林飞艇的损失达到了不堪忍受的地步。德国飞艇在夜空中象火炬一样坠毁的场面，又对打击英国民众的士气一点也没有起到负面影响。

当齐柏林飞艇在火焰中分崩离析、化为灰烬的时候，英国人聚集在地面上欢呼着观看。当一艘齐柏林飞艇在埃塞克斯地区坠落时，一对见证了该事件的夫妇将他们的新生女儿命名为“齐柏林”。齐柏林飞艇的坠毁令英国本土的民众斗志昂扬，就如同他们亲眼目睹了公海上德国无畏

L－31 号飞艇的残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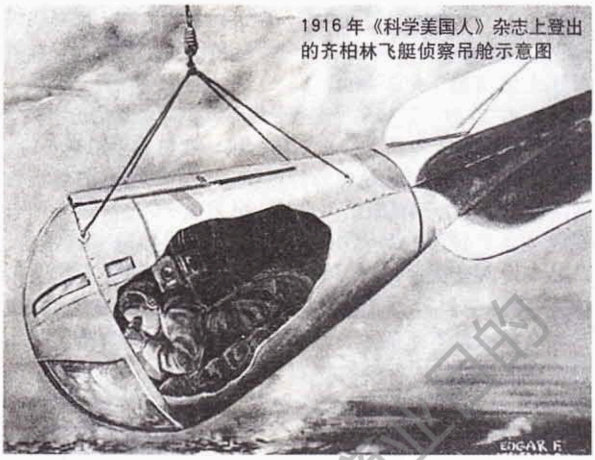


英国士兵检查 L－31 号飞艇的残骸。左图是海因里希·马蒂艇长从高空坠落的身体在地面上砸出的浅坑

舰队的覆灭一样。对士气的影响因素和飞艇的昂贵代价加起来，使得轰炸英国失去了当初的意义所在。因此在1916年之后，德国海军的飞艇部队逐渐移交给公海舰队作为侦察手段，以及德国政府用来宣传的武器。

德国从这时开始才把力量集中在研制重型轰炸机上面，最初是哥达公司制造的轰炸机，然后是齐柏林－施塔肯工厂制造的庞大的R－VI型四发巨型轰炸机，一次能够携带998公斤炸弹，时速135公里，并带有4挺自卫机枪，足以对付英国战斗机的攻击。

至于德国海军和陆军的齐柏林飞艇，则在轰炸英国时始终保持在云层之上飞行。它们通常携带一个带有尾翼的炸弹形吊舱，内有座椅、地图和罗盘。当飞艇飞近目标区域时，观测员爬入吊舱，随后用绞车将吊舱降到云层之下，投弹观察员在吊舱中进行观测，使用电话通知上面的艇员投弹。LZ－26号飞艇曾经使用长达1000米的钢线悬挂这种侦察吊舱，其他德国飞艇一般将吊舱挂在飞艇下面750米左右的高度上。1916年9月，英国人曾经在科切斯特附近发现一具坠毁的侦察吊舱，推测是从LZ－90号飞艇上掉下来的。如今这具吊舱在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中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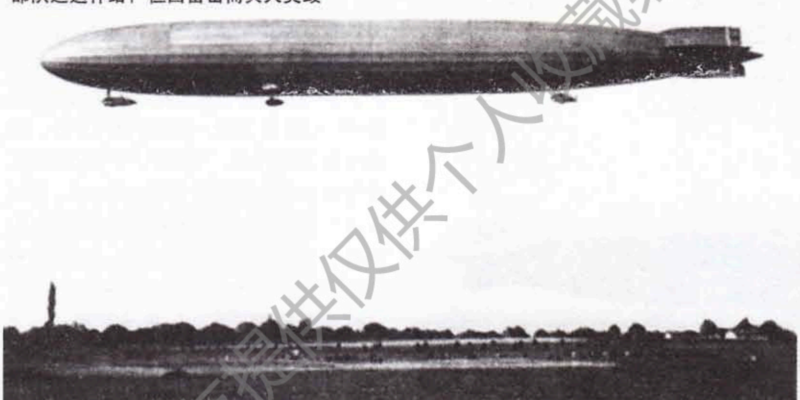


1916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登出的齐柏林飞艇侦察吊舱示意图

1917年9月1日服役的LZ－101号飞艇是所谓“高升限”(Height Climber)型号的头一艘，其巡航高度为5000米，最高升限可以达到6400米。这比当时任何英国飞机能够爬升的高度都高出许多，但是牺牲了有效载荷和续航力，而且高空投弹的精确性极低。

1917年10月，德国海军决定派W型飞艇L－57号(LZ－102)飞往德属东非殖民地，为在那里坚持游击战的东非军事司令勒托－福尔贝克运去稀缺的补给品，但是这艘飞艇于10月8日在德国南部的尤特堡进行试飞时被闪电击中，起火焚毁。德国海军随后指定L－59号飞艇(LZ－104)来完成这次长途补给任务。这艘飞艇建造于腓特烈港的齐柏林公司，10月31日完成首次试飞，其长度为226.5米，比L－57号长了将近30米，可以容纳68500立方米氢气。它由五台240马力的迈巴赫HSLu引擎驱动，时速103公里，航程高达16000公里。L－59号被称为X型飞艇，其正式名字叫“非洲飞船”(Afrikaschiff)。

L－57号飞艇(LZ－102)。原本计划向德属东非部队运送补给，但因雷击而失火焚毁



像L－57号一样，L－59号也进行了专门设计，以便在抵达目的地后可以被完全拆卸利用：飞艇蒙皮可以改成帐篷，软棉布衬里可以用作绷带，氢气气囊可以改成睡袋，硬铝合金制作的骨架可以改成小棚屋或无线电发射塔。飞艇内部的狭小工作通道是用牛皮做的，可以做成靴子。飞艇上还带有15吨补给物资，包括药品、机枪、子弹、丛林砍刀、双筒望远镜、饮水过滤器和其他在丛林作战中非常有用的东西，甚至还有一台缝纫机。

腓特烈港艇库中的L－59号飞艇(LZ－104)。它虽然没能飞抵目的地便半途折返，但仍创造了飞艇连续飞行的时间记录和航程记录



1917年11月初，雨果·艾克纳博士和恩斯特·莱曼艇长驾驶L－59号飞艇离开腓特烈港，抵达保加利亚东南部的飞艇基地扬博尔(Yambol)，在那里把飞艇交给了新艇长路德维希·博克霍尔特少校(Ludwig Bockholt)。后者是位经验丰富的海军飞艇指挥官，曾经指挥L－23号飞艇捕获了一艘向英国运送木材的挪威货船（这是海战史上唯一一次飞艇捕获船只的战例）。考虑到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旅程，博克霍特手下的二十一名艇员都是自愿报名的志愿人员。

由于地中海上空气候恶劣，L－59

战研君搜集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号经过几次不成功的起飞尝试，在11月21日才离开扬博尔，前往非洲。22日凌晨，它穿过利比亚，当天黄昏在阿斯旺上空飞越了尼罗河。

11月23日，L－59号在喀土穆西边200公里的达尔富尔地区上空收到了“任务终止”的电报，在艇员中引起争论。有人认为这是英国人拍发的假电报，但是如果对方想拦截这次补给的话，只需派出飞机截击就可以了，而L－59号穿越了克里特岛、利比亚、苏丹等协约国控制下的领土，一路上没有遇到过任何协约国的飞机。经过辩论，艇长最后决定调头返航。11月25日，L－59号抵达扬博尔，结束了这次创造世界纪录的长距离空中航行。当它降落时，飞艇上携带的燃料还可供其继续飞行64小时。

L－59号的非洲之行被取消后，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的德国顾问曾提议用这艘飞艇向正在阿拉伯半岛作战的恩维尔帕夏运送补给，也有人提议用它搜索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的水雷，但是德国海军最终在1918年决定派它去轰炸马耳他的英国海军基地。4月7日傍晚，在奥特朗托海峡附近，浮在海面上的德国潜艇UB－53号发现L－59号飞艇正从上空飞过。忽然从它的蒙皮中发出两次强烈的闪光，接着这艘飞艇就在空中爆炸了，其21名乘员无一幸免。德国海军经过调查认为这艘飞艇是因氢气泄露而爆炸的。

德国飞艇部队在1917年里一共对英国进行过5次空袭，10月19日进行了当年最后、也是规模最大的空袭。德国海军一共出动了13艘飞艇，轰炸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利物浦和伦敦。在这次空袭中，德方一共损失了5艘飞艇：L－44号（LZ－93）被法国的地面防空炮火击落；L－50号（LZ－89）因用尽燃料而被吹到法国地中海海岸迫降，由艇员自行烧毁；L－45号（LZ－85）在轰炸完伦敦之后遭到英国战斗机的追击，在法国迫降后焚毁，其艇员全部投降；L－49号飞艇（LZ－96）也在法国迫降，随后被法军完好无损地俘虏。法国与英美两国分享了这艘飞艇的技术，美国在一战结束后建造的第一艘硬式飞艇“谢南多厄”号和英国飞艇R－34号都使用了从L－49号上取得的技术。L－55号（LZ－101）为了摆脱协约国战斗机的追逐而上升到7600米的高度，创造了齐柏林飞艇的升限纪录。它后来成功返回德国境内的飞艇基地，但在降落时严重损坏，不久之后解体。



L－53号飞艇（LZ－100），1917年被从一艘英国驱逐舰拖带的滑橇上起飞的索普威思“骆驼”飞机击落

1918年对于德国飞艇部队来说是个不吉利的年头。1月5日，位于奥尔登堡公国境内阿尔霍恩（Ahlhorn）的海军飞艇库起火，烧毁了L－46、L－47、L－51和L－58四艘齐柏林飞艇，以及SL－20号飞艇。当年7月19日，英国皇家海军派出“暴怒”号航空母舰，对边境小镇托恩德恩（Tondern，今属丹麦）的德国海军齐柏林飞艇库进行空袭。这也是海军史上第一次由航母起飞的舰载机作战行动。“暴怒”号在5艘新服役的“君权”级战列舰、一个轻巡洋舰分队和一个驱逐舰分队的护送下驶近丹麦海岸。凌晨3时13分，三架索普威思“骆驼”飞机从“暴怒”号舰艏的飞行甲板上起飞，于4时35分飞抵托恩德恩镇上空。

德国海军在托恩德恩有三座飞艇库，代号分别是“托斯卡”、“托比亚斯”和“托尼”。最大的“托斯卡”艇库中当时停放着两艘飞艇，分别是L－54号和L－60号。“托比亚斯”艇库中有一具气球，“托尼”艇库正在拆除当中。三架“骆驼”飞机向“托斯卡”艇库投下了3枚炸弹，它们击穿艇库屋顶后爆炸，引燃了两艘飞艇内的氢气。第二波四架“骆驼”飞机轰炸了“托比亚斯”艇库，库内的系留气球被炸毁。德方有4名地面工作人员受伤，

L－45号飞艇（LZ－85）属于R型飞艇，即“超级齐柏林”，其长度为198米，比之前的Q型长出了近20米。1917年10月在法国因耗尽燃料而迫降，艇体受损报废，全体艇员被俘



停泊在托恩德恩艇库外的L－54号飞艇（LZ－99），属U型飞艇，长196.5米，1918年7月在艇库中被英国海军“暴怒”号航母舰载机炸毁



英方的损失是一架“骆驼”的起落架轮子被打坏。

德国飞艇部队在1918年一共对英国进行了4次空袭，目标主要集中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8月5日，德国海军飞艇部队指挥官彼得·施特拉塞亲自率领L－70号飞艇前去空袭伦敦。在靠近英国诺福克郡沿岸的北海上空，这艘飞艇被英国皇家空军的DH－4水上飞机发现，随即被对方用白磷子弹击中，施特拉塞和其余艇员全部随艇坠毁身亡。这也是德国飞艇对英国本土的最后一次空袭。



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的葬礼，1917年3月12日，斯图加特

从“博登湖”号到“洛杉矶”号

1917年3月8日，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在柏林去世，雨果·艾克纳博士成为他的事业继承人，承担起执掌齐柏林航空帝国的重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齐柏林公司一共为德国陆海军建造了84艘飞艇，这些飞艇执行了1200多次侦察任务和51次空袭任务，一共空投了197吨炸弹，炸死557人，炸伤1358人，给敌国造成150万英镑的财产损失。有60艘齐柏林飞艇在战争中损失，其中22艘是由于积雪、积冰、强风、雷暴和自燃等事故损失的，在战斗行动中损失了38艘。有24艘飞艇被协约国的飞机击落、或在艇库中被炸毁。协约国的地面炮火击落了9艘齐柏林飞艇，军舰击落2艘（L－7号被英国巡洋舰“法厄同”号和“活雕像”号击落，然后被E－31号潜艇击沉；LZ－55/LZ－85号被“阿迦门农”号战列舰击落）。L－49号飞艇被法国俘获，L－20号和L－3号因故障在中立国挪威和丹麦迫降，L－19号被荷兰击伤后在海上迫降沉没。

鉴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飞艇轰炸城市及平民的劣迹，协约国在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的飞艇和飞艇制造业作出了严厉的限制。和约的第198条专门规定德国陆海军不得拥有或保留飞艇，第202条规定德国将所有的飞艇和地面艇库移交给协约国。

1919年6月23日，当德国海军主力舰队在英国斯卡帕湾自行凿沉的同时，德国海军飞艇部队的官兵也自行炸毁了L－14、L－41、L－42、L－52、L－56、L－63和L－65号共七艘飞艇，以避免将其移交给战胜国，从而令德国海军的

L－20号飞艇艇员在迫降后自行将飞艇破坏掉，随后被挪威当局拘留。下图为挪威警察将斯塔伯特艇长押送至岸上的情景，他在六个月后逃脱，返回德国





德国海军的L－20号飞艇（LZ－59）于1915年11月首飞，执行过6次侦察任务，两次空袭英国，1916年5月3日在空袭苏格兰后飞回德国时遇强风耗尽燃料，被吹至挪威斯塔万格附近迫降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

荣誉受损。至于正在齐柏林工厂建造中的LZ－115至LZ－119号飞艇，则被协约国勒令停建并拆毁。值得一提的是，LZ－119号是为了空袭美国设计的超大型飞艇，气囊容积高达108000立方米，安装10台发动机，计划在1919年6月开工。

在1920年，协约国最终从德国接收了2艘陆军飞艇和4艘海军飞艇，此外还从齐柏林公司手中没收了为德国海军建造的L－71号和L－72号。这8艘飞艇在各战胜国之间进行分配，比利时得到了最旧的L－30号（LZ－62），在1920年将其解体拆毁，飞艇的一些部件，包括一个引擎吊舱，陈列在布鲁塞尔的军事历史博物馆中展出。日本得到L－37号（LZ－76），不久也拆毁了。法国得到了原德国陆军飞艇LZ－113号（LZ－83）和最新的L－72号（LZ－114），前者很快被拆毁，LZ－114则被交给法国海军，改名为“迪克斯缪得”号（Le Dixmude），1923年在地中海上空遇风暴失踪。

意大利分到了LZ－120（LZ－90）和L－61（LZ－106）两艘飞艇，但是由于当时意大利军方力主发展半硬式飞艇，因此对这两艘齐柏林硬式飞艇并不是十分热衷，将其氢气抽出后便解体拆毁了。英国海军得到了L－64（LZ－109）和L－71（LZ－113），但是这两艘飞艇也很快就在1920年被拆毁，以腾出艇库修理英国海军的R－36号飞艇。



L－70号飞艇（LZ－112），1918年7月1日首飞，8月6日在前往英国进行最后一次空袭时被一架德哈维兰DH－4飞机击落，德国海军飞艇部队司令彼得·施特拉塞随艇坠落身亡



L－72号飞艇（LZ－114）在一战后赔偿给法国，改名“迪克斯缪得”号，1923年失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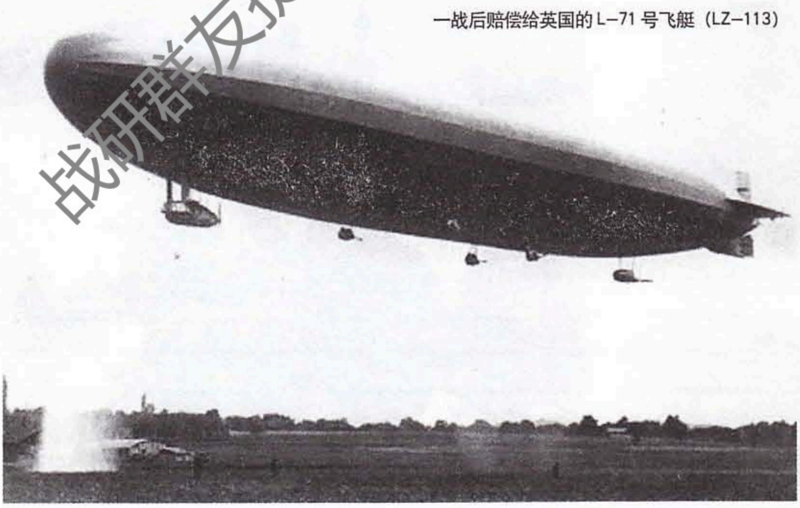
齐柏林伯爵的继承人雨果·艾克纳博士设法克服战后的困难和混乱，使用拆毁4艘飞艇后余留下来的材料，为DELAG公司建造了两艘较小的客运飞艇，希望借此避开《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发展飞艇的限制。LZ－120“博登湖”号（Bodensee）是齐柏林公司在战后建造的第一艘飞艇，也是自1913年“萨克森”号之后首次重新建造民用飞艇。

在“博登湖”号的设计阶段中，齐柏林公司的工程师进行了多次风洞试验，最终采用流线体外形。它借鉴了“高升限”型飞艇的设计，被称为Y型飞艇，在1919年8月20日首次试飞。其全长为130.8米，直径18.7米，气囊容积22550立方米，安装3台245马力迈巴赫Mb IVa发动机（1920年增至4台），最高时速132.5公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飞艇。

“博登湖”号的额定载客数是20人，但是实际上最多可以搭载30名乘客。它的一个新奇之处是设置了头等舱，其座椅不是硬邦邦的藤椅，而是舒适的绒布沙发。在驾驶舱还有一个VIP座席，其收费是普通座位的两倍。在客舱的后段，首次在飞艇上设置了一个使用电炉烹调的小厨房。除了艇长、机师、领航员等12名常规乘务人员外，“博登湖”号上还有1名侍者、1名厨师和1名无线电收发员。

“博登湖”号从1919年8月24日起投入腓特烈港至柏林－斯塔肯机场之间的航空运营，中途在慕尼黑的威森菲尔德机场（如今是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做短暂停留。雨果·艾克纳博士担任首次飞行的艇长。完成腓特烈港至柏林的600公里航程共需6个小时，顺风的话只需4个小时，而当时用火车完成这段旅程需要24小时。“博登湖”号优秀的气动外形赋予其在恶劣天气下飞行的能力。在其服役生涯中唯一的一次事故是1919年11月在柏林－斯塔肯机场上，由于在降落时遇到大雪而碰坏了尾翼。

一战后赔偿给英国的L－71号飞艇（LZ－113）



到1919年底为止，“博登湖”号一共执行了103次客运飞行，运送乘客4050人、邮件4500公斤、货物30000公斤。除此之外它还在柏林上空进行了7次观光飞行，并且在10月搭载20名旅客飞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这是DELAG公司新航线计划的一部分，它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为此还向齐柏林公司订购了一艘“博登湖”号的同型艇，即LZ-121“北极星”号（Nordstern）。但是协约国的战争索赔要求终结了这一计划。由于德国飞艇部队成员在1919年6月摧毁了7艘飞艇，因此在1920年7月召开的协约国大使会议【注1】上，法国和意大利要求各自从德国多获得1艘飞艇作为赔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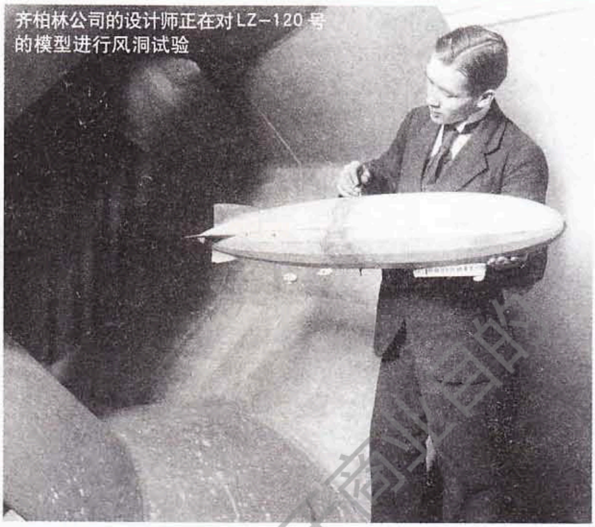
1921年6月27日，“博登湖”号搭载43名乘客——全都是齐柏林飞艇公司的员工——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7月3日，艾克纳博士亲自驾驶这艘飞艇，以12.5小时的时间飞完了1329公里的旅程，在罗马郊外的钱皮诺机场将它交到了意大利人的手中。在对意大利飞艇乘务组进行了两个月的训练后，“博登湖”号在9月2日正式移交给意大利政府，并改名为“埃斯佩利亚”号（Esperia）【注2】。此后五年中，这艘飞艇曾经多次执行宣传飞行任务。1928年半硬式飞艇“意大利”号在北极科考飞行中失事后，“艾斯佩利亚”号也被搁置起来，并在当年7月解体拆毁。

LZ-121“北极星”号在1920年1月完工，但是还没有来得及投入商业运营，便在当年7月的斯巴会议上被指定赔偿给法国。法国陆军在凡尔赛附近的圣西尔为这艘飞艇建造的艇库完工后，“北极星”号于1921年6月13日从腓特烈港起飞前往法国，1万多名德国百姓自发为其送行。LZ-121号移交给法国政府之后改名为“地中海”号（Mediterranee），租给法国的民营“航空运输公司”（SANA），用于法国南部至阿尔及利亚的客运航线。

1922年4月，“地中海”号的所有权移交给法国海军，以土伦军港附近的絮尔为基地，随后参加了1923年法国海军地中海演习。1923年“迪克斯缪得”号飞艇失踪后，法

【注1】该会议每年定期在比利时温泉疗养地斯巴召开、讨论德国赔偿和对德军备管制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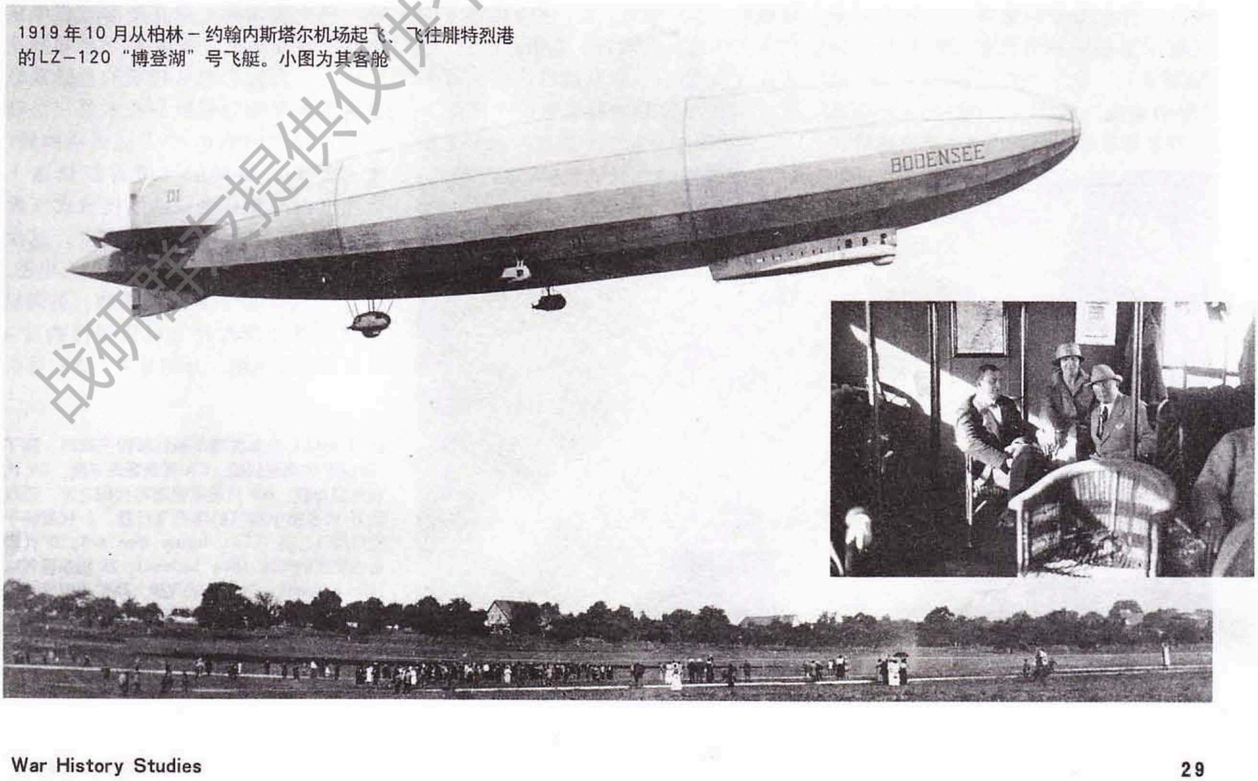
【注2】这个名字来自拉丁文Hesperia，在古代指的是希腊以西的世界，特别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在拉丁文诗歌中成为专指意大利的雅称



齐柏林公司的设计师正在对LZ-120号的模型进行风洞试验



赔偿给意大利的LZ-120号飞艇，改名为“埃斯佩利亚”号



1919年10月从柏林－约翰内斯塔尔机场起飞、飞往腓特烈港的LZ-120“博登湖”号飞艇。小图为其客舱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国海军规定“地中海”号只可进行短途飞行。1926年8月，“地中海”号从法国海军中退役。法国空军的设计师在这艘飞艇身上进行了超载应力破坏试验，随后就将其解体拆毁了。1929年DELAG公司的“齐柏林伯爵”号飞艇访问法国时，其艇长在絮尔的飞艇库里只看到了“地中海”号的一副硬铝框架圈。


赔偿给法国的LZ-121“北极星”号飞艇，归法国海军所有，改名为“地中海”号

继LZ-121“北极星”号之后，齐柏林公司还在1919年设计了LZ-122、LZ-123和LZ-124三艘飞艇，计划用于DELAG公司的客运飞行，但是由于DELAG公司害怕这几艘飞艇建成之后也被协约国没收，因此没有下达订单，这三艘飞艇停留在了绘图板阶段，但是其序列号没有被取消。

同是在1919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建造一艘大型硬式飞艇的预算，将其列入1920财年美国海军预算当中。美国海军建造硬式飞艇有几个用途，首先是在舰队前方执行海上远距离侦察任务，此外还计划以此来提高美国的客运飞艇设计与建造水平。这艘飞艇的代号为FA-1，意思是“舰队飞艇”(fleet airship)，后来改为ZR-1，R指的是“硬式飞艇”(rigid airship)，至于字母Z则并不代表“齐柏林”（英文中代指硬式飞艇），而是“轻于空气的飞行器”的代号[注]。

1923年9月3日，美国海军部长埃德温·丹比妻子以家乡——弗吉尼亚州谢南多厄河谷的名字，将其命名为“谢南多厄”号（USS Shenandoah）。“谢南多厄”在当地特拉华印第安语中的意思是“群星的女儿”，因此被认为很合适拿来命名美国海军的第一艘大型飞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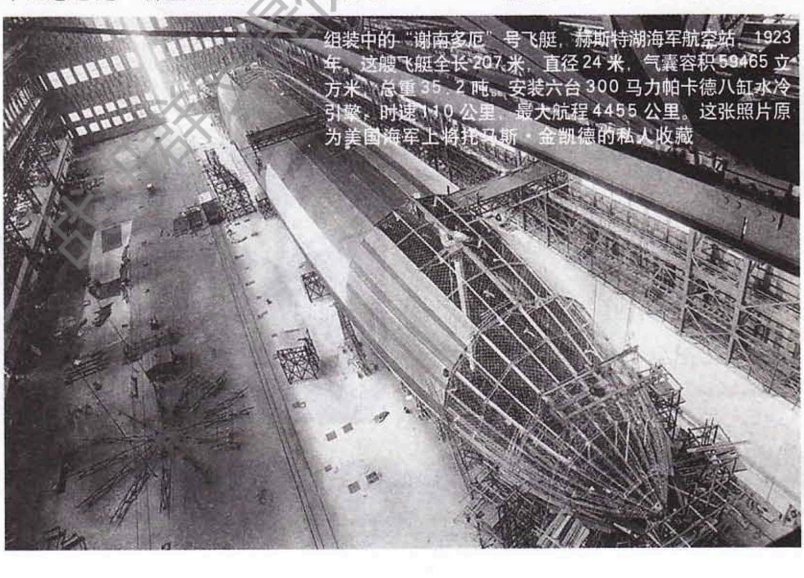
“谢南多厄”号在新泽西州的赫斯特湖海军航空站（Lakehurst Naval Air Station）建造，美国海军在这里建起了巨大的飞艇库、系留柱、氦气储存设施和修理厂。这艘飞艇本来计划像德国的齐柏林飞艇一样使用氢气，但美国海军对氢气的安全性有顾虑，再加上当时美国已经可以大规模生产氦气，因此改以氦气为浮升气体。由于氦气的浮升能力只有氢气的90%，因此美国海军航空局更改了设计，在飞艇中部增加了10米长度，以容纳更多的氦气。

飞艇是一种需要严格配平的飞行器，随着燃料的消耗，重量会逐渐变轻，使得其不断升高。德国的齐柏林飞艇采用的是放出一部分氢气的做法。当时氢气的价格是每1000立方英尺（28.3立方米）3美元，而氦气的价格高达55美元，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气体，不能随便放掉。“谢南多厄”号为此还安装了一套发动机冷凝回收系统，利用回收的冷凝水来配平重量。

“谢南多厄”号的设计使命是跟随舰队作战，侦察敌方舰队动向，但实际上主要用于飞行试验以及宣传飞行，美国海军航空局还考虑过派这艘飞艇前往北极进行科学考察飞行。不过，1924年1月，系留在露天系艇柱上的“谢南多厄”号遭狂风吹袭，艇首气囊被撞破，尾翼也被撞伤，不得不入库修理。当年秋天，“谢南多厄”号进行了横跨美国大陆的飞行，对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的海军飞艇基地设施进行测试。1925年1月号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为此还刊登了一篇名为《从“谢南多厄”号上俯瞰美国》的配图文章

1925年9月2日，经过半年多修理和测试的“谢南多厄”号离开赫斯特湖，飞往美国中西部参加一系列州庆活动，结果第二天就在俄亥俄州卡德威尔镇附近遇到一股暴风，被上升气流携裹至高空，最终在125号肋骨的位置被撕为两截。较短的尾段急速坠毁，两个发动机吊舱在坠落过程中从艇身上脱落下来，导致4名机械师全部身亡。驾驶舱也从较长的首段残骸上脱落，里面包括艇长扎卡里·兰斯多恩中校在内的6个人被活活摔死。失去了驾驶舱后的飞艇首段快速上升，里面的幸存者设法缓慢放出气囊中的氦气，平安降落在地面上。这次事故一共导致14人死亡，29人生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皇家海军曾经向肖特飞机公司订购过4艘大型硬式飞艇，分别是R-38号至


组装中的“谢南多厄”号飞艇，赫斯特湖海军航空站，1923年。这艘飞艇全长207米，直径24米，气囊容积59465立方米，总重35.2吨。安装六台300马力帕卡德八缸水冷引擎，时速110公里，最大航程4455公里。这张照片原为美国海军上将托马斯·金凯德的私人收藏

【注】1921年美国海军制订舰种代码时，除了规定BB代表战列舰、CA代表重巡洋舰、CV代表航空母舰、DD代表驱逐舰等代码之外，还规定A代表重于空气的海军飞行器，Z代表轻于空气的飞行器（LTA，lighter than air）。ZF代表自由漂流的气球（free balloon），ZK指系留气球（kite balloon），ZN指软式飞艇，ZMC是以薄铝板做蒙皮的金属外壳软式飞艇。大型硬式飞艇的代码起初为是ZR，1931年“阿克伦”号服役后改为ZRS，即“侦察飞艇”（rigid airship scout）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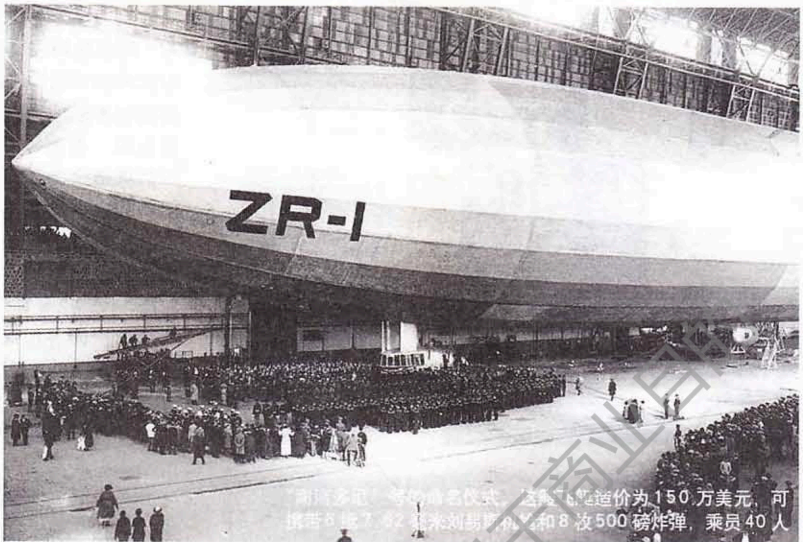
R－41号，计划在北海上空进行巡逻飞行，其滞空时间可以长达6天，而且携带自卫武器，可以为商船护航。德国投降后，R－39号到R－41号的订单被取消。正在建造中的R－38号原本也将拆毁，但是美国海军由于没有分到德国的齐柏林飞艇作为战争赔偿，因此表示在R－38号建成之后买下这艘飞艇，这才使得其建造工作继续下去。

1919年10月，美国海军以2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R－38号飞艇，并将其改为ZR－2号。肖特公司按照美方的要求，在艇首加装了1吨重的系留装置——这是英国人在战后的新发明，此前飞艇是通过缆绳系留在地面上的——并为此加长了尾部，以配平首尾重量。改装工作到1921年6月才完成，但是在当年8月23日的另一次试飞中，ZR－2号飞艇在亨伯河口上空进行15度转弯时，蒙皮上突然出现裂缝，接着艇身断为两截，迅速下坠，艇首还发生了爆炸。艇上的49名试飞人员（包括17名美国人）中有44人丧生，只有艇尾的5人幸存。

事后英美两国海军对ZR－2号失事原因进行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艘飞艇虽然在设计时仿照了德国的齐柏林"高升限"型飞艇，但其原型由于为了提高升限而削减骨架重量，导致结构脆弱。一战中德国海军对"高升限"型飞艇有非常严格的操纵要求，在飞行中是不能突然转舵的，而英方并不知道这一点。

雨果·艾克纳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从ZR－2号的不幸事故中看到了齐柏林公司的新希望。当时有一种说法甚嚣尘上，声称协约国大使会议正在考虑勒令齐柏林公司关门解散，并拆除其所有飞艇库、氢气工厂和装配车间。艾克纳认为，美国在战后没能从德国获得飞艇作为赔偿，对此一定是相当不满的。当时美国海军的ZR－2号飞艇已经坠毁，ZR－1"谢南多厄"号还没有试飞。如果齐柏林公司能够为美国军方承建一艘飞艇，那么也许能够挽救这家公司的前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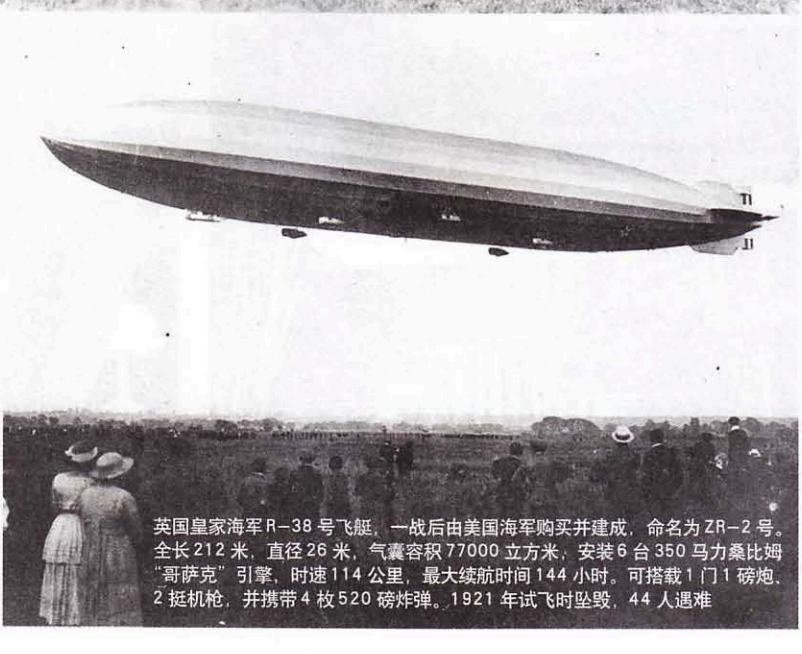
事实上美国陆军曾经在1919年1月26日向齐柏林公司订购了LZ－125号飞艇，其设计规格为长236米、直径29.9米、17个气囊，安装10台迈巴赫Mb IVa发动机，可搭载45到50名乘员。但是美国陆军部长纽顿·贝克出于政治考虑而在当年12月1日否决了这项订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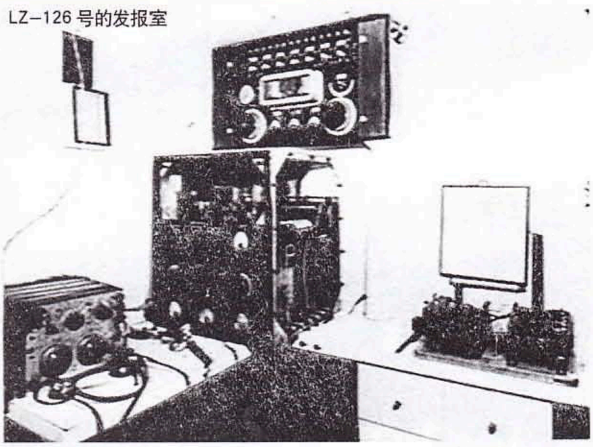


"谢南多厄"号的命名仪式，这艘飞艇造价为150万美元，可搭载6挺7.62毫米刘易斯机枪和8枚500磅炸弹，乘员40人

1925年9月2日在俄亥俄州坠毁的"谢南多厄"号飞艇




英国皇家海军R－38号飞艇，一战后由美国海军购买并建成，命名为ZR－2号。全长212米，直径26米，气囊容积77000立方米，安装6台350马力桑比姆"哥萨克"引擎，时速114公里，最大续航时间144小时。可搭载1门1磅炮、2挺机枪，并携带4枚520磅炸弹。1921年试飞时坠毁，44人遇难


LZ-126号的发报室

1922年艾克纳博士带领齐柏林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卡尔·阿恩施坦因（Karl Arnstein）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海军部和海军航空局商议为美国建造飞艇的问题。6月26日，美国海军航空局与齐柏林公司正式签订ZR-3号飞艇的建造合同，齐柏林公司的建造序列号为LZ-126。这艘飞艇的估算造价为320万马克，约合140万美元——这个价格比英国建造的ZR-2号飞艇便宜得多。

顺便说一句，齐柏林公司的飞艇建造费用远远低于同规格的美制飞艇。美国古德伊尔公司建造的239米飞艇“阿克伦”号（ZRS-4）造价是550万美元，这还是不含氦气的价格。而齐柏林公司的LZ-127“齐柏林伯爵”号飞艇造价只相当于175万美元，“兴登堡”号飞艇的造价也只有250万美元。


LZ-126号的客舱过道，右边的梯子可通往艇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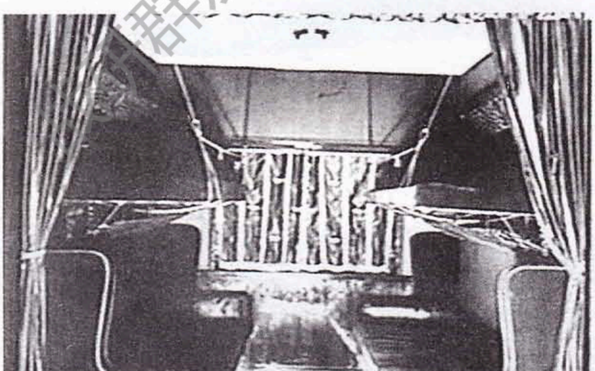
根据美德两国关于战争赔偿的协议，ZR-3的建造费用由德国政府支付，以抵偿本应赔偿给美国、却在1919年6月23日被德国海军艇员自行破坏掉的3艘齐柏林飞艇。除了1919年英国海军的R-34号之外，当时还没有其它飞艇成功飞越北大西洋的记录，所以没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承担将飞艇运往美国途中的意外保险。所以美方在合同中补充了一条，要求齐柏林公司自行将飞艇送至赫斯特湖航空站，途中若发生损失，将由齐柏林公司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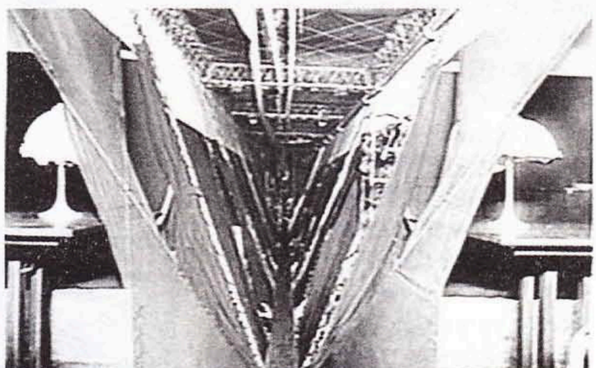
当时英法等一战空袭受害国要求彻底关闭齐柏林公司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尽管获得了美国海军的订单，但是艾克纳面临这样一个可能：LZ-126将是齐柏林公司建造的最后一艘飞艇。齐柏林公司是一家家庭氛围很浓厚的公司，上下级之间、工程师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在对未来晦暗不明的前景下，齐柏林公司所有的雇员都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这艘飞艇的建造工作中，以图给齐柏林飞艇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LZ-126号的客舱采用普尔曼式卧铺座椅，配有酒红色金丝绒幕帘，十分奢华，下图为改为卧铺后的座舱

LZ-126号飞艇全长200米，直径27.65米，艇内设有14个气囊，总容积73600立方米，其外形经过风洞试验，骨架结构采用新型的硬铝，并且改进了内部结构。齐柏林公司的长期合作伙伴迈巴赫公司还为这艘飞艇特地开发出了功率高达400马力的VL-1型12缸发动机，使其最大时速达到122公里（65节）。

由于协约国禁止德国建造军用飞艇，因此ZR-3在建造合同中被标注为“民用飞艇”，并具备搭载36名乘客的空间。LZ-126的客舱布置在驾驶舱之后，采用左右对称的布局，每侧有三个隔间。每个隔间布置两套墨绿色天鹅绒布面的普尔曼式火车座椅，可以坐六人。夜间将座椅靠




LZ-126号的乘务人员卧舱，设在艇体内部，上方为检修气囊的过道

背抬起来，并放下各个隔间之间、以及隔间与走廊之间的金丝绒幕帘，就可以将其改造成舒适的四人卧舱。在客舱后面有盥洗室、厕所和电气厨房，可以为旅客提供可口的热食。艇长、大副、技师、发报员、厨师和侍者的铺位设在飞艇艇体之内。

1924年8月27日，LZ-126号在腓特烈港附近的康斯坦茨湖上进行了首次试飞。为了避免日光辐射加热气囊内的浮升气体，齐柏林公司在LZ-126的蒙皮外涂上了一层铝粉，以反射阳光。这艘银光闪闪的雪茄形飞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行器。10月12日，雨果·艾克纳博士亲自驾驶这艘飞艇从腓特烈港起飞，前往美国。艇上一共搭载了27人，包括齐柏林公司的好几名骨干，比如首席艇长恩斯特·莱曼，他在这次飞行中担任大副；此外还有齐柏林公司的首席工程师、LZ-126的设计者路德维希·杜尔博士。此外LZ-126的首次跨洋飞行还搭乘了4名美国海军军官、2名陆军军官，以及美德两国的新闻记者。

为了躲开北大西洋上空的低压气流带，LZ-126号采用大圆弧法航线，从腓特烈港径直穿越法国领土，从纪龙德河口进入比斯开湾上空，在西班牙西北海岸转向亚速尔群岛方向，从低纬度地区穿越大西洋。随后这艘飞艇转而向北，借助一股强大的西南气流飞至纽芬兰大浅滩上空，经过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在10月15日凌晨4时抵达美国波士顿城。天亮之后，LZ-126号飞抵纽约市上空，哈得孙河上的船只按照纽约港迎接首次横跨大西洋的邮船的古老礼仪，向这艘银白色的飞艇鸣笛致意，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的消防船也向天空中喷洒大片大片的水花。

美国东部时间10月15日上午9时56分，LZ-126号在赫斯特湖海军航空站平安降落。这次横跨大西洋的飞行总耗时81小时零2分钟，航程8050公里。艾克纳博士和乘务人员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受到了花车彩带游行的待遇，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也在白宫会见了这群德国人，并高兴地称艾克纳博士为“和平的天使”。

1924年11月24日，在华盛顿市郊的安纳科斯塔海军航空站，柯立芝总统的夫人格蕾丝称赞这艘飞艇“像和平的天使一样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以“天使之城”洛杉矶的名字，宣布将其命名为“洛杉矶”号（USS Los Angeles，ZR-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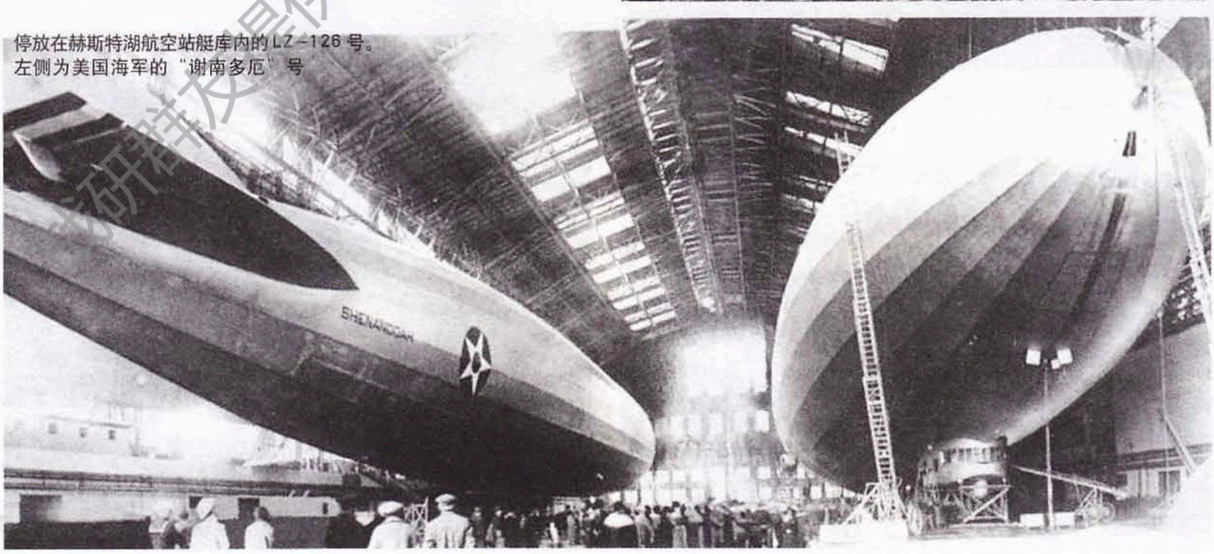


1924年8月，LZ-126号在慕尼黑的上威森菲尔德机场上空试飞


1924年9月，一名柏林市民向飞越勃兰登堡门的LZ-126号挥手致意



正在飞越大西洋的LZ-126号



停放在赫斯特湖航空站艇库内的LZ-126号。左侧为美国海军的“谢南多厄”号


LZ-126 号的驾驶舱


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前排右）与雨果·艾克纳博士握手。左一为恩斯特·莱曼艇长


1929 年停放在巴拿马运河美国海军基地的 ZR-3 "洛杉矶" 号


"洛杉矶" 号飞越曼哈顿岛上空

"洛杉矶"号加入美国海军后，立即在赫斯特湖航空站抽出了气囊内的氢气，换成氦气，并且像"谢南多厄"号一样加装了发动机冷凝回收系统。事实证明"洛杉矶"号是美国海军最成功的一艘飞艇，也是齐柏林公司建造过的最优秀的飞艇之一。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禁令，美国海军不能将这艘飞艇用于军事用途，因此在其 12 年的服役生涯里，"洛杉矶"号的主要使命是用作各种新技术的试验平台，例如挂载和回收飞机的"空中航空母舰"试验。此外它还多次搭载科学家观测日蚀和各种天文现象，为美国海军天文台校准罗经，在 1932 年还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可视电话"试验提供无线中继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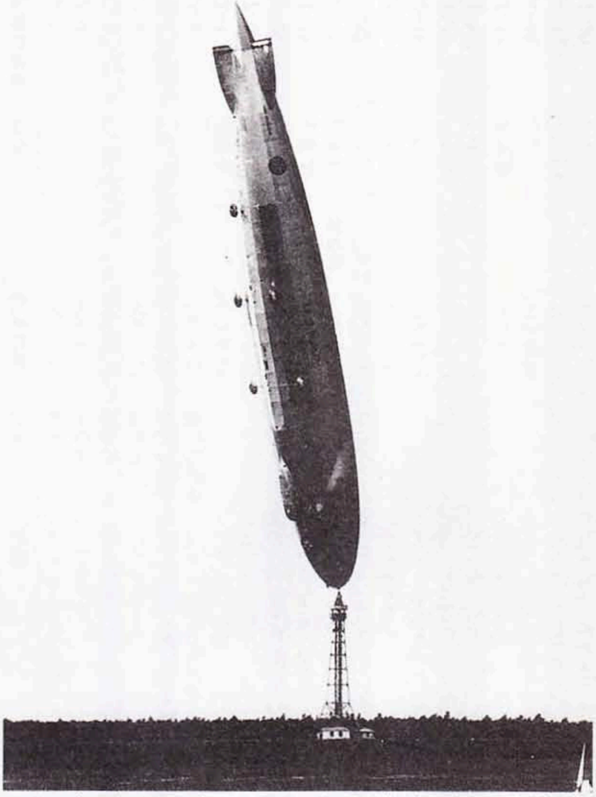
1931 年美国海军最新式的氦气硬式飞艇"阿克伦"号服役之后，"洛杉矶"号退出现役，封存在赫斯特湖的飞艇库中。1933 年"阿克伦"号失事坠毁后，"洛杉矶"号作为海军军用飞艇重新服役，但是在 1937 年"兴登堡"号爆炸事故之后再次退役，1939 年解体拆毁，成为世界上服役生涯最长的飞艇。

"洛杉矶"号的成功挽救了齐柏林公司的命运，不仅使其得以保留艇库、工厂和车间设备，而且留住了经验丰富的熟练雇员。1926 年 5 月 3 日，协约国大使会议决定取消对德国建造大型飞艇的限制，唯一的条件是不得建造军用飞艇。受"洛杉矶"号越洋飞行的鼓舞，艾克纳博士和齐柏林公司总工程师路德维希·杜尔等人决定利用 LZ－126 的建造经验和技术，制造一艘真正的跨洋客运飞艇，也就是航空史上大名鼎鼎的 LZ－127"齐柏林伯爵"号。它将成为飞艇黄金时代来临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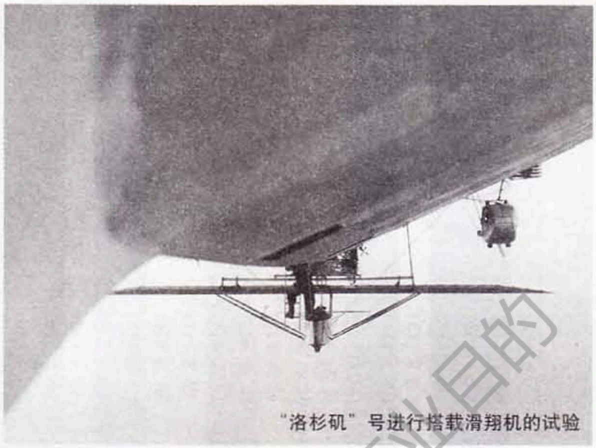
（待续）


从赫斯特湖海军航空站艇库徐徐移出的"洛杉矶"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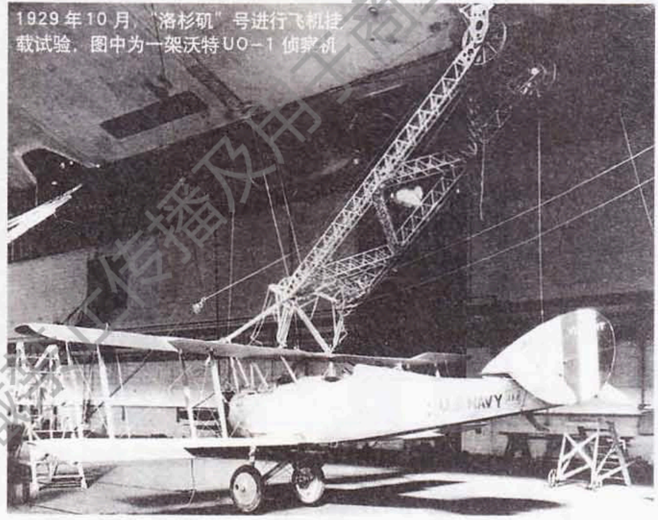

停放在赫斯特湖航空站地面上的"洛杉矶"号



↑1927 年 8 月 25 日下午 1 时 30 分，停泊在赫斯特湖航空站系留柱上的“洛杉矶”号遇到一阵从大西洋方向吹来的冷空气。地面人员来不及调整飞艇方向，致使其艇尾部位陷入冷空气中，导致升力陡然增大，艇尾上升。艇内的机组人员试图沿着龙骨爬到艇尾部位，使其降下去，但没能成功。最后“洛杉矶”号与地面形成 85 度角，数小时后才徐徐降下。“洛杉矶”号在这次事故中只有轻微的损坏，第二天照常进行了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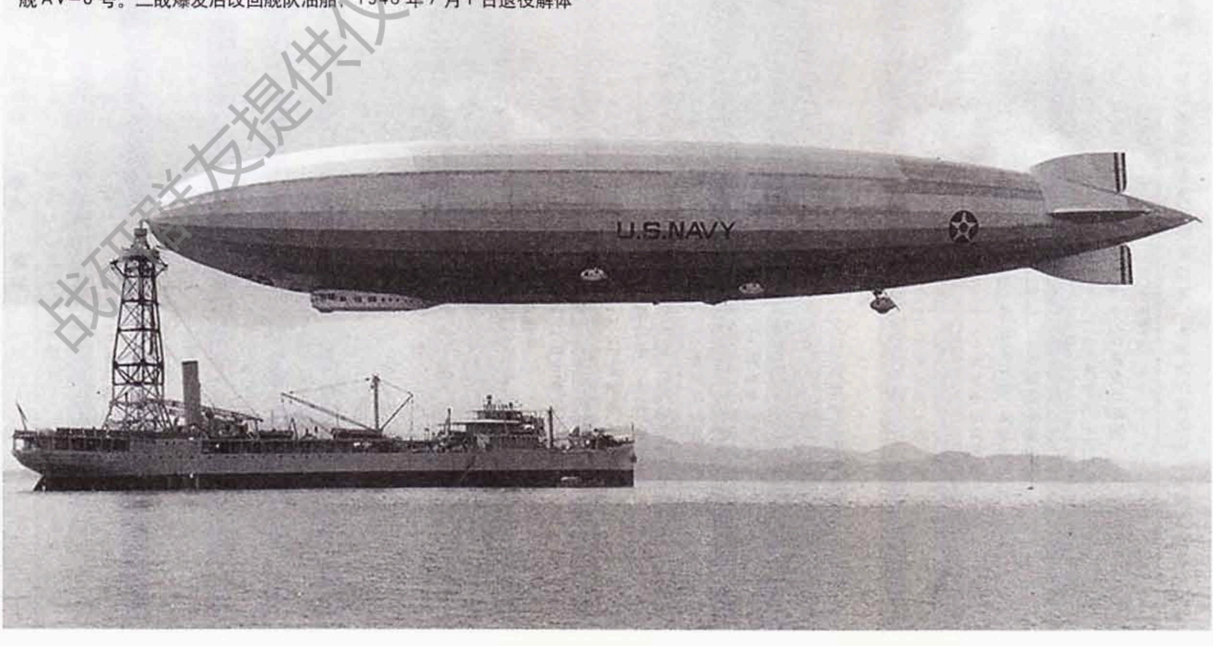


“洛杉矶”号进行搭载滑翔机的试验



1929 年 10 月，“洛杉矶”号进行飞机挂载试验，图中为一架沃特 UO－1 侦察机

1931 年 2 月，“洛杉矶”号参加了美国海军第十一次舰队演习，在巴拿马运河附近海域系留在“帕托卡”号舰队油船 (USS Patoka, AO－9) 上。“帕托卡”号 1918 年由纽波特纽斯船厂建造，排水量 16800 吨，航速 11 节。1924 年改装为飞艇供应船，加装了一座 125 英尺高的系留塔。美国海军的“谢南多厄”号、“洛杉矶”号、“阿克伦”号飞艇都曾在上面系留过。1933 年“阿克伦”号飞艇失事后“帕托卡”号也退役，1939 年重新启封并拆除飞艇系留塔，改为水机母舰 AV－6 号。二战爆发后改回舰队油船，1946 年 7 月 1 日退役解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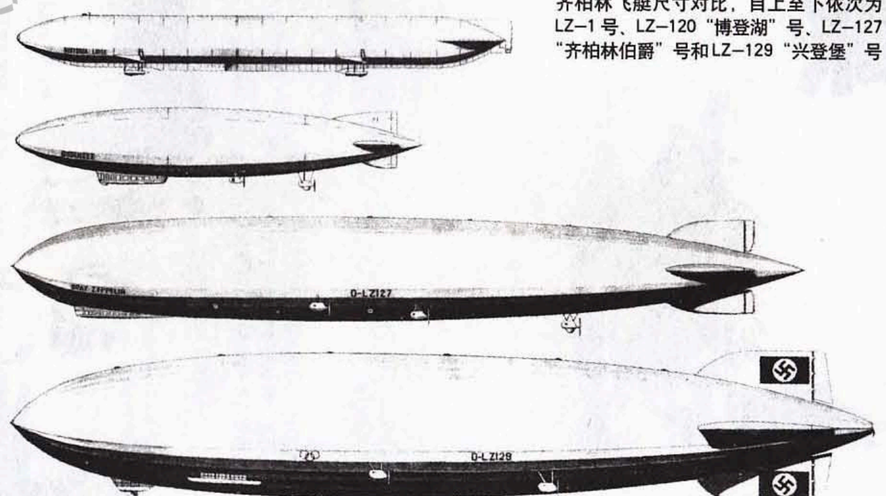


齐柏林序号	艇名	首飞日期	型号	备注
LZ-1		1900.7.2	原型	1901 年卖给废金属商以回收资金
LZ-2		1906.1.17	试验型	首飞时损毁
LZ-3	Z I	1906.10.9	试验型	1913 年解体
LZ-4		1908.6.20	试验型	1908.8.4 失事
LZ-5	Z II	1909.5.26	试验型	1910.4.24 脱锚失控撞毁
LZ-6		1909.8.25	客运试验型	1910 年在艇库内撞毁
LZ-7	德意志	1910.6.19		1910.6.28 坠毁
LZ-8	德意志 II	1911.3.30		1911.5.16 撞毁
LZ-9	Z II 代艇	1911.10.2		1914.8.1 解体
LZ-10	士瓦本	1911.6.26		1912.6.28 失火焚毁
LZ-11	维多利亚·路易丝	1912.2.19		1915.10.1 在艇库内撞毁
LZ-12	Z III	1912.4.25		1914.8.1 解体
LZ-13	汉萨	1912.7.30		1916 年夏解体
LZ-14	L-1	1912.10.7		1913.9.9 在赫尔戈兰岛海域失事
LZ-15	Z I 代艇	1913.1.16		1913.3.19 降落时撞毁
LZ-16	Z IV	1913.3.14		1916 年秋解体
LZ-17	萨克森	1913.5.3		1916 年秋解体
LZ-18	L-2	1913.9.9		1913.10.17 坠毁
LZ-19	Z I 代艇	1913.6.6		1914.6.13 遇风暴坠毁
LZ-20	Z V	1913.7.8		1914.8.23 在波兰迫降，被俄军俘获
LZ-21	Z VI	1913.11.10		1914.8.6 降落时坠毁
LZ-22	Z VII	1914.1.8		1914.8.21 被法军击伤，迫降时坠毁
LZ-23	Z VIII	1914.5.11		1914.8.21 被法军俘获
LZ-24	L-3	1914.5.11		1915.2.17 在丹麦迫降，由艇员自毁
LZ-25	Z IX	1914.7.13		1914.10.8 在艇库内被英军飞机炸毁
LZ-26	Z XII	1914.12.14		1917.8.8 解体
LZ-27	L-4	1914.8.18		1915.2.17 在丹麦迫降时损毁
LZ-28	L-5	1914.9.22		1915.8.7 被俄军飞机击落
LZ-29	Z X	1914.10.13		1915.3.20 在法国受伤迫降，艇身损毁
LZ-30	Z XI	1914.11.15		1915.5.20 移出艇库时失火
LZ-31	L-6	1914.11.3		1916.9.16 在艇库内充氢时失火炸毁
LZ-32	L-7	1914.11.20	M 型	1916.5.4 被英国军舰击沉
LZ-33	L-8	1914.12.17		1915.3.5 被法军击伤后坠毁
LZ-34	LZ-34	1915.1.6		1915.6.21 被俄军飞机击伤，迫降时坠毁
LZ-35	LZ-35	1915.1.11		1915.4.13 在比利时被击落
LZ-36	L-9LZ-36	1915.3.8	O 型	1916.9.16 充氢时炸毁
LZ-37	LZ-37	1915.3.4	M 型	1915.6.7 被英国高炮击落
LZ-38	LZ-38	1915.4.3	M 型	1915.6.7 被英国高炮击落
LZ-39	LZ-39	1915.4.22		1915.12.17 在东线被击毁
LZ-40	L-10	1915.5.13		1915.9.3 遇暴风损毁
LZ-41	L-11	1915.6.7	P 型	1916.4.25 解体
LZ-42	LZ-72	1915.6.15	P 型	1917.2 解体
LZ-43	L-12	1915.6.21	P 型	1915.8.10 维修时焚毁
LZ-44	LZ-74	1915.7.8	P 型	1915.10.8 撞山坠毁
LZ-45	L-13	1915.7.23	P 型	1917.4.25 解体
LZ-46	L-14	1915.8.9	P 型	1917.4.25 解体
LZ-47	LZ-77	1915.8.24	P 型	1916.2.21 在凡尔登被法军击落
LZ-48	L-15	1915.9.9	P 型	1916.4.1 在英国被击落
LZ-49	LZ-79	1915.8.2	P 型	1916.1.30 在巴黎被法军击落
LZ-50	L-16	1915.9.23	P 型	1917.10 遇风迫降时坠毁
LZ-51	LZ-81	1915.10.7	Q 型	1916.9.2 在保加利亚失事
LZ-52	L-18	1915.11.3	P 型	1915.11.17 加注燃料时失火
LZ-53	L-17	1915.10.20	P 型	1916.2.28 在艇库内被 L-24 撞毁
LZ-54	L-19	1915.11.27	P 型	1916.2.2 在北海迫降后沉没
LZ-55	LZ-85	1915.9.12	Q 型	1916.5.5 被英国战列舰击落
LZ-56	LZ-86	1915.10.10	Q 型	1916.9.3 坠毁
LZ-57	LZ-87	1915.12.6	Q 型	1917.7 解体
LZ-58	LZ-88/L-25	1915.11.14	Q 型	1917.9 解体
LZ-59	L-20	1915.11.21	Q 型	1916.5.3 在挪威迫降自毁
LZ-60	LZ-90	1916.1.1	Q 型	1916.11.7 在北海遇恶劣天气失踪
LZ-61	L-21	1916.1.10	Q 型	1916.11.28 被英国飞机击落
LZ-62	L-30	1916.5.28	R 型	1920 赔偿给比利时，旋解体
LZ-63	LZ-93	1916.2.23	P 型	1917 解体
LZ-64	L-22	1916.3.3	Q 型	1917.5.14 被英国飞机击落
LZ-65	LZ-95	1916.2.1	Q 型	1916.2.21 被法军击落
LZ-66	L-23	1916.4.8	Q 型	1917.8.21 被英军飞机击落
LZ-67	LZ-97	1916.4.4	Q 型	1917.7.5 解体
LZ-68	LZ-98	1916.4.28	Q 型	1917.8 解体
LZ-69	L-24	1916.5.20	Q 型	1916.12.28 在艇库内撞墙失火
LZ-70				未建造
LZ-71	LZ-101	1916.6.29	Q 型	以保加利亚为基地，1917.9 解体
LZ-72	L-31	1916.7.12	R 型	1916.10.2 被英军飞机击落
LZ-73	LZ-103	1916.8.23	Q 型	1917.8 解体
LZ-74	L-32	1916.8.4	R 型	1916.9.24 被英军飞机击落
LZ-75	L-37	1916.11.9	R 型	1920 赔偿给日本，旋解体
LZ-76	L-33	1916.8.30	R 型	1916.9.24 在英国迫降被俘
LZ-77	LZ-107	1916.10.16	Q 型	1917.7 解体
LZ-78	L-34	1916.9.22	R 型	1916.11.28 被英军飞机击落
LZ-79	L-41	1917.1.15	R 型	1919.6.23 由艇员自毁
LZ-80	L-35	1916.10.20	R 型	1918.9 解体

注：德国陆军飞艇的编号以 Z 和 LZ 开头，用深灰色栏标注，德国海军的飞艇编号以 L 开头，用浅灰色栏标注。民用飞艇为白色栏

齐柏林序号	艇名	首飞日期	型号	备注
LZ-81	LZ-111	1916.12.20	Q 型	移交海军，1917.8.10 解体
LZ-82	L-36	1916.11.1	R 型	1917.2.7 降落时损毁
LZ-83	LZ-113	1917.2.22	Q 型	1920 移交法国
LZ-84	L-38	1916.11.22	R 型	1916.12.29 空袭圣彼得堡时遇暴雪损毁
LZ-85	L-45	1917.4.12	R 型	1917.10.20 在法国迫降后自毁
LZ-86	L-39	1916.12.11	R 型	1917.3.17 被法军击落
LZ-87	L-47	1917.5.11	R 型	1918.1.5 因艇库失火被焚毁
LZ-88	L-40	1917.1.3	R 型	1917.6.16 降落时失事坠毁
LZ-89	L-50	1917.6.9	R 型	1917.10.20 在法国迫降后自毁
LZ-90	LZ-120	1917.1.31	R 型	1920 赔偿给意大利，翌年解体
LZ-91	L-42	1917.2.21	高升限型	1919.6.23 由艇员自毁
LZ-92	L-43	1917.3.6	S 型	1917.7.14 被英国飞机击落
LZ-93	L-44	1917.4.1	高升限型	1917.10.20 被法军击落
LZ-94	L-46	1917.4.24	高升限型	1918.1.5 因艇库失火被焚毁
LZ-95	L-48	1917.5.22	高升限型	1917.6.17 被英国飞机击落
LZ-96	L-49	1917.6.13	高升限型	1917.10.20 在法国迫降后被俘
LZ-97	L-51	1917.6.6	高升限型	1918.1.5 因艇库失火被焚毁
LZ-98	L-52	1917.7.14	高升限型	1919.6.23 被艇员自毁
LZ-99	L-54	1917.8.13	U 型	1918.7.19 在艇库内被英国舰载机炸毁
LZ-100	L-53	1917.8.8	U 型	1918.8.11 被英军飞机击落
LZ-101	L-55	1917.9.1	高升限型	1917.10.19 躲避英机追击时坠毁
LZ-102	L-57	1917.9.26	W 型	1917.10.8 遭强风损毁
LZ-103	L-56	1917.9.24	W 型	1919.6.23 由艇员自毁
LZ-104	L-59	1917.10.30	X 型	1918.4.7 自爆坠毁
LZ-105	L-58	1917.10.29	U 型	1918.1.5 因艇库失火被焚毁
LZ-106	L-61	1917.12.12	U 型	1920 赔偿给意大利
LZ-107	L-62	1918.1.19	U 型	1918.5.19 被英军飞机击落
LZ-108	L-60	1917.12.18	高升限型	1918.7.19 在艇库内被英国舰载机炸毁
LZ-109	L-64	1918.3.11	U 型	1920 年赔偿给英国，旋解体
LZ-110	L-63	1918.3.4	U 型	1919.6.23 由艇员自毁
LZ-111	L-65	1918.4.17	U 型	1919.6.23 由艇员自毁
LZ-112	L-70	1918.7.1	X 型	1918.8.6 被英国飞机击落
LZ-113	L-71	1918.7.29	X 型	1920 年赔偿给英国，旋解体
LZ-114	L-72	1920.2.9	X 型	1920 年赔偿给法国，1923 年遇雷暴失踪
LZ-115	L-100		Z 型	取消建造
LZ-116	L-73		高升限型	取消建造
LZ-117	L-74		高升限型	取消建造
LZ-118	L-75		高升限型	取消建造
LZ-119	"美洲飞艇"		Z 型	取消建造

齐柏林序号	艇名	首飞日期	备注
LZ-120	博登湖 / 埃斯佩利亚	1919.8.20	1920 赔偿给意大利，1928.7 拆毁
LZ-121	北极星 / 地中海	1921.6.13	竣工后赔偿给法国，1927 年解体
LZ-122			因协约国禁令取消建造
LZ-123			因协约国禁令取消建造
LZ-124			因协约国禁令取消建造
LZ-125			美国陆军订货，后取消订单
LZ-126	洛杉矶	1924.8.27	美国海军订货，1939 年解体
LZ-127	齐柏林伯爵	1928.9.18	首艘跨洋客运飞艇，投入德国至南美航线，1940 年拆毁
LZ-128			LZ-127 加长型，后由于英国 R-101 号飞艇失事而取消建造，改为设计氦气飞艇 LZ-129 号
LZ-129	兴登堡	1936.3.4	因美国禁止氦气出口而仍用氢气，1937.5.6 在美国赫斯特湖航空展因氢气爆炸而失事
LZ-130	齐柏林伯爵 II	1938.9.14	兴登堡号同型艇，竣工后因无法购入氦气而未获准投入客运运营。1940 年拆毁
LZ-131			兴登堡级加长型，载客 80 人，仅建造部分构件，1940 年拆毁
LZ-132			LZ-131 同级艇，未建造



齐柏林飞艇尺寸对比，自上至下依次为 LZ-1 号、LZ-120 "博登湖" 号、LZ-127 "齐柏林伯爵" 号和 LZ-129 "兴登堡" 号

战研所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果壳里的战争

——1961年葡印果阿之战

○ 鹰扬

题图：1962年3月，印度海军“维克兰特”号航母与英国海军“人马座”号航母在印度洋上结伴航行。“维克兰特”号在当年12月参加了占领果阿的行动

四百五十年的征服

中世纪欧洲的相对封闭状态由于从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的七次十字军东征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些东征的公开目的是从塞尔柱突厥人手里夺回十一世纪被占领的基督教圣地，但无疑也有经济动机。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包括追求商业利益或趁机抢夺战利品的人，纷纷参加十字军。

十字军的征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他们只取得了短暂的成果。他们在地中海东岸建造的一系列十字军城堡到1291年为止全部丧失殆尽，十字军运动也最终以完全未能达到最初目的的彻底失败告终。不过，大多数欧洲人这时开始明白，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在文化和技术的许多方面比他们更优秀的文明。欧洲人开始从阿拉伯人、突厥人和拜占庭人手中接触到他们从与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交往中了解到的东西。在两百年的时间里，返回欧洲的十字军骑士随身带会近东和印度的货物、家具、衣着，以及医学和其他零碎的科学知识，欧洲文化也因此变得丰富而充实起来。

不过，十字军的最大成果是对贸易的刺激。贸易一开始发生在欧洲和东地中海地区之间，后来扩展至意大利与其北方的欧洲内陆之间，最终扩展到北欧和英国。小镇开始发展，有些壮大成了贸易都市，比如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自从罗马帝国灭亡后统治了欧洲好几个世纪的地区自给型和物物交换型经济，开始被一种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取代。从事贸易的欧洲人开始渴望把他们的贸易从地中海东岸向东继续推进，能够直接与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特别是马可波罗在1293年从中国和印度回国，并讲述了令人着迷的东方财富之后。

但是，从欧洲前往印度和中国的商路被占据着中间地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和他们的穆斯林同盟者控制着，阻断了欧洲与东方的任何直接交流。意大利北部的商业城镇由此得以发展成主要的商业中心，特别是威尼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地中海港口都更接近中欧的主要市场，同时可以用成本低廉的海运将货物从东地中海运来，并通过正好在威尼斯北边的阿尔卑斯山口运往整个欧洲北部。

在这些货物中，最重要的是东南亚和印度的香料。欧洲不出产这些东西，但却大量需求香料以保存肉食，使本来单调或容易变质的食物大为增色。香料也用来配置药物、香水和熏香。由于冬储饲料技术不发达，因此直到十七世纪末，欧洲很大比例的农场牲畜都要在晚秋时节屠宰，因为难以为它们提供足够的冬季饲料和畜舍。古代欧洲保存肉类的方法是盐腌和烟熏，这两种方法虽然保质期长，但口味可憎。

亚洲香料给欧洲人带来了大受欢迎的新鲜口味和新鲜存储方法。胡椒主要来自南印度，丁香产自马鲁古群岛，肉豆蔻和豆蔻也产自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桂皮出自锡兰，姜来自中国和南印度。此外，产自印度的各类棉织物、精制钢用具和珠宝，以及来自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也都是贸易的热门货。威尼斯人用黄金和白银支付这些亚洲货物的货款，然后以高得多的

价格销往欧洲各地。他们依靠垄断贸易的巨大利润富庶起来了。每年威尼斯总督都要坐着一艘金色的巨大御船，把一枚金戒指投进亚得里亚海，象征威尼斯与大海的联姻。

当威尼斯人在1499年听到瓦斯科·达伽马从印度胜利返回里斯本的消息时，他们陷入真正的悲哀之中。因为他们明白，这意味着威尼斯的贸易垄断地位的完结。现在大西洋成为通往亚洲的新航线起点。这对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英国的港口、商人和为辽阔大洋设计的船舶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意味着威尼斯的光芒将被它的竞争对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故乡热那亚所淹没。

哥伦布虽然是热那亚人，航行时却挂着西班牙国旗。他的目标是马可波罗笔下的“Cathay”，也就是中国。他相信向西环绕地球一周就可以到达那里。直到逝世为止，他一直相信他在新大陆发现的海岸和岛屿就是亚洲的“Cipangu”(日本国)。哥伦布之所以要向西航行，是因为资助他的西班牙人参与竞争较晚——主要耽误在长期驱赶摩尔人、直到1492年才将他们赶走这件事上面——而从欧洲直接通往东方的航线此时已经被葡萄牙人所开辟和控制。

葡萄牙直接面向大西洋的地理位置，以及葡萄牙人在狂暴海上航行和捕鱼的悠久传统，使得葡萄牙在这项事业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葡萄牙从来不是重要的商业中心，它是一个贫穷、多山而落后的国家，但它了解辽阔的大洋，而像威尼斯人那种用单层甲板划桨大帆船的地中海航海者则不然。

葡萄牙人建造了适合远航的船只，并吸取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特别是大三角帆，来建造船只。这种帆与可以调节角度的方形帆结合起来，后来又加上一种船首三角帆，就可以使船在与风向成一定角度时也能顺利航行，而不仅仅是顺风漂流。这种船被称为“卡拉维尔”(caravela)。葡萄牙人还采用了中国人发明的罗盘和船尾舵，来代替笨重又不适于航海的船尾橹。

葡萄牙人航海的动机并不仅仅出于商业利益。他们是狂热的天主教徒，自认是这一宗教信仰的捍卫者。葡萄牙人曾经被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征服，而伊斯兰教的北非就在直布罗陀海峡对面。所有的穆斯林都是葡萄牙人的大敌——何况他们还阻断了通向东方的航线。对葡萄牙人更为迫切的是，阿拉伯人同时也控制着从西非穿过撒哈拉沙漠运送奴隶、黄金、象牙和香料的贸易路线，这刺激着葡萄牙人在1415年便进行了他们最早的一次海外冒险，即占领直布罗陀对岸的摩尔人城市休达。这是十五世纪其余时间里葡萄牙人沿着非洲海岸的推进活动的开始。

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之子亨利亲王在1460年逝世前一直鼓励并领导了这一扩张事业。亨利曾多次派远征船



航海家亨利亲王（Infante Dom Henrique de Avis，1394–1460），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之子。他在21岁时曾参加征服北非摩尔人的战争，此后任北非总督，并派出探险队发现了马德拉群岛。1420年，他成为圣殿骑士团在葡萄牙的继承人——季度骑士团的团长，从此将骑士团的巨大财富投入到资助海外探险当中。他资助航海有双重目的，一是寻找新的贸易道路，一是将其当作伊斯兰帝国进行宗教战争的一种手段。

队沿非洲海岸航行，并记录所见所闻。他在圣文森特角一处可眺望大海的峭壁上建造了一所培养地图制图员、探险家和航海学院的学校。亨利手下的船长们在向南扩张时建立了一系列堡垒和贸易站，到十五世纪末时已取代阿拉伯人成为西非很多地方的



右图为位于里斯本附近特茹河河口的“发现者纪念碑”(Padrao des Descobrimentos)，1958年航海家亨利亲王逝世五百周年前夕建造，以纪念航海大发现时期的葡萄牙航海家，以及支持海外探险事业的君主、贵族、学者、绘图师和作家。站在最前方手捧帆船模型的是亨利亲王。1为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2为瓦斯科·达伽马，3为斐迪南·麦哲伦，4为巴塞罗缪·迪亚斯，5为征服马六甲的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6为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这一面的其他人像包括巴西的发现者卡布拉尔，刚果河的发现者卡昂，航海家苏萨、科特－里亚尔、德·阿布里乌、埃斯特万·达伽马、克里斯托万·达伽马等人。雕塑的另一面有航海事业的赞助人科英布拉公爵和菲利帕王后、探险家兼作家门德斯·品托、数学家佩德罗·努涅斯、制图学家耶胡达·克莱斯科、葡萄牙民族史诗《卢西亚德》的作者德·加莫斯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出于保守航海秘密的原因，当时的葡萄牙王室严禁为亨利王子、达伽马、迪亚斯等人画像，因此这些人流传后世的形象大多是后人猜测的

商业支配力量，并由海路把西非的奴隶、象牙和黄金直接运往欧洲。

亨利王子死后，葡萄牙探险者继续南进。巴塞罗缪·迪亚斯于1487 年绕过非洲南端被他命名为“好望角”的那个海角。从此开始，葡萄牙人对非洲贸易的兴趣降到利润更为丰盛的亚洲贸易之下。

瓦斯科·达伽马于1497 年组成了一支四艘船的船队，从里斯本启航，目的地是印度。他对于中国、“印度群岛”或香料群岛在何处依然模糊不清，随身只带着马可波罗的游记。他绕过好望角后，于1498 年初到达东非的马林迪（今属肯尼亚），随后强迫一名多次航行于印度洋的印度古吉拉特领航员带领他去印度西海岸的港口卡利卡特（Calicut）。在这名领航员的帮助下，达伽马在1498 年5 月顺利抵达那里，此时距他从里斯本出发已经将近一年了。

印度商人和当地统治者立即意识到葡萄牙人对于他们的香料贸易是一个威胁，而且很快发现葡萄牙人是残忍的竞争者。当第二次印度舰队的指挥官卡布拉尔得知卡利卡特当局拖延他的贸易请求时，他下令炮轰该镇，并抓了一些印度人当人质。最后，卡布拉尔的船上装载了大量香料，于1501 年回到里斯本。这些香料为他赚得了3000% 的利润，足以支付航行费用600 次有余。到1503 年，里斯本的胡椒价格大约是威尼斯的五分之一。

1498 年达伽马在卡利卡特登陆的情景



1502 年达伽马回到卡利卡特，再次炮轰港口，并打败来迎击他的印度和阿拉伯舰队。葡萄牙人随后探索了整个印度西海岸和锡兰，于1510 年在果阿定居下来，并把这里作为他们在亚洲的主要基地。他们从那里几乎可以垄断亚洲与西方的全部贸易。

葡萄牙人对于果阿这个亚洲基地的重视可以从他们给两个主要的非洲基地起的名字上看出来：阿尔戈阿湾（Algoa），也就是今天南非的伊丽莎白港，其名字的意思是“到果阿去”；德拉戈阿湾（Delagoa），今天是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湾，意思是“从果阿来”。这两个名字反应了葡萄牙与其亚洲行政中心果阿之间最佳往返海路上的主要风向特征。

果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当时这片地方被称作“果曼塔”（Gomanta），意思是“牛群之国”。这里曾先后隶属于雅利安人的孔雀帝国（Maurya Empire）和百乘王国（Satavahana Dynasty）、斯基泰人的西郡太守国（Western Satraps）、以及一系列信奉印度教的小领主。1350 年，它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巴赫玛尼苏丹国征服，在1370 年落入印度次大陆的最后一个印度教帝国——毗奢耶那伽罗帝国（Vijayanagara Empire）手中。此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是毗奢耶那伽罗帝国最主要的海港之一，帝国从这里进口了大量阿拉伯马，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军。

1469 年，果阿再次被巴赫玛尼苏丹国征服，1492 年这个苏丹国分裂之后，在其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小苏丹国比贾蒲尔（Bijapur Sultanate）控制了果阿地区，并以老果阿城（Velha Goa）作为其陪都。比贾蒲尔苏丹效忠于奥斯曼帝国，因此从1504 年起，在这座城市里驻扎着400 名奥斯曼士兵。这座城池被护城河环绕，城中建有比贾蒲尔苏丹的王宫，以及众多的清真寺和寺庙。

1503 年春天，葡萄牙贵族探险家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Afonso de Albuquerque）率领“第五次印度舰队”离开里斯本，从而开创了葡萄牙东方殖民帝国的基业。由于帮助印度南方港口科钦（Cochin）的领主击退了卡利卡特的进攻，因此阿尔布开克获准在科钦建立一座商站，从而奠定了葡萄牙东方帝国的基础。



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1453–1515），出身王族，是卡斯蒂里亚和葡萄牙国王的后代，足智多谋，目光远大。他以果阿为葡萄牙东方帝国的中心，西边征服了霍尔木兹，东边占领了马六甲，从而控制了除红海外进入印度洋的所有入口。1498 年达伽马在印度洋所发现的穆斯林海上商业体系，到1515 年便基本上被阿尔布开克消灭了，他也因此被称为“东方恺撒”、“海上雄狮”和“葡萄牙战神”

1504 年阿尔布开克回国后受到了曼努埃尔一世国王的款待，两年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海军上将（Tristao da Cunha）率领“第八次印度舰队”的16 艘战舰前往印度时，阿尔布开克担任其中由5 艘船组成的“阿拉伯海岸分舰队”的指挥官。他在红海出口附近的索科特拉岛与达库尼亚舰队分开，单独率舰前去攻打亚洲主要的商业中心之一、波斯湾中的霍尔木兹岛，并在岛上建起了第一座葡萄牙人的堡垒。

1508 年12 月，阿尔布开克率“阿拉伯海岸分舰队”驶往印度西南的马拉巴尔海岸，在当时葡萄牙人在印度的行政中心坎纳诺尔（Cannanore）登岸。他在离开里斯本时曾随身携带着一封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密令，指派他接掌第一任印度总督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的职位。但是德·阿尔梅达宣称自己的任期要到1509 年1 月才到期，同时还要为死在穆斯林舰队手中的儿子报仇，因此拒绝让位。为了避免爆发内战，阿尔布开克撤退到科钦。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1509年3月，德·阿尔梅达在印度西北海岸的第乌岛附近与奥斯曼帝国、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古吉拉特苏丹国和卡利卡特的联合舰队展开了海战，彻底击败了后者，奥斯曼和马木鲁克的海军势力被葡萄牙人永远从印度洋中驱逐出去了。德·阿尔梅达返回坎纳诺尔之后，获悉阿尔布开克曾经密谋以“不适合执政”为由推翻自己，于是下令把阿尔布开克抓到坎纳诺尔，软禁到一艘旧船上面。当年11月，葡萄牙海军元帅费迪南·库廷尼亚率领“第十一次印度舰队”到达印度后，才下令将他释放。阿尔布开克随后就任第二任印度总督。

在第十一次印度舰队离开里斯本之前，曼努埃尔国王曾经给库廷尼亚元帅两个任务，一是用武力支持阿尔布开克就任总督，二是占领卡利卡特港。1510年1月，阿尔布开克率领舰队对卡利卡特发起进攻。葡萄牙人一度打到了内城，但是库廷尼亚元帅由于贪羡城中宝库里的财富，在率领一小队人马单独冒进时陷入了包围之中。为了营救这位元帅，阿尔布开克亲自率人前去营救，在战斗中身受重伤，不得不撤离卡利卡特。


1509年第乌海战的场面

伤愈之后，阿尔布开克再度率领舰队离开坎纳诺尔。他手下有23艘军舰和1200名士兵。他原本的计划是前往红海与马木鲁克王朝海军作战，或者前往霍尔木兹岛。但是一名信奉印度教的私掠船船长提莫吉向他建议说，攻打果阿更加容易。

葡萄牙的印度舰队

从1500年起，到1612年为止，葡萄牙几乎每年都要派出一支“印度舰队”（Armadas da India）。这种舰队大者有二十多艘帆船，小的只有四五艘。这些船通常是排水量在三四百吨左右的卡拉克式帆船，最小的大约100吨，最大的排水量达到600到900吨。船上面搭载着青铜加农炮、鹰炮（falconnet，一种轻型加农炮，炮弹通常重约两磅，和一只猎隼的重量相当，故而得名）和回旋炮（swivel gun）。用来交换亚洲香料的欧洲商品包括铜锭和铜条、铅锭、水银、洋红、小块地毯、染色布匹、小刀、无边帽和镜子，此外还有大量的白银。如果船队在中途停靠莫桑比克的话，还要加上当地葡萄牙商站在东非沿海收购到的珊瑚、黄金、象牙、黑檀木和珍珠。这些船只在印度的卡利卡特、科钦或果阿卸下货物，然后购买香料。最主要的是五种“辉煌香料”：胡椒、肉桂、丁香、肉豆蔻果和肉豆蔻皮，以及生姜、小豆蔻、桂皮、罗望子等辅助香料。除此之外，葡萄牙人采购的商品还有索科特拉芦荟、白松香、樟脑、没药、苦艾、紫胶、靛青。

葡萄牙官方史料通常将达伽马的舰队算作是第一支印度舰队，但实际上他带到印度去的只是一些劣质而廉价的衬衫和玻璃珠子，根本没法换到任何值得一提的货物。佩德罗·卡布拉尔在达伽马回国后六个月组成的第二次舰队才算是真正以贸易为目的的“印度舰队”。它由13艘卡拉克帆船组成，途中顺道发现了巴西。抵达卡利卡特后，卡布拉尔与当地的萨穆林（王公）签订了一份贸易条约，在银箔上用金字写成。但是卡利卡特的穆斯林商人群起攻击葡萄牙人，杀死了50名管理葡萄牙货栈的人。卡布拉尔无情地进行了报复，抓了10条穆斯林商船，杀死五六百名船员，没收了他们的货物，并且炮轰了萨穆林的王宫（他认为穆斯林商人的骚乱是受萨穆林怂恿的），将卡利卡特城变为一片火海。他随后决定抛弃这里，前往科钦进行贸易。由于科钦的萨穆林听闻葡萄牙人在卡利卡特的所作所为，再加上他与卡利卡特的萨穆林是死对头，因此允许葡萄牙人在当地建立了一个集商站、仓库和要塞为一体的据点。这也是葡萄牙在印度立足之始。卡拉布尔从此开创了葡萄牙在亚洲进行严酷无情的商业扩张和统治的先例。当他于1501年率舰队返回葡萄牙时，获得的利润——据威尼斯人说——超过了30万磅白银。

每支印度舰队大约需要六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从欧洲抵达印度。船队通常在2月到4月之间从里斯本出发（右图），沿着加那利海流到达佛得角群岛附近，在这里的港口躲过臭名昭著的佛得角热带气旋之后，船队继续南下，在今天的达喀尔湾一带补充淡水。在利比里亚的帕尔马斯角附近，船队利用南大西洋的本格拉环流，向西转向南美洲巴西海岸，以避开反方向的贸易风。船队在巴西的伯南布戈加水后，沿着南大西洋的西风带快速经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这里是商船的坟场，大的葡萄牙船队通常在好望角之前就解散成若干小船队，希望能顺利闯关。

一旦顺利通过好望角，船队就在莫桑比克海峡南端的科连特斯群角附近重新集合，然后沿着马达加斯加岛的西海岸（葡萄牙人给这个大岛起了个富于诗意的名字叫“月亮之岛”）和非洲东海岸北上。东非的马林迪港是船队抵达印度之前的最后一个补给港口，有时船队也在这里采办东非出产的货物。马林迪的统治者自从达伽马时代起就是葡萄牙人的盟友。如果船队在每年的8月25日之前离开莫桑比克，就能够在马林迪港外驶入向西吹去的贸易季风带，顺利前往科钦和果阿等目的地；如果在这个日期之后还不能离开莫桑比克，船队就在非洲等到下一年的4月再出发。这些航海资料都被葡萄牙官方列为最高机密，严防泄露给其他欧洲国家。

“印度舰队”的组织者是里斯本的印度事务院（Casa da India），它在1500年由曼努埃尔一世国王建立，其使命是垄断对东方的贸易。从1500年到1612年，一共派出了806艘船只，其中425艘成功返航，20艘没能驶到印度便返航，66艘失事沉没，4艘被海盗俘获，6艘被凿沉或焚毁，285艘留在了印度。

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在1570年取消了对印度贸易的王室垄断，任何私人都可以自由组织船队前往印度，此后由印度事务院组织的“印度舰队”规模逐年缩小，此外还遭到荷兰、法国和英国的私掠船长们的攻击，例如1587年英国的弗朗西斯·德雷克船长在亚速尔群岛俘获“圣菲利佩”号，1603年荷兰的雅各布·范·希姆斯科克船长在新加坡俘获“圣卡塔琳娜”号。这两件事对葡萄牙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圣卡塔琳娜”号被俘时正在从澳门驶往马六甲，上面装载着大量中国麝香，这批珍贵的货物出售后几乎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资本翻了一倍。而“圣菲利佩”号上面除了大批珍贵的亚洲商品外，还有一整套被视为国家机密的航海日志和海图，这艘船被德雷克俘获后，使得葡萄牙东印度航线的秘密对英国人暴露无遗。

在荷兰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咄咄逼人的进攻下，葡萄牙的亚洲商业帝国日渐缩水。1612年，印度事务院派出了最后一支印度舰队。1624年，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兼葡萄牙国王菲利佩三世颁布命令，将印度贸易垄断权交给一家由葡萄牙私人投资者组成的股份公司“印度贸易公司”，指望这家仿照英荷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商业机构能够挽救伊比利亚人在东方的商业帝国。但是这个公司经营了九年之后就在1633年惨淡解散，同时也宣告了“印度舰队”的彻底终结。



提莫吉是效命于信奉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的，而这个帝国与信奉伊斯兰教、并控制着果阿地区的比贾蒲尔苏丹国是死对头。提莫吉向阿尔布开克分析了葡萄牙人的优势：第一，自从第乌海战之后，印度次大陆的各个穆斯林国家开始惧怕葡萄牙的海上威力；第二，比贾蒲尔苏丹国的统治者优素福·阿迪尔沙阿当时正患病；第三，比贾蒲尔苏丹国当时正与德干苏丹国交战；第四，果阿城中的印度教徒都渴望摆脱穆斯林的统治。阿尔布开克听取了提莫吉的建议，在1510 年3 月打下了老果阿城。不过，由于城防设施简陋，再加上城中的印度教徒对凶蛮的葡萄牙天主教徒采取冷漠的中立态度，因此老果阿城在当年 8 月再度落入比贾蒲尔苏丹国手中。

迭戈·门德斯率领的“第十二次印度舰队”赶到之后，实力大为增强的阿尔布开克在1510 年11 月25 日对果阿展开了第二次进攻。12 月10 日，果阿守军司令、优素福的儿子伊斯马仪·阿迪尔沙阿和奥斯曼士兵向葡萄牙人投降，6000 到9000 名穆斯林士兵死于城墙上和巷战当中。为了奖赏提莫吉，阿尔布开克任命他为果阿的民政长官，管理城中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

由于葡萄牙国王发给阿尔布开克的最初指令是占领马六甲、霍尔木兹和亚丁，而果阿不在这个名单当中，因此阿尔布开克的行动遭到了王室的反对。但是葡萄牙贵族枢密会议最终批准了对果阿的占领。阿尔布开克随后将总督机构从坎纳诺尔迁到老果阿城。

占领果阿之后，阿尔布开克把葡萄牙商业殖民帝国的触角继续向东延伸。1511 年，经过激烈的战斗，他征服了马六甲，随后下令屠杀当地所有的穆斯林，并强迫印度教徒皈依基督教。阿尔布开克还下令葡萄牙船只向东寻找传说中的“香料群岛”。

1512 年，在从马六甲返回果阿途中，阿尔布开克的舰队在马拉巴尔海岸遭到暴风袭击，装载着他所聚敛的战利品财宝的“海洋之花”号帆船失事，阿尔布开克本人仅以身免。返回果阿之后，他用严厉的手段镇压了当地穆斯林居民的叛乱。1513 年阿尔布开克曾经试图围攻亚丁，但是失败了。同一年他的船队航行到珠江口，首次和中国商人直接发生了贸易联系。



马来西亚马六甲港内的一艘卡拉克帆船复制品，即阿尔布开克的“海洋之花”号

虽然曼努埃尔国王为了奖赏阿尔布开克而将他封为“果阿公爵”——这是首位非王室成员出身的葡萄牙公爵——但是后者在东方的成功还是激起了国王的嫉妒，而阿尔布开克本人在一些场合的不明智和武断的行为更加深了这一点。他在里斯本宫廷里的几个敌人不失时机地挑拨国王解除其印度总督职务。1515 年，在从霍尔木兹返航的时候，阿尔布开克在果阿港的入口处碰见一艘来自欧洲的船只，宣布他的总督职位已经被其政敌索阿雷斯·德·阿尔伯加利亚所取代。这个打击对阿尔布开克而言实在太大，当年12 月16 日，这位被后人称为“东方恺撒”（Cesar do Oriente）、“海上雄狮”（Leao dos Mares）和“葡萄牙战神”（Marte Portugues）的征服者在海上去世。

阿尔布开克这位亚洲商业帝国的总设计师去世后，葡萄牙人并未停下其扩张脚步。十六世纪上半叶，葡萄牙人先后占领了印度西北海岸的达曼（Daman）、第乌岛（Diu）、萨尔赛特岛（Salsette）、孟买、苏拉特（Surat）、乔乌尔（Chaul）和巴齐亚姆（Baciam）等沿海据点。在南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葡萄牙人占据了坎纳诺尔（Cannanore）、克兰加诺尔（Cranganore）、奎隆（Quilon）、曼加罗尔（Mangalore），并且在科钦（Cochin）和卡利卡特（Calicut）建立了商站。

在面向孟加拉湾一侧的科罗曼多尔海岸，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奇利帕特南（Machilipatnam）、纳加帕提纳姆（Nagapattinam）图图库迪（Thoothukudi）和迈拉蒲尔（Mylapore）等港口，并且控制了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和胡格里（Hugli）。这样，葡萄牙的海上商路又向东延伸了6000 海里，通过整个东南亚直抵中国和日本，并且介入到利润丰厚的中日贸易中来。葡萄牙人把中国丝绸和瓷器及一些东南亚香料从广州运到日本的长崎，然后给中国运来日本的白银和铜。他们还发现，把东南亚和中国的货物运到印度，换成欧洲急需且市场巨大的印度棉花，也是非常有利可图的。

葡萄牙人在霍尔木兹岛上建立的康赛普西翁圣母要塞（Forte de Nossa Senhora Conceicao de Ormuz），建于1507 年，1622 年被波斯国王阿巴斯一世和英国东印度公司联手攻占，并沦为废墟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用于商业目的

位于这个海洋商业网络中点的果阿依靠贸易利润高度繁荣起来。在果阿的全盛时期，这座城市以“金果阿”（Goa Dourada）之称闻名于世。城中富人的房子用石头建造，这些富丽堂皇的巨宅外墙刷成白色，带有四面斜坡的红瓦屋顶，以及回廊、露台、私人小教堂、舞厅和图书室，用抛光磨薄的蚌壳代替玻璃，以抵御南印度的炎炎烈日。房子的四周还环绕着花园和棕榈树林。总督府官员、陆军和海军军官、教会和富商组成了果阿的上流社会，举行各种声色犬马的盛大招待会。从1575年到1625年这五十年是果阿繁荣的顶峰，葡萄牙至今仍有一句与中文“曾经沧海难为水”意思相近的谚语，叫“看过果阿的人不用去里斯本”。

阿尔布开克为了培养一批忠于祖国的人，便鼓励部下与当地女子成婚，并雇佣印度人当兵、以及在政府部门担任文书。他还开设学校，让印度儿童学习葡萄牙文，熟识西方习俗。阿尔布开克虽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也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他唯一的干预就是禁止印度教的“萨蒂”习俗，使得寡妇免于被迫投身于亡夫的火葬堆上自焚。

葡萄牙人对果阿地区的统治以老果阿城为中心，包括周围的三十多个村庄。阿尔布开克的意图是将果阿建设成行政中心和海军基地，这和以前葡萄牙人在亚洲沿海建立起的那种四周有围墙的商站据点大不相同。果阿从1511年起成为葡属亚洲副王国（vice-kingdom）的首都，并被授予和里斯本市一样的王室特权。原属于比贾蒲尔苏丹的一座宫殿成为葡萄牙亚洲副王的官邸，一直使用到1961年。

葡萄牙亚洲副王国的辖区包括葡属印度、锡兰、马六甲、香料群岛、帝汶岛、安汶岛、霍尔木兹岛、马斯喀特、巴林、，葡萄牙人在澳门和日本长崎的商站也归果阿当局



上图：果阿的伊达尔坎宫，葡萄牙统治时代是果阿总督府

下图：日本战国时期织田信长军队从葡属果阿进口的青铜火炮



十六和十七世纪欧洲国家在印度的商站和殖民地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

管辖。阿尔布开克公爵在果阿建立了葡萄牙的第一座海外铸币厂，铸造名为“印度卢比”的金银硬币，由于其标准成色和统一重量而逐渐成为印度洋和波斯湾的通用货币。此外，由果阿铸造厂铸造的火枪和铜炮甚至远销日本和中国，还出现在织田信长的军队中。

到了1550年，阿尔布开克的继任者已经吞并了果阿城四周沿岸约100公里的地方，有些地区更深入内陆达50公里。果阿不但成了欧亚贸易——主要是香料贸易——的最重要枢纽，更是宗教和知识的中心。葡萄牙诗人路易斯·德·加莫斯的史诗《卢西亚德》，有若干部分就是在果阿完成的。亚洲第一台用活字排版的印刷机也是在这里设立的。果阿也是葡萄牙医生兼博物学家加西亚·达·奥尔塔的家，他对印度药用植物的研究，对近代药理学的诞生很有贡献。果阿的医学院也很有名，培养出了一些最卓越的医生。

果阿城的人口在1543年时就已经超过20万，并且是天主教会在东方最大的传教中心。城内遍布教堂、修道院和神学院，教授宗教法和哲学。来自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各个天主教修会组织都在老果阿城中修建了自己的教堂，其中最著名的“神圣耶稣大教堂”内葬有将天主教传到东亚的著名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co Xavier）的遗体。

耶稣会是果阿最大的宗教团体，并且垄断了果阿的一大部分贸易。耶稣会传教士还通过给整个村庄洗礼的方式获得了果阿周围的大片土地，并且在传教士遭到当地居民攻击时利用葡萄牙驻军的武力支持，征服和吞并更多的村镇。在教会的努力下，最终使果阿的所有居民都皈依了天主教。而且，印度人在受洗时，都会得到一个葡萄牙姓氏。像“苏萨”或“达席尔瓦”这样的普通葡萄牙姓氏、或者“斐迪南”、“卡梅拉”这样的葡萄牙人名，在今日的果阿仍比目皆是。

直至今天，果阿的天主教徒仍然取葡萄牙名字，在家里用的是葡萄牙语，连祈祷所唱的赞美歌都用葡语诵念。但是这些天主教徒并没有忘记他们的印度背景，许多人也去印度神庙拜神，并参加印度教节日。实际上泛宗教主义在果阿随处可以见到，例如当奇迹圣母修道院举行复活节庆典时，教堂内挤满了崇拜圣母玛利亚的印度教徒，他们相信玛利亚是一位改信了天主教的印度教女神。果阿的许多印度教神庙都和印度其他地方的神庙大异其趣，它们有圆顶、巨型吊灯和灯座，仿效葡萄牙曼努埃尔一世时期的建筑风格。

果阿上层社会中的天主教徒虽然很少去印度神庙朝拜，但也以自己的祖宗为荣，而且在婚姻大事上依然遵循古老的印度教种姓等级制度，不同种姓的人通婚通常会遭到反对——实际上英文中表示印度种姓制度的“caste”这个词就来自葡萄牙语，原意是“颜色”。不过果阿人不像印度其他地方的人那么重视种姓和社会等级。



果阿的神圣耶稣大教堂，圣方济各·沙勿略的遗体即安葬于其内



圣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出生于纳瓦拉王国的一个巴斯克贵族家庭，19 岁时前往巴黎学习神学，1534 年与依纳爵·罗耀拉等七人在巴黎蒙马特高地创建了耶稣会。1540 年来到葡萄牙，随葡萄牙商船前往东方，先是在马六甲、马鲁古群岛传教，1549 年将天主教传入日本。1552 年试图经澳门进入中国传教，在广东台山上川岛因疟疾去世。其尸体长期不腐，一路展示至果阿安葬。其右臂安放在罗马的耶稣教堂（耶稣会总部），左臂原存放于澳门的圣保禄教堂（后焚毁，仅剩前壁，即大三巴牌坊），后迁至路环岛的圣若瑟修道院。沙勿略去世 30 年后，利马窦才将天主教传入中国。1662 年沙勿略被封圣，并被尊为中国、日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新西兰天主教区，果阿、澳门、马林迪、萨格勒布等城市，以及航海者和瘟疫患者的主保圣人

英国人的高傲态度使得英属印度的种姓隔阂加剧，而葡萄牙人比较不拘小节、随和得多。举例来说，在殖民时期，葡属果阿就没有英属印度那种只有欧洲人才许入内的俱乐部。

葡萄牙人还把那种享受生活的态度传给了果阿人。这一点从果阿人酷爱音乐可以看出一斑。从十六世纪起，果阿的天主教学校就开始传授和声观念，而传统印度音乐里是没有和声的。到十九世纪，果阿人已经发展出自己的非宗教音乐，用鼓和小提琴伴奏，用当地的柯卡尼语演唱，但带有欧式的和声。

孱头帝国

瓦斯科·达伽马是一位比同时期所有航海家和征服者都幸运得多的人。麦哲伦死于土著之手，哥伦布在债务监狱里穷困潦倒，而阿尔布开克也死于政治失意。当达伽马这位“印度海军上将”和维迪格拉伯爵在1524年圣诞节去世的时候，其寿命之长已经足以使他知道，尽管竞争对手西班牙发现了新大陆，但葡萄牙却发现了

去东方的道路。而且这是欧洲海上商业的最大份额：达伽马领取三份王室退休金，总计2750克鲁扎多（金币名），此外还享有各国商船在马六甲、果阿和霍尔木兹缴纳的锚位费的一部分。达伽马的君主，曼努埃尔一世，采用了一个夸张的头衔：“奉天承运，在大海此岸的葡萄牙和阿尔加维的国王，和在大海彼岸的非洲的几内亚与埃塞俄比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征服地、航海和商业的君主”，这是一个被其嫉妒的竞争对手们贬称为“杂货商国王”的称号。

为了控制以果阿为中心的海上商路，葡萄牙人还需要其他一些基地。从印度往东最显而易见的海路控制点是锡兰的科伦坡和马来亚的马六甲。印度和锡兰之间的保克海峡水太浅而不宜行船。绕过苏门答腊岛、通过苏门答腊和爪哇之间的巽它海峡航线路程较长，多暗礁和海流，而且苏门答腊岛西海岸没有安全港口，因此往返东亚的交通全部要通过马六甲海峡。阿尔布开克占据马六甲主要是出于战略上的理由，尽管它在东南亚各岛国的贸易中也起一定的集散作用。锡兰的科伦坡于1515年被葡萄牙人占领，修筑了防御工事，还吸引附近生产的桂皮，因此也有一定的商业作用。

葡萄牙人直到1557年才在珠江三角洲近海一侧的澳门建立起他们的商业基地。在澳门，可以较少地受到明帝国对于广州外国商人所施加的那些限制，也更能得到中国当局的容忍。从明帝国的观点来看，这些不守规矩的野蛮外国人最好就呆在那个偏远狭窄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里按照其奇怪习惯管理自己。在印度尼西亚当时尚无大国，因此也就没有建立类似的地区基地，葡萄牙人通过恐吓一部分苏丹、与另一些苏丹结成联盟，统治了当地的香料贸易并排斥了与之竞争的欧洲人。


果阿的圣凯瑟琳教堂


果阿的救世主教堂


果阿的圣母无染受孕大教堂

受葡萄牙文化的影响，果阿当地的印度教神庙也采用西方式建筑风格。图为果阿的珊塔杜尔加神庙



应当记住的一点是，印度次大陆的大小与欧洲相近，而其文化和政治的多样性至少与欧洲相当。在十六世纪里，印度北方在莫卧尔帝国的牢牢控制下，南方则分割成许多大大小小的王国。信奉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帝国曾经积极寻求葡萄牙人的援助，力求摆脱德干高原北部穆斯林苏丹国联盟对它的进攻和占领。葡萄牙起先提供给毗奢耶那伽罗帝国以进口马匹和大炮，并从与这个南印度主要国家的交往中获得商业利益。但是毗奢耶那伽罗帝国在最危急的关键时刻向葡萄牙提出的紧急援助要求却被葡萄牙人愚蠢地拒绝。毗奢耶那伽罗帝国在1565年灭亡之后，葡萄牙人在印度的贸易和地位迅速下降。

葡萄牙亚洲殖民帝国的商业性质决定了其最后的命运。在阿尔布开克占据果阿之后的两百多年里，葡萄牙人在亚洲舞台上的形象仍然是一小撮被亚洲人打发走就完事的野蛮人。在海上他们占据上风，但是在陆地上的势力范围很少超出大炮的射程以外，完全不能抗衡中国和莫卧尔帝国这样的强大亚洲帝国、或甚至一些比较强大的地区性国家的威力。

葡萄牙人确立了他们在亚洲香料贸易中的强大地位，并为向欧洲出口亚洲货物的垄断权而与后来居上的荷兰人和英国人竞争。但是在整个亚洲贸易中，甚至在海路贸易中，葡萄牙人所起的作用仍是非常微小的。他们只是在既定的市场上购买早已由亚洲商人收集起来的香料和其他货物，然后把它们运回欧洲。葡萄牙人从未参与生产活动。他

们以商人身份与完成生产组织工作的中国、印度、东南亚及阿拉伯创业者竞争。葡萄牙人仅仅垄断了把亚洲货物送到欧洲的运输过程，而且后来不得不面临荷兰人的强大竞争。

葡萄牙人意识到自己在陆地上的劣势，于是便凭借其海上力量，在海路所经的各战略要地占领海滨立足点，并修建防御工事。最理想的地点当然是强大亚洲帝国的边缘地区，或者地方当局力量弱小、能够通过贿赂而说服对方给予优惠的地方。果阿之所以成为葡属亚洲的行政中心，一是它的地理位置最优越——葡萄牙的舰队能够从果阿出发，巡逻整个印度西海岸，这样就基本控制了印度洋上的全部贸易；二是它周围的那一小片地区当时不属于任何一个强大的印度国家。



英国人1729年绘制的第乌岛地图

除了果阿之外，葡萄牙人在印度其他地方建立的基地都不能长久，不是被迫转让给英国人或荷兰人，就是在十八世纪落入善战的马拉塔帝国或孟加拉总督之手。到二十世纪时，除了果阿之外，整个印度次大陆上只有达曼、第乌、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这四块微不足道的小领地仍保留在葡萄牙人手中。

葡萄牙人衰落的最主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其胃口太大了。到十六世纪后期，葡萄牙的国力就已不足以维持其原先的统治。葡萄牙国内基础薄弱而且贫穷，无法提供为维持海外基地和抵抗竞争所需的人力和财力。十六世纪结束时，他们在东南亚的垄断性地位迅速被荷兰人取代，不久以后在亚洲其他地方的贸易中丧失了与另一个新兴对手英国竞争的实力。从此葡萄牙不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殖民力量了。



1750 年前后的果阿

果阿以及葡属亚洲帝国的衰落是和荷兰的崛起密不可分的。1583 年，荷兰人扬·范·林索登乘坐一艘葡萄牙船来到果阿，在那里为葡萄牙的大主教工作了将近六年。回到荷兰后，他发表了《旅行记》一书，对他所见到的世界做了地理描述，记述了他对亚洲的观察，还介绍了抵达亚洲各主要港口的航海说明。这正是荷兰人（还有英国人，他们很快翻译了该书）所需要的。

1595 年，科尼利厄斯·德·豪特曼率领一支荷兰船队，利用林索登的航海说明，首次抵达亚洲。此后在许多荷兰贸易公司的资助下，一些荷兰船长又进行了一系列贸易远航。他们发现葡萄牙人在亚洲普遍不受欢迎，尤其是在东南亚。于是他们很快就打破了葡萄牙人对香料贸易的垄断。荷兰的船只和船员都比较优秀，运送货物前往欧洲更加便宜而且快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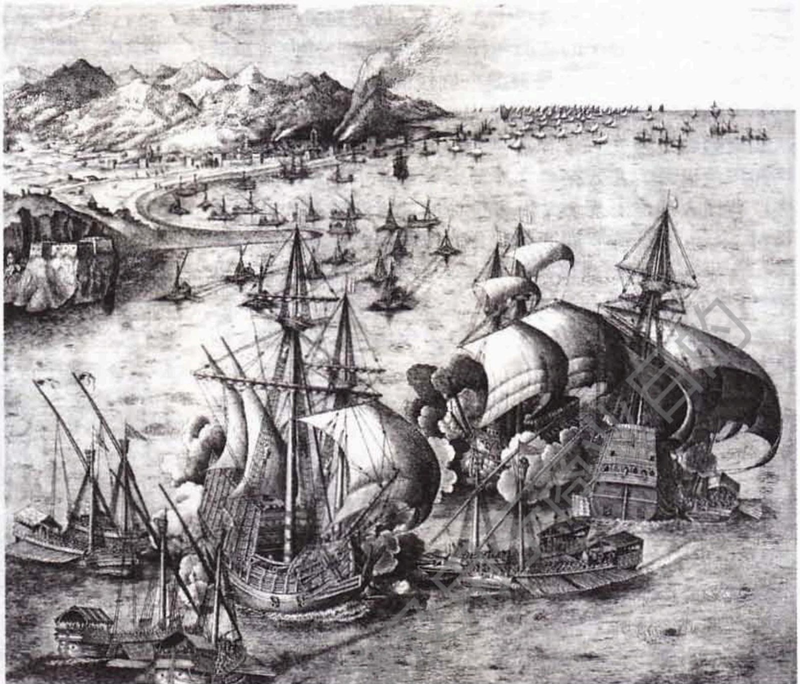
荷兰与葡萄牙舰船之间的第一次海战于 1601 年发生在爪哇岛的万丹，尽管葡萄牙人的船只和人数超过荷兰人，但他们的枪炮较差，船只也不够机动灵活，海战以荷兰人的压倒性胜利告终。

与葡萄牙人不同的是，信奉新教的荷兰人专心贸易，避免一切传教尝试或宗教冲突。但他们是冷酷的家伙，用各种最无情的手段来对付亚洲和欧洲的竞争者。1605 年荷兰夺取了香料群岛，1641 年占领马六甲。这两处都是战略要地，对它们的控制权的易手，标志着葡萄牙亚洲贸易垄断者地位的终结和荷兰势力的崛起。

此后荷兰把在亚洲的努力集中于今日的印度尼西亚和近邻的马来亚，确立了他们自己对香料贸易的半垄断地位。1656 年荷兰人又占领了科伦坡，两年后占领整个锡兰，1660 年到 1662 年还占领了葡属印度的纳加帕提南、克兰加诺尔和科钦。荷兰舰队在 1603 年和1639 年都曾经从海上封锁过果阿，但是这座城市利用其城墙和防御设施成功地抵挡住了荷兰人的进攻。

正是亚洲殖民地的丧失，使得葡萄牙的贵族和商人决意终止与西班牙的联合。他们利用西班牙卷入欧洲“三十年战争”的机会在1640 年12 月1 日发动政变，布拉冈萨公爵约翰在葡萄牙贵族的簇拥下加冕为约翰四世。之后爆发的“葡萄牙王位恢复战

争”持续了四十八年之久。1661 年，为了换取英国的支持，葡萄牙王室将凯瑟琳公主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同时将孟买和非洲的丹吉尔作为嫁妆赠送给英国。



上图为西班牙的卡拉克帆船与土耳其划桨战船在墨西拿海峡海战的情景。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以及历次印度舰队所使用的帆船以卡拉克帆船为主。卡拉克帆船（Carrack，葡语称为Nau，西班牙语称为Nao，法语称为Nef，均为“船”之意）的特征是巨大的弧形船尾和船首的巨大斜桅。通常有三到四桅，前桅及中桅使用横帆，后桅和前斜桅使用三角帆。由于其庞大体型能在深海中保持稳定，再加上三角帆可以提供逆风航行的能力，因此卡拉克帆船是欧洲航海史上第一次用作远洋航行的船型。

到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在卡拉克帆船的基础上发展出加隆帆船（Galeon），其船首调低，船身拉长，增加了稳定性，同时还以方艉楼取代了卡拉克帆船的弧形船尾。葡萄牙也追随潮流建造了加隆帆船，但仍在海上败于荷兰人。这主要是因为葡萄牙的帆船大而笨重，而荷兰人更倾向于建造小型帆船。虽然在大风浪中不如葡萄牙船（以及同时期的西班牙船和英国船）稳定，但是却阻力小，而且快速。历史学家认为荷兰建造较小战舰是因为他们的船厂位于狭窄的码头内，或是由于需要在较浅的水域航行。但是荷兰的商船却和其他国家的船只一般大。历史上某些海军兵法家宁愿建造小而机动的战舰，不愿造大舰，可能荷兰人就有这样的习惯。此外荷兰是个共和国，没有用大军舰来显示自己威望的国王。在荷兰与葡萄牙争霸东方的海战中，这种小军舰的优势最终得以体现

1583 年，英国商人约翰·纽伯里、拉尔夫·费奇和另外三名英国人乘船航行到叙利亚，再由陆路来到波斯湾海角。在霍尔木兹岛，他们试图偷越葡萄牙人的封锁线，以被截获而告终。葡萄牙人宣布他们是间谍，运往果阿关押，这是来到印度的第一批英国人。纽伯里等人死在果阿的监狱里，但费奇设法逃脱出来，随后在印度次大陆旅行了两年多。他拜访了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在阿格拉和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的两处首都，之后又乘船到缅甸和马六甲，1591 年经波斯湾和叙利亚返回英格兰。

回国不久后，拉尔夫·费奇写了一部旅行纪事，内容与林索登的《旅行记》差不多，但准确性稍差，也不够详细。但是他关于印度财富的描写助长了英国人的胃口，促进了160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但是当时统治海洋的是荷兰人，他们轻易地粉碎了英国商人企图进入香料群岛的企图，英国只好以配角身份在一些港口坚持下来。当荷兰人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利润最为丰厚的东印度群岛时，英国人便进入了印度的某些港口，从而开始了征服印度次大陆的漫长征程。

由于在东方的香料贸易上来自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因此葡萄牙从十七世纪末起逐渐把经营重点转移到了出产蔗糖和黄金的巴西，而把葡属东方帝国抛弃在一旁，任其自生自灭。当整个十八世纪里英国人、法国人、莫卧儿帝国和马拉塔帝国为了印度次大陆的霸权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葡属印度却陷入了一种昏沉欲睡的停滞状态。1739 年，马拉塔帝国的军队曾经试图攻打果阿，但从里斯本驶来的舰队及时赶到，帮助城中守军击退了马拉塔人的军队。

1757 年，葡萄牙国王约瑟夫一世签署法令，授予葡属印度的所有居民以葡萄牙臣民身份，并将“葡属亚洲副王国”改组为“葡属印度行省”(Estado da India Portuguesa)，仍以果阿为首府。不过，由于一再发生瘟疫，老果阿城已是十室九空。1759 年，由于再次爆发疟疾和霍乱，葡萄牙副王将其王座从老果阿城近郊搬到了西边十公里外的潘吉姆（Pangim，当地名称为帕纳吉），老果阿城里的居民也几乎全都随副王宫廷一同搬走。到 1775 年时，老果阿城中的人口只剩下 1500 人。1843 年葡萄牙王室枢密院颁布法令，正式以潘吉姆为葡属印度的首府，并将其更名为“新果阿”(Nova Goa)。

面积38.8 平方公里的第乌岛是阿拉伯和波斯湾货物的主要集散地，其商业地位几乎与霍尔木兹岛一样重要，葡萄牙人对这里垂涎已久。1535 年，古吉拉特苏丹国统治者巴哈杜尔·沙阿在面临莫卧儿帝国胡马雍皇帝的进攻时，被迫与葡萄牙结成防御同盟，并准许葡萄牙人在古吉拉特海岸的第乌岛（Diu）上修筑一座要塞。但是古吉拉特和葡萄牙人的关系很快破裂，巴哈杜尔·沙阿将葡萄牙人驱逐出第乌岛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1539 年，古吉拉特苏丹国与葡萄牙签订和约，将第乌岛和葡萄牙1531 年侵占的达曼地区（面积72 平方公里）永久割让给葡萄牙。

1779 年，为了拉拢葡萄牙人对抗英国，马拉塔帝国又将位于达曼东边、达曼恒河（Daman Ganga）上游 72 个村庄的征税权赠送给葡萄牙。1783 年，马拉塔帝国将这 72 个村庄的主权正式割让给葡萄牙，以赔偿葡萄牙海军战舰“桑塔纳”号的损失。这些村庄的总面积是 491 平方公里，被称为纳加尔哈维利地区。1785 年，葡萄牙人又购买了附近的达德拉村，从而形成了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飞地(Dadra e Nagar Aveli)，由达曼总督管辖。

达曼、第乌、达德拉和纳加尔哈

维利，再加上果阿，构成了十九世纪以后的葡属印度省的全部版图。在葡萄牙的亚洲殖民帝国像落潮一样向后撤退的时候，很多葡萄牙人像海滩上搁浅的鱼一样留了下来，到处捡拾贸易的残羹剩饭，或者从事海盗活动。1822 年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后，昔日强大的葡萄牙海外帝国除了非洲和印度沿海的几处据点之外便所剩无几了。在印度次大陆，英国人的绝对优势是无可抗衡的。好在葡萄牙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殖民狂潮中还抢到了一些地方，比如葡属东非（莫桑比克）、葡属西非（安哥拉）、葡属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卡宾达、佛得角群岛、以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群岛。这些殖民地大多是从昔日的沿海据点扩展而来的。

葡萄牙人甚至在十九世纪末制订了一个野心勃勃的“粉红地图”方案（Mapa cor-de-rosa），计划向赞比西河的内陆地区，也就是今日的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殖民，将葡属东非和葡属西非联成一片。这同英国人“从开罗到开普敦”的“红色地图”殖民计划发生了冲突。1890 年，英国弃古老的 1373 年英葡同盟条约[注]于不顾，向葡萄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终止在非洲中南部的殖民行动。葡王卡洛斯一世被迫接受了通牒，共和主义者将这一事件渲染成对葡萄牙国家尊严的羞辱，并且发起了一系列宣传运动，令王室的形象大为受损。1908 年卡洛斯国王和路易斯·菲利普王储在里斯本遇刺身亡，两年后布拉冈萨王朝末代国王曼努埃尔二世被推翻，葡萄牙成为一个共和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独裁者安东尼奥·萨拉查博士统治的葡萄牙采取中立政策，因此葡属果阿的莫尔穆冈港（Mormugoa）在战争一开始就成为来不及返回本土的德国商船的避难所。到 1939 年 8 月底，莫尔穆冈港内已经有三艘德国汉萨海运公司的货船停泊下锚，它们分别是 7846 吨的“布劳恩菲尔斯”号（Braunfels）、6342 吨的“德拉肯菲尔斯”号（Drachenfels）和 7752 吨的“埃伦菲尔斯”号（Ehrenfels）。这些船的船员后来都搭乘葡萄牙商船返回德国，每条船上只留下了一个看管小组。

尽管葡萄牙当局拆下了船上的无线电，但是德国国防部谍报局在印度的特工还是在 1942 年设法将备用电台带上了“埃伦菲尔斯”号，向印度洋上的德国潜艇和袭击舰

1942 年时停泊在果阿莫尔穆冈港内的两艘德国货船，近处是“德拉肯菲尔斯”号，远处为用作德国特工电台的“埃伦菲尔斯”号



发送盟国船运情况的情报。

从 1942 年末起，英军监听部门发现在孟买以南四百英里处有一座神秘的电台，向外发送密码电报。经过分析和实地观察，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SOE）认为这是“埃伦菲尔斯”号发出的电报。SOE 准备对这条船采取行动，但是丘吉尔严令必须尊重葡萄牙的中立地位。最后 SOE 印度站的负责人策划了一次大胆的袭击行动。通过私下接触，SOE 设法招到了一批原属于加尔各答商团（Calcutta Light Horse）的业余军人。这些成天酗酒、年过半百、大腹便便的家伙可以以老百姓的身份去袭击德国商船，即使被葡萄牙当局抓住，也可以以“酒后闹事”之类的借口来解释自己的行动。

为了躲开孟买港的轴心国间谍，这些人在加尔各答港登上了一艘古老的蒸汽驳船“菲奥比”号，沿着印度海岸南下，然后在科摩林角北上进入阿拉伯海，驶往果阿。1943

【注】1373 年，英王爱德华三世与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一世和王后埃莉诺签署了同盟条约，以对抗法国与卡斯蒂里亚王国（西班牙前身之一）的联盟。1386 年，英王爱德华三世之子、兰开斯特公爵约翰·冈特前往伊比利亚半岛，试图取得卡斯蒂里亚王位（约翰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卡斯蒂里亚国王），以失败告终。他在返回英格兰之前将另一个女儿菲利帕·兰开斯特，也就是英国兰开斯特王朝开国君主亨利四世的妹妹，嫁给了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为了巩固英葡联盟，约翰一世和约翰·冈特于 1386 年在温莎城堡签订了《温莎条约》，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外交同盟条约。菲利帕·兰开斯特与约翰一世所生的几位王子，特别是“航海家亨利”，对十四世纪葡萄牙海外帝国的崛起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被誉为“超凡的一代（王子）”。

由 1373 年英葡条约、1386 年温莎条约、以及 1643 年、1654 年、1660 年、1661 年、1703 年、1815 年、1899 年、1904 年和 1914 年续签的各条约所确立的英葡同盟一直存在了六个世纪之久，只有 1580–1640 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时期中断过六十年。除此之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葡萄牙都忠实地站在英国一方作战。1943 年，英国还援引 1373 年同盟条约的内容，从葡萄牙手中获得了大西洋中部的亚速尔群岛建设海空反潜基地的许可。1982 年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葡萄牙再次向英国皇家海军提供了亚速尔群岛的使用权。但是英葡同盟关系有两次被“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即英国人）破坏，一是 1890 年非洲殖民问题的最后通牒，一是 1961 年印度出兵占领果阿时葡萄牙向英国求援遭拒。除此之外，英国首相张伯伦在 1938 年为了将希特勒的侵略兴趣从欧洲转移出去，还试图利用非洲殖民地来绥靖纳粹德国。他提出了一个秘密方案，归还德属西南非洲、喀麦隆和多哥，同时强迫葡萄牙和比利时将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比属刚果割让给德国。但是张伯伦的这个秘密提议不仅没有被纳粹德国接受，德方反而将其故意泄露给葡萄牙人，以离间英葡关系。





1943 年英国加尔各答商队义勇军的老兵摸入莫尔穆冈、炸毁“埃伦菲尔斯”号的情景。港内另两艘德国商船也冒出了浓烟

年3 月9 日，这些人把驳船停在了“埃伦菲尔斯”号的船舷旁边，然后强行登船，制服了船上的德国发报组，在船舱内安放了炸药，然后离船。几分钟后，“埃伦菲尔斯”号在猛烈的爆炸声中沉没了。

由于这次行动破坏了葡属果阿的中立地位，因此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情报当局和当事人对此事都缄口不语，直到1978 年英国作家詹姆斯·莱索尔写了一本有关这次秘密行动的书，此事才首次被公诸于世。1980 年，好莱坞根据这本书拍摄了一部惊险电影，由大卫·尼文、罗杰·摩尔和格利高里·派克等著名影星主演，电影的名字叫《海狼》。电影的片尾字幕中提到，在1943 年3 月的头11 天里，印度洋上有12 艘盟国船只被德国潜艇击沉。而在奇袭“埃伦菲尔斯”号的行动之后，盟国在这个月其余的时间里只损失了1 艘船。

果阿危机

早在1947 年印度独立之前，甘地、尼赫鲁和印度国大党的其他领导人就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反复强调过葡萄牙和法国在印度沿海的各处殖民飞地，包括果阿的未来命运，是与印度独立运动密不可分的，这些零碎的殖民地将来也必将被并入独立的印度国家。

印度独立之后，法国人在1947 年10 月将位于卡利卡特、马奇利帕特南（Machilipatnam）和苏拉特（Surat）的三处商站用地移交给了印度政府。1948 年法国与印度达成协议，允许法属印度的居民自行投票决定其未来地位。1950 年5 月2 日，法国将位于加尔各答以北的一小块飞地昌德纳戈尔（Chandernagore）交给印度，1954 年11 月1 日又将本地治里（Pondichery）、加里加尔（Karikal）、亚南（Yanam）和马埃（Mahe）交给印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国民议会于1962 年批准的最终移交文件中，使用的是“移交”而非“归还”一词。这是因为法属印度的法理地位不同于香港或澳门，在1947 年8 月15 日之前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印度国家，法属印度的这些领地是从印度次大陆不同的苏丹、大君、纳瓦布（总督）手中通过购买、赠送等方式获得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印度共和国也并不是自从一诞生便自动获得对葡属印度的法理主张权。因为将果阿、达曼和第乌等地割让给葡萄牙的比贾蒲尔苏丹国、古吉拉特苏丹国等国家都早已不复存在。在印度政府请葡萄牙与其谈判葡属印度的前途问题时，葡萄牙的答复也是一样的：葡属印度并非殖民地，而是葡萄牙的海外省，关于其未来地位没有什么可谈的。

在法国移交其印度领地的同一年，达德拉－纳加尔哈维利地区爆发了骚乱。来自“果阿联合阵线”、“民族运动解放组织”等政治党派的成员在1954 年7 月22 日涌入达德拉地区，驱逐了当地的葡萄牙警官。7 月28 日，这群人又进入纳加尔哈维利地区，占领了纳罗利、锡尔瓦萨等村庄的葡萄牙警察局。由于印度对深处其内陆的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进行陆上封锁，禁止葡方将弹药军火经印度领土运往这两个地区，因此当地的葡萄牙治安力量早已没有弹药，在人数远超过自己的印度人面前只好乖乖投降。葡萄牙此后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1960 年4 月作出判决：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是葡萄牙领土，但印度有权禁止葡萄牙穿越其领土进入这一地区。

此后七年中，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地区保持了一种奇怪的状态：在法理上它属于葡萄牙，但当地的葡萄牙行政当局已经被驱逐，实际上是由设在锡尔瓦萨村的一个“行政委员会”来实行统治。印度政府派一名高级文官担任该行政委员会的“总理”，而这两块领土却又没有被正式并入印度。直到1961 年印度出兵攻打葡属果阿之后，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的“总理”才与尼赫鲁签署归并条约，成



达曼和达德拉－纳加尔哈维利地区示意图



1954 年7 月印度吞并达德拉－纳加尔哈维利之后，里斯本市民涌到总理府前，高呼口号称“果阿是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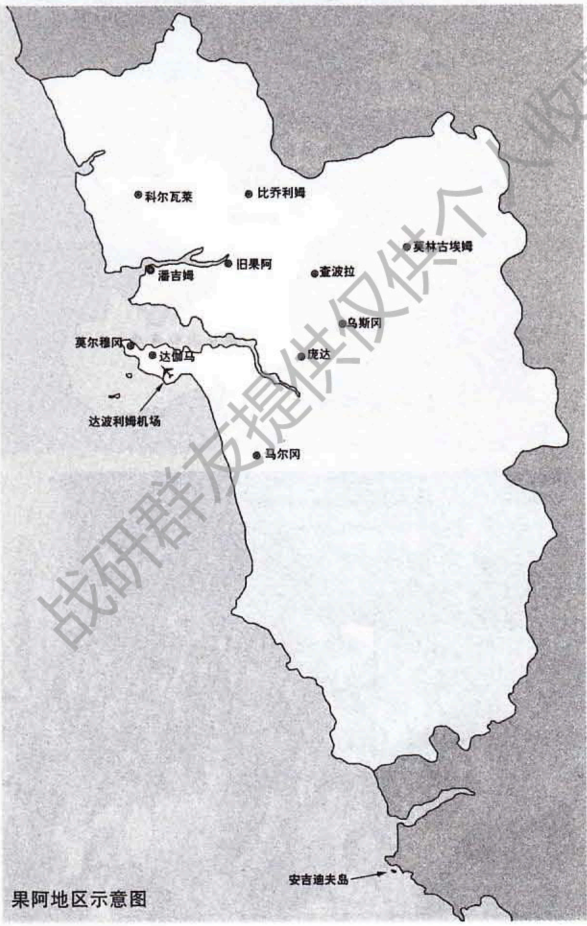
为印度的一个中央直辖区。

1955 年，印度企图用在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地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强行解决果阿问题。8 月15 日印度国庆日那天，五千多名“非暴力不合作”的示威者从六个地方越过边界进入果阿。葡萄牙当局逮捕了一些人，但更多的非暴力分子继续越过边境。当葡萄牙警察看到越境人数太多，捕不胜捕的时候，便开了枪，打死了22 人，打伤了许多人。之后印度同葡萄牙断绝了外交关系，并且对果阿、达曼和第乌进行了封锁，断绝货物和人员往来。但葡萄牙人还是设法留下来并站住了脚，从葡属东非向果阿运送各种生活物资和商品，并且建立了从果阿直飞里斯本的航线。

到1961 年时，进军果阿事件在印度引起的公众愤慨已经逐渐平息下去，葡萄牙人留在果阿的事实虽然令印度人感到痛心，但并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印度政府说过最终要把果阿并入印度，但同时也说过不使用武力实现上述目标。而且印度政府在果阿问题上并没有受到重大的政治压力。

可是到了1961 年秋天印度大选前夕，国大党政府由于被指责“在划界问题上屈从于中国”而感到恼火，很想在什么地方采取一下军事行动，以表示其“保卫印度利益”的“决心”。当时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上采取的“前进政策”由于是采取一个哨所一个哨所地蚕食领土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并不能在公共舆论中造成戏剧性的效果。从各方面因素考虑，在果阿这个舞台上采取行动，收效会更大。

1961 年10 月，一些亚非国家在新德里召开会议，讨论



果阿地区示意图

果阿的阿瓜达要塞城墙



葡萄牙殖民主义问题。与会代表们向参加会议的印度代表尖锐地指出，如果让葡萄牙在果阿的统治继续下去，他们就认为印度不是在真心实意地献身于反殖民主义事业。印度代表辩解说，“非暴力”是比非殖民化更为高尚的事业，这个回答激起了其他代表的反感。他们说，在葡萄牙殖民地，非暴力只会引起镇压和屠杀——印度人一回忆起1955 年非暴力示威者在果阿边境遭到枪杀的情景，就无法否认这个论点。尼赫鲁后来说这次会议“使我们想到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意见，探索一下（对于果阿）能够做的事情。”会议结束后，尼赫鲁马上在孟买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宣布“重新考虑用什么方式把果阿从葡萄牙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

接着事情就按照印度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惯于采取的那种方式进行下去了：一方面尼赫鲁宣布印度对于葡萄牙人在果阿的存在已经忍无可忍，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又利用报刊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说葡萄牙正在“屠杀”果阿的“自由战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供的武器在果阿堆积如山，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还说葡萄牙想要同巴基斯坦相勾结，这就使得“果阿问题比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端还来得紧迫”。

11 月24 日，印度近海客船“萨巴尔马蒂”号在葡属果阿的飞地安吉迪夫岛（Anjidiv）与对岸的印度本土卡塔纳克邦之间海域航行时，被安吉迪夫岛要塞内的葡萄牙驻军当成是运送“非暴力主义者”登岛强占要塞的运输船。葡萄牙驻军向这艘汽船开枪，打伤大管轮，打死一名乘客。这件事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印度却把它当作不能容忍的挑衅，抓住不放。12 月初，印度军队开始向果阿边境集结。其人数如此之多，行动如此仓促，以至于引起了印度北部和西部铁路交通的脱节。

到12 月初，印度陆军已经把在果阿周围布置了第17 步兵师和第50 “飞马”伞兵旅（印军最精锐的特种部队），随时待命进攻。这两支部队由印度南方集团军司令乔德哈里中将指挥，直接听命于印度国防部长克里什那 · 梅农和尼赫鲁总理。第1 马拉塔轻步兵团部署在葡属达曼边境，第乌岛附近则驻扎着第20 拉吉普特营和第4 马德拉斯营。印度空军西部战区司令埃尔里克 · 平托上将下令驻扎在普那和桑布拉空军基地的印度空军部队处于24 小时待命状态。

印度海军为出兵果阿的行动组成了四支特混舰队，其一是航母编队，包括“维克兰特”号航母（INS Vikrant）、“德里”号巡洋舰（INS Delhi）、“拉吉普特”号驱逐舰（INS

Rajput)、以及三艘英制“布莱克伍德”级反潜护卫舰。这支编队实力最为强大，布置在果阿外海65海里处，执行远程威慑任务，并随时准备进行登陆支援。第二支编队是水面战斗部队，包括轻巡洋舰“迈索尔”号（INS Mysore）和4艘英制护卫舰，它们在果阿外海7海里处巡弋，防止葡萄牙当局派船只北上增援达曼和第乌。第三支编队是4艘扫雷舰组成的扫雷部队，第四支编队是补给舰队。

葡萄牙军方从1954年印度对其殖民地采取经济封锁之后，就开始着手加强葡属印度的防卫力量。三个葡萄牙陆军营从本土调往果阿，使得当地的葡萄牙武装力量增加到了一万二千人。1960年3月，葡萄牙国防部长莫尼兹将军向萨拉查总理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认为如果将葡军投入与反殖民化力量的战斗，对陆军来说将是一种“自杀任务”，而且不可能成功。他的观点得到了葡萄牙军队中一些高级官员的支持。当年年底，葡军总参谋部官员科斯塔·戈梅斯中校视察果阿之后，下令削减了驻守在当地的兵力，将其减至3500人。

在印军采取军事行动之前，驻扎在果阿、达曼和第乌的葡萄牙部队共有3995人，包括810名当地士兵，他们只接受过有限的军事训练，执行保安巡逻任务。除了正规军外，三地还有1040名警察和400名边境卫队。葡萄牙海军在果阿驻有一艘殖民地炮舰“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号，搭载有4门120毫米炮和4门速射炮，此外在果阿还有3艘巡逻艇，每艘上有一门20毫米厄利孔高炮。

在印度出兵果阿之前两天，葡萄牙空军准备动用两架DC-6运输机向果阿紧急运去10吨反坦克武器和弹药。但是美国拒绝其使用位于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郊外的惠勒斯空军基地，巴基斯坦迫于第三世界国家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压力，也拒绝葡萄牙军用飞机飞越其领空。葡萄牙空军最后只好从葡萄牙国际航空公司（TAO）租用一架洛克希德“星座”民航飞机。当这架飞机于12月17日晚6时降落在果阿的达波利姆机场上的时候，当地葡萄牙驻军发现并没有运来急需的反坦克弹药，反而运来了几十袋香肠作为“军用口粮”。



印度海军“德里”号巡洋舰，原为英国“利安德”级轻巡洋舰“阿基里斯”号，1937年交给新西兰海军，1939年曾参加围歼德国袭击舰“斯佩伯爵”号的行动。1945年归还英国，1948年出售给印度海军。在1956年的电影《拉普拉塔河之战》中，它曾重新扮演当年的“阿基里斯”号。果阿战役期间“德里”号在第乌海域巡弋，1978年退役后在孟买解体

印度海军“拉吉普特”号驱逐舰，原为1942年建造的R级驱逐舰“罗特汉姆”号，1948年出售给印度，1971年印巴战争中曾用深水炸弹击沉巴基斯坦潜艇“加齐”号，1976年退役解体



印度军方夸夸其谈地宣布在果阿驻扎着一队F-86“佩刀”战斗机，但是除了开战前飞来的这架“星座”之外，在果阿只有一架葡萄牙印度航空公司（TAIP）的DC-4飞机，这两架运输机就是葡属印度全部的空军力量了。而当地的防空武器只有几门过时的高炮，操炮人员是化装成足球队员乘民航飞机赶来的。



安吉迪夫岛上的葡萄牙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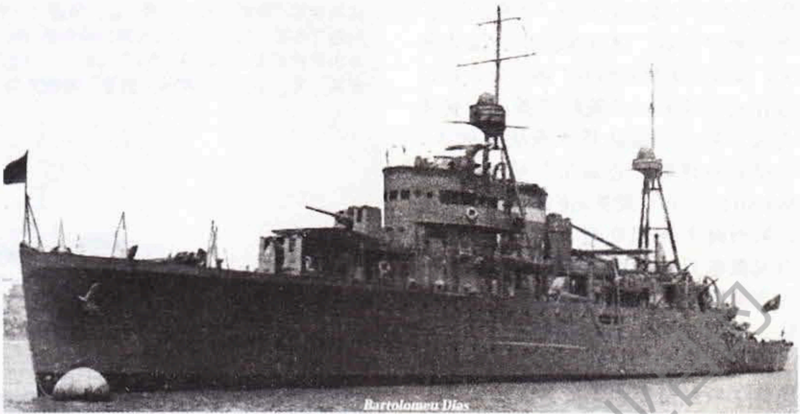
12月9日，从里斯本驶往帝汶岛的“印度”号客货船进入莫尔穆冈港。尽管里斯本当局禁止这艘船搭载平民离开果阿，但席尔瓦总督还是将700多名妇女和儿童送上了轮船。与此同时，葡萄牙海外国民银行（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也将保险库中的所有黄金和贵金属都转移到了“印度”号轮船上，其中不少是果阿居民寄存在银行里的私人财物（这批黄金直到1991年才归还给印度）。

12月14日傍晚，果阿当局接到从里斯本海外事务部发来的紧急电报，称葡萄牙总统亚美利哥·托马斯（Americo Tomas）已经下达了“焦土作战令”，要求将果阿、达曼和第乌地区所有没有军事用途的葡萄牙历史建筑物全部摧毁，以免落入印度人手中[注]，同时要求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遗骸——天主教世界最神圣的圣物之一——紧急转移到里斯本。果阿驻军

为执行“焦土令”将一些汽油运进了潘吉姆的伊达尔科宫，但是葡属印度总督曼努埃尔·瓦萨罗－席尔瓦(Manuel Antonio Vassalo e Silva)撤销了这道命令。他说“我不能下令抹杀这些葡萄牙（在东方的）伟大业绩的证据”。

为了防止发生更严重的边境冲突，葡萄牙当局在12月初将果阿的边境哨所后撤。尼赫鲁在那时还没有下定入侵果阿的决心，他感到十分苦恼，陷入犹豫不决的状态。在这个问题上，他听任那些比他更果断的人推着向前走，直到事态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境地。当入侵果阿的政治和军事准备正在加紧进行时，尼赫鲁还在重申他自己和印度反对使用武力解决、认为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办法。但此时印度政界已经大肆要求派兵打进果阿了，印度媒体上关于这块殖民地的宣传也是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十二月初，驻果阿的外国记者坐在潘吉姆幽静的路旁咖啡馆里，一边喝着冷饮，一边听印度广播电台那些耸人听闻的的报道，诸如潘吉姆已经宣布宵禁、葡萄牙总督已经出逃、从印度去的“果阿突击队”正在进行巷战，如此等等。

12月17日晚上，美国驻印度大使约翰·加尔布雷思教授求见尼赫鲁，再次呼吁他保持冷静和克制，和平解决果阿争端。加尔布雷思讲得头头是道，以至于当他离开总理府后，尼赫鲁告诉国防部长梅农说，他所批准的在那天午夜出兵果阿的命令应再度暂缓执行（此前已推迟了两次）。梅农回答说，要收回成命已经为时过晚，军队已经开始前进了——实际上当时印军还没开始行动。



葡萄牙海军炮舰“巴托罗缪·迪亚斯”号，1933 年葡萄牙向英国豪索恩·莱斯利船厂订购的两艘“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级海外殖民地炮舰之一。标准排水量1810 吨，满载排水量2435 吨，主机为2 台帕森斯式蒸汽轮机，4 台亚罗式锅炉，功率8000 马力，最高航速20 节，续航力高达10000 海里。其武备为4 门120 毫米单装炮、2 门76 毫米炮、4 门76 毫米高炮、2 座深水炸弹导轨，可携带40 枚水雷和一架水上飞机，乘员191 人。“阿尔布开克”号于1934 年服役，主要部署在印度和东非，翌年“迪亚斯”号服役，主要部署在大西洋。1961 年果阿危机前夕“迪亚斯”号也调往印度，护送装有银行黄金和沙勿略遗体的3 艘葡萄牙商船回国。1967 年“迪亚斯”号改名“哥伦布”号，成为海军军校宿舍船，1976 年退役解体

尼赫鲁在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深受其精神导师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影响。出兵果阿的行动简单而残暴，这一点令他不喜欢。17日深夜，印度陆军参谋局局长布里吉·莫汉·考尔中将（他是克什米尔人，与尼赫鲁总理出身于同一个婆罗门部族，是尼赫鲁的远亲）被叫到总理府，尼赫鲁向他询问如果取消这次军事行动会对印度有什么影响。考尔回答说，这将对印度文武官员的士气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并建议尼赫鲁不要理睬国外的意见。尼赫鲁最终勉强地被说服批准了出兵果阿。他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因为认识到印度人民期望他解放果阿，如果不采取行动，人民和武装部队都将对他失去信心。

维贾依行动

“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号殖民地炮舰



1961年12月18日凌晨4时，印度出兵果阿的战斗打响了。这次战役的代号是“维贾依行动”(Operation Vijay)。“维贾依”在印度是一个常见的姓氏和人名，来自梵语“Vijaya”，意思是“胜利”。1999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发生冲突时，印军的反攻行动也以“维贾依”作为代号。

陆地边境上的冲突从12月17日上午就爆发了，印军的一小股部队占领了果阿东北部的莫林古埃姆镇(Maulinguem)，打死两名葡萄牙士兵。附近的葡军第2侦察中队（Esquadrao de Reconhecimento/EREC）要求进入印度境内实施报复，但里斯本当局以为这是边境挑衅事件，因此向果阿发去急电，禁止进入印度境内。当天下午，果阿葡军司令下令所有的部队和边境哨所必须听从他本人的直接命令，绕开了中间的指挥官，从而给指挥系统造成了混乱。

12月18日凌晨4时，印军第17步兵师向莫林古埃姆镇南边的葡军阵地开炮射击，0430 时比乔利姆镇

【注】1961 年8 月1 日，非洲新独立的达荷美共和国（今贝宁共和国）在独立一周年纪念日当天驱逐了维达市的圣约翰堡（Forte Sao Joao Baptista de Ajuda）的葡萄牙总督。圣约翰堡的面积只有11 英亩，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殖民地，当时由葡属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总督代管，城堡里只有两人居住，其中一名军官兼任圣约翰堡的行政官。这两人在被押解出圣约翰堡之前，也按照托马斯总统的命令纵火烧毁了总督府，并且企图烧毁行政官的汽车。

(Bicholim)也遭到炮击。葡萄牙工兵炸毁了比乔利姆附近的一座重要桥梁，清晨5时又炸毁了位于查波拉、科尔瓦莱和阿松诺拉镇的另外三座大桥。天亮之后，印军第50“飞马”伞兵旅分为三路纵队，越过边境进入果阿境内，分头向南进军。最东边的第2马拉塔团进军目标是果阿中部的交通枢纽庞达镇（Ponda），中间的第1旁遮普团进攻果阿首府潘吉姆，最西边的主力部队包括第2锡克轻步兵团和第50伞兵旅装甲营，它们在0630时越过边境，沿着海岸附近的公路向南进军，目标也是潘吉姆。

驻扎在庞达镇的葡军第1侦察中队在0530时离开了兵营，乘坐装甲运兵车和卡车向乌斯冈镇（Usgao）方向前进。0900时，葡军先头侦察分队发现了第2马拉塔团的动向，第1侦察中队于是立即调头撤退，用重机枪火力殿后掩护，准备撤往曼多维河以南的潘吉姆城区。1300时，在第2侦察中队也撤走之后，葡军炸毁了曼多维河上的大桥，切断了潘吉姆与果阿北方地区的公路交通。傍晚时分，葡军第1和第9侦察中队撤到曼多维河北岸，开始用渡船过河。此时“飞马”旅的坦克已经攻至潘吉姆对岸的贝提姆镇，一路上没有与葡军发生过任何战斗。当天晚上2100时，第2锡克轻步兵团也进抵贝提姆，并在镇上过夜。

18日晚上20时，一位名叫格利高里·安东的果阿居民渡过曼多维河，给印军指挥官送去了一份停火建议，果阿葡军指挥官阿卡西奥·特内雷罗少校提议在“尊重葡萄牙军事荣誉”的前提下实现停火，以避免炮火摧毁城市或居民大量死伤的悲剧性结局。印军指挥官萨迦特·辛格准将没有答复，而是在19日清晨0730时下令部队渡河进入潘吉姆。第2锡克轻步兵团的两个连乘渡船渡过了曼多维河，进入潘吉姆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随即迅速占领了城中各处交通要地，在总督府、银行、报社等重要建筑门前布上了岗哨。第7骑兵团也于当天上午在装甲部队的支援下占领了潘吉姆的阿加达要塞监狱，释放了关在狱中的印度裔政治犯。

在第17步兵师从北方向南侵入果阿的同时，印军第63步兵旅也从果阿的东部边境上发起了进攻。这个旅分为两队，左翼是第2比哈尔营，右翼是第3锡克营，两队分头向庞达镇进军。两支部队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是由于葡军在后撤时炸毁了桥梁，从而被耽搁了前进速度。


在达伽马镇至达姆利波机场公路上被印军击中的葡军吉普车


印度空军的“堪培拉”轻型轰炸机。下图为印军的霍克“猎人”战斗轰炸机



19日早上，第3锡克营的士兵脱去衣服，淌着齐胸深的河水，占领了南果阿的行政中心马尔冈镇（Margao）。当天中午，该营离开马尔冈，向西扑向海滨的莫尔穆冈港和达波利姆机场。在一个叫维尔纳的村子，他们遭到一支500人的葡萄牙军队的猛烈阻击，但是葡军在第2比哈尔营赶到后就投降了。

到19日傍晚，果阿地区的大部分村镇都已经被印军占领，葡军剩余的主力部队退守莫尔穆冈港及其市区达伽马镇，准备按照此前制订的防御计划在此长期固守，等待葡萄牙援军从海上到来。印军在攻打莫尔穆冈－达伽马时，为减少伤亡而采取了佯攻战术。第4拉吉普特连穿过葡军布设的雷区，淌水渡河，在莫尔穆冈港南方发起进攻，印军主力随后从东边发起侧翼攻击，占领了扼守达伽马镇门户的阿尔布开克兵营，俘虏了2000多名葡萄牙士兵。

根据埃尔里克·平托上将的命令，印度空军的12架“堪培拉”轰炸机在18日清晨向果阿的达波利姆机场跑道投下了63000磅炸弹，不久之后第二波8架“堪培拉”轰炸机也前来空袭。这两波飞机都没有轰炸达波利姆机场的旅客站和修理车间，也没有触及停机坪上的那架“星座”飞机和DC－4运输机。当天傍晚，葡属果阿政府用这两架飞机把总督和其他重要官员的家属撤往巴基斯坦。

由于波利姆机场的大部分跑道被破坏，因此“星座”飞机只能在短短700米的距离内起飞。其机组成员为了减轻机身重量，拆下了所有的座椅，扔掉了飞机上的餐车、电炉、备餐食品和毛毯，甚至连洗手间里的香波和厕纸都扔掉了。最后这架“星座”还是顺利地起飞了，但是跑道上崩起的水泥碎块在机身上打出了25个小洞，还扎坏了一个起落架轮胎。葡萄牙印度航空公司的那架DC－4紧跟在“星座”后面起飞。为了避开印度空军的战斗机，这两架飞机

都贴着海面飞行，最后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降落。

运载葡萄牙要员亲属的两架运输机飞走后，印度空军的6 架霍克“猎人”攻击机对达波利姆机场进行了第三次空袭，使用火箭弹和机炮摧毁了机场的无线电发射塔。印度空军第45中队的德哈维兰“吸血鬼”战斗机在达波利姆机场附近盘旋，执行对地支援任务，但是误炸了印军的第2 锡克轻步兵团，炸伤两名士兵。

18 日下午1425 时，印度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在“迈索尔”号巡洋舰和“特里舒尔”号护卫舰（INS Trishul）的掩护下，对安吉迪夫岛发动登陆袭击，安吉迪夫要塞的葡萄牙驻军开了几枪之后便升起了白旗。当印军陆战队员见到白旗、走出掩蔽处时，葡军士兵向他们开火射击，打死7 人，打伤19 人。

停泊在不远处的两艘印度军舰一直在密切注视岸上的动向，发现葡军滥用白旗的行为之后，“迈索尔”号舰长下令用小口径舰炮向安吉迪夫要塞开炮射击。但是不巧的是，炮弹却射向了印度海军陆战队所在的区域。印度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阿伦奥迪托中校连忙打出两发红色信号弹，“迈索尔”号发现误击友军，遂停止开火。安吉迪夫要塞里的葡萄牙守军一直战斗到第二天下午两点，在用尽了弹药之后才向印军投降。

在果阿本土的莫尔穆冈港外，三艘印度护卫舰在0900 时进入了战斗阵位，等待开战命令。1100 时，印度空军飞机开始轰炸莫尔穆冈，港口中停泊的葡萄牙炮舰“阿尔布开克”号对空开炮射击，但没有命中目标。1200 时，由于还没接到海军司令部的开战命令，“贝特瓦”号（INS Betwa）和“比亚斯”号（INS Beas）两艘护卫舰擅自驶入莫尔穆冈港，用舰上的114 毫米炮向“阿尔布开克”号开火射击，同时用信号灯打出莫尔斯电码，要求对方投降。

“阿尔布开克”号立即用舰上的四门120 毫米炮开火还击。但是该舰当时正停泊在锚位上，无法进行规避机动，再加上四门主炮每分钟只能发射8 发炮弹，而印度的三艘护卫舰每分钟可以发射60 发炮弹，因此“阿尔布开克”号处于绝对劣势地位。1215 时，一发炮弹命中该舰舰桥，舰炮官被炸伤。



曼努埃尔·安东尼奥·瓦萨罗－席尔瓦（1899—1985），葡萄牙海军少将，1958—1961 任葡属印度第128 任总督。印度出兵果阿后因“失职”遭葡萄牙军事法庭审判，被放逐到巴西，1974 年葡萄牙民主革命后回国

1225 时，印舰发射的另一发开花弹在“阿尔布开克”号上空爆炸，弹片打死了葡舰的无线电通讯官，舰长安东尼奥·达库尼亚－阿拉冈也被炸伤。1235 时，锚链被打断的“阿尔布开克”号舰体漂转了180 度，搁浅于庞波里姆海滩。一名葡萄牙海军下士违反舰长的命令，在主桅上升起了白旗，但是印度军舰没有看到这面旗帜，继续向“阿尔布开克”号开火，不久之后白旗就被其他舰员降下来了。

1250 时，“阿尔布开克”号已经发射了400 多发炮弹，击中了两艘印度护卫舰，但是本身也多处中弹，无线电和动力系统全都被打坏，死伤多人。达库尼亚－阿拉冈舰长发出弃舰命令，包括炮手在内的葡萄牙水兵纷纷跳入海中，游向附近的海滩。1310 时，最后一批舰员用汽油在舰内各处纵火，然后抬着舰长离开了“阿尔布开克”号，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到了潘吉姆的医院。2030 时，“阿尔布开克”号官兵正式向印军投降。

在莫尔穆冈海战中，“阿尔布开克”号一共有5 人阵亡，13 人受伤。为了向其对手表示敬意，“贝特瓦”号和“比亚斯”号的舰长去潘吉姆医院探望了受伤的达库尼亚－阿拉冈舰长。

印度海军“贝特瓦”号护卫舰，英国海军41 型“豹”级防空护卫舰的第7 艘，1954 年订购，1960 年建成服役，1988 年退役解体。印度还向英国订购了同级舰“比亚斯”号，并购买了“黑豹”号的建造合同，改名为“布拉马普特拉”号。该级舰以柴油机为动力，航速方面不能满足要求，因此英国海军除了将后三艘出售给印度外，还向孟加拉国出售了同级的“猞猁”号和“美洲虎”号。并将在“豹”级之后建造的12 型护卫舰动力系统改为蒸汽轮机



印度海军“迈索尔”号巡洋舰，原英国海军“斐济”级巡洋舰“尼日利亚”号，排水量10450吨，搭载9门152mm主炮，航速33节。1957 年出售给印度，1959 年与英国海军“霍格”号驱逐舰相撞，1969 年与印度海军“拉纳”号驱逐舰相撞，1972 年与“比亚斯”号护卫舰相撞。1971 年印巴战争期间曾轰击卡拉奇港。1985 年退役解体




在莫尔穆冈海战中被击毁的“阿尔布开克”号炮舰

搁浅焚毁的“阿尔布开克”号被印度海军俘获，重新命名为“萨拉瓦斯特里”号，在庞波里姆海滩搁置了一年多，之后拖往孟买解体。

在总面积只有72平方公里的达曼地区，葡属达曼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边界地区地形复杂，密布沼泽、河流和棕榈树林，难于通过。达曼恒河从其首府达曼城的中间穿过，把城区分成北岸的大达曼（Damao Grande）和南岸的小达曼（Damao Pequeno）两个部分。小达曼是一座设有楞堡和城壕的要塞城镇，设有葡萄牙总督府，而大达曼是自由发展起来的市区。达曼机场位于大达曼的北边，达曼恒河河口北岸的圣杰罗米诺要塞内也有一部分驻军。

达曼的葡萄牙军事指挥官安东尼奥·达科斯塔·品托少校兼任达曼总督，他手下有360名正规军人，编为两个连和一个炮兵中队，此外还有200名警察和30名边防海关人员。达曼地区的两个最主要军事目标是圣杰罗米诺要塞和达曼机场的管制塔，1961年12月初在葡属印度总督的命令下从果阿向达曼运去了几门20毫米高炮，用来保护这两个地方。

印军第1马拉塔轻步兵团在18日0400时越过达曼边境，其主要作战目标是夺占达曼机场。0430时，印军炮兵开始向大达曼的机场指挥塔开炮射击。0730时，圣杰罗米诺要塞的葡萄牙守军前去保卫机场，向企图夺占机场跑道的印军士兵开了火。到傍晚17时，印度军队已经控制了达曼的绝大部分地区，只有达曼机场和圣杰罗米诺要塞还被葡萄牙部队控制着。晚20时，品托少校召集属下军官开会，决定向印军方面派去军使谈判停火事宜，但是葡方谈判代表一走出圣杰罗米诺要塞就遭到印军开火射击，只好掉头返回。

19日天亮之后，印军调集部队，准备对达曼机场发动攻击，但葡方在11时升起了白旗。印军指挥官只接受品托少校的投降，因此这位受伤的达曼总督被人用担架抬着出席了投降仪式。大约600名葡萄牙军人和警察被印军俘虏，葡方阵亡10人，2人受伤。印军有4人阵亡、14人受伤。

印度空军的法制“神秘”战斗机在12月18日那天进行了14次战斗飞行，骚扰和轰炸葡军的炮兵阵地。停泊在达曼港的葡萄牙巡逻艇“安塔列斯”号（NRP Antares）在艇长阿布鲁奥·布里托少尉的指挥下出海躲避印军空袭。1920时，来自岸上葡萄牙电台的通讯陷入静默状态，布里托少尉从印度的广播中获悉这是对葡属地区的全面进攻，于是决定驶往巴基斯坦。12月20日晚20时，在530海里的长途航行之后，“安塔列斯”号平安驶入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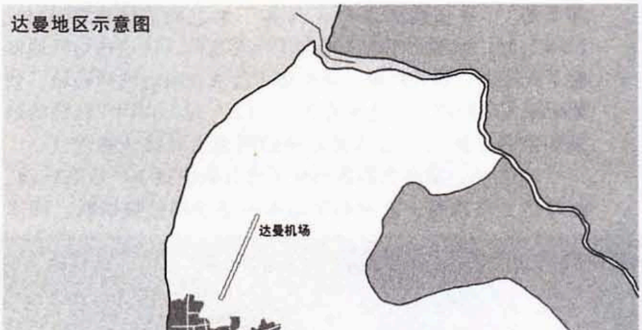
在古吉拉特邦海岸的第乌岛，印度海军巡洋舰“德里”号从17日晚间就停泊在其附近，舰上的152毫米主炮瞄准了第乌岛要塞。岸上的葡萄牙守军曾经用望远镜观察这艘军舰，但是陆军士兵没有辨认出印度海军的战旗，把它当成了一艘商船。凌晨4时，葡萄牙巡逻艇“韦加”号（NRP Vega）驶近“德里”号试图对其进行观察，遭到了重机枪的扫射，幸好没有人员伤亡。“韦加”号撤回到第乌岛的港口内。

0700时，印度人侵行动开始的消息传到了第乌，“韦加”号艇长奥利维亚·卡尔莫少尉下令驶出港外并“战斗到最后一发子弹”。0730时，两架印度空军的法制达索“飓风”战斗轰炸机出现在第乌岛上空，“韦加”号用艇上的唯一一门20毫米厄利孔高炮向其射击，但没有命中。印度飞机最后炸沉了“韦加”号，艇长和炮手被炸死，其余的艇员纷纷跳入海中，游向第乌岛，上岸后向印军投降了。

18日黎明，印度空军对第乌岛发起了空袭，摧毁了该岛面向大陆一侧的防御工事。当天晚些时候，从蒲那空军基地起飞的两架“飓风”战斗轰炸机向第乌机场的跑道投下了4枚1000磅炸弹，摧毁了大部分跑道。当第二架次的“飓风”飞到第乌机场上空时，飞行员见地面有人挥动白旗，便放弃了空袭。在18日这一天里，印度空军随时保持有两架飞机在第乌岛上空飞行。

印军第20拉吉普特营的任务是渡海攻占第乌机场，第4马德拉斯营则负责攻占第乌岛最东端的第乌要塞。第乌岛的地形狭长，东西最长处为13.8公里，南北最宽处4.6公里，与印度之间隔着一条非常狭窄的海峡，海水很浅，在

达曼地区示意图



由期刊提供仅作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满潮时也只有渔船和小艇能够通行，退潮时则变成一片泥泞的滩涂。第乌岛与印度本土之间没有任何堤道或桥梁相连。在第乌岛东边的果戈尔半岛（Gogol），葡萄牙人还有一小片飞地，在那里设置了一处警察哨所。

18 日凌晨0130 时，第4 马德拉斯营向果戈尔半岛的葡萄牙哨所发动袭击，被哨所里的1 3 名葡萄牙警察击退。0200 时，印军试图再次反攻，第乌要塞的葡萄牙守军用87.6 毫米炮和迫击炮进行火力射击，印军多人受伤。但是到0400 时，果戈尔哨所的13 名守军中已经有10 人受伤，被撤往附近的民营诊所救治。第乌岛上的葡军继续用火炮阻止印军向果戈尔半岛推进，但是在天亮时炮弹逐渐耗罄。0530 时，第乌要塞的葡军进行了最后一次炮火打击，正好落在向前推进的第4 马德拉斯营中间，造成重大伤亡，该营被迫后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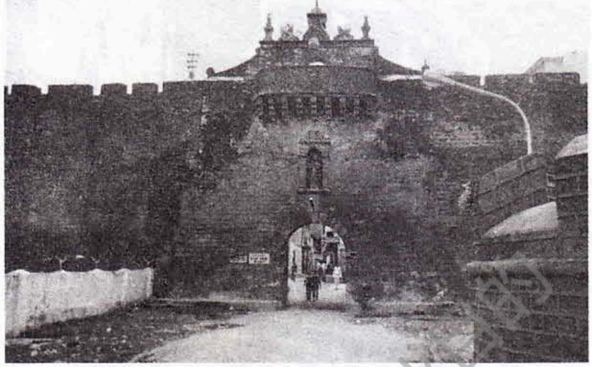
0300 时，第2 拉吉普特营的两个连把空油桶绑在竹子上做成筏子，试图渡过第乌岛与大陆之间的泥泞沼泽地和狭窄水沟。对岸的8 名葡萄牙守军发现印军的动静后，用重机枪、冲锋枪和步枪向印军开火，打翻了好几艘竹筏。第20 拉吉普特连连长马尔·辛格少校和5 名士兵最终成功登上第乌岛。这六个拉吉普特人——印度次大陆最骁勇善战的民族之一——扑向葡军的轻机枪战壕，打死了机枪手。葡方的另一处机枪战壕向这些人开火，打伤了辛格少校和3 名士兵。

天亮之后，葡萄牙士兵能够看清第乌海峡中的印军目标，火力变得更加准确了。为避免更多伤亡，第2 拉吉普特营的营长下令所有人后撤，在附近一个叫科布的村庄里寻找掩护。0630 时，一小群葡萄牙士兵走上即将涨潮的滩涂，开始打扫战场。他们捡拾到印军士兵丢弃的许多枪支和弹药，还捡到了一名被遗弃的印度伤兵。

0900 时，葡萄牙人放弃了果戈尔半岛，第4 马德拉斯营在炮火掩护下"胜利进军"，占领了这座无人防守的居民点。1015 时，"德里"号巡洋舰开始用舰炮向第乌岛上的葡军阵地射击。但是由于对弹道的要求过于苛刻（需要进行平射），许多炮弹落到了与其一水之隔的印度领土上。1245 时，印度空军的飞机向第乌要塞的一处迫击炮阵地发射了火箭弹，将其打哑，并引爆了堆放在附近的弹药箱，葡萄牙军人纷纷逃出了这座要塞。1415 时，在印军猛烈的炮轰和空袭干扰下，第乌要塞里的所有人员终于撤空了。

18 时，第乌岛的葡萄牙军官开始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此时岛上与达曼、果阿和里斯本的通讯都已被切断，印军不仅兵力远远超过岛上的葡萄牙守军，而且还有巡洋舰和战斗轰炸机的配合。经过讨论，军官们一致同意向印军投降。12 月19 日1200 时，第乌岛守军司令正式向印度指挥官投降，403 名葡萄牙军人沦为俘虏，其中包括18 名军官和43 名士官。在投降仪式上，第乌岛总督说他的手下能抵抗印度陆军的进攻达五六个星期之久，但是对印度空军就无能为力了。

第乌要塞的入口



第乌要塞上的青铜大炮



19 日天黑之后，退守到达伽马镇的曼努埃尔·瓦萨罗－席尔瓦总督万分痛苦。果阿的大部分领土已经沦陷，达曼和第乌的守军音讯皆无，他显然要成为128 位葡属印度总督的最后一任了。亚美利哥·托马斯总统发给葡属印度总督府的"焦土令"不仅要求他炸毁潘吉姆和老果阿城，而且要求守军战斗至最后一人。但是瓦萨罗－席尔瓦在权衡了葡军与印军在人数、食品储备、弹药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巨大差异之后，于19 日晚上20 时发出了停火命令。



第乌岛示意图

在停火令中，总督说"考虑到莫尔穆冈半岛的防御……考虑到来自空中、海上和地面的敌方炮火，以及双方在兵力和资源上的差异……目前的局势已经使得我无法在避免瓦斯科·达伽马镇平民出现巨大伤亡的情况下继续坚持防守。我所信奉的爱国主义观念要求我……与敌人进行谈判。我命令在我指挥下的所有部队停止开火。"

2030 时，瓦萨罗－席尔瓦总督在停火协议上签了字，宣告长达451 年的葡属印度领地的完结。在出兵葡属印度的行动中，葡萄牙方面一共有31

人阵亡，57 人受伤，4668 名军人和平民——包括葡萄牙人、非洲人和印度果阿人——成为印度军队的俘虏，其中果阿有3412 人，达曼853 人，第乌403 人。印度方面的伤亡情况是34 人阵亡、51 人受伤。当天午夜，印度人民院通过决议，宣布果阿、达曼、第乌这三块领地成为由印度总统直辖的中央直辖联邦区，并正式并入印度共和国。


印军攻占果阿后俘获的葡萄牙军人和警察


果阿居民上街欢迎印军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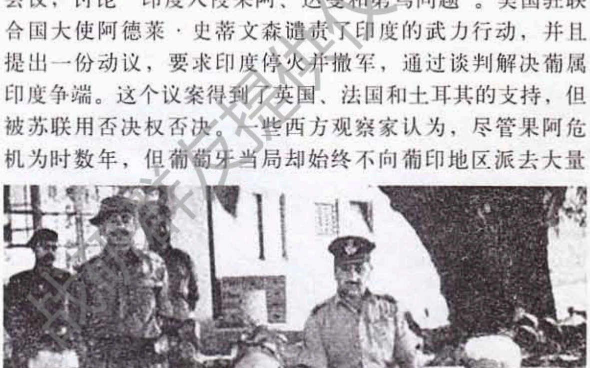
德里春梦

在果阿、达曼和第乌被俘的葡萄牙士兵最初被囚禁在自己的兵营里，1962 年1 月转移到了果阿中部庞达镇的战俘营中。总督和高级军官则被关押在达伽马镇的一处小战俘营中，由印军严密看守。庞达战俘营的葡萄牙士兵经常遭到虐待和打骂，被迫睡在水泥地上，伙食也很糟糕。直到葡萄牙总理萨拉查博士下令拘禁葡属莫桑比克的1200 名印度人，这些战俘的待遇才有所改善。1962 年5 月，印度释放了第一批葡萄牙战俘，他们乘坐一架法国飞机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然后搭乘三艘葡萄牙船回国。

运送葡萄牙战俘回国的船只一驶入里斯本西边的特茹河口，葡萄牙宪兵就登船宣布这些归国战俘处于隔离状态，禁止他们与家人接触。战俘中的军官受到葡萄牙陆军军事检察院的起诉，指控他们违反了不得向印度投降的命令。

1963 年3 月22 日，葡萄牙军事法院作出判决，葡属印度总督瓦萨罗－席尔瓦少将、驻印葡军司令和参谋长、“阿尔布开克”号舰长、6 名少校、1 名少尉和1 名军士被判犯有“懦弱罪”，受到剥夺军职的处罚。另有4 名上尉、4 名中尉和1 名少尉被判处6 个月的监禁。瓦萨罗－席尔瓦总督还受到了额外的侮辱：萨拉查总理让人给他送去一颗氰化物胶囊，暗示其自杀。瓦萨罗－席尔瓦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根据教义拒绝自杀，于是萨拉查将他放逐到海外。瓦萨罗－席尔瓦流亡到巴西，直到1974 年葡萄牙军人政变后才回国。

12 月18 日，当印度军队还在果阿边境上同葡萄牙守军战斗的时候，葡萄牙驻联合国代表就要求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印度人侵果阿、达曼和第乌问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谴责了印度的武力行动，并且提出一份动议，要求印度停火并撤军，通过谈判解决葡属印度争端。这个议案得到了英国、法国和土耳其的支持，但被苏联用否决权否决。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尽管果阿危机为时数年，但葡萄牙当局却始终不向葡印地区派去大量兵力，以至于印度能够将其轻易夺取。这也许是一种壁虎断尾的策略，通过牺牲果阿来换取北约组织和西方国家的同情，并使其支持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战争。


被关押在达伽马战俘营的果阿葡军司令与印军指挥官萨迦特·辛格交谈

在印度出兵之后，葡萄牙政府断绝了和印度的所有外交关系，并向果阿、达曼、第乌三地的居民提供了葡萄牙公民权，并帮助愿意离开三地的印度人移居葡萄牙。葡萄牙当局还对直接指挥出兵行动的指挥官萨加特·辛格准将发出了10 万美元的悬赏通缉令。

1961 年里斯本的圣诞节是在一片哀悼气氛中度过的，所有的剧院和电影院全部歇业，上万名市民自发聚集起来，在里斯本的大街上静默地列队游行，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遗骸从里斯本市政厅护送到大教堂。美国大使馆新闻处橱窗里的耶稣诞生马槽布景（这是法、意、西、葡等天主教国家的圣诞习俗，有别于英美德和北欧国家布置圣诞树的习俗——后者来自古日耳曼人在冬至日围绕枞树庆祝的传统）也用一块黑纱遮挡了起来。

为了对占领果阿的军事行动表示抗议，美国取消了1962 年对印援助。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也不失时机地对美国提出了增加军事援助的要求。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印度出兵行动表示了支持和祝贺。但由于当时印度在中印边界谈判上采取了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立场，因此中国政府虽然没有谴责印度出兵的行动，但也没有对其表示支持，只是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失去葡属印度后，葡萄牙在非洲还有大片的殖民地，但很快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殖民地战争。1970 年萨拉查去世后，他的接班人马尔塞罗·卡塔诺继续坚持萨拉查的政策，拒绝撤出非洲。长久的战争和庞



安东尼奥·萨拉查博士（1889—1970）出身于葡萄牙的一个地产商家庭，先后进入神学院和科英布拉大学求学，毕业后留在科英布拉大学任经济学讲师。1926 年葡萄牙发生军人政变，第二共和国被推翻，萨拉查被军人总统卡蒙纳任命为财政部长。1932 年，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卡蒙纳任命萨拉查为葡萄牙总理，并赋予他独裁权力。萨拉查于1933年通过新宪法，建立了带有法西斯性质和官僚独裁特征的“新国家”（Estado Novo）体制，以“上帝、祖国、家庭”为政权的号召，并且仿效意大利的法西斯黑衫队建立了“葡萄牙青年团”和“国家军团”。他解散了除“国民同盟”外的一切政党，在葡萄牙实行了36年的温和独裁统治。1968 年 8 月，79 岁高龄的萨拉查中风，将权力移交给其接班人卡塔诺后于1970 年病逝，而由他建立的葡萄牙法西斯政权也在1974 年的“康乃馨革命”中寿终正寝



亚美利哥·托马斯（1894—1987），1958—1974 任葡萄牙总统，1974 年“康乃馨革命”后被推翻，流亡巴西。他原为葡萄牙海军水文专家，1936 年出任海军部长，其间大力发展葡萄牙的造船业，因此在萨拉查政权领导人当中是评价最好的一个，也是葡萄牙民主化后唯一一名被允许回国访问的前独裁政权领导人

大的军费令葡萄牙独裁政权失去了许多葡萄牙人民，特别是中下级军官的支持。这些军官组成了左翼的“武装部队运动”（Movimento das Forcas Armadas），于1974 年4 月25 日凌晨在里斯本发动了政变。“武装部队运动”成员占领了里斯本军区司令部、葡萄牙国家电视台和电视信号发射塔、两座电台、阿尔梅达炮台、里斯本机场和国家保安警察总部。卡塔诺政权的部长们在睡梦中被破门而入的军人逮捕，押送到一处兵营集中关押。卡塔诺总理也被左翼军人逮捕，签署了辞职书，随后被一架军用飞机押送到大西洋中的葡属马德拉群岛软禁，不久之后流亡巴西并死在那里。

许多葡萄牙平民自发参与了这次政变，并且向左翼军人们赠送康乃馨鲜花，以至于4 月25 日的这次政变以“康乃馨革命”（Revolucao dos Cravos）之名流传后世。此后葡萄牙经过了两年的社会转型和混乱时期（在葡萄牙被称为“革命过渡期”），最终建立了自由民主化的民选政府。此后葡萄牙宣布实行“非殖民化”政策，并主动撤出安哥拉、卡宾达、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群岛等葡属殖民地。这些地区随即相继宣布独立。但是不久之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亲苏、亲华和亲西方政治派别之间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导致100 多万名葡裔居民逃回葡萄牙。

在亚洲殖民地问题上，葡萄牙新政权在“康乃馨革命”后制订的民主宪法中承认澳门是“葡萄牙管理下的中国领土”，并且承认东帝汶的独立。但东帝汶在1975 年独立之后不久便被



1974 年 4 月 25 日清晨，里斯本市民走上街头，向政变军人献花

印度尼西亚出兵吞并。印尼总统苏哈托援引印度出兵果阿的先例，宣称吞并东帝汶是“解放”那里的人民。但东帝汶人深受葡萄牙天主教文化影响，并且深受“康乃馨革命”带来的左翼思想影响，对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施行权贵资本主义腐败统治的印尼苏哈托政权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意识，从而爆发了长达24 年的东帝汶独立战争。

葡萄牙新政权还承认了达荷美共和国对圣约翰堡的吞并，以及印度对果阿、达曼、第乌、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的吞并，承认这些地区是达荷美和印度的领土，并且发表了正式文件和声明，宣布永久放弃葡萄牙对这些地区的主权。自此之后，葡萄牙与印度的关系一直良好，殖民地的旧事已经不再令彼此心存芥蒂。1974 年12



1974 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时的里斯本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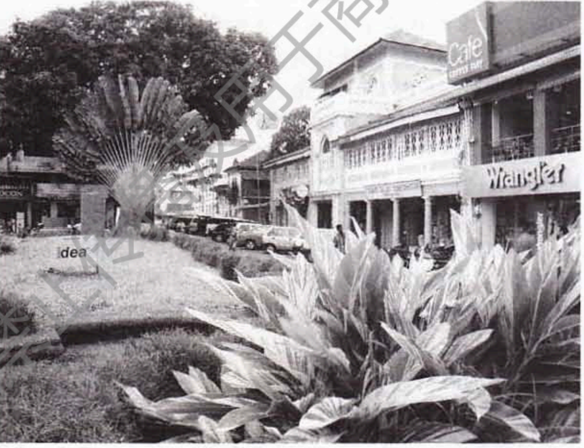
月31日，葡萄牙恢复了与印度的外交关系，1992年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访问了果阿，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苏亚雷斯也是四百八十二年以来踏上果阿土地的第一位葡萄牙国家元首。

如今果阿是印度最富裕的一个邦，人均GDP是印度平均水平的2．5倍。果阿的宜人气候和蓝水白沙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198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老果阿城教堂和修道院更是吸引了不少天主教朝圣者。果阿的130万人口中有30％来自印度别的地方，然而大多数果阿人都设法保留了葡萄牙人带给他们的独特身份。1967年果阿人曾投票反对与邻近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合并，结果到1987年5月31日，果阿成了印度的第25个邦。

如今在果阿邦，葡萄牙文和英文并列为法庭的官方语言，而且民事法庭至今仍在沿用1871年的葡萄牙民法。葡萄牙和巴西的音乐在果阿甚为流行，果阿电视台里播放的是巴西的连续剧，果阿的足球爱好者也密切关注葡萄牙在世界杯和欧洲杯比赛中的成绩。果阿的烹饪菜谱中有许多是葡萄牙名菜，大量使用葡萄牙人传来的橄榄油、腰果、非洲花生和巴西红椒。果阿人成立了许多促进印葡友好关系的协会，其中潘吉姆印葡协会的总干事兰格尔兹医生的发言可以代表大多数果阿人的心声：“我们在血缘上是印度人，但是我们的文化是印度文化与葡萄牙文化的结晶。这种文化是经过几个世纪才创造出来的，它不能——也不应——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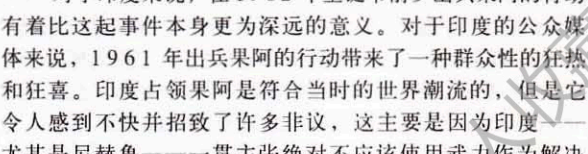
果阿如今是印度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之一，每年吸引约40％前往印度的外国游客。图为果阿老城的圣卡塔琳娜大教堂。下图为其首府帕纳吉一条富于葡萄牙特色的商业街





对于印度来说，在1962年圣诞节前夕出兵果阿的行动有着比这起事件本身更为深远的意义。对于印度的公众媒体来说，1961年出兵果阿的行动带来了一种群众性的狂热和狂喜。印度占领果阿是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的，但是它令人感到不快并招致了许多非议，这主要是因为印度——尤其是尼赫鲁——一贯主张绝对不应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现在印度人却坚持说，占领果阿毫不违背他们所提出的国际行为准则。这表明了印度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具有两重性——抽象地谈论使用武力或在别人使用武力时，是应该受谴责的，而印度自己使用武力时，在政治上和在道义上就被认为是正当的了。

出兵果阿的行动表明了印度政府决定政策的过程是如何地混乱和主观，也证明了尼赫鲁会任由自己被推动到一系列毫无转圜余地的行动中去。占领果阿的决定并不是由印度内阁作出的，而是军方和某些政客推动着尼赫鲁进行的，尽管这种使用武力的行动与他自己的政治信念背道而驰。一家刊物概括了印度人对于占领果阿的见解：“印度并没有进行侵略，因为自1947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果阿是我国的合法领土……把非法侵占我国领土的入侵者赶出去，这并不是侵略。”按照印度人的看法，这种方式显然也适用于同中国的边界争端。有些印度政客为果阿事件所沉醉，开始叫嚷把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赶走、把中国从阿克赛钦地区赶走。印度内政部长夏斯特里就在1961年12月的一次竞选大会上说“如果中国不肯从它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印度将不得不重复它在果阿所采取的行动。印度一定把中国军队赶出去。”



克里什那·梅农（左）与尼赫鲁。梅农1952–1962任驻联合国大使，1957–1962任印度国防部长，被视为印度国大党二号人物，1962年中印战争之后失势

如果说昔日英国人在印度搞的是“普通帝国主义”，葡萄牙人在印度搞的是略带拉丁荷尔蒙气味的“文艺帝国主义”，那么身为英帝和葡帝双重继承者的印度政府和军方从“维贾依行动”之后就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为“二B帝国主义”的路线，把一个本不该成为敌人的朋友逼成了敌人，把一个本不该成为对手的邻居给逼成了对手。如果说尼赫鲁最后同意批准出兵果阿的目的之一是要降低印度政界“要求立即对中国采取行动”的热度的话，那么实际上他却获得了相反的效果。印军在果阿战役中轻易取胜，自然滋长了对中国取得同样“辉煌胜利”的希望。印度民众普遍认为果阿战役的迅速结束反应了印度军队战斗精神很旺盛（而不是由于葡萄牙人没有抵抗），这也就更容易使得印度人相信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印度军队状况良好的保证。

从军事方面看，印度为了夺取果阿、对付葡属印度不到五千人的那么点驻军，竟然动员了两个多师的兵力、1艘

航母、2 艘巡洋舰、1 艘驱逐舰、8 艘护卫舰、4 艘扫雷舰、20 架轰炸机和 22 架战斗机。战役实际上暴露出印度陆军在装备上的许多缺陷。由于葡萄牙对占压倒优势的印军并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所以这些缺陷也就没有及时暴露出来，同时也没有真正地考验印度军队及其指挥官的能力。有的印度部队缺少步枪和轻机枪，也有的缺少无线电台、电池或其他通讯工具。陆军还长期缺少皮靴，有一个营的半数士兵是穿着帆布球鞋参加了整个战役的。

1962 年初，踌躇满志的印度陆军总参谋长布里吉·莫汉·考尔视察阿萨姆地区的一处兵营。当年10 月，他亲自指挥印度第四集团军同中国军队作战，以失败告终



就整个印度陆军而言，当时缺乏6 万支步枪、70 门反坦克炮、200 门迫击炮，炮弹的供应量低到危急的程度。需要5000 台站地无线电台，数千英里的电线、36000 个干电池。陆军缺少载重1 吨和3 吨卡车各1000 辆，有两个坦克团因缺乏零件而不能作战。这些情况在印度陆军内部是广泛谈论的话题，但很少对政治家和公众透露出来。人们把果阿战役当作是赫赫武功加以颂扬，销路很广的《闪电》杂志还洋洋自得地将其与1940 年的“不列颠之战”相比，将之称为“我们自己的最光荣的时刻”。

连尼赫鲁自己也被出兵果阿行动给弄得飘飘然。1962 年1 月他到孟买为梅农竞选时说“梅农担任国防部长以来，我国国防部队第一次成为一支非常强大、和非常有效率的战斗力量。我是深知内情才讲这番话的，看谁能驳倒我……我们的国防部队第一次有了新的精神和现代化的武器”。尼赫鲁此后常常用这样的腔调讲话，对议会和公众保证说，印度陆军和其他军种比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而且已经准备好随时迎击“对印度的领土完整和尊严的挑战”，“即便应付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联合进攻也是绰绰有余”。

由于印度陆军不肯向外界透露详情，因此外人对于陆军的缺陷有多大是没有概念的。许多批评尼赫鲁国防政策的人自豪地相信，印度陆军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只要放手让他们干，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中国教训一顿。就这样，果阿的这一场小表演，使得印度的被煽动起来的民族热情得到满足，却时刻没有偏离那个念念不忘的中心问题——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尼赫鲁说过，对于印度来说，这（中印边界问题）比一百个果阿更为重要。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印度陆军总司令部在1961 年12 月发出了在从喀喇昆仑山口到缅甸边境的漫长中印边界线上“前进巡逻”、建立哨所的命令，印度政府也坚决拒绝谈判边界问题。

印度海军“维克兰特”号航母。1962 年时，印度是唯一拥有航母和巡洋舰的亚洲国家，其陆军和空军也从英国、美国和苏联获得了大量先进的军事装备，致使其军方上层人物踌躇满志，几乎以“世界第三”自夸



西方国家早就把“民主印度”和“红色中国”视为代表着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亚洲政治集团的决赛对手，现在决赛即将开始了。在国外舆论的竞赛场上，印度也仿佛是主场比赛的队员一样，取得了一切便利条件。看台上挤满了支持印度的人群，印度穿着写有“民主”二字的球衣，看上去球技熟练，斗志顽强。当西方世界的报纸和政府看到印度似乎是“勇敢地顶住了中国扩张主义的进攻”时，他们就大声喝彩，希望再接再厉。虽然入侵果阿损害了印度的声誉，从而引起一些人对印度的态度和行动产生疑问，但并不影响他们在中印争端上谁是谁非的看法。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斯帕克曼就在1962 年说过，“我们知道印度在东北边境对共产党中国施加很大压力。我们早就希望它这样干，现在它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做。”

就这样，在印度国内和国外的鼓噪起哄之下，尼赫鲁、梅农和印度军方其他将领终于在1962 年10 月下旬，在靠近不丹边境的克节朗河和兼则马尼山口跨过了冒进与冒险之间的最后一道界限。不料这次印军碰上的不是孱弱的葡萄牙人，而是专替“世界第三”们清热败火的解放军。而在这之后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就是中国的广大军事爱好者们耳熟能详的了。



法兰西巡逻兵

布干维尔级殖民地炮舰

○ 郝晓伟

通报舰与殖民地炮舰

在从十八世纪直至今日的法国海军舰艇分类谱系中，有一类被称为“aviso”的舰船。按照《1788-1792年法国海军辞典》(Dictionnaire de la Marine Francaise 1788-1792) 的解释，“Aviso”指的是用来搭运和递送情报及军令的小型舰船，故也可翻译成“通报舰”。这种军舰一般来说吨位很小，但航速较快，在风帆海军时代通常搭载8至16门小口径火炮。

在发明无线电之前的时代，通报舰的主要作用是在海战中部署于主力舰队的前方，执行侦察和哨戒任务，并在发现敌舰队时快速回航，将其兵力、航向等情报通知给己方舰队。日本海军在十九世纪末建造的“八重山”号、“千岛”号、“宫古”号等小型军舰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军舰，此外在对马海战中首先发现俄舰队动向的“信浓丸”号也是由商船改装而成的临时通报舰。到20世纪初，随着无线电技术得到推广，这种执行专门用途的通报舰在各国海军中逐渐被取消了，原本由其担任的侦察和哨戒任务由轻巡洋舰和驱逐舰这样的中小型军舰承担。

除了舰队通报舰之外，还有一类被称作“殖民地通报舰”的小型军舰，负责在海外领土和殖民地担当航路警备、维持治安、保护权益等使命，战时则负责为殖民地周边海域的海上通商提供护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拥有殖民地通报舰或殖民地炮舰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葡萄牙、荷兰等国，基本上都是在非洲和亚洲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老牌殖民国家。

实际上这一类“殖民地通报舰”的概念已经与具备远洋适航性的大型炮舰已经发生了重叠，比如说日本海军的“嵯峨”号炮舰，虽然属于配属在中国近海及扬子江流域的航洋型炮舰，但其主要使命——对华炫耀武力，以及维护日本在华利权——也与英法等国的殖民地通报舰类似。在1913年摩洛哥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德国海军炮舰“豹”号也属于这类军舰。英国海军一般将这类军舰称为“炮舰”(sloop) 或“殖民地炮舰”(colonial sloop)，荷兰海军称其为“炮舰”(kanonneerboot)，葡萄牙海军则称之为“殖民地通报舰”(Avisos coloniais)。

列强海军的殖民地通报舰或殖民地炮舰有几个共同的特征：首先，其吨位不是很大，小者三四百吨，最大也不超过两三千吨，因此其吃水也通常比较浅。这主要是因为殖民地和海外领地通常岛屿众多，港口航道水深比较浅，浅吃水的军舰可以增大活动范围。其次，殖民地炮舰的干舷比较高，具备海上自航能力，这是浅水重炮舰或内河炮舰所不具备的。第三，殖民地炮舰的主炮通常与同时期的驱逐舰或小型巡洋舰相当，通常其口径在80毫米到140毫米左右，数量也不是很多，通常只有三四门，最多不过六

荷兰海军1933年建造的“莫里斯·范·拿骚”号属于典型的殖民地炮舰，采用往复式蒸汽机和燃煤锅炉作为动力，排水量1400吨。该舰在1940年被德国飞机炸沉击沉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上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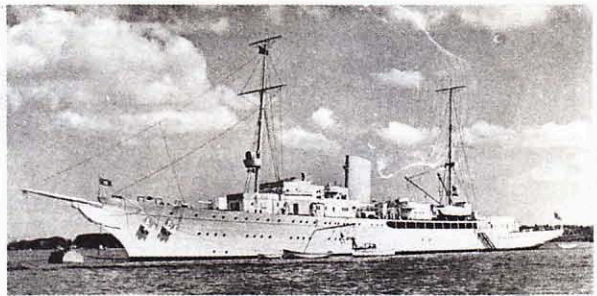
门。这样规格的火力足以满足在殖民地执行警备任务、镇压起义、以及参加低强度战争的需要。最后，由于海外领地的海军设施和港口比较少，因此殖民地炮舰必须具有较长时间的海上自持能力，居住性也要满足舰员长时间在舰上生活的需要。

布干维尔级殖民地炮舰

经过三个多世纪的经营，法国建立了居世界第二位、面积仅次于英帝国的庞大海外殖民帝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拥有总面积1290万平方公里的海外领土及殖民地，遍布于北非、西非、东非、近东、印度、中南半岛、大洋洲和美洲。从十九世纪末起，法国便向远东和非洲派驻了小规模的舰队，成为对越南、暹罗、摩洛哥等弱小国家推行炮舰政策的有力工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法国海军建造了8艘“毕宿五”(Aldebaran)级殖民地通报舰和6艘“艾纳河”(Aisne)级殖民地炮舰，以替代当时已经破败过时的“彗星”级殖民地通报舰。这两级军舰中吨位最大的“毕宿五”级由英国的船厂代建，排水量1250吨，搭载2门140毫米炮和2门47毫米炮，可以搭载260吨煤，续航力2400海里。排水量680吨的“艾纳河”级搭载4门100毫米炮和3门9磅（65毫米）炮，可搭载135吨燃油，续航力4000海里。

当时法国海外殖民地面临的威胁并不是很大，因此这19艘殖民地炮舰在竣工后一度被部署在地中海和北海，用作护航和反潜用舰，直到一战结束后才分别派往法属各海外殖民地。



德国海军1935年建造的“蟋蟀”号（Grille）尽管正式分类是舰队勤务舰（flottentender），用途是德国总统及海军部长的游艇，但实际上也被算为殖民地炮舰类型的军舰，即aviso。它排水量3430吨，装有3门127毫米炮、4门37毫米高炮和4门20毫米高炮，航速26节。在其服役生涯中，曾搭载勃洛姆堡元帅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参加斯卡格拉克海战20周年纪念，以及用于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意大利国王维多里奥·艾曼纽尔三世和墨索里尼的国事访问。二战后该舰被英国没收，卖给一位加拿大船主，1951年出售解体

1927年，随着一战期间建造的殖民地炮舰逐渐变得陈旧过时，法国海军开始筹划建造新一级大型远洋殖民地炮舰，或称“远程战斗通报舰”(avisos pour compagnes lointaines)。根据法国海军的需要，这种军舰将专门配属给海外殖民地，主要部署在印度支那和西非等地，因此需要具备在长满红树林的咸水泻湖中航行，以及上溯至湄公河、塞内加尔河或加蓬河等淡水河河口内的能力，也就是说其吃水不能过深。由于预计会被指定为小型分舰队的旗舰，因此这级炮舰对通讯性能和住宿空间的要求很高。此外，当时法国海军的主要假想敌是意大利海军，因此这种殖民地炮舰在单舰武备方面需要具备能够与意大利驱逐舰相抗衡的能力。

法国海军“毕宿五”号殖民地炮舰。由于一战期间法国与英国、美国、俄国和日本都是盟友，因此其海外殖民地面临的威胁不大，这一级炮舰在一战当中基本上全都留在地中海地区，主要执行护航任务



法国海军“马恩河”号殖民地炮舰，属“艾纳河”级。这一级的6艘炮舰全都以法国本土的河流命名。事实上除了被列为一等殖民地炮舰的“艾纳河”级和“毕宿五”级外，法国海军在一战中还建造了23艘“热心”级、8艘“布丰”级、1艘“吕荣讷”级、2艘“巨人”级、6艘“杜布第厄”级、1艘“弗拉芒”级，共41艘二等炮舰，以及30艘“亚眠”级、2艘“轻护甲”级、1艘“仙后座”级和3艘“斯卡尔佩”级一等炮舰，主要执行护航、反潜、护渔等任务



1927年法国国会批准建造“大型殖民地炮舰”的头两艘，即“布干维尔”号和“迪蒙·迪维尔”号，随后在1929年批准开工建造4艘，1931年批准建造1艘。所有这些炮舰全都由法国本土的民营船厂建造，一部分船体和主机采用民船的标准。

到三十年代后期，由于日本和意大利已经开始显现出咄咄逼人的侵略势头，因此在法国海军的要求下，法国国会在1937年和1938年又批准增建3艘。所有这10艘炮舰都以首舰命名，称为“布干维尔”级，不过最终建成服役的只有8艘，最后两艘在1940年法国投降时仍没有竣工服役，后来被迫自沉或拆毁。

“布干维尔”级殖民地炮舰全长为103.7米，宽12.7米，吃水4.5米，标准排水量1970吨，满载排水量为2600吨。其外观为带飞剪艏的长艏楼舰型，上层建筑前方为两座背负式安装的主炮塔，其中2号主炮塔的下面有防浪遮板。

布干维尔”级的主炮是3门1927型138毫米40倍径主炮，这种火炮的原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赔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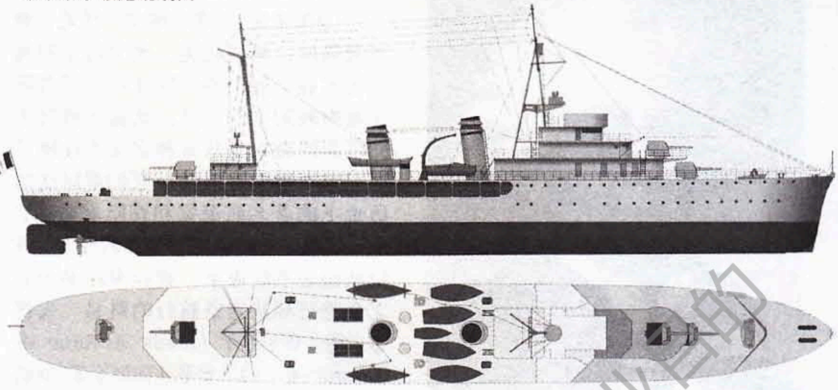
S－113号驱逐舰上搭载的150毫米新型舰炮。法国海军抄袭了这种炮的结构，但将其口径削减为一战前后法国驱逐舰主炮所通用的138.6毫米，其炮弹重40公斤。这种炮理论上每分钟可发射10到15发炮弹，但受限于供弹机的速度，实际射速为每分钟6到8发。

除了“布干维尔”级炮舰之外，1927型138毫米火炮还搭载于同时期建造的“冥王星”号布雷巡洋舰、以及6艘“鹰”级和6艘“沃奎林”级大型驱逐舰上。“布干维尔”级采用的是与这两级驱逐舰相同的半敞开式单装炮塔，其单重为13吨。这种炮塔的主要缺点是最大仰角略显不足，只有28度，此时的最大射程为16600米。

前部主炮的后面是包括通讯舰桥、航海舰桥和露天舰桥在内的上层建筑，舰长舱和海图室也设在其中。露天舰桥上安装了一具1.5米测距仪，其后方是前主桅，上面有一台1.1米探照灯和一座了望台。前主桅后面的主甲板用作小艇甲板，搭载有4艘捕鲸艇式摩托艇和3艘划桨式小艇，艇群的中央是两座烟囱。再往后为后桅和后甲板室，以及布置在主甲板上的后主炮。

在主甲板下方是住舱甲板，布置有下级军官及海军陆战队住舱，在住舱与船舷之间布置有客轮式的游廊。采用这种布局主要是为了适应非洲沿海、太平洋岛屿及印度支那地区的炎热气候，避免阳光直射住舱舱壁。与

布干维尔级炮舰线图



“布干维尔”级同时开工服役的法国海军训练巡洋舰“圣女贞德”号也采取了与之类似的游廊甲板设计，这是对居住性的重视高于战斗力的辅助性军舰的共同点。“布干维尔”级舰上定员为14名军官和121名水兵，同时考虑到在殖民地担任警备任务的需要，舰上还有能够搭载一个海军陆战连的住宿设施。

“布干维尔”级的防空武器为4门什耐德1933年型37毫米高炮，也采用单装方式，布置在主甲板上，最大仰角80度，最大射程5000米。舰上还装有三座13.2毫米哈奇开斯气冷式双联高射机枪，射程6500米，射速每秒700发。舰上有两具水雷投放导轨，可以搭载50枚水雷，此外还有一座深水炸弹发射器，以及两门供舰上陆战队员使用的桑尼克罗夫特迫击炮。

“布干维尔”级在设计时没有预定搭载固定的舰载机，但是具备搭载、投放和回收一架水上飞机的能力。这一级军舰在服役之后搭载过的水上飞机包括波泰兹452型和古尔杜－莱舍尔GL－832型。

作为殖民地炮舰，“布干维尔”级全舰都没有布置防护装甲，主炮塔也仅仅安装了一层厚度为3毫米的钢板，只具备防御子弹和小口径火炮弹片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布干维尔”级是法国海军第一型以柴油机作为主机的军舰。它安装两台苏尔寿柴油机，总功率3200马力，巡航速度为15.5节，但短时间内最大航速可以达到17节。舰上可以搭载60吨重油和220吨柴油，续航力高达1.3万海里。同时期的德国海军也根据一战时对柴油机的使用经验和未来的作战需要，在对续航力要求很高的“德意志”级袭击舰上搭载了柴油机主机。



里戈·德·热诺伊号炮舰，1940年法国投降后于当年7月3日在阿尔及利亚沿海被英国潜艇击沉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学习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1729–1811），法国著名航海家，1766–1769年成为首位环航地球的法国人，遗体安葬在先贤祠



皮埃尔·德·布拉柴（1852–1905），法国探险家，生于奥地利乌迪内的一个意大利伯爵家族，早年参加法国海军军校，1874年随甘必大等人对加蓬河进行考察，开始其非洲探险生涯。1883年成为法属刚果总督，1905年奉法国国民议会之令调查刚果新总督埃米尔·让蒂埃的不法行为，归途中死在达喀尔，历史学家怀疑是被让蒂埃毒死的。尸体埋葬于阿尔及尔，2006年运往布拉柴维尔，安葬于法国、加蓬和刚果出资1000万美元修建的纪念陵墓中

富于殖民色彩的舰名

总的来说，“布干维尔”级是一艘布置简洁、外观优美、火力适中的现代化军舰，舰上不少特征反应了其殖民地炮舰的专门用途。其富于殖民主义色彩的命名也从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这一级军舰的特殊性：它们都以法国历史上的著名航海家和探险家命名。

首舰“布干维尔”号得名自十八世纪法国著名航海家、曾经奉路易十五之命进行环球考察航行的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也是法国海军第10艘以布干维尔命名的舰船。它于1929年11月25日在法国西南名城波尔多的纪龙德河造船厂开工，1931年4月21日下水，1933年2月15日服役，在其服役生涯中主要部署于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地区。“迪蒙·迪维尔”号则以曾经对南太平洋、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极进行过航海考察的儒勒·迪蒙·迪维尔海军少将（Jules Dumont d' Urville）命名，1929年11月21日在波尔多西南造船厂开工，1931年3月21日下水，翌年6月4日服役，配置给印度支那分舰队。

“布干维尔”级三号舰“布拉柴维尔”号的名字得自皮埃尔·萨沃南·德·布拉柴子爵（Pierre Savorgnan de Brazza），他是一名出生在意大利、但归化法国国籍的贵族，也是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时代的法国殖民先驱，在法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下对赤道非洲地区进行了多次探险活动，刚果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柴维尔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是法国国会1929年批准建造的4艘“布干维尔”级殖民地炮舰的头一艘，也由波尔多西南造船厂建造，在1929年12月6日开工，1931年6月18日下水，1933年2月21日服役，随后部署在法属印度支那地区。



莱昂内尔·夏尼埃（1797–1869），法国海军上将，曾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安南战争

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1929年批准建造的另三艘殖民地炮舰在1930年底和1931年才开工，其中1933年5月服役的“当特尔卡斯托”号以十八世纪的航海家安托万·布吕尼·当特尔卡斯托少将（Antoine Bruni d' Entrecasteaux）命名，他在南太平洋航行中发现了后来在二战中经常被提及的当特尔卡斯托环礁和阿德米勒尔蒂群岛。

1934年3月14日服役的“里戈·德·热诺伊”号（Rigault de Genouilly）以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热诺伊海军中将命名，他在1858至1862年的交趾支那战争中指挥一支法国舰队，从越南的嗣德皇帝手中割取了南方的交趾支那地区。

1934年4月20日服役的“夏尼埃海军上将”号的命名者莱昂内尔·夏尼埃(Leonard Victor Charner)也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交趾支那战争，在1861年指挥舰队解除了西贡之围。之后夏尼埃奉热诺伊的委托，成为法属交趾支那的第一任军事总督，最终以海军上将的军衔退役。

1930年伦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对美、英、日三国的巡洋舰总吨位进行了限制，同时明确了“巡洋舰”的定义：排水量超过1880吨，主炮口径超过130毫米。法国虽然接受对巡洋舰的定义，但是反对将吨位比例的原则扩及到战列舰和航空母舰之外的其他军舰，宁愿把总的海军吨位分配给不同类别的军舰。

意大利通过1922年华盛顿条约已经在战列舰上取得了与法国队等的地位，而法国海军负有大西洋和地中海



布干维尔号俯视，适应热带气候的游廊甲板和白色遮阳篷颇为醒目

的两海防御责任，以及比意大利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因此坚决反对在巡洋舰和驱逐舰方面接受与意大利对等的地位，因为这将意味着默认意大利在地中海的霸权。

在法国和日本的强烈要求下，伦敦海军条约的第8条规定对各国海军排水量在600吨以下的军舰数量不作限制。此外，对于排水量在600吨到2000吨之间、主炮口径不超过155毫米、或76毫米以上口径火炮不超过4门、航速在20节以下且不能发射鱼雷的军舰，其数量也同样不受限，“布干维尔”级正好符合这样的条件。

“布干维尔”级的七号舰“迪贝维尔”号是在1931年批准建造的，它于当年7月7日在波尔多的纪龙德河船厂开工，1934年3月14日服役，先是配属在吉布提至马达加斯加的法属东非海域，后来调往达喀尔。该舰以十七世纪末法国海军舰长皮埃尔·勒莫耶·迪贝维尔（Pierre Le Moyne d'Iberville）命名，他出生在法属加拿大的魁北克，在1682年随拉萨尔爵士对密西西比河进行探险和考察，创建了路易斯安那殖民地。

1937年批准建造的“拉格兰迪耶”号是法国海军在和平时期获得的最后一艘“布干维尔”级炮舰。这艘炮舰最初名为“伊城”号（Ville d'Ys），由位于法国地中海小城布克港的普罗旺斯船厂建造，1939年6月22日下水。1940年6月20日“伊城”号竣工，数日之后法国投降，该舰随即被维希政府接收，改名为“拉格兰迪耶”号，并派往阿尔及利亚驻防。皮埃尔·拉·格兰迪耶中将（Pierre de la Grandiere）曾经对南美洲的巴拉圭河进行过探险考察，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1863年被任命为交趾支那总督。

1940年法国投降后在炮塔涂上中立国标志（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拉格兰迪耶号炮舰





1936年停泊在马达加斯加岛迭戈－苏亚雷斯湾的“迪贝维尔”号炮舰

1938年和1939年，法国国会分别批准建造了第9艘和第10艘“布干维尔”级炮舰，命名为“波坦－贝阿普雷”号和“拉彼鲁兹”号。它们也都是以法国海洋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的。波坦－贝阿普雷（Charles-Francois Beautemps-Beaupre）是法兰西学院成员和著名的水文学家，而让－弗朗索瓦·德·拉彼鲁兹舰长（Jean-Francois de La Perouse）是发现北海道岛与库页岛之间的宗谷海峡的第一位欧洲航海家。

“贝阿普雷”号炮舰由纪龙德河船厂建造，于1940年6月20日下水，6月23日移交给法国海军，次日便在波尔多外港凿沉了。由同一船厂建造的“拉彼鲁兹”号在法国投降时船体只完工了82%，德军占领波尔多之后，被勒令在船台上就地拆毁。

同室操戈

如前文所述，头8艘“布干维尔”级炮舰服役后，分别被派往西非、马达加斯加、北非和法属印度支那等地长期驻扎。在和平的三十年代里，这些殖民地炮舰就像当时法国海军及法国武装力量一样，在达喀尔的酷热烈日或西贡的明媚阳光照耀下，沉陷于一种昏昏欲睡的慵懒状态。8艘“布干维尔”级炮舰在这段时间里唯一值得一提的活动，就是首舰“布干维尔”号1939年初的远洋科学考察航行了。

1939年1月，“布干维尔”号从法属马达加斯加的迭戈－苏亚雷斯港出发，搭载了来自法兰西科学院、法国国家地理学会、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法国国家度量衡标准局、海军水文局、法国农业部渔业局的学者和专家，以及1架波泰兹452小型水上飞机，对位于印度洋极南地区的一些法属岛屿进行了科学考察，其足迹所至包括克罗泽岛、凯尔格伦岛、阿姆斯特丹岛和圣保罗岛等荒无人烟的偏僻岛屿，科学家考察岛上的动植物及矿产，海军人员则测绘其地形图和周围海图。在阿姆斯特丹岛，“布干维尔”号向耗尽燃煤、已在此滞留一个多月的捕虾船“波旁岛”号提供了一批给养。这次考察于1939年3月结束，“布干维尔”号一共航行了8240海里。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干维尔”号离开马达加斯加，改以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为基地。

1940年年6月24日法国投降时，“布干维尔”号炮舰正和“迪贝维尔”号停泊在西非的达喀尔港，“夏尼埃海军上将”号和“迪蒙·迪维尔”号停泊在越南金兰湾，“拉格兰迪耶”号和“热诺伊”号停泊在阿尔及利亚的米尔斯克比尔军港，“当特尔卡斯托”号停泊在法国南部的土伦港。这7艘炮舰都遵守海军部长达尔朗的命令，按照法德停战条约停泊在原地，随后被维希政权所接收。

“布拉柴”号于1940年2月从法属印度支那奉调返回本土，以拉罗舍尔港为基地。在当年5月底和6月初，它参加了敦刻尔克撤退活动，法国投降时正停泊在英国的朴茨茅斯军港。7月3日黎明，英国皇家海军士兵采取了出其不意的奇袭行动，登上“布拉

战网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用于商业目的

柴”号和停泊在英国港口内的其他法国军舰，控制了舰上的法国水兵，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艘炮舰随后被移交给戴高乐将军麾下的自由法国海军，升起了象征自由法国运动的洛林十字旗。

同一天，英国舰队逼近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米尔斯克比尔军港，要求港内的法国军舰或是随英国舰队继续作战，或是前往西印度群岛解除武装。在遭到拒绝后，英舰对法国舰队发起攻击，击沉了“布列塔尼”号战列舰，击伤“普罗旺斯”号和“敦刻尔克”号，以及四艘驱逐舰。停泊在港内的“里戈·德·热诺伊”号炮舰虽然没有在袭击中受伤，但是当它在第二天冲出港外、逃往附近的奥兰港时，被英国潜艇“潘多拉”号击沉了。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没的第一艘“布干维尔”级炮舰。

维希政权成立后，法属海外帝国的各殖民地总督起初都相继向这个政权及其领袖贝当元帅效忠，只有法属赤道非洲例外。虽然当地的法国总督布瓦松将军（Pierre Francois Boisson）服从于维希政府，但是乍得、刚果、乌班吉－沙里（今中非共和国）等殖民地的地方长官纷纷宣布追随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一群中级军官占领了政府大厦，迫使代理赤道非洲总督的路易·维松海军上将（Louis Husson）下台。

整个法属赤道非洲唯一没有归顺的殖民地是加蓬。在这里，当地的行政长官乔治·马松（George Pierre Masson）起初也致电归附戴高乐，但达喀尔的法属西非当局很快奉维希政权之命作出反应，派“布干维尔”号炮舰带领一艘潜艇和几艘炮舰来制裁



1939年停泊在达喀尔的“布干维尔”号炮舰

加蓬的行政长官。马松很快改变了立场，声称加蓬参加自由法国是出于误解，并且把那些忠于戴高乐的人解送到了达喀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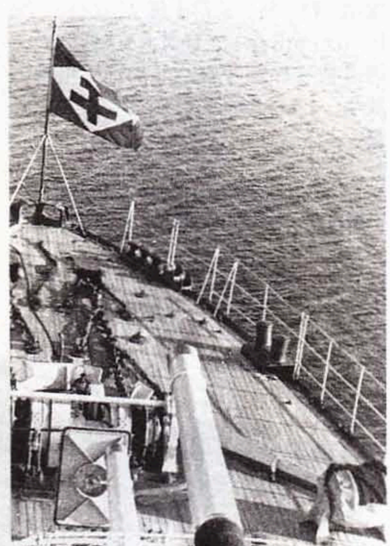
1940年9月，“布拉柴”号参加了戴高乐及英国舰队进攻达喀尔的行动。自由法国在这次行动中能够动用的力量小得可怜，除了“布拉柴”号之外，只有“杜博队长”号和“多明内队长”号这两艘殖民地炮舰，以及两艘武装拖船。自由法国那时没有自己的运兵船，只好租借了两艘荷兰商船和一艘波兰商船，装载一个营的外籍军团、一连征募兵、一连海军陆战队、一个坦克连和一个炮兵中队。四艘法国货船搭载着供这些部队使用的轻型坦克、火炮、装箱的“莱桑德”侦察机、“飓风”战斗机和“布伦海姆”轰炸机，以及各种车辆和一些食品。

这次达喀尔作战以自由法国的失败而告终。9月23日，停泊在港内的战列舰“黎塞留”号和达喀尔的炮台用火炮轰击了接近达喀尔的英国舰队，击伤“坎伯兰”号重巡洋舰和“巴勒姆”号战列舰，两天后“决心”号战列舰也被一艘法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伤。与此同时“黎塞留”号战列舰也中了一枚15英寸炮弹和两枚炸弹，两艘法国潜艇和一艘驱逐舰被击沉。

在达喀尔战斗中，“布拉柴”号的姐妹舰“当特尔卡斯托”号和“迪贝维尔”号炮舰停泊在港口内，但是没有参加战斗。“布拉柴”号随戴高乐的舰队一同撤往英属塞拉利昂的首府弗里敦，随后前往法属喀麦隆的杜阿拉港，在那里休整了一个多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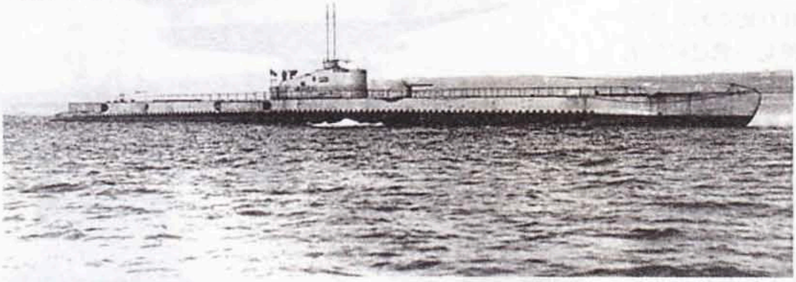
1940年10月，戴高乐决定拿下加蓬，将整个法属赤道非洲殖民地连成一片，随后以这里为基地，向轴心国控制下的利比亚发动直接进攻，以重振法国军队的名声。当时维希政权派驻加蓬的行政长官是马塞尔·德杜空军少将（Marcel Tetu），他的司令部设在利伯维尔，其麾下有四个陆军营、一个炮兵营、4架新式的格朗－马丁式轰炸机、“布干维尔”号炮舰和“彭塞勒”号潜艇（Poncelet）。





二战中追随戴高乐作战的自由法国海军“布拉柴”号炮舰，右图为舰艏的洛林十字旗

在1941年加蓬海战中被击沉的“彭塞勒”号潜艇（Q-141）属于法国海军“可畏”级潜艇的第一型，1927年在洛里昂海军船厂开工，1932年服役，水面排水量1572吨，水下排水量2082吨，安装两台3000马力柴油机和两台1200马力电动机，有9具550mm鱼雷发射管、1门100mm甲板炮和一座13.2mm双联机枪，乘员71人。“可畏”级共建造31艘，战前损失2艘，二战中损失24艘





乔治·蒂耶里·达让吕厄(1889-1964)出生于法国海军世家，17岁进入海军军校，1915年时加入宗教修士团，一战结束后退役从事教职，1939年作为海军预备役人员重新应征，1940年追随戴高乐，加入自由法国海军，1941年升为海军中将，二战结束后曾参加印度支那战争

当时自由法国的军队已经从刚果和喀麦隆出发，试图占领加蓬首府利伯维尔。但是这两支纵队都在加蓬境内遭到了维希法国军队的阻拦，双方的小纵队互相打了几次枪。从利伯维尔起飞的格朗－马丁轰炸机有时飞过来扔下几颗炸弹，并投下大量传单，第二天自由法国的布洛克200式飞机也从布拉柴维尔起飞，同样地给对方来一套。这样僵持了一个星期后，戴高乐决定放弃陆上进攻，从海上直接攻占利伯维尔。

1940年11月5日，搭载着自由法国军队的船只从喀麦隆的杜阿拉港出发了，登陆行动的总指挥官是勒克莱尔将军，柯尼希上校（Pierre Koenig）担任陆军指挥，“布拉柴”号舰长乔治·达让吕厄上校（Georges Thierry d' Argenlieu）担任海军指挥。达让吕厄的小舰队除了“布拉柴”号之外还包括650吨的殖民地炮舰“多明内队长”号，以及一艘运兵船，上面搭载着外籍军团的一个营、一个塞内加尔殖民地混合营和一个喀麦隆法国侨民营。

11月8日白天，效忠于维希政权的法国潜艇“彭塞勒”号离开利伯维尔以南70公里的让蒂尔港，在海上遇到了一艘英国炮舰“米尔福德”号，向它发射了一枚鱼雷，但是没有命中。“彭塞勒”号受到英国人深水炸弹的攻击，浮上海面，水手都被英国军舰接走，可是“彭塞勒”号的舰长德·绍桑少校却拒绝向英国人投降。他把潜艇凿沉，自己也随艇沉到海底去了。

11月8日晚上，自由法国部队开始在利伯维尔城外的拉蒙达海岬登陆，9日凌晨向利伯维尔机场逼近时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战斗。原定用于达喀尔战役的几架英制“莱桑德”侦察机在喀麦隆的杜阿拉匆忙组装好，飞到战场上扔了几颗炸弹。

与此同时，达让吕厄舰长指挥“布拉柴”号驶入了利伯维尔港，后面跟着“多明内队长”号。两舰向停泊在港内的“布干维尔”号炮舰发出友好信号，但后者仍开了火。达让吕厄下令“布拉柴”号还击，“布拉柴”号只发射了一发138毫米炮弹，便击中了“布干维尔”号毫无防御的舰体，打入其柴油机主舱，并燃起熊熊大火。“布干维尔”号的舰员纷纷弃舰逃命，军舰缓慢地沉没于利伯维尔港的浅水中。

这时外籍军团已经突破了利伯维尔机场上的抵抗，达让吕厄派人给加蓬行政长官德杜将军送去一封信，叫他停止抵抗。前加蓬行政长官乔治·马松此时也住在“布拉柴”号舰上，他自告奋勇登岸到利伯维尔去，呼吁德杜将军和警备部队不要与法国同胞自相残杀。德杜将军最后同意投降，柯尼希上校占领了利伯维尔城，法属加蓬归入自由法国运动旗下。但是马松在港内见到起火燃烧的“布干维尔”号残骸，对他在当年8月份宣布加蓬退出自由法国所造成的惨重后果感到非常痛心。他受不住精神上的刺激，在乘“布拉柴”号返回喀麦隆的途中，在自己的船舱里上吊自杀了。

顺便说一句，对于时乖命蹇的法国海军来说，加蓬海战并不是法国军舰之间的最后一次同室操戈。1941年7月，在夺取法属吉布提的行动中，维希法国潜艇“复仇者”号曾经试图用鱼雷攻击“布拉柴”号，但没有命中。

阁昌岛海战

1940年8月，法国远东舰队的“迪蒙·迪维尔”号炮舰在杜桑·德·奎维库尔海军上校指挥下离开西贡，前往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岛，以支持当地的法国总督佩利西埃（Marie Marc Pelicier）压制这座岛屿上日益增长的

停泊在新喀里多尼亚首府努美阿的“迪蒙·迪维尔”号炮舰



亲自由法国势力。邻近的澳大利亚政府针锋相对地派遣轻巡洋舰“阿德莱德”号进驻英法共管的新赫布里底群岛，对“迪蒙·迪维尔”号作出威慑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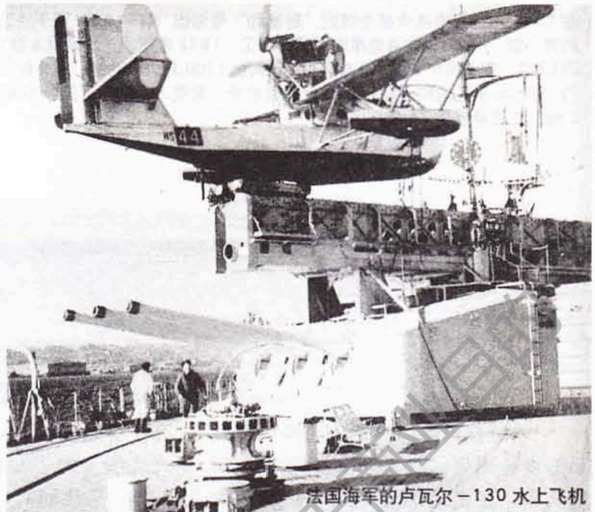
“阿德莱德”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根据1908年设计的“伯明翰”型巡洋舰图纸自行建造的，虽然在1938年到1939年进行过改装，但仍然是一艘过时的老式军舰。当时澳大利亚海军最新、最现代化的军舰都被抽调到地中海或大西洋，因此“阿德莱德”号是能够动用的最大军舰了。值得欣慰的是，这艘巡洋舰搭载有8门152毫米主炮，火力和防御能力都胜过“布干维尔”级炮舰。

在1940年9月初，法属波利尼西亚和法属新赫布里底群岛宣布加入自由法国运动，新喀里多尼亚岛的戴高乐派也跃跃欲试。一些激进分子制订了一个政变计划，绑架岛上的亲维希总督，奇袭并夺取“迪蒙·迪维尔”号。

奎维库尔海军上校得知这个计划的一些风声之后，要求维希政府派遣一艘战列舰前往新喀里多尼亚。在得知德国人不允许调动主力舰后，他又要求把留在西贡的“夏尼埃海军上将”号炮舰调往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府塔希提岛，以恢复那里的“秩序”。

9月19日清晨，“阿德莱德”号出现在新喀里多尼亚首府努美阿港外，当时“迪蒙·迪维尔”号正把守着海港的入口。奎维库尔上校向“阿德莱德”号派去一艘小艇，警告这艘澳大利亚军舰不得驶入港口，同时他本人前往总督府，要求从9月4日起代理总督职务的丹尼海军上校对走上街头迎接澳大利亚军舰的戴高乐派分子采取“强硬措施”。

“迪蒙·迪维尔”号上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都领到了枪支，控制了努美阿的主要街道。但是法属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总督亨利·索托乘坐“阿德莱德”号的一条摩托艇上岸，与丹尼总督进行了一番秘密会谈之后，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他争取过来了。当天上午11点，新喀里多尼亚总督府升起了戴高乐的洛林三色旗，三千多名群众走上街头，高喊“戴高乐万岁！法国万岁！”奎维库尔上校悻悻地把“迪蒙·迪维尔”号舰上的人员召回船上，与丹尼总督的副官夏多奈少校一道返回西贡。9月27日，“夏尼埃海军上将”号也被召了回去。


法国海军的卢瓦尔－130 水上飞机


1935 年日本海军军官访问西贡，与“迪蒙·迪维尔”号军官合影

1940年法国投降后，维希政权任命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让·德古海军中将（Jean Decoux）为法属印度支那总督。为了讨好日本人，德古关闭了滇越铁路，切断了中国的物资入口通道，但这些措施并没能令日本人满足。1940年9月22日，日军开进了法属印度支那，迅速占领了边境城市同登和谅山。维希方面不得不答应日本的要求，同意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驻军。

在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的同时，泰国政府通知维希政府，要求在湄公河国界上把主航道作为国界，并且归还1907年从泰国割占的马德望、诗梳风和暹粒三省。1940年10月15日，维希政府拒绝了泰国的领土要求，泰国方面在11月28日宣称法国飞机空袭了那空拍侬地区。两天后在泰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漫长边境上开始爆发交火事件，双方沿着边界互相射击。

停泊在西贡的“马恩河”号殖民地炮舰，它在1941年1月与“夏尼埃”号和“迪蒙迪维尔”号一道参加了阁昌岛海战



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德古于1940年12月9日在金兰湾组建了“临时分遣队”，指挥官为贝伦讷海军上校。12月底，维希政府海军部向德古发去密电，命他利用远东舰队的力量支持陆军作战行动，抵挡泰军的进攻。

1941年1月9日，泰国军队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进入柬埔寨，很快占领了诗梳风省。1月11日，泰国空军的6架马丁B－10轰炸机在4架霍克75N战斗机护送下轰炸了河内。1月13日，泰国军队又越过了老挝的边

界。到1月中旬，5个师的泰国陆军部队与法国殖民地部队之间的战争已经在1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展开。在暹罗湾上，泰国海军战舰四处游弋，寻找法国远东舰队的踪影。

当时远东舰队分为两部分：一支主要的舰队，包括负责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的防务，一支规模小得多的舰队，由5艘内河炮艇组成，负责守卫湄公河，并承担维护老挝和柬埔寨沿岸地区的治安。1941年1月13日，德古正式向贝伦讷下达命令，要求其舰队向西进发，为法军计划于1月16日展开的陆上反攻提供支援。贝伦讷的具体任务一是搜寻并摧毁从梭桃邑（泰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到柬埔寨边境沿海的所有泰国海军舰艇，二是利用舰炮轰击海岸附近的泰国军队驻地和阵地。

1月14日，贝伦讷率领旗舰“拉莫特·毕盖”号和两艘“布干维尔”级炮舰“夏尼埃海军上将”号和“迪蒙·迪维尔”号出发，于15日下午在越南最南端的柬埔寨角（现名金瓯角）西北20海里处与先行出发的两艘较老的炮舰“马恩河”号和“塔乌尔河”号会合，随后这支舰队以14节的航速驶入暹罗湾。

1月15日上午，法方派出的“卢瓦尔”130型水上飞机曾对泰国东南海岸进行了侦察，向西贡的法属印度支那海军司令部发回报告说，在泰国第三大岛——阁昌岛（Koh Chang）水域有1艘海防舰（根据情报判断为“阿育陀耶”号）和3艘鱼雷艇，在梭桃邑基地有1艘海防舰、2艘潜艇和4艘鱼雷艇。

16日深夜，法国舰队抵达阁昌岛西南方水域。17日凌晨5时45分，法舰借助海面雾气的掩护向泰国军舰的锚地扑去。贝伦讷的具体计划是在黎明前从西南方接近阁昌岛，利用其周围众多岛屿作为掩护，兵分三路，截断泰国军舰的逃路。阁昌岛北侧的海峡中大部分是水深不到5米的浅滩，因此泰国军舰最有可能向东边逃跑。于是贝伦讷将“拉莫特·毕盖”号部署在最东边进行拦截。中路由两艘“布干维尔”级炮舰封锁，西路是两艘炮舰，这两路军舰负责肃清停泊在阁昌岛南侧锚地中的泰国鱼雷艇。

17日清晨6时，从柬埔寨起飞的“卢瓦尔”130飞机（“拉莫特·毕盖”号舰载机因弹射器发生故障而未能起飞）对泰舰锚地进行了最后一次侦察，于6时05分向“拉莫特·毕盖”号发去报告，称在阁昌岛附近停泊着两艘大型海防舰。

贝伦讷闻讯大吃一惊，他不知道装备200毫米主炮的“吞武里”号海防舰于头一天夜里抵达阁昌岛，停泊在北侧的海峡中，准备替换其姐妹舰“阿育陀耶”号。执行侦察任务的法军飞机试图用其携带的小型炸弹攻击“吞武里”号，但是被舰上猛烈的防空火力赶跑。法国人现在不仅失去了突然袭击的条件，而且要面对比原计划多出一倍的对手。法军飞机随后将剩下的炸弹投向阁昌岛附近的一座水上飞机机库，但是无一命中。

由于阁昌岛附近的大多数岛屿峰峦林立，有的高达200米，因此锚地里的泰国军舰没有发现偷偷接近的法国舰队的踪影。但是停泊在阁昌岛南边的“阿育陀耶”号在5时50分左右便听到法国侦察机的声音，于是迅速投入战斗状态。

6时14分，“阿育陀耶”号向“拉莫特·毕盖”号开火，这一举动帮了法国人的大忙：他们原本不能将“阿育陀耶”号的舰影与黑暗的山峦背景区分开来，如今在发现其炮口火光位置后迅速进行定位，于1分钟后开火反击，并于6时20分发射了3条鱼雷，其中1条击中了“阿育陀耶”号，法舰的155毫米炮弹也击中了其上层建筑。“阿育陀耶”号舰尾很快冒出火焰，向近岸处驶去，搁浅在水深不到5米的海边沙滩上。由于海岸峰峦掩护了该舰的踪影，法舰未对其进行补充打击。





上图为“布干维尔”级炮舰搭载的138毫米主炮，下图为舰上的13.2毫米高射机枪

6时15分，“迪蒙·迪维尔”号和“夏尼埃海军上将”号相继向阁昌岛南侧的泰国军舰群开火。停泊在这里的是三艘泰国鱼雷艇“春武里”号、“颂克里”号和“达叻”号。6时20份，“马恩河”号和“塔乌尔河”号也向泰舰开火。

受到攻击的泰国鱼雷艇建造于20世纪初，使用烧木柴的蒸汽机作为动力，至少要花1小时时间升火启动，而且为了节约燃料，泰国海军部又命令这些军舰在锚泊时必须熄火。在法国军舰发动突然袭击时，水兵们正在洗晨澡，而军舰也不能进行机动规避或发射鱼雷，只能停泊在原地。一些光着身子的水兵跑上甲板，用舰上的小口径火炮向法舰盲目射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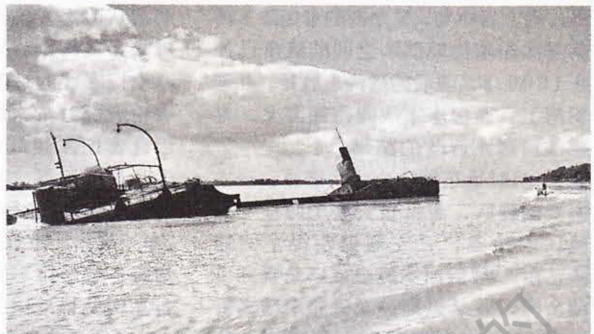
借助泰舰炮口火焰和黎明的微光，法国军舰像打靶一样向这三艘泰国鱼雷艇瞄准射击。6时30分，“马恩河”号和“塔乌尔河”号前进到距泰国鱼

停泊在西贡的“夏尼埃海军上将”号，舰身也涂上了中立国标志——维希法国国旗



雷艇只有2600米的距离。在冬日黎明前的薄霭和晨光中，3艘受伤的鱼雷艇像火把一样熊熊燃烧，其中“春武里”号和“颂克里”号分别于6时53分和6时55分沉没，“达叻”号重创后漂到岸边，不久也沉入海底。

在阁昌岛北侧停泊着“吞武里”号海防舰、“依萨莱”号布雷舰和1艘测量船。“吞武里”号也于6时05分被法国侦察机所惊扰，迅速升火起锚，向东南方向驶去。其舰长下令向附近的尖竹汶空军基地发去电报，但“吞武里”号的无线电发生故障，联络未能成功。6时20分，从峰峦相隔的阁昌岛南岸传来了一阵阵炮声，“吞武里”号了望员在主桅上报告说发现一艘法国巡洋舰，并报告说看到了泰国鱼雷艇舰炮发射的火光。“吞武里”号向泰国海军司令部发去电报：“‘拉莫特·毕盖’号攻击阁昌岛南锚地的我军战舰”，同时向随行的“依萨莱”号打出灯语：“勿跟随我舰”（“依萨莱”号上装有水雷）。


1942年盟国占领马达加斯加岛时，在迭戈－苏亚雷斯湾被炸沉的“布干维尔”号辅助巡洋舰

6时34分，“拉莫特·毕盖”号发现正在驶出阁昌岛海峡的“吞武里”号舰影，随即进行测向定位，于6时45分在13000米距离上向其进行跨射射击。0648时，“拉莫特·毕盖”号的第四次齐射击中“吞武里”号的干舷、上层建筑和舰桥，“吞武里”号舰长銮普隆维拉潘当场阵亡（后被追封为上校）。这次炮击还摧毁了“吞武里”号的前主炮观瞄仪、操舵装置和无线电通讯设备，直到半个多小时后，担任代理舰长的航海长才恢复对该舰的控制，改用人工操舵。

6时55分，“拉莫特·毕盖”号调头南返，以回避“吞武里”号后主炮的还击。7时12分，两艘“布干维尔”级炮舰和两艘“马恩河”级炮舰也加入对“吞武里”号的炮击，“吞武里”号将其火力对准“夏尼埃海军上将” 号，但无一弹命中。7时22分，“拉莫特·毕盖”号再次转舵向北，对“吞武里”号展开最后的打击。

在法舰准确而威力强大的齐射下，“吞武里”的后主炮也被打哑，但它已经驶入阁昌岛海峡内较安全的浅水区，重达9000多吨的“拉莫特·毕盖”号无法继续追击。7时35分，贝伦讷下令吃水较浅的“迪蒙·迪维尔”号和“夏尼埃海军上将”号继续追击“吞武里”号，但两舰航速较慢，不久便放弃了追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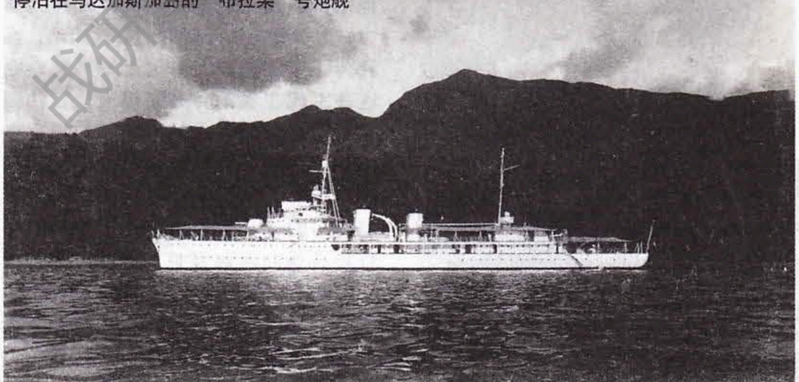
7时50分，“拉莫特·毕盖”号向“吞武里”号进行最后一次鱼雷齐射，发射了3条鱼雷，但是没有命中。贝伦讷下令停止追击。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法国舰队在阁昌岛南边海面上来回巡弋，救捞泰国军舰上的幸存者。8时40分，贝伦讷下令返航，泰国空军的九七式轰炸机也于此时赶到，对“拉莫特·毕盖”号进行了不成功的轰炸，虽然有几枚炸弹险些命中，但“拉莫特·毕盖”的防空火力阻止了泰国轰炸机的企图。9时40分，泰国空军停止追击，贝伦讷率领其舰队平安返回西贡。

1941年时的“当特尔卡斯托”号



停泊在马达加斯加岛的“布拉柴”号炮舰



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法国远东舰队以近乎于零的代价摧毁了泰国海军的主力，这对维希法国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说，法国海军的这次胜利毫无用处：阁昌岛海战6天之后，日本强迫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接受其“调停”，德古中将被迫在东京签订协议，将马德望、诗梳风和暹粒三省割让给泰国。

坎坷命运

泰法冲突令盟国对日本产生了警觉。1941年底日本对美英开战后，盟国担心维希法国将战略位置重要的马达加斯加岛割让给日本、或允许日本在岛上建设海空军基地，因此决定对这座岛屿展开先发制人的占领。1942年5月5日，一支由2艘航母、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8艘护卫舰、4艘扫雷舰、5艘武装运输船和3艘运兵船、以及6艘货船组成的庞大舰队驶入马达加斯加岛最北端的

迭戈－苏亚雷斯湾。维希法国派驻在那里的海军力量包括两艘辅助巡洋舰、两艘炮舰和5艘潜艇。

在登陆行动开始之前，"光辉"号和"不屈"号航母起飞的舰载机迭戈－苏亚雷斯湾中的法国军舰进行了空袭，炸沉了"布干维尔"号辅助巡洋舰（以1940年加蓬海战中被击沉的"布干维尔"号炮舰命名）、曾经在达喀尔战斗中击伤"决心"号战列舰的"贝韦泽"号潜艇，以及"当特尔卡斯托"号炮舰也被英军飞机炸沉。1943年，"当特尔卡斯托"号和"贝韦泽"号潜艇被打捞出水，修复后加入了自由法国海军。在1944年里，"当特尔卡斯托"号被派驻在红海和地中海海域，执行反潜巡逻和护航任务。

"迪蒙·迪维尔"号在1941年底从西贡调回法国，在土伦海军基地进行检修后被派往法属摩洛哥驻扎。派驻在马达加斯加的"迪贝维尔"号也在盟军登陆之后于1942年9月奉命返回维希法国，停泊在土伦军港。1942年11月盟军对北非发动了"火炬"登陆战役，当时"拉格兰迪耶"号炮舰停泊在卡萨布兰卡，"迪蒙·迪维尔"号在达喀尔，两舰都向盟军投降了。11月27日，德军占领法国南部，停泊在土伦军港的"迪贝维尔"号炮舰与港内其他军舰一道自行凿沉。

1945年3月，日本决定用武力夺取当时名义上还属于法国的印度支那地区。3月9日晚上，日本军队袭击了河内的总督府，拘禁了德古总督，同时在海防、西贡、凉山、河仙等许多地方袭击当地的法国驻军和官员。到3月10日，日军已经占领了整个法属印度支那，许多法国军人被关入战俘营，有些被残酷地砍头杀害了。只有越南北部的一部分法军设法抵挡住了日军的进攻，设法撤到了中国境内。

在日军发动进攻时，"夏尼埃海军上将"号正停泊在西贡的美萩港，当时与它停泊在一起的还有"美萩"号内河炮舰和"阿弗朗什"号炮舰。日军在3月9日晚上夺取控制了"美萩"号炮舰，但"夏尼埃海军上将"号随即向这艘军舰开火，将其击沉。"夏尼埃海军上将"号随后又击沉了"阿弗朗什"号，以避免被日军俘获。

3月10日，日本海军的飞机对"夏尼埃海军上将"号进行轰炸，扔下了几颗炸弹，但没有命中。舰上的水兵用延时雷管引爆了弹药库，在美萩码头自行凿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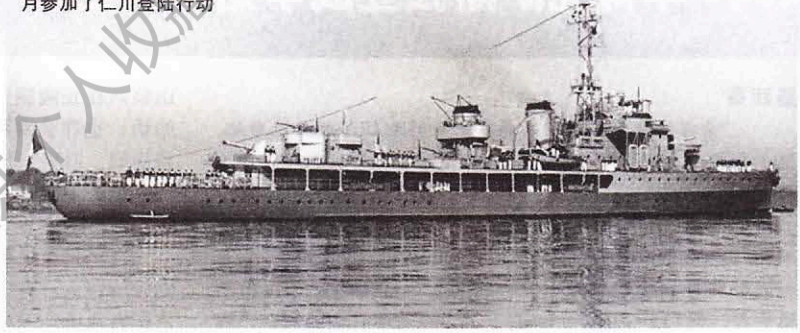
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8艘"布干维尔"级炮舰只剩下了4艘，包括"布拉柴"号、"拉格兰迪耶"号、"迪蒙·迪维尔"号和"当特尔卡斯托"号。最后这艘军舰由于曾经被炸沉，因此舰况不如其他三舰，在1948年便提前退役了。在五十年代，"布拉柴"号参加了法属印度支那战争，在海防和西贡等地执行港口警戒任务，1957年退役解体，翌年"迪蒙·迪维尔"号也退役了。"拉格兰迪耶"号在1950年9月随美国海军一道参加了仁川登陆行动，于1959年11月退役解体。

八艘"布干维尔"级炮舰的生涯其实是二十世纪前半期法国政治史的缩影：有"布拉柴"的追随义旗，也有其他七艘军舰的束手投降；有加蓬海战的同室操戈，也有阁昌岛海战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光怪陆离，错综复杂，犹如莫里哀的悲喜剧。这悲喜剧既是"布干维尔"级的，是法国海军的，也是法兰西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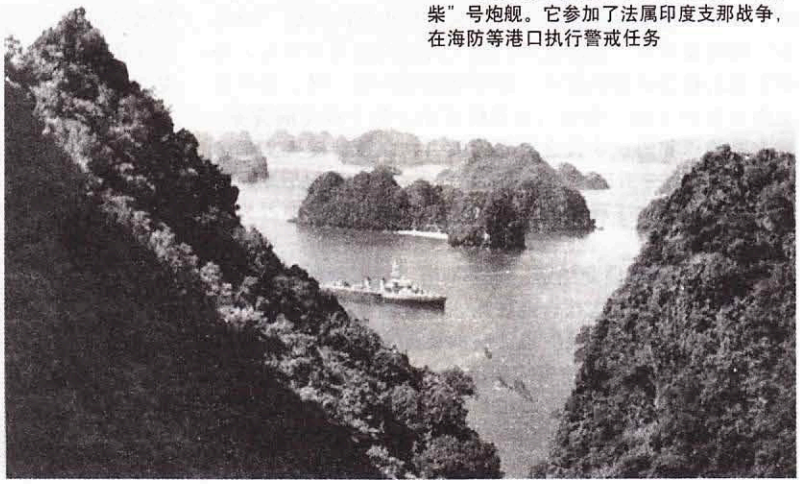


2003年法国发行的"布干维尔"号纪念邮票。这枚邮票是为了纪念该舰在1939年参加的海洋科学考察航行

朝鲜战争时停泊在釜山港的"拉格兰迪耶"号炮舰。该舰在1950年9月参加了仁川登陆行动



1951年停泊在越南北部下龙湾地区的"布拉柴"号炮舰。它参加了法属印度支那战争，在海防等港口执行警戒任务





○ 朱幼安

“牢记阿拉莫！”

1836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始末（上）

墨西哥

“桑塔安纳是墨西哥人所有缺点的象征，也正因为此，他才总能受到那么多墨西哥人的欢迎。”——胡斯托·西埃拉

西半球的大陆原是动物和红皮肤人的伊甸园。直到有一天，红日升起的海面上长翅膀的木头城堡带来了白脸的陌生人，他们手执喷吐火焰的棍子，骑着不长角的大鹿，毁灭了红皮肤人的帝国。红皮肤人一觉醒来，发现他们脚下的土地连同他们自己已经归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叫做“西班牙”的国家所有。起初这些白脸人占领的地方并不大，局限于他们称之为新西班牙，即后来的墨西哥一隅，至于更北面无垠的土地，起初只是探险家们才敢于涉足的荒原。受丰饶物产和传说中黄金宝藏的吸引，以及传播天主福音的使命，小部分西班牙人逐渐向北扩张，18世纪后期，他们向北一直到达了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将大片土地占为己有。

墨西哥高原向北绵延，地势渐缓，崎岖峻峭的山岭降为低矮的台地。从这些台地往东，一直到墨西哥湾碧波轻抚的海滩，南及“大河”里约格朗德滚滚东逝的河水，北达红河和萨宾河奔腾拍击的湍流，是一片广袤的处女地，墨西哥狭窄的海岸低地在这里扩展成了辽阔的平原，丰美的起伏的高草、繁茂的河谷以及葱绿的小片树林覆盖其上。成群的野牛是此地的主人；郊狼在灌木丛中追捕兔子；山猫趴在丘陵顶上晒太阳。如果肯走上数十乃至上百千米的话，也许会看到从科曼奇印第安人的皮帐篷里升起的袅袅炊烟。迟至17世纪末，西班牙人的身影才开始在这里出现，他们将此地称作“得克萨斯”，源自当地印第安语中“友好”一词。

19世纪以前，这片土地的名称嘲弄着所有试图在这里定居的白人。在“友好之地”上游荡的科曼奇和阿帕奇人是所有北美印第安人中最桀骜野蛮的部落，他们学会了驯养野化的马匹，使用钢铁和火药武器，会抓住一切机会攻掠孤立的白人车队和定居点，是极为讨厌的马贼和杀人不眨眼的强盗。西班牙人在北部边疆拓殖不力，很大程度上是拜这些凶悍的原住民所赐。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也渐渐地出现了一些较大

得克萨斯的科曼奇印第安人村庄，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绘于1834年。在白人到来前的多少个世纪中，得克萨斯和整个美洲大陆一样是红皮肤印第安人独占的家园



的殖民聚落，其中有小港镇（La Bahia），即后来的戈里亚德（Goliad），还有圣安东尼奥·德·贝哈尔（San Antonio de Bexar），即今日的圣安东尼奥。这座城市最初是围绕一个耶稣会传教站建立起来的，后来传教站搬离居民点，迁至圣安东尼奥河东岸，里面一度居住着近300名信徒，并曾于18世纪中动工修建一座正式的教堂。但此后这个传教站就走了下坡路，教堂的建筑时断时续，最终也没有完成，直到1793年教会决定将整个传教站改作俗用。

1802年，一支名叫“阿拉莫·德·帕拉斯”（Compania Volante del Alamo de Parras，西班牙语意为“白杨和葡萄飞骑连”）的西班牙部队进驻此地，修筑加固了围墙、军营等设施，将其改建成一个用以防御科曼奇人袭击的小堡场，这就是以这支部队命名（一说以附近的白杨林命名），后来永载史册的阿拉莫。

伸向大西洋的伊比利亚半岛是欧洲人扩张野心的起点，但决不是唯一的出发点。1620年，一艘不起眼的船只从岛国英格兰载着一群落魄的清教徒抵达美洲，这艘船叫做“五月花”号，这是美利坚坠地的第一声啼哭。这个国家从诞生伊始就浑身散发着贪婪的扩张气息，一颗又一颗星星出现在它的国旗上，就连得克萨斯的旷野中也驶来了美国移民的篷车，“那种在不到一个世纪中殖民遍及阿利根尼山脉到太平洋之间三千英里地方的贪婪欲望，早晚势必被吸引到这个诱人的真空地带来”，新老两股殖民势力开始了试探和碰撞。

起初西班牙当局的态度是准许甚至鼓励这些人合法移民，同时要求他们承担与墨西哥居民同样的义务。从短期利益来看，西班牙当局这么做无可厚非：由于恶劣的气候，印第安人的侵扰，基础设施的缺乏，除开军人和传教士外少有西班牙人愿意长期在得克萨斯居留，当局以为能够同化这些美国人，使空置的荒地得到开垦，对抗讨厌的印第安袭击者，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引狼入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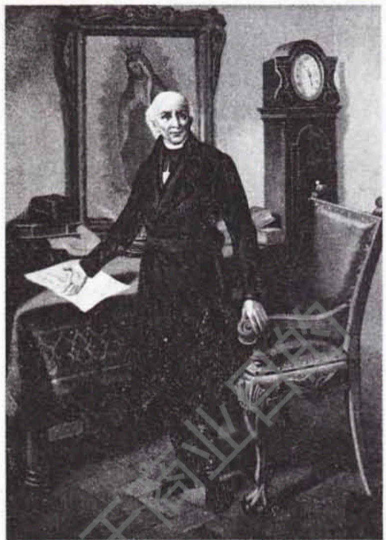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欧洲大陆上的西班牙因固步自封、极奢尽欲和穷兵黩武而从黄金时代的象牙塔上迅速跌落，到十八世纪末，西班牙已经变成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拿破仑时代的“西班牙溃疡”流尽了法国的血，但同时也将西班牙自身变为一片疮痂焦壤。本土尚且自顾不暇，重洋之外的殖民地社会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

当时的墨西哥社会主要按人种出身分成四个阶级：伽丘平人（Gachupines），意为“佩马刺的人”，也称为“半岛人”（Peninsulares）或“哥特人”（Godos），是指在西班牙本土出生、然后来到墨西哥的白人；克利奥尔人（Criollo），指的是出生在墨西哥的纯种白人；墨斯提佐人（Mestizo），即混血儿；最底层的是印第安人（Indio）。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伽丘平人掌握着墨西哥的军政经大权，骑在其他三个阶级头上作威作福。

法国大革命和自由启蒙的惊雷唤醒了被压迫的人，1810年多洛瑞斯城（Dolores）年近六十的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神父首先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墨西哥独立战争爆发。但是这场战争缺少同时代的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在热带雨林和雪山云巅那些史诗般的进军和会战，而更像是一场社会革命和阶级仇杀：一些克利奥尔人带着墨斯提左人和目不识丁的印第安人，与伽丘平人和富裕的克利奥尔人分成两大对立集团，互相残酷地杀戮。政府军规定对捕获的武装人员应在一刻钟内枪决；而革命者在攻破城池后也常将男女老幼不分皂白地杀死。1811年6月30日伊达尔戈被杀后，他白发苍苍的头颅在瓜纳瓦多城大谷仓的墙上挂了整整十年之久。

战争爆发同年，一名出身哈拉巴（Jalapa）地方克利奥尔中产家庭的年仅16岁的军校生进入西班牙将军华金·德·阿雷东多（Joaquin de Arredondo）麾下的政府军服役，此人有着典型西班牙式的冗长全名：安东尼奥·勒佩兹·德·桑塔·安纳·佩雷斯·德·莱夫龙（Antonio Lopez de Santa Anna Perez de Lebron），一般略称桑塔安纳，他的人生注定要与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墨西哥历史浮沉相连。

当时革命者在北方招募了一批美国佣兵，并攻占了得克萨斯的数个重要据点，阿雷东多率军进击，于1813年8月18日在麦地那河畔击溃了这支部队，700名叛军被当场击毙，桑塔安纳因英勇作战而受到嘉奖。为了表示震慑，阿雷东多处决了所有的俘虏和另外300名被怀疑有革命倾向的当地



伊达尔戈神父。他的“多洛雷斯呼声”至今仍是受压迫人们反抗斗争的经典象征，但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他理想有余，实干不足，最后兵败身死。19世纪墨西哥的革命与解放道路要比所有人想象的都曲折蜿蜒许多



桑塔安纳像。这个轻浮多变的人能在数十年间纵横墨西哥政坛，在相当程度上是靠其光鲜花哨的言辞和风度翩翩的克利奥尔式魅力

居民，这血腥的一幕很可能在年轻的桑塔安纳脑海中打下了两个深刻烙印，一是对叛乱者的铁腕镇压，二是对美国人的厌恶痛恨，这也可能是他在1836年战争中残酷手段之起始滥觞。

伊达尔戈死后接任革命军指挥的是一个墨斯提左神父莫瑞罗斯（Jose Maria Morelos y Pavon），但他的军队亦于1813年底在帖萨马拉卡（Tezmalaca）之役中被政府军骑兵的冲锋所击溃，他本人于次年夏被枪决。墨西哥独立的渺茫希望讽刺地落到在帖萨马拉卡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


美男子，投机者，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前西班牙将军，革命大潮的弄潮儿，墨西哥的袁世凯奥古斯丁·伊图维德（1783–1824），"墨西哥皇帝奥古斯丁一世"。他的称帝闹剧固然短暂，但却为四十年后法国入侵和马克西米连一世的"墨西哥帝国"的建立埋下了一颗种子

的政府军将领奥古斯丁·德·伊图维德（Augustin de Iturbide）手中。

伊图维德这个政治野心家和大投机者因贪污勒索而在西班牙皇军中混不下去，于是自己拉起一支队伍投靠了革命，提出三项保证，即墨西哥独立但仍属西班牙君主；确保天主教地位不动摇；伽丘平人和克利奥尔人平等。这一纲领团结和顺应了各方面力量的要求，从而立即得到广泛的支持，原来支持西班牙政府的墙头草们纷纷倒向革命派，这其中就包括刚被晋升为西班牙军队中校的桑塔安纳，这是他第一次见风使舵，改换门庭，但决不会是最后一次。1821 年墨西哥正式宣布独立。

但墨西哥的独立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却在同时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发生了更多新的矛盾冲突。在民族问题上，伽丘平人固然被赶走了，克利奥尔人和墨斯提左人却分裂了，后者成了新的反对派；在经济方面，封建的大庄园主和教士继续保持他们的特权，而之前革命的军队现在成了新的特权阶级，这三大既得利益集团认为集权统一的中央政府对他们有利，但知识分子和律师却想建立美国式的议会和联邦政治体制。阶级和阶层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保守主义的集权派和自由主义的联邦派两大政治集团的出现，接下来整个 19 世纪上半叶的墨西哥政治实际上是这两派斗争的大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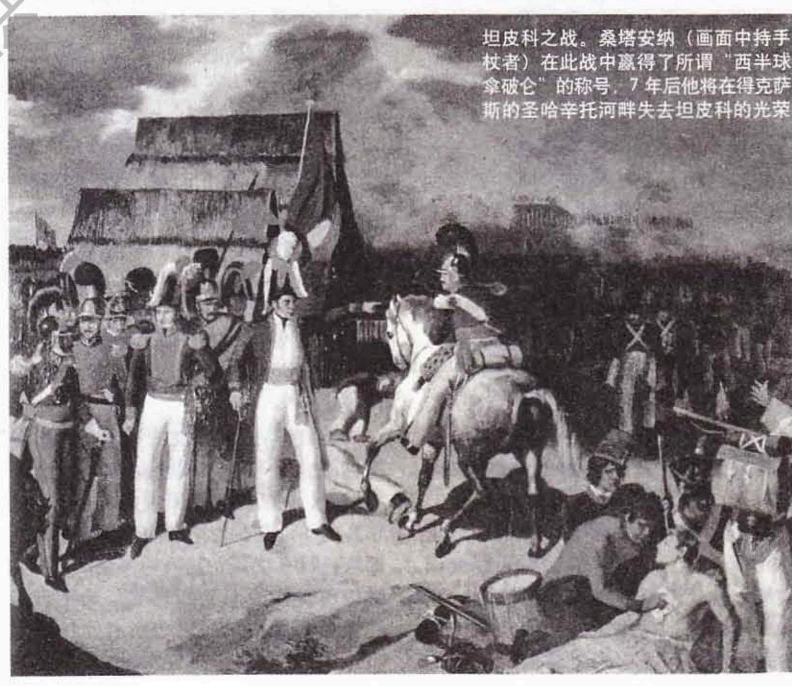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伊图尔维德利令智昏地称了帝，1822 年 7 月穿着镶假宝石——因为预算不够——的大礼袍加冕为奥古斯汀一世，反对势力顿时四起。据说桑塔安纳曾向伊图尔维德六十岁的姐姐求婚，未果后由于军事失败而失宠，于是加入到反对派那里。十个月后伊图尔维德已成独夫寡人并被驱逐出境，后潜回墨西哥图谋再起时被地方当局枪毙——在 19 世纪的墨西哥政治斗争中每每有着你死我活的残酷，这种残酷在四十年后要由另一位墨西哥皇帝，来自古老哈布斯堡皇室的马克西米连的鲜血来再次证明。

集权派势力由于伊图尔维德的冒进闹剧而有所削弱，联邦派掌握了政权，出台了著名的1824 年宪法。这部宪法除未采纳宗教自由和陪审制外几乎照搬美国 1787 年宪法，自然特别受到得克萨斯美国移民的欢迎和拥护。集权派的反扑引发了内战，桑塔安纳在反复权衡后加入了联邦派阵营，并当选为韦拉克鲁兹州（Vera Cruz）州长。1829 年一支西班牙军队试图乘墨西哥内战之机卷土重来，但陆海军协同上的不当导致西班牙陆军被扔在港城坦皮科（Tampico）困守，军中爆发了黄热病大流行，在桑塔安纳率领的墨西哥军队的步步紧逼下，不得不于当年 9 月 11 日宣告无条件投降。坦皮科是桑塔安纳的大捷，一场政治上的大捷。他的宣传机构从此把他称作坦皮科的英雄，拯救共和国的圣人，"西半球的拿破仑"，他在人们心中的声望也到达了顶峰。1833 年，桑塔安纳当选为墨西哥共和国联邦派政府的总统。

所谓乱世出英雄，人们在动荡和危难之中最容易寄希望于一个有能力翻云覆雨的强者。正因为如此，桑塔安纳的发迹和统治模式在 19 和 20 世纪风云变幻的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为许多人一再重复，这些军阀独裁者被赋予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考迪略"（Caudillo，西班牙语"首领"之意）。考迪略主义成为了这片肥沃美丽而又命运多舛大陆上的独特政治现象，其影响在当代的加尔铁里和皮诺切特等拉美军政府独裁者身上仍可见一斑。

和许多考迪略一样，桑塔安纳之所以在乱世如鱼得水，青云扶摇，不仅是靠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见风使舵的本事，同时也是靠着他的个人魅力，一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典型克利奥尔式魅力。与他谈话的人看到的是一位"中等个儿，有着黑发、黑眼珠和一张苍白忧郁的脸的男人，礼貌极为周到，散发一种高贵而从容不迫的气质，像一位哲学家，一位理想破灭了的爱国者。"即使是他的敌人，也常常为这种魅力所折服。

但另一方面，桑塔安纳又具有典型克利奥尔式的缺点：为人浮夸，自


坦皮科之战。桑塔安纳（画面中持手杖者）在此战中赢得了所谓"西半球拿破仑"的称号，7 年后他将在得克萨斯的圣哈辛托河畔失去坦皮科的光荣

负，好大喜功，眼高手低，往往不具备把他那些美丽的许诺和不切实际的理想变为现实所需的全部能力，这些缺陷在他几起几落的政治生涯中都一一应验。此外，他沉迷于斗鸡、鸦片与女色的嗜好，对钱财的贪婪，对原则的漠视，毫不羞耻地将国库当成自己的私产以及肆无忌惮地枪杀反对他的人士，都将成为当时和后世人们激烈抨击的对象。

1834年4月，桑塔安纳感到攫取最高权力的时机到来了，于是再次暴露出其没有任何政治道德可言的面目，与集权派作了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先前退居幕后的桑塔安纳突然走上前台，发动政变推翻了联邦派政府，流放了该派的主要领导人，恢复一度废止了的教士和军官的特权；集权派则欢呼其为墨西哥的救星，支持他解散国会并废除1824年宪法，成为实际上的大独裁者。

得克萨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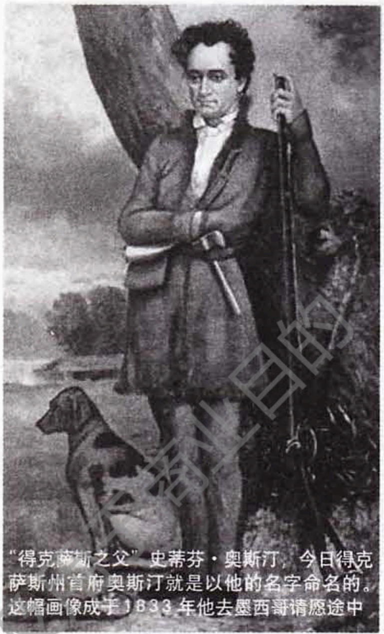
“得克萨斯是男人和狗的天堂，女人与马的炼狱”——得克萨斯俗语

在墨西哥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同时，在北面的得克萨斯，美国移民的人数正飞速增长。1820年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叫摩西·奥斯汀（Moses Austin）的人说服西班牙当局授予他一份移民代理合同，即他从当局取得土地，负责吸引移民来此定居并从中得利。摩西去世后，他的儿子，今天被称为“得克萨斯之父”、并用其名字命名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市的史蒂芬·奥斯汀。从独立了的墨西哥政府那里继承了这项工作。

经由他和其他移民代理人的努力，得克萨斯的移民数量在十年中增长了十倍，其中大部分是源源涌入的美国移民，一群好斗、粗野，对墨西哥的拉丁文化毫无认同感且习惯了边疆地区无法无天生活的人们，很快他们就变得尾大不掉，与当局摩擦连连。移民们对腐化拖沓的墨西哥官僚和反复无常的政府法令深恶痛绝；当局则对移民们摇摆不定的忠诚和得克萨斯被美国人和平演变的前景忧心忡忡。根据1830年得克萨斯人口调查结果，当地有美国白人15400名，美国黑奴2000名，“归化印第安人”4500名，“野蛮印第安人”10500名，而墨西哥裔得克萨斯人（Tejanos）只有3600人。

重新研究了得克萨斯的人口形势后，墨西哥政府开始后悔当初放任移民涌入，于是在1829年出台“4月6日法令”禁止新的美国移民入境，不少移民代理人因此破产。1830年当局最终下令关闭得克萨斯边界，贸易需在边界上进行并缴纳关税，同年废奴法令颁布，全墨西哥除得克萨斯外基本没有黑奴，因此这摆明了是要限制靠蓄奴种植园为业谋生的美国移民。但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得克萨斯，这些法令的实施非常困难，而用强硬的手段推行法令又更进一步加剧了移民的不满情绪，至1832年这些移民已几近公开叛乱边缘。他们集会要求废止“4月6日法令”并成立与南部的科辉拉州分开的得克萨斯州，1833年初奥斯汀受托携此议程前去墨西哥城请愿未果，一气之下写信建议移民自行组织议会和政府，结果被当局以叛国罪名监禁近两年始得释放。

也是在1832年，一位名叫山姆·休斯顿（Samuel Houston），身高6英尺2英寸（约1.88米）的美国大汉渡过红河进入得克萨斯。这位桑塔安纳未来的克星比其对手大了一岁，出籍弗吉尼亚的苏格兰移民家庭，早年失怙，全家迁居到田纳西州。动荡的边疆生活养成了他骄横自负、渴求名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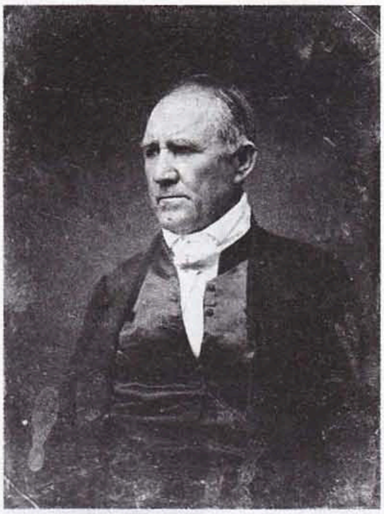
“得克萨斯之父”史蒂芬·奥斯汀，今日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幅画像成于1833年他去墨西哥请愿途中

的性格，家里曾希望他当一名循规蹈矩的店员，却招致他负气出走，跑到切罗基印第安人那里居住，和他们结下了友谊。

在1812年美英战争中，21岁的休斯顿作为一名美国正规军少尉在“老胡桃”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后来的合众国总统麾下参加了对克里克印第安人的战斗。在1814年马掌峡（horseshoe bend）之战中，他带领部



1824年时的墨西哥合众国（Estados Unidos Mexicanos），右上角浅色区域是科辉拉和得克萨斯州。三块深色区域是新墨西哥、上加利福尼亚和下加利福尼亚三个准州。



前田纳西州长，得克萨斯将军，孤星共和国首任正式总统和后来的美国参议员山姆·休斯顿(1793–1863)。休斯顿是一个具有领导魅力和能力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好吹牛的酒徒，关于他在1836 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的

队向克里克印第安人的工事发起冲锋，腿部中箭后仍不离火线，结果在拄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跨过胸墙时又吃了颗子弹。这伤口几乎要了他的命，但也为他赢得了杰克逊将军的青睐，前途一片坦荡。

美英战争结束后，休斯顿在军队里呆了一阵，后辞去军职转而学习法律，并于当年获得律师资格，这在当时的美国是进入政界和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休斯顿去了田纳西州，并在杰克逊羽翼的庇护下平步青云，1823 和 1825 年休斯顿连续两届成为国会议员。1827 年，年方34 岁的休斯顿入主田纳西州州长官邸，1829 年大选中再次连任，许多人都认为他会继杰克逊而入主白宫。

可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正当事业一帆风顺的时候，休斯顿的新婚妻子突然出走离开了他，心高气傲的休斯顿终生没有透露她出走的原因，以致于人们到现在也未搞清楚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人们只知道他很快辞去了州长职务，离开了田纳西并再次跑到他的切罗基朋友那里躲了起来。他彻底消沉下去，终日靠一瓶又一瓶的威士忌排忧解愁，他的印第安邻居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大酒鬼”的诨名。杰克逊也无可奈何，只得于1832 年将他打发去得克萨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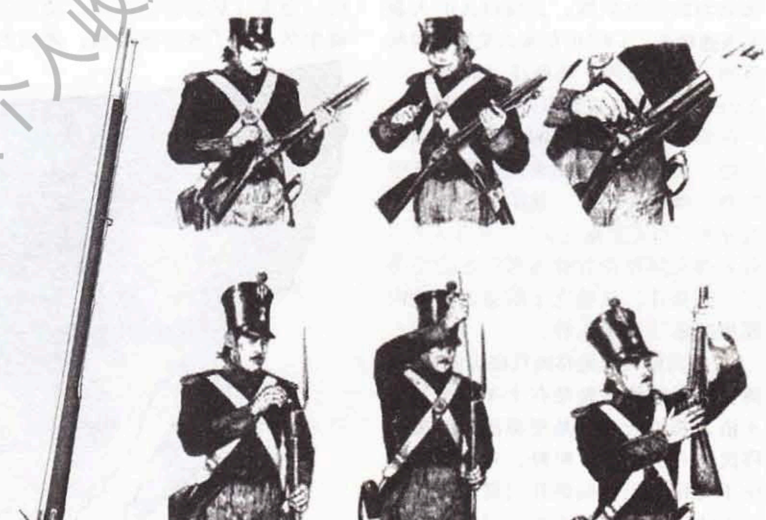
得克萨斯真是片神奇的土地，和许多人一样，休斯顿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新的生活，很快他就融入了正群情鼎沸的移民中间。移民们需要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人领导他们，而这位仪表堂堂的前州长正具有这种领导的能力和魅力。1833 年他成为第二次得克萨斯议会的主席，当起义最终开始后他被任命为得克萨斯正规军的总司令。

1835 年中，得克萨斯局势因1824 年宪法的废除以及移民卷入联邦派与桑塔安纳独裁政府的斗争而急剧恶化。刚被释放出狱的奥斯汀咒骂墨西哥政府为“卑鄙不讲信用的该死怪物”，一度态度温和的他现在也宣称“除了全面开战外没有中间道路”。5 月间桑塔安纳镇压了萨卡特卡斯州的联邦派起义，该州首府遭到洗劫，2500 人被屠杀。9 月21 日，桑塔安纳的姐夫和政治心腹科斯将军率领一支军队在戈里亚德附近登陆开进得克萨斯，一方面镇压此地的联邦派，另一方面试图强迫移民遵守法令，释放黑奴并缴纳关税，移民们最终决定与墨西哥政府彻底决裂，得克萨斯独立战争的幕布徐徐拉开。

大幕拉开，演员出场前，有必要介绍下这个战争舞台的布景情况。这时无论是武器装备、技术水平还是战争艺术的发展都与二十年前的拿破仑时代相差不多，双方作战的主力都是步兵，骑兵是重要的辅助兵种，炮兵则造成大量的杀伤。只是战场环境和条件不同，造成战争形式也略有不同。

墨西哥步兵身着靛蓝军装，戴高筒军帽，上有鲜艳的帽章和绒球，其基本编制是营或按古老的西班牙传统称“大方阵”(tercio)，地位相当于欧洲军队中的团，理论上约编制有300–400 人，在实战中可下降为此数的一半。墨西哥步兵分为永备营(permanentes) 和现役营(activos) 两种，名义上前者是常备正规军，由桑塔安纳的老兵组成，是军队的核心，各营均以独立战争的英雄命名；后者是各州组织的长期服役的民兵，但在实际使用上两种部队没有差别。现役营以组建地命名，其中尤卡坦营的民兵多为玛雅印第安人，连西班牙语命令都听不懂。

墨西哥步兵营的战斗主力是6 个称燧发枪手的中央连，使用0.753 英寸口径的东印度式“褐贝斯”(Brown Bess) 前装滑膛燧发枪。墨西哥自己没有兵工生产能力，这些枪和墨军的大部分武备一样多是英国人卖来的拿破仑战争剩余物资。尽管已装备军队一



墨军褐贝斯枪操法。墨西哥的褐贝斯枪是购自英国的拿破仑战争剩余物资，已经开始落后于时代。它的精确度和所有滑膛火枪一样差强人意

百多年的褐贝斯在射程和精度上无法与得克萨斯人的长管来复枪相比，但还算得上是一件可靠的武器，真正要命的是墨西哥土产的劣质黑火药严重降低了其效能，有人甚至形容墨西哥火药“不过是捣过的木炭”。

每个营编有两个精锐连支援中央连作战，其中一个称猎兵连(Cazadores)，一般由机敏灵活，枪法准的士兵组成，多成散兵线作战，有些射手装备了精准度可与美国长管来复枪相媲美的0.61英寸口径贝克式来复枪，这也是从英国人那里弄来的。另一个精锐连是掷弹兵连(granaderos)，由年长的勇敢老兵组成，一般充当预备队角色，装备和燧发枪手一样。精锐连士兵的薪饷和地位均高于中央连。

墨西哥步兵的精华是战斗工兵(zapadores)，这些面蓄浓须，腰围皮裙的士兵高大强壮，训练有素，不仅能执行工程任务，更是一等一的作战部队，唯人数较少，1835年12月统计只有185人。攻打阿拉莫时桑塔安纳将他的战斗工兵和几连掷弹兵一起编成总预备队。

1835年12月，桑塔安纳对墨西哥骑兵部队进行了改组，将他们像步兵营那样分别编为永备团和现役团。永备团以独立战争中的战役命名，每团包括4个中队外加一连骑马战斗工兵，每中队两个连，头戴马尾皮盔，身穿挺括华丽的军服，这是适合于克利奥尔式的轻浮炫耀口味的。

不过，墨西哥骑兵决不只是一支银样蜡枪头的仪仗队，他们多数出身奇瓦瓦、科辉拉等北部各州的熟练牧人，装备了长矛、军刀和英国佩吉特式卡宾枪，能相当出色地执行奔袭、遮断、追击等任务，在阿拉莫和戈里亚德，他们寒光闪闪的长矛是许多得克萨斯人生命中最后的梦魇，得克萨斯人之害怕墨西哥骑兵，决不下于墨西哥人对得克萨斯来复枪手的恐惧。此外桑塔安纳在得克萨斯还收编了一些熟悉地形的当地牧人和哨所守军人伍作为辅助骑兵，称为“团练兵”(Presidial)，他们是很有价值的斥候与搜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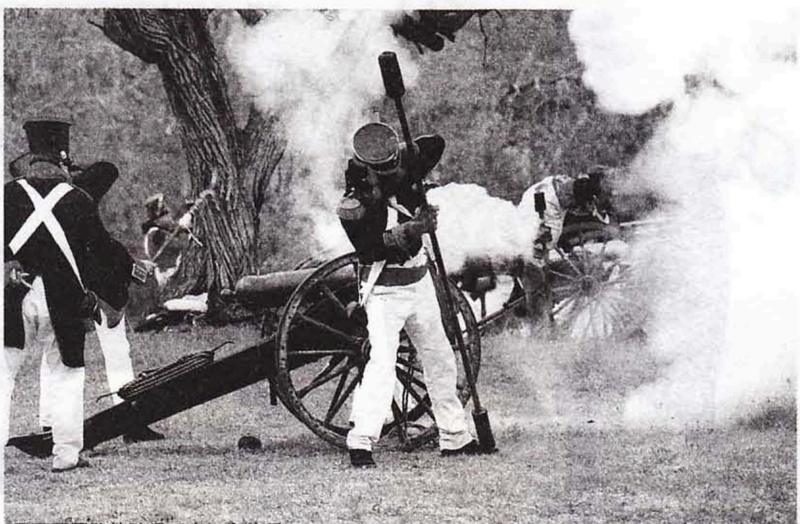
墨西哥炮兵长期受缺少资金的困扰，原有一个旅的骑炮兵，即炮手全部乘马机动的快速炮兵，却于1833年11月因耗资过大，无力维持而只得解散。普通炮兵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836年初桑塔安纳备战时发现全军只有21门火炮可用，其中17门是野战加农炮，包括7门4磅炮、4门6磅炮、4门8磅炮和两门12磅炮；攻城则只能依靠4门7英寸榴弹炮。炮手人数也配不齐，根据条令每个炮兵连应有91人和6门炮，实际上有一个连只有62人，却要操作8门大炮。相形之下他们的对手，阿拉莫的守军反而拥有足足二十余门火炮，其中还包括一门18磅重炮！在围攻阿拉莫时墨军吃尽了缺少火炮的苦头。

在文件的纸上和将军的嘴里，墨西哥军队是威风凛凛，强大无敌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支军队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体，他们有着西班牙的编制、用着英国的武器、同时试图仿效法国的指挥。不错，墨西哥士兵吃苦耐劳，部分军官也颇有能力，但这些却为官吏的贪污腐化和对士兵的漠不关心所抵消了。

整支墨西哥军队的后勤状况之差，达到了令人乍舌的地步：将军们大口啃着香草烤鸡，用精致的水晶杯喝着上好的法国葡萄酒，而终日背着沉重装备行军的士兵一天只能领到八盎司（约合227克）烘玉米饼或硬面饼，从臭水坑里汲水饮用。几乎所有军需均为劣质产品，军需商发财，桑塔安纳和军官们亦有份可拿。有些军官甚至直接垄断军需并以双倍价钱卖给士兵，最令人发指的是受伤的士兵居然得花高价购买包扎用的绷带！无怪乎随着行军的持续，士兵不断地生病、倒毙，老兵默默地忍受这一切，新兵则寻找一切开小差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一支“编外部队”的存在就变得几乎是必不可少了，这就是随军妇女。这些女人可能是士兵的妻子、姘头、母亲、姐妹，或者是巫医(curandero)、洗衣妇和免不了的娼妓。是随军妇女们担起了原应由土崩瓦解了的后勤部门承担的烹调、清洁、搜寻食物、护理伤员的重任。将军们嫌弃她们吵闹费事，拖慢了行军速度，但对饥寒交迫、流血受伤的士兵来说，这些妇女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和慰藉。

如果说墨西哥军队虽然问题百出，但还算得上是一支正规军队的话，那么将要与他们对抗的得克萨斯武装完全可以用极恰当的四个字形容：“乌合之众”。大致来说，得克萨斯一方的兵力主要来自三大块：一是本地民兵，最初他们是得克萨斯武装力量的



墨西哥军队的骑兵（左）和炮兵

主力，但往往不听号令，自行其是；二是起义者决定针对民兵缺点而成立的，由休斯顿任总司令的正规军，但正规军的组建和完善需要时间，大部分时候他们之无法无天并不逊于民兵，而民兵们亦嘲笑正规军为“唬人鬼”。三是以私人名义前来的美国志愿兵，如著名的新奥尔良灰衣部队，这些人多是受纽约和新奥尔良的得克萨斯中介公司提供土地的诱惑而来卖命的逃兵、穷苦人、冒险家乃至亡命徒，不过他们认为这也是援助得克萨斯兄弟反抗暴政的英勇行为。

所有这些部队的基本组织都是连，如果这种松散的，常常只有二三十人的单位能被称作“连”的话。一个连长常常既是该连的建立者，又是指挥者，靠所谓的“名望”而非权威向手下发号施令。军事指挥协调非常可笑，军官之间互不服气时须恪守“民主”，靠举手投票做出决定，失利一方常以负气出走作为回应，而胜利一方的手下又未必听从这些决定，特别是当没有足够的掺了嚼烟、糖浆和河水的威士忌给他们喝时。更糟的是有些连军纪松弛，到处游荡的大兵撞开门讨要牲畜、食物、武器，谁都抢，什么都要。当地老百姓常常比害怕桑塔安纳的士兵更害怕这些“自己人”。

总的说来，这些犟头倔脑、自行其是，集种种恶习于一身的得克萨斯佬是所有军官的梦魇，不合格的士兵，此外其数量也远小于桑塔安纳的大军，但另一方面，艰苦的边疆生活也将他们锻炼成了身强力壮、枪法精准，作战英勇的优秀斗士。多数人都拥有一到数支长管来复枪，这是当时北美大陆最受欢迎的一类武器，虽然射速较慢但在好射手手里极为精准，在非正规作战中效能远超过滑膛火枪；他们通常还腰插一把大猎刀，再加上几把手枪，武装颇为齐备；身上的衣服也许五花八门不成制式，但至少能保暖御寒，有人甚至拥有当时最新的服装科技产品——一件带橡胶涂层的大衣。最重要的是，和被强征入伍、饱受虐待、对得克萨斯既不了解亦不关心的墨西哥士兵相比，大多数得克萨斯人认为自己是在为自由、正义和家园而战，因此士气满涨，战意高昂。有的时候，甚至是过分高昂了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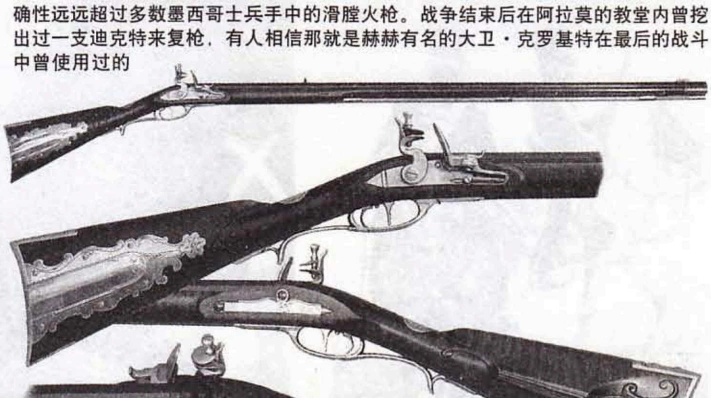
1836 年战争中的得克萨斯战士。上排左：手持双管猎枪和马刀的得克萨斯骑兵；上排中：参加起义的墨西哥裔得克萨斯人；上排右：穿鹿皮衣的美国边疆穷白人移民；下排左：临时充作炮手的战士；下排中：得克萨斯老移民志愿兵；下排右：新奥尔良灰衣志愿部队一员

1835 年 10 月 2 日，最初的冲突发生在冈萨雷斯城。当墨西哥士兵要求移民交出一门原属该地治安之用的破旧大炮时，武装的移民声称该炮属于“得克萨斯共和国”并开火将他们赶走，一名墨西哥人被杀，这就是得克萨斯版的“列克星敦枪声”。冲突中移民们首次打出了后来成为得克萨斯象征的孤星旗帜，上绘一颗星星、大炮和“来拿呀”(come and take it!)的字样，看起来倒更像是挑衅示威用的横幅而非严肃庄重的旗帜。

到1835 年10 月末，已有约500 名吵吵嚷嚷的美国移民聚集在冈萨雷斯，他们自称为“人民军”，决定进攻有1400名墨西哥士兵驻守的圣安东尼奥，被推为司令的奥斯汀实



左图：许多得克萨斯军队中的志愿兵与上图中这位左手拿鸡、右手拿酒的密西西比志愿兵一样，是优秀的斗士，却是不合格的士兵，并且极受当地居民的厌恶。桑塔安纳将他们称为“盗匪”和“乌合之众”，虽然是蔑称，但倒也不无几分道理



下图：北美大陆最好的长管来复枪产自宾夕法尼亚和肯塔基两州，像图中这种由宾夕法尼亚著名德裔枪匠迪克特（Dickert）制造的来复枪是昂贵但极为精良的武器，准确性远远超过多数墨西哥士兵手中的滑膛火枪。战争结束后在阿拉莫的教堂内曾挖出过一支迪克特来复枪，有人相信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大卫·克罗基特在最后的战斗中曾使用过的

际上没有权威，只得随大流而去。好在科斯手下部队的素质亦极为低劣，大多是无经验的新兵和服苦役的犯人，并且数量随后勤的短缺及向各地分遣而不断减少。

10月27日，在圣安东尼奥以南约3公里的康赛普西翁传教站（Mission Concepcion）爆发了首次大规模（当然是以这场战争的标准而言）交战，一个名叫詹姆斯·鲍威（James Bowie）的移民带着92名得克萨斯人依托传教站壁垒掩护，打退了一股拥有400名步骑兵和1门火炮的墨西哥部队，交战中长管来复枪大显身手，得克萨斯方面只有一人阵亡，墨西哥人却死了67名，受伤之数约与此相当。

提起这个后来被称为“阿拉莫围城三杰”（Alamo Triad）之一的詹姆斯·鲍威，其好勇斗狠在当时得克萨斯不大的社会圈子里已经是闻名遐迩，是远近第一个惯使猎刀的斗士，他所用的刀长十一英寸半（约30厘米），宽两英寸，比普通猎刀要阔大许多。鲍威1796年出生在肯塔基，早年在路易斯安那长大，学就了一身打猎生存的本事，也参加过1812年英美战争。战争结束后辗转多地，做过很多未必十分光彩的灰色勾当，比如非法贩奴、土地投机，寻找银矿等等，期间免不了与人结下许多冤仇忌恨。

1827年9月19日，在密西西比河一处沙洲上爆发了令鲍威日后扬名的所谓“沙洲决斗”，其实是一场有十几个人参加的大械斗。当时两颗子弹连续打中他的屁股和手臂，脑门又吃了一手枪柄，用力之猛连枪柄都击断了；接着一把细剑刺进了他的胸膛，卡在胸骨和肋骨之间。但他毫不为之所动，反而乘对手的剑被卡住之机将其拖倒在地，拔出那把大猎刀插进对手心脏部位，左右反复割拉，一直到对方断了气。以那个时代美国边疆社会尚侠仗义的风气，越是无法无天的人往往越受到人们的敬重，自此这种大猎刀就和鲍威一起出了名，后来干脆被称作“鲍威刀”，现在仍是一类猎刀的专有称呼。

1831年鲍威娶了当时墨西哥驻得克萨斯副总督委拉门迪（Veramendi）美丽的女儿，来到圣安东尼奥定居。可惜天有不测风云，4年后他的妻儿在一次霍乱流行中不幸死去，这条硬汉倒也被儿女情长牵绊，自此常常借酒消愁，身体在旧伤和肺痨的折磨下渐渐垮掉了。

康赛普西翁之战中鲍威的副手名叫詹姆斯·沃尔克·



陈列在得克萨斯州冈萨雷斯县博物馆内的冈萨雷斯大炮复制品和“来拿呀”孤星旗帜，后面的牌子上写着“1835年10月2日，这门炮打响了得克萨斯独立的第一枪”。旗和炮两者当然都是极简陋粗糙的制品，但它们打响得克萨斯独立第一枪的意义却不容忽视。下图为冈萨雷斯县的“来拿呀”节庆集市的宣传海报。在得克萨斯等有佩枪传统的南方州，“来拿呀”如今成了反对禁枪的白人组织的旗帜性口号，其标志是在美国内战的南方邦联战旗（红地蓝色斜十字加13颗白星）中间加上一把卡宾枪的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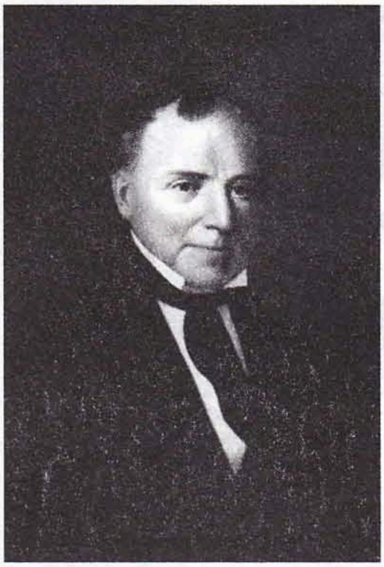


下图为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的康赛普西翁传教站（Mission Nuestra Senora de la Purisima Concepcion，意为“圣母无染受孕传教站”）。这是一个小而坚固的据点，1835年10月27日，鲍威带队在这里打退了一股四倍于己方兵力的墨军，后来桑塔安纳亦曾惊讶于得克萨斯人选择阿拉莫而不是这里作为据守的要塞





詹姆斯·鲍威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大猎刀



得克萨斯第一任临时最高领导人亨利·史密斯(1788–1851)。他后来在山姆·休斯顿的得克萨斯共和国政府中担任国库掌库官，退休后死在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的途中

范宁，佐治亚州人，西点军校的肄业生，也是1836年得克萨斯军队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受过较系统的军事训练，有一定的组织能力，但为人犹疑，缺少果断的性格和领袖的气质，他要对后来起义军队在戈里亚德遭遇的惨剧负起相当的责任。

缺少重炮的得克萨斯人试图通过围困拿下圣安东尼奥，围城从10月末持续到12月初，其间起义者选举了临时议会和临时州长亨利·史密斯。他的头衔之所以是州长而不是总统，是因为此时至少在名义上，起义者仍未准备彻底脱离墨西哥，只想建立独立于科辉拉和集权派势力的得克萨斯州。

随着冬天的到来，许多民兵渐渐厌战，要求撤围休整，这时轮到美国志愿兵迫不及待了。12月4日，一位名叫本·米拉姆的肯塔基志愿兵上校振臂一呼"谁愿意跟我老米拉姆打进城去哇！"带领一群志愿兵冲进了圣安东尼奥，大队人马随后跟上，开始了为期4天逐屋逐户的激烈争夺和拼斗，其间米拉姆本人在城中鲍威的旧宅门前遭墨西哥猎兵狙击身亡。

12月10日，枪声终于沉寂下来，龟缩进阿拉莫堡场的科斯开始谈判投降条件，谈判的结果是起义者允许科斯的军队保留全部旗帜、随身武器和一门大炮撤离，条件是需发誓保证永不反对1824年宪法。当然了，后来的事实表明科斯与他的内弟桑塔安纳一样，对发誓和保证的定义十分灵活。

从战果来看，围攻圣安东尼奥确实可算是起义者的一次辉煌胜利，但这胜利带来的后果并不全是好的。得之太易的战果冲昏了他们的头脑，其领导机构中那些自以为是的边疆怒汉立即分裂成好几派，互相吵嚷不休。多数人相信与"不堪一击的墨西哥军队"的战争已经结束，思乡心切的民兵纷纷自作主张返乡料理家务，而无所事事的美国志愿兵则提出了所谓的马塔莫罗斯（Matamoros）远征计划。马塔莫罗斯是坐落里约格朗德河口的一个墨西哥港口城市，离开圣安东尼奥有440公里之遥，攻打这里名义上是要将革命的火种向墨西哥本土播撒，阻止桑塔安纳可能从海上实施的入侵，实际则怀有掠取这个贸易良港丰富财源的目的。

这个异想天开的计划成为了各派势力大争吵的导火索。临时州长史密斯和休斯顿都反对进行马塔莫罗斯远征，但临时议会却坚持授权范宁和弗兰西斯·约翰逊（Francis Johnson）指挥远征，实际带领那些志愿兵的约翰逊和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在临时议会支持下对休斯顿不屑一顾。恼羞成怒的史密斯下令解散议会，议会则以弹劾史密斯作为反击，两边均不顾对方的激烈攻讦继续签发各种自相矛盾的命令，进一步加剧了起义内部的混乱程度。这出闹剧直到史密斯和休斯顿均甩手出走，临时议会代表也失去耐心纷纷返回各自家庭才开始平息下来，它的恶劣影响则还要持续更久，那支远征部队在抽走了许多防守墨西哥大军入侵所必需的宝贵人力和物资后，尚未踏出过得克萨斯边界一步就遭到全军覆灭的悲惨命运。此为后话。

阿拉莫

"永不投降或撤退——不成功就成仁"——威廉·特拉维斯

1835年10月末，桑塔安纳在他位于韦拉克鲁斯郊外的豪华大庄园中接到科斯被围的消息，当即决定亲自领军北上平息叛乱。他以惯常的做作笔调写道："我欲骄傲地带头捍卫独立、荣耀和国家之权利，我将放弃舒适的府邸生活，亲自领军作战。"此类漂亮话是他在几十年间取悦于墨西哥人——实际仅是那些虚荣的克里奥尔人和容易激动的莫斯提左人，因为几乎全部印第安人都是对政治毫不关心的文盲——时常用的。即使是集权派中也有人并不满意于一个墨西哥的拿破仑的出现，桑塔安纳需要战场上的光荣来压服这些人，巩固他独裁的地位。因此桑塔安纳所看重追求的首要是政治资本而不是军事得失，这是在理解1836年得克萨斯战争中他的许多表现时所必需记住的事情。

不过，桑塔安纳也并非光说不干的牛皮大王，他如果算不得是一流的统帅，那么至少他作为组织者能够迅速拉起一支军队的本事应当得到肯定，这也是后来在得克萨斯战役中身败名裂后，桑塔安纳得以东山再起的资本之一。为了准备这场战争，他总共征集了约六千名士兵，是之前全墨西哥常备军总数的三倍。只是为了补足捉襟见肘的军费亏空，不得不又向私人债主外借了数十万比索年息高达近50%的高利贷款，自然地，这些贷款中的部分将作为回扣和贿赂流进桑塔安纳自己的腰包。大部队的调度和整备需要时间，因此华金·拉米雷斯·塞萨马准将（Joaquin Ramirez y Sesma）受命率1500人和8门火炮先行北上支援科斯。

12月5日，桑塔安纳抵达圣路易波多西城（San Luis Potosi），墨军主力的集结地。到12月末军队已经整装待发，此时科斯投降的消息也已传来，盛怒之下，桑塔安纳决定率军队主力约4000人和12门火炮立即进军。

19世纪初的墨西哥道路建设非常落后，只有两条能供大部队行进的大



桑塔安纳的姐夫及政治心腹科斯将军（Martin Perfecto de Cos）。他是一个能力平庸的墨西哥将领，在圣安东尼奥和圣哈辛托战役中两次被得克萨斯人打得一败涂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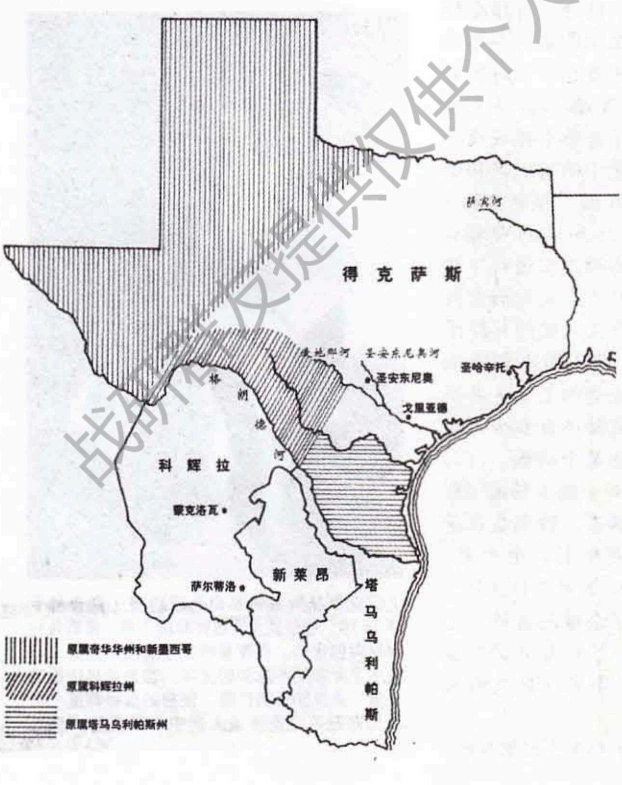
道从本土通往得克萨斯，其中塞萨马的先遣队走的是西边靠近内陆的“皇道”（El Camino Real，意为“皇家公路”）向东北方向蜿蜒经过圣安东尼奥、巴斯特洛普（Bastrop）、纳科多奇斯（Nacogdoches）、圣奥古斯丁（San Augustine）等移民点，跨过萨宾河进入路易斯安那州。

另一条大道是靠近东面的滨海地区，自里约格朗德河口的马塔莫罗斯始，经过圣帕特里奇奥（San Patricio）、戈里亚德（Goliad）、维多利亚（Victoria）和圣菲利普（San Felipe）等城镇的阿塔斯科西托大道（Atascosito），大部分墨西哥将领都建议从这条路线进攻，因为部队将可以从海路方便地得到补给，还能尽快控制得克萨斯富庶的海岸线和各主要港口。但桑塔安纳却不顾这些意见，拍板紧随塞萨马的先遣部队，从“皇道”直扑圣安东尼奥。

桑塔安纳选择后一条道路的原因，除了攻占圣安东尼奥这个全得克萨斯最大的城镇和叛乱的中心会产生更大的威慑影响外，恐怕也是急于洗刷他的姐夫科斯兵败投降的耻辱，为其亲信集团捞回政治资本。他只派乌雷亚将军领一支600 名步骑兵的分遣队从东路向戈里亚德进军。不过，能干的乌雷亚很快将在东线战事中以这支小部队显示出他的出众将才。

墨西哥大军的纵队从圣路易波多西开拔，蜿蜒北行到达科辉拉州首府萨尔蒂洛（Saltillo），在这里军队进行了最后的训练和整备，科斯及其败兵也前来会合，桑塔安纳公然无视他们之前不再参战的誓言，将这支部队编入军中。

1836 年1 月24 日，桑塔安纳在萨尔蒂洛举行了全军大阅兵，身穿绣满银线的军服，骑带金丝鞍鞯的战马，佩着一把价值7000 美元——在当时是极贵的价钱，1931 年之前，1 美元合2 比索——的军刀威风凛凛地检阅了部队，这位大独裁者个人形象的魅力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士气大振的部队齐声高喊“桑塔安纳万岁”。26 日至30 日，这支由





在十九世纪，剽悍的科曼奇骑马武士，是可怕的马匪，任何落单的白人，无论是墨西哥人还是美国人，都会遭到他们的劫掠和残杀。图为科曼齐酋长“小羚羊”

4000 名士兵，2500 名随军妇孺，1800 头驮骡，33 辆马车和200 辆牛车组成的大军依次出发，一星期后桑塔安纳已经抵达190 千米以北的蒙克洛瓦城（Monclova），他的下一站就将是得克萨斯的南界，滚滚东逝的“大河”里奥格朗德河。

但盛大阅兵式的记忆及其激励效果很快就随着艰苦的行军而在墨西哥士兵的脑海中消散殆尽了。从蒙克洛瓦到里约格朗德河之间是一片令人谈之色变的荒漠，今日仍是许多迷路偷渡者的葬身之地。冬日刺骨的寒风呼啸着掠过荒芜的原野，军需供应很快断绝，筋疲力尽，饥渴难耐的士兵和随军人员不断掉队，而一旦离开大部队，这些可怜的人就会立即被兀鹰般在地平线上徘徊等待的小股科曼奇印第安人洗劫、残杀，割去头皮。桑塔安纳自己则在五十名骑兵护送下乘坐配有六匹纯白壮骡的豪华马车轻松前进，当他2 月13 日与随从到达里约格朗德河南岸小镇圭雷罗（Guerrero）时，获悉这地狱般的行军已经让他的整支军队头尾拖拉绵延了近500 千米！

这些困难都阻挡不住桑塔安纳一心催促先头部队进军。他一要在得克萨斯叛乱者没有集中前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二也是考虑到得克萨斯的夏天以炎热而著称，正午气温常可超过华氏100 度（约摄氏38 度），因此必须在酷暑来临前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在第一点上桑塔安纳完全达到了他的目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得克萨斯起义领导者均以为他的军队在4 月之前将不会到达，但在第二点上他却不幸受到了老天的无情嘲讽。1836 年初是得克萨斯近百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2 月13 日，墨西哥先头部队遭遇了罕见的暴风雪，狂风挟卷着冻雨、霰粒和鹅毛大雪接连向这些可怜的人们席裹而来，大雪整整下了两天，积雪竟没过了膝盖，瑟缩的士兵，包括那些来自地处热带的尤卡坦半岛，从不知雪为何物的印第安人成团挤在微弱的篝火旁取暖，老弱妇孺和不少挽畜甚至被活活冻死，真可谓是“天山大雪风还寒，横笛遍吹行路难”！

不过，墨西哥士兵吃苦耐劳的能力实在令人赞叹，暴风雪刚刚过去，他们掸掉褴褛大衣上的积雪，埋葬冻死的同伴，然后继续在军官的斥骂催促下蹒跚前行。2 月21 日，



寒夜风雪中瑟缩的墨西哥士兵。在桑塔安纳的敦促下，墨军在酷寒的2 月中行军越过数百千米荒凉的原野，为此吃尽了苦头

桑塔安纳42 岁生日当天，他和墨军先头部队已经行至麦地那河畔，也就是他本人当年在阿雷东多将军麾下打第一场仗的老地方，这里离圣安东尼奥只有区区40 千米。在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之后，墨西哥军队完成了整个军事史上也不多见的一项壮举：在酷寒的冬天穿越无人的荒原行军约600 千米，同时基本完好地保持了战斗力，这是后人在嘲笑指责桑塔安纳1836 年战争中表现时甚少提及的。

墨军行动之快完全出乎所有得克萨斯人的意料，也让桑塔安纳获得了极为有利的先机。他下令塞萨马带300 名骑兵换乘快马，立即进击，墨西哥骑兵的奔袭满可以在那些大模大样毫无防备的叛贼来得及躲进阿拉莫堡垒之前突入城中，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桑塔安纳在写给京城的报告中夸口道：“美国佬将被赶出得克萨斯，而土地将被分给我们的士兵和勤劳勇敢的墨西哥人民。”

的确，面对一群惊慌失措的乌合之众，桑塔安纳有理由如此乐观。与他的决心与不计代价的迅疾相比，起义者一方显得一盘散沙，毫无作为。区区八百名武装人员，分布在二百四十千米长的战线上，没有统一的指挥调度，正面临着六千名墨西哥正规部队的集中进攻。得克萨斯的指挥官甚至从来就没法清楚了解他手下到底有多少兵力，因为每天都有零星的人跑来加入，同时又有些人开了小差。侦察和情报工作约等于零，圣安东尼奥的守备指挥官特拉维斯直到2 月23 日中午，城中居民已经开始争相出逃方才确信墨西哥军兵临城下的消息！

在生活中往往会碰到这样一类人，抱负远大，也颇有能力，但同时又非常自我乃至自私，与人难以相处，威廉·巴雷特·特拉维斯（William Barret Travis）就是这类人中的一员。这个生于1809 年的小伙子原是阿拉巴马州一名业余学习法律的小学教师，自小熟读荷马史诗等英雄故事，抱有做一番事业的大志，却因婚姻失败，家庭入不敷出而于1831 年丢下怀孕的妻子，独自跑到得克萨斯的阿纳华克（Anahuac）来寻找新的生活，开业做了律师。

当时律师是个与政治紧密相连的行当，因此特拉维斯顺理成章地进入移民的政治圈并成为其中最激进的分子之一，1832 年一度被当局逮捕，1835 年中，他是第一批起事攻击当地政府驻军的带头人。年底特拉维斯被任命为正规军骑兵中校，名义上是得克萨斯骑兵的最高军衔，不过派给他的任务仅仅是带30 名骑兵前去与驻守圣安东尼奥的詹姆斯·尼尔（James Neill）会合。

命运似乎注定要让特拉维斯的名字镌刻在“阿拉莫三杰”的丰碑上。1836 年2 月14 日，尼尔接到家人重病的消息后离开职守，将圣安东尼奥的指挥权和名垂青史的机会一并移交给了特拉维斯。需要指出的是，尼尔此举并非临阵脱逃，不要忘了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墨西哥大军尚不会马上到达。尼尔后来参加了圣哈辛托战役并受了伤，他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和受人尊敬的上司，在首席工程师格林·詹姆逊（Green B. Jameson）的指导下对阿拉莫的各处防御工事进行了修缮和完备。如果一早不是尼尔而是做作、傲慢、具有得罪人天赋的特拉维斯在指挥这支散漫混乱的小部队的话，不要说完善阿拉莫的工事，甚至在桑塔安纳大军到来时还有多少人愿意继续呆在这里都还是个问题。

民兵和志愿兵对于缺少领袖气质的特拉维斯尤其不满意，特别是在圣安东尼奥有远比他更年长，更出名，更受爱戴的人的时候。2 月9 日这样一位人物的到来引起了全城的轰动，这就是“西部雄狮”，三届美国国会议员，“阿拉莫三杰”中名气最大的大卫·克罗基特。

克罗基特1786 年生于田纳西州，12 岁即离家谋生，靠种田和狩猎养活自己并成为远近最出色的猎熊人之一，曾创下在一个狩猎季中捕获105 头熊的纪录。1813 年他参加了与印第安人的克里克战争，但这场战争给他留下最深的烙印却是此后毕生对印第安人的同情和帮助。

克罗基特是一切边疆事物的朋友，是一个从詹姆斯·库柏的《皮裹腿故事集》（著名的《最后的莫西干人》就是其中的一篇故事）中走出来的活生生的长枪猎人“鹰眼”纳第·邦波，他



威廉·特拉维斯唯一存世的画像是这幅草就的素描。不过图中仍依稀画出了他那副年轻气盛，傲气凌人的表情



这幅克罗基特肖像系由画家约翰·查普曼于1839 年，也就是克罗基特死后3 年，根据各种素材再创作的。克罗基特在他的后半生被人们戴上了太多的不真实的光环，但无论是边疆的小屋，还是国会的广厦，他自始自终都是一个认为自己不过是普通人民中一代表的“老大卫”

战研群发起人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一生都穿着朴素的衣服，从不掩饰甚至带着小小炫耀的态度承认自己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且几近于文盲，只是凭着那种机智幽默、慷慨又周到的悦人风度在政坛上打出一片天地，于1827年跻身美国众议员的高位。他的传奇生涯被改编成一出名为“西部雄狮”的流行戏剧，这出剧让他的名声远扬密西西比河南北，让他成为了类似后世电影明星那样的大众偶像。

可是要做一名成功的政客，克罗基特还是太诚实，太天真了。出于同情心和正义感，他激烈反对杰克逊总统的迁移印第安人法案，其结果是在1831 和1835 年度的议员竞选中两次败北。后一次失利击垮了49 岁的克罗基特从政的信心，他决定前往得克萨斯这个传说中失意者的天堂，据称他曾在孟菲斯城一间酒吧当着一大群人说道：“你们统统去地狱吧，我可要去得克萨斯啦！（You can all go to hell，I' ll go to Texas!）”

1836 年1 月14 日，克罗基特在纳科多奇斯宣誓成为得克萨斯辅助志愿军的一员并加入了所谓的“田纳西骑马志愿兵连”，很快凭借自己的威望成为了它的实际领袖。许多人都希望克罗基特接替尼尔担任圣安东尼奥守备指挥官，但他谨慎地选择“宁愿当一名资深大兵”。

除克罗基特之外，尚有一人也在民兵中间声望甚高，这就是早在1 月19 日就已经到达圣安东尼奥的詹姆斯·鲍威。鲍威原本奉休斯顿的指示准备疏散圣安东尼奥，夷平阿拉莫的工事并将部队、大炮和军需带往冈萨雷斯，但权衡之后他却带着坚守此地的决心留了下来。有人说如果他能遵从休斯顿的命令，那么阿拉莫的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但实际情况是当时缺少足够的挽畜能拖走大炮和军需，更重要的是，心气满满的鲍威和绝大多数守军一样，都不愿意放弃圣安东尼奥这个重要的城镇，将这里的一切都留给杀气腾腾的独裁大军。在2 月2 日给史密斯州长的信中，鲍威写道：“尼尔上校和我已经庄严决定，宁愿战死在这些壕沟之后，也不会将此地放弃给敌人。”

对特拉维斯不服气的民兵要求进行选举以决定指挥权归属，结果只有一些正规军支持特拉维斯，而占总数大半



2 月23 日下午，圣安东尼奥守军接到墨西哥大军逼近的消息



2 月21 日下午，拉米雷斯·塞萨马准将和墨西哥骑兵为暴涨的麦地那河水所阻，无法完成对圣安东尼奥的奔袭任务

的民兵和志愿兵都把票投给了鲍威。选举的第二天鲍威大宴宾客，酩酊大醉的主人和酒客到处惹事，洋相百出，闹到把监狱中的犯人都放出来了。恼火的特拉维斯写信给临时州长史密斯告状说鲍威“将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他将“不对任何“醉鬼非正规军负责”，两人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好在这种紧张关系并未持续很久。鲍威虽然剽悍勇猛，“发起火来脸就扭成老虎一般”，但还是个识大体的人，他清楚自己酗酒的毛病确实不太像话，向特拉维斯提出由他负责民兵和志愿兵，而特拉维斯则指挥正规军，两人共同签发命令。这是一个和解的姿态，何况也只有鲍威才能说服管束那些无法无天的民兵，因此特拉维斯痛快地答应了。这个和解来得非常及时，奔袭而来的三百名墨西哥骑兵此时已经逼近麦地那河，在这关头如果两人继续争吵下去，甚至一方一怒之下带走属下兵力的话，将给本已一盘散沙的起义力量带来更为不利的后果。

桑塔安纳的怒火比多数得克萨斯人估计的整整早来了一个月。墨西哥人的进军当然并非悄无声息，难民和游骑早已经带来大军越过里约格朗德河的消息，但无论鲍威和特拉维斯都将其当成是不值一信的谣言，因此2 月21 日当晚墨西哥骑兵发动进击时，圣安东尼奥的绝大部分守军正在一场以庆祝美国国父华盛顿诞辰为名义举办的方丹戈舞会上大口饮酒或者搂着女人胡闹。如果墨西哥人真的在此时打进城中，即使有部分人来得及撤入阿拉莫，长期坚守所必需的大量军火和补给也无法及时运进去，他们将在数天内因耗光补给而不得不投降，阿拉莫的传奇将在它尚未开始前即告结束。

可是冥冥中似有天意在阻碍墨西哥人的脚步。当塞萨马的骑兵在冷雨中抵达麦地那河岸时惊愕地发现，由于一

星期来持续的降水，往常的潺潺流水此刻暴涨成了奔涌的激流，根本不可能像平时一样涉渡过去，他们只能徒然望河兴叹。等待洪水过境白白耗去了两天时间。直到 2 月 23 日上午，墨军先头部队才逼近到离圣安东尼奥只有 10 公里的地方。

圣安东尼奥城中此时恰如炸了窝的蚂蚁般乱成一团。守军慌乱地将牛群、粮食、枪支弹药以及他们的家小运进阿拉莫堡场去，内中有参加了起义的墨裔得克萨斯人格雷戈里奥·埃斯帕萨（Gregorio Esparza）及其家小 6 口人，此人有一个亲兄弟与他政见相左，已经投奔到桑塔安纳的骑兵队里。有些居民跟着守军撤入堡场，但大多数都带着细软急急向东北逃散了。忙乱之中还是有许多物资落在了城内，内中包括一大批墨军在长途行军后所急需的鞋子。

桑塔安纳在离开城西一千多米的一处墓园里，安全地观看他的掷弹兵纵队如同接受检阅般趾高气昂地进占圣安东尼奥。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必要展开成战斗队形，除了零星的枪声外没有大规模冲突发生。但这恰恰是桑塔安纳所不愿看到的事情：得克萨斯守军已经带着补给和弹药躲进了阿拉莫堡场，一场与他速战速决的计划相悖的，靡费时间和人力的围攻战看来是不得不打了。

桑塔安纳决定给这些胆敢跟他对峙的叛贼一个颜色看看。很快，在圣安东尼奥城中圣费尔南多教堂的钟楼顶上升起一面绘有骷髅图案的血红旗帜，根据惯例，这种旗帜传达的信号是“格杀勿论”。这并非独裁者的一时性起，在 12 月 30 日墨西哥政府签发的以战争部长托内尔命名的托内尔宣言（Tornel Decree）中就已声明，所有捕获的得克萨斯叛军均将被政府军视为盗匪而非对等的战俘，而有权加以处决。

这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战争观念的冲突：来自美国的得克萨斯起义者习惯于欧洲其他地方自 18 世纪的绅士战争以来浮于杀戮和毁灭表面的那一层所谓文明与公信，例如英勇战斗后有条件的投降被认为是光荣而值得对手尊重的。


今日仍矗立在圣安东尼奥街头的圣费尔南多教堂。近两百年前，桑塔安纳血红色的死亡旗帜曾经飘扬在它的钟楼之上

但是，包括桑塔安纳在内的一些保守墨西哥军人的战争观念直接来自西班牙人——那些在与异教徒摩尔人几百年你死我活的拼杀历史中变得骄傲而残忍的安达卢西亚武士。在他们那里，处决放下武器的俘虏或者以毁伤敌人尸体为乐并非是什么了不得的罪过。有一首承袭西班牙的墨西哥军乐与血红旗帜一样表示格杀勿论的警告，名叫“德圭耶罗”（Degüello，意为“抹脖子”），最早就源自伊比利亚摩尔人的死亡号角。这两种观念的冲突最终在得克萨斯战争中造成了极为悲惨的后果。

从阿拉莫的墙头上可以清楚看到那面旗帜。面对这一恫吓，两位得克萨斯头头的反应各不相同，骄傲的特拉维斯还以一个简洁明了的回答：他命令发射阿拉莫西南角炮台上正对着圣安东尼奥方向的 18 磅加农炮；但是鲍威是一个更加世故实际的人，他决定在“战死在壕沟之后”前先试一试谈判，希望能得到与 2 个月前科斯在起义者手中所得到的同样宽大的对待。不过，桑塔安纳是不会将叛贼当成对等的谈判对象的，很快回信的内容就使得鲍威和特拉维斯的意见从此一致起来了，于是那门 18 磅炮发出了第二声巨响。桑塔安纳报以下令榴弹炮队立即轰炸阿拉莫，咝咝作响的榴弹拖着抛物线烟迹落入堡场中央爆炸，宣告阿拉莫围城正式开始。

在叙述接下来的 13 天战事之前，不妨先来鸟瞰一下这个即将扬名青史的小小堡场吧。经过一百多年的改建与变迁，今日阿拉莫已经与 1836 年的样子大不相同，但从时人的描述和文件，特别是围城前后墨西哥工兵军官所绘的图样中，还能够比较完整地复原当年的工事布置和防御情况。

阿拉莫的围墙内侧建着一些简陋的平房，仅在堡场东面有一列南北向联排，比较像样的两层楼房，这就是所谓的“长兵营”，守军的医护所驻地。后来成为阿拉莫象征的那座未完成的教堂就矗立在长兵营的东南角。



The Alamo Compound at the time of the siege in 1836.

阿拉莫之战墨军参战序列：

★6 个永备步兵营：阿尔达马（Aldama）营、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营、圭雷罗（Guerrero）营、希门内斯（Jiminez）营、马塔莫罗斯营、莫雷罗斯营。

★7 个现役民兵营：瓜哈努阿托（Guajanuato）营、墨西哥城营、奎雷塔罗（Queretaro）营、圣路易波多西营、托鲁卡营、特雷斯维拉斯（Tres Villas）营、尤卡坦营。

★5 个永备骑兵营：科阿特拉（Cuautla）营、多洛雷斯营、坦皮科营、韦拉克鲁兹营（部分）、科辉拉营（部分）。

★非正规骑兵：格兰德河团练骑兵连、圣路易波多西、巴希奥（Bajio）辅助骑兵营

★战斗工兵营

★炮兵

★桑塔安纳护卫骑兵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长兵营和教堂的门口都筑有工事，一旦外围堡墙被攻破，可以作为最后抵抗的据点。

堡场的大门开在南墙，门边的建筑原是传教站的谷仓，后被称为“矮兵营”。整座堡场需要加固的防御弱点有二，一是容易被劈倒或撞开的大门，为此在门外修筑了凸出的所谓“半月堡”工事，它既可以防护大门，又能够从中侧射南墙。此外在堡场中央还布有两门指向大门的火炮。二是堡场东南角，教堂南侧与南墙的矮兵营之间原是一个没有围墙的缺口，因此必须临时修筑一堵壁垒。

由于时间仓促，前述的半月堡和这堵壁垒均是由打入地下的粗木桩筑成，在外侧设有壕沟和鹿砦加强防御。为了在薄墙上和倾圮的教堂中布置枪炮火力，还需要修筑堆土的炮台、推炮的斜坡以及供枪手站立的踏脚。

以上这些工事在1835年底圣安东尼奥围城时即已由科斯的墨西哥部队动工建筑，得克萨斯人占领此地后，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缮和加固。尽管如此，阿拉莫仍算不上是一个好的防御位置，它的围墙不够结实，是用未经烧制的土坯砖砌成的，而且这个地方对于一支仅有200多人的守军来说太大了。难怪桑塔安纳和他的军官们会吃惊于得克萨斯人竟然没有选择圣安东尼奥附近另一个更小也更容易防守的堡场——拥有一米多厚的石灰岩坚墙，并曾为得克萨斯人带来独立战争第一场胜利的康赛普西翁传教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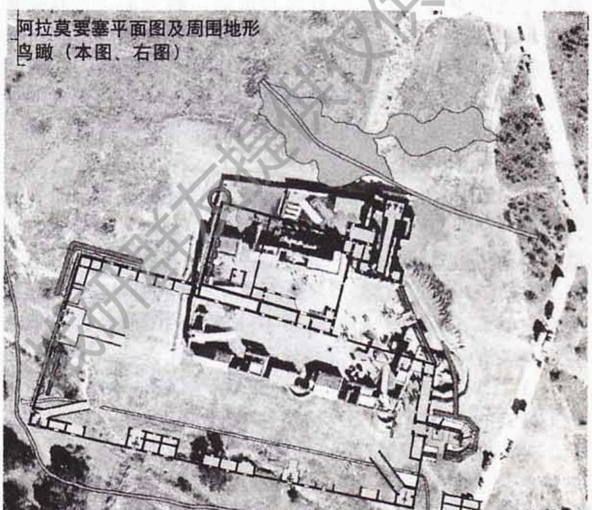
在围城的最初日子里，双方对自己的实力均抱有很大信心。特拉维斯认为他完全能够坚守直到援军到来，如果桑塔安纳胆敢立即发动正面强攻，那阿拉莫的火炮一定能给他们造成大量的伤亡并将其击退。而墨西哥人则对阿拉莫的简陋工事嗤之以鼻，时任战斗工兵中尉的何塞·德拉佩纳(Jose Enrique de la Pena)，其手稿为研究1836年战争重要史料之一者写道：“一位有能力的将军能以微小代价拿下这个没有恰当布置侧射火力的非正规工事”；墨军的意大利裔副帅菲力索拉将军（Vicente Filisola）在他的《得克萨斯战争史》中更认为“只需适当地部署20门火炮，那些可怜的墙将在一小时内变成一堆瓦砾。”桑塔安纳的秘书拉蒙·卡罗（Ramon Caro）甚至将阿拉莫称作是“土砖砌成的牛栏”！

墨西哥人的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如果说阿拉莫的工事无法与正规城防相比的话，那末墨军的装备也比正规围城战所需要的简陋得多。4门榴弹炮的轰炸犹如隔靴搔痒，不足以最终解决战斗，他们没有任何专用的重型攻城加农炮来轰塌围墙打开破口。全军最大的火炮——两门12磅野战加农炮由于运输困难尚在后续部队中没有抵达前线，而现有最大的8磅加农炮炮弹只有橘子大小，必须逼近到区区几十米的极近距离才能对并不坚固的围墙造成一些破坏。

墨西哥炮手就很快发现，得克萨斯人的长管来复枪足以在200米距离上击倒任何胆敢不加掩蔽在空地上作业的敌人，迫使他们不得不费时费力地根据17世纪法国军事工程师沃邦创立的正规围城方法，按部就班地在每天夜里由战斗工兵开挖“之”字形壕沟，让炮兵能够一边持续轰击，一边安全地逼近阿拉莫的围墙。

2月24日，即围城的第二天，鲍威突发高烧病倒了，无从得知他到底染上了什么疾病，从症状看来可能是伤寒引起的肺炎。眼不可见的细菌是再厉害的猎刀也没法对付的敌人，重病在床的鲍威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继续参与指挥，遂吩咐手下服从特拉维斯的命令。这个27岁的年轻人知道他长久梦求的时机到来了，他终于摆脱了过去的岁月中那种让他厌倦、破产的平和庸碌的家庭生活和纷繁复扰的人际关系，只有现在，这强敌围困，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方能感到周身充满了力量、激情与使命感，全身心准备好将这个小小的堡场以及他自己带向那必然到来的荣耀巅峰。

就在这天，特拉维斯签发了他著名的致“得克萨斯人民和世界上所有美利坚人民”的公开信，在信中他写道，尽管阿拉莫已经“遭到连续24小时不间断的轰炸和炮击”，但“我军旗帜仍骄傲地飘扬在壁垒上空”，他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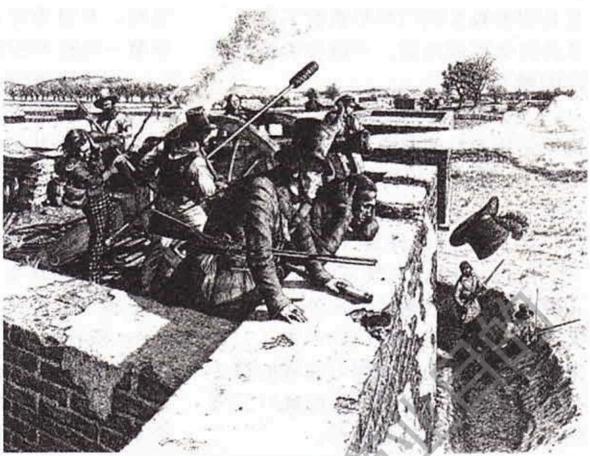
阿拉莫要塞平面图及周围地形鸟瞰（本图、右图）

“坚持抗争，奋战到底，像一个未曾忘却他的荣誉和国家的战士那样面对死亡，永不投降或撤退——不成功就成仁”。

这封特拉维斯用他读到的所有英雄故事和史诗神话中得来的豪情壮志写就的信，后来经由得克萨斯、美国和欧洲的各种报刊书籍一再转载，至今已经成为阿拉莫传奇的一部分。但是隐在这封信的豪言壮语后面的意思其实是呼吁援军，即使是自傲如特拉维斯者，也不相信阿拉莫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永远困守下去。他写道：“我以自由，爱国和一切为美利坚人民所珍视的美德的名义呼唤你们，火速赶来给予我们帮助。”

特拉维斯派遣的飞骑信使很容易就穿过了墨西哥人三心二意的封锁线，这些信使中有全得克萨斯最出色的游骑，绰号“聋子”的伊拉斯塔斯·史密斯（Erastus 'Deaf' Smith），还有著名的墨西哥裔起义者胡安·塞金，后者骑着老朋友鲍威借给他的一匹快马。然而所有这些求救却如同石沉大海。

困守孤城的特拉维斯对整个得克萨斯起义力量四分五裂的程度缺乏概念，他还不知道临时议会、总督史密斯和总司令休斯顿已经在争吵中分崩离析。不错，在圣安东尼奥东北约 300 公里一个名叫“布拉佐河畔华盛顿”（Washington-on-the-Brazos）的狭小破落的村庄中，一场新的代表会议正准备召开，它将选出新的议会领袖，并正式宣布脱离墨西哥独立，但在各派势力的争端和分歧得到解决前，这些人尚没有能力组织起一支像样的援军去给阿拉莫解围。



特拉维斯下令发射阿拉莫西南角炮台上的 18 磅重炮，以示决不投降



上图：阿拉莫西南角炮台上的 18 磅重炮实物，这是阿拉莫全部 20 余门火炮中最大、最重、射程最远者，曾击中过圣安东尼奥城中桑塔安纳的司令部。注意墨西哥军撤出得克萨斯时已将该炮的耳轴毁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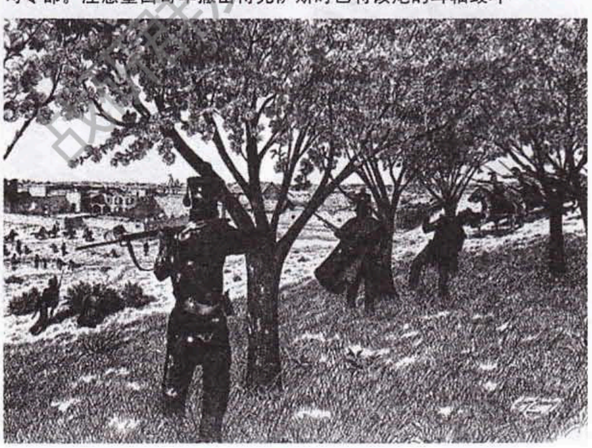
特拉维斯最大的希望寄托在驻守戈里亚德的詹姆斯·范宁身上，这支部队约有 600 人之众，装备齐全且配有炮兵，是当时得克萨斯方现有最强大的一支兵力。不幸的是，指挥这支部队的范宁拥有一名军人所最不应该有的缺点：优柔寡断，而且此时已经因指挥的重压而濒临情绪崩溃的边缘。

接到求援信后第三天，范宁才于 2 月 28 日带着 320 人和 4 门大炮离开戈里亚德向阿拉莫进发。可是刚刚走出四分之一公里距离，他就因坏掉了几辆牛车而命令停止行军，返回戈里亚德休息，随即在召开军官会议后取消了救援行动。从戈里亚德到阿拉莫 150 千米的路程，范宁仅仅踏出了其中的 250 米，这个数字将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最后将在厉害的乌雷亚手中断送掉整支部队连同他自己的性命。

与此同时在阿拉莫，战况从表面上看来对守军倒还算有利。在前几天的小规模战斗中，墨西哥侦察小队无一例外被得克萨斯人精准的长程火力击退，而守军一方却能顺利地出外搜集薪柴、饮水，焚烧西南方向可能被墨军猎兵用作掩护的茅屋，战斗中他们还捉住了一名俘虏，此人将墨军各种号声的含义解释给得克萨斯人听。墨西哥人的炮击不见成效，多天来有数以百计的榴弹落入阿拉莫，却连一个人都没有伤到。

堡场内的补给尽管并不充足，但却还能支持一时。克罗基特充当着守军精神支柱的角色，在战斗和炮击的间歇，他的小提琴和一位名叫约翰·麦克格雷格（John McGregor）的苏格兰裔移民的风笛常常你唱我和，奏出或悠扬或婉转的乐曲，如果这还不够消愁解闷的话，克罗基特讲俏皮话、双关语和奇闻轶事的本领可是出了名的。

3 月 1 日凌晨，阿拉莫盼来了整个围城期间最大的，但也是最后的一支援军——从冈萨雷斯骑马驰来的 32 名志愿兵，他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明知前途险恶，但仍自发前来相助，后来被称为“不朽的 32 人”。守军士气在这时高涨到了顶点，特拉维斯下令 18 磅重炮发射两发炮弹权作庆祝，其中一发击中了圣安东尼奥城中桑塔安纳的司令部，



左图：2 月 26 日晨，外出取水砍柴的阿拉莫守军遭到墨军射手骚扰，双方展开长程交火

不过当时他正在野地中侦察城防，并不在这栋房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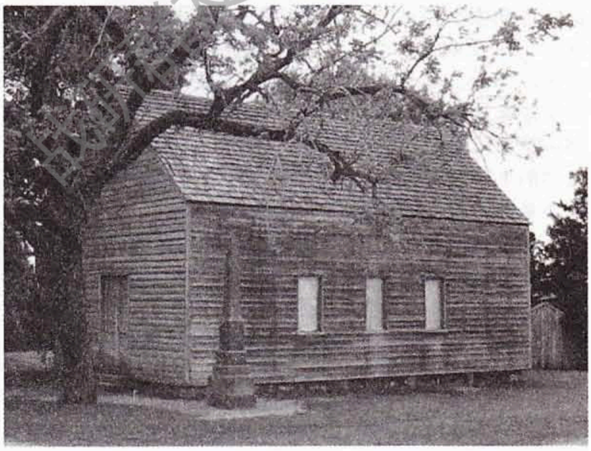
围城期间，桑塔安纳常常躬亲接近阿拉莫的堡墙勘测侦察，不管是真有用还是装样子，这种行动是非常危险的，2 月 29 日晚上就有一名墨西哥上等兵在执行同样的任务时被得克萨斯狙击手打死。

不过，桑塔安纳的辛勤劳动倒是有一件特别的收获。他在阿拉莫附近的一所房屋里发现了一对没有逃走的墨西哥裔母女。为了将漂亮的女儿哄骗到手，他不惜举行了一场假婚礼，婚礼上的牧师是由一名士兵冒充的，这个情妇后来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这当然不过是桑塔安纳一生无数情史中的一段外传罢了，但从中倒是可以一窥这位在几十年间玩弄整个墨西哥于股掌之上的人物之所以在今天声名如此狼籍的个人品质方面的肇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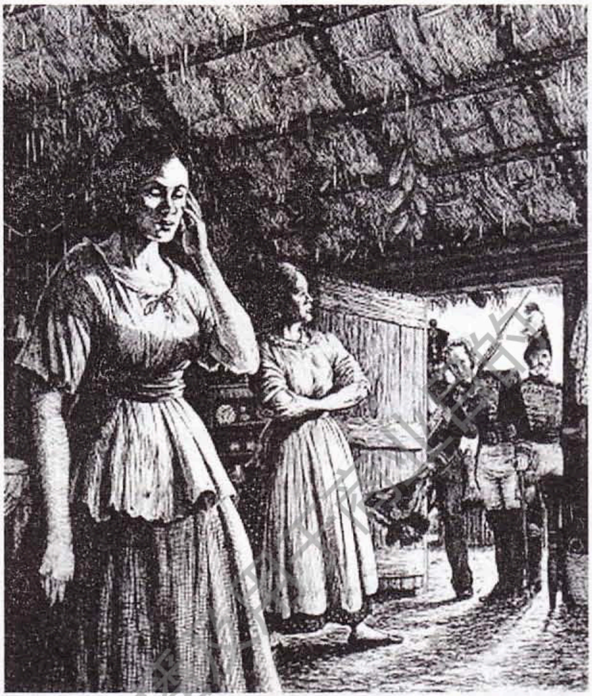
3 月 2 日的天气异常寒冷，但却成为了得克萨斯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正是在这一天，得克萨斯起义代表会议在“布拉佐畔的华盛顿”的一栋棚屋内通过了得克萨斯独立宣言和宪法，正式宣布脱离墨西哥建立“自由、自治、自立”(Free, Sovereign, Independent）的得克萨斯共和国。但是困守阿拉莫的人们并无从得知这一消息，堡场上空直到陷落前仍然飘扬着带有“1824”字样的红白绿三色墨西哥旗，从名义上说，直到最后时刻他们仍然是在为 1824 年宪法，也即墨西哥联邦派的事业而非独立的得克萨斯国家而战。

随着气温的触底回升，阿拉莫内的士气却从顶峰开始逐渐跌落。范宁和他的援军杳无音信，从冈萨雷斯来的志愿兵尽管精神可嘉，但在实际力量上无异于杯水车薪，于事无补。墨西哥狙击手的威胁使得守军不得不蜷缩着窝坐在墙头，他们从那里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可以望得见墨西哥后续纵队开进圣安东尼奥。在每一次看似胜利的遭遇战后，总有新的壕沟和大炮出现在墨西哥人刚刚被击退的地方，震天动地的炮声间歇，墨西哥军乐队受命向着阿拉莫的方向齐奏“德圭耶罗”，带有不祥含义的刺耳乐声与炮声一刻不停，使得守军无法入睡。





上图为 1836 年得克萨斯起义代表会议签署独立宣言的情景，下图的小木屋是得州华盛顿县布拉佐河畔华盛顿村的得克萨斯共和国独立签字小屋复制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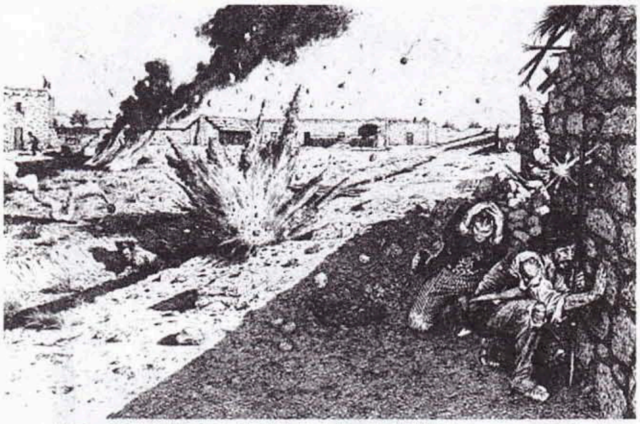
桑塔安纳的收获——一名漂亮的墨裔少女被哄骗上手，成了他新的情妇

围城已经进行了超过一星期，被围困的厌倦，食物的单调，因缺少活动而造成的烦躁，因缺少睡眠而造成的疲乏，都如同酸液腐蚀金属，蛀虫啃食木材一般持续影响着人们的情绪。

3 月 3 日，一位名叫詹姆斯·邦汉姆（James Butler Bonham）的快骑从戈里亚德回到阿拉莫，带来了范宁放弃救援的消息。失望透顶的特拉维斯整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奋笔疾书，在给布拉佐畔的华盛顿会议代表的信中他以克制的口气写道：“如果援军再不到来，我将被迫在对敌军有利的条件下作战。”

在另一封信中，特拉维斯的口吻就没这么客气了：“如果我的同胞们还不集结起来援救我们，我决心牺牲在防守此地的战斗中，我的骸骨将成为提醒他们对我见死不救的见证。”最后，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特拉维斯写道：“请照顾我的儿子……如果国家得救的话，我也许能给他一份可观的财产，但如果国家沦陷，我杀身成仁，他就什么也没有了，除了关于他父亲是为国献身的骄傲回忆。” 就连一向风趣，乐观的克罗基特，也不免写道：“我想也许最好还是开出去死在旷野里，我不喜欢被困死的感觉。”

末日的阴影已经开始在阿拉莫的上空盘旋。情况在继续恶化，弹药和补给越来越少，为了节省弹药，特拉维斯下令各火炮停止还击，仅在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发射三



上图：阿拉莫遭到墨军榴弹炮的轰炸。据特拉维斯 3 月 3 日记载，仅当天一天就有两百余发榴弹落入阿拉莫，但“一个人都没有伤到”

下图：在早春酷寒中生火取暖的守军。随着气温的触底回升，阿拉莫守军的士气却开始逐渐跌落





3 月 4 日晚桑塔安纳召开军官会议，在会上他不顾军官们的反对，决定于 3 月 6 日拂晓对阿拉莫发动总攻

次那门 18 磅炮，目的是为了提醒炮声所及范围内的人们，阿拉莫仍在坚持。这炮声湮没在墨西哥大炮的持续轰鸣之中。桑塔安纳的工兵每个晚上都在掘进壕沟，一步步逼近阿拉莫的围墙，到围城第 11 天，墨军火炮已经可以在“滑膛枪射程”，也就是 100 米内安全地直射阿拉莫北墙。在越来越近的不间断轰击下，这段城墙碎砖迸飞，摇摇欲坠，守军不得不用圆木加固以防止其坍塌。没有任何人还会怀疑，至多再过一个星期，桑塔安纳将胜券在握。

但这位大独裁者的心思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根本就不打算再等一个星期。在 3 月 4 日晚上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桑塔安纳突然提出要在 3 月 6 日对阿拉莫发动全面攻击，令他的军官们大吃一惊。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要在这个时间发动攻击：天气正在暖和起来，攻城者并无冻馁之虞；没有任何得克萨斯援军到来的迹象；两门 12 磅重型加农炮预计将在 7 日到达，届时阿拉莫的破墙将被彻底轰塌，总司令为何在此时突然下令进行几乎必然遭到惨重损失的全面进攻呢？

原来，就在 3 月 4 日当天，一名溜出阿拉莫的墨西哥裔得克萨斯妇女向桑塔安纳报告说特拉维斯已经让守军自由选择撤离或者直接投降。这个报告确切与否姑且不论，但却正击中了大独裁者所不情愿的一桩心事。桑塔安纳要的是荣光和影响，要的是可以在那些仍然对他有所怀疑的人们面前夸耀炫示的胜利，在他的眼里，不流血的投降和一座空城根本没法与无畏的攻击和血腥的战斗得来的胜利相提并论。至于这胜利所要付出的代价，要流下多少鲜血，丧失多少人命，他这个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大将军有什么必要考虑这些呢？

据一名墨西哥军官的回忆，当桑塔安纳的副官，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卡斯特里翁（Manuel Fernandez Castrillon）在会上以浪费兵力为理由反对立即发动进攻时，桑塔安纳挥舞着一只鸡腿对他发表了这么一通言论：“士兵的命算得了什么？不过就是一群鸡崽嘛！我告诉你，阿拉莫必须被攻陷，我的命令必须不惜一切得到遵从。” 这个固执而过分自信的独裁者，他一心想学拿破仑的百无禁忌、纵横捭阖，却不曾明了拿破仑只有在实际形势需要的时候，而不是为了表面的虚荣才会不惜麾下士兵生命的代价。

这样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剩下的问题只是制定攻击计划的细节。3 月 5 日桑塔安纳再次召开了军官会议，计划组成 4 个纵队于次日拂晓从各个方向同时向阿拉莫作向心突击，各纵队的指挥均是桑塔安纳的亲信，其中科斯的纵队将向阿拉莫的西北角发动攻击，杜克上校（Francisco Duque）的纵队负责摇摇欲坠的堡场北墙，罗梅罗上校（Jose María Romero）的纵队将袭击阿拉莫的东面，而莫拉雷斯上校（Juan Morales）主要由猎兵组成的纵队则将向整个防御工事看上去最弱的一环，即教堂和“矮兵营”之间的木栅发动攻击。战斗工兵独立营和分别来自 5 个永备步兵营的 5 个掷弹兵连共同编成预备队。

这支为数共 1700 人的总攻部队均是挑选出的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兵，没上过战场的新兵和临时征召的部队都被留在了营地。下午桑塔安纳以全军总司令的名义正式签发命令，巨细无遗地指令了各部应当携带的装备和应当执行的任务。

与此同时，堡场内的气氛也愈发凝重，尽管得克萨斯人并不知道桑塔安纳将在何时发动最后一击，但毫无疑问

阿拉莫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这天下午特拉维斯召集了所有守军，用佩剑在堡场中央空地上划下一道长线，说既然没有任何援军到来，任何想走的人可以现在离开，而决定留下来与他特拉维斯死战到底的请走过线来。传说已经无法走动的鲍威第一个让人将他抬过线去，跟着是克罗基特，然后是除一人外的所有守军。在今日阿拉莫仍可以看到后来镶上铜条的所谓“特拉维斯之线”。

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如何，守军在此刻表现出的决心和勇气的确值得敬佩，事到如今他们应该清楚继续在这里待下去的话，生存的前景极其渺茫，而如果他们决定放弃防守分散溜走的话，也有很大机会能够活下去。

不知是桑塔安纳的疏忽或故意，整个围城期间墨军的封锁线都很松垮，唯一没有走过那条线的路易·罗塞(Louis Rose)，从前拿破仑军队中的一名老兵，就顺利离开了阿拉莫并告诉了人们“特拉维斯之线”的故事。好汉詹姆斯·邦汉姆，两次作为信使驰出阿拉莫复又归来，最后和其他守军一起战死。就在3月5日当晚，特拉维斯还派出了他最后一个信使，16岁的阿伦(James Allen)，他同样安全穿越了墨西哥人的封锁线，使得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特拉维斯、克罗基特和其他许多守军在最后时刻写就的信件。

1836年3月5日入夜，根据桑塔安纳制定的小小计策，持续轰鸣的墨西哥大炮沉寂了下来。在过去几天中一直被巨大的炮声震得两耳发聋的守军纷纷进入了黑甜的梦乡，连特拉维斯在堡墙外布置的哨兵也打起了瞌睡。无人注意到墨西哥营地压抑着的骚动，而在那里正进行着总攻的一切准备：各级军官来回视察，为麾下部队打气，军士们认真地检查着士兵的高筒军帽有没有扣紧，下发的鞋有没有穿上，最重要的是突击所必须的武器——长43厘米的三棱刺刀有没有磨利上好。一行行一列列的黑影在清冷的夜色中强抑着战斗前的紧张，静默地迈步走向指定的攻击阵位，走向征服或者死亡。

到凌晨3点，攻击部队已经基本就位，但开始总攻的命令直到两个半小时后方才下达，其中有些接近到离阿拉莫只有300米的士兵必须穿着单薄的衣服趴在冰冷的地上，冻得手足僵硬，半死不活。直到凌晨5点半终于传来了进攻的命令，四个纵队的墨西哥士兵开始向阿拉莫逼近。墙外的得克萨斯哨兵被杀死在岗位上，没有发出任何警报。

脚步沙沙，呼吸急促，强绷着脸，紧皱着眉，心脏在胸腔内怦怦直跳，血液却仿佛要凝固起来，这些经过战斗的人知道他们在冲入堡场前将要面临着什么。终于，临战的压力崩断了一名墨西哥士兵不堪重负的神经，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他歇斯底里地喊出了他最熟悉的一句口号：“桑塔安纳万岁！”“墨西哥共和国万岁！”，成百的声音自发附和起来。

见到突然性已经失去，桑塔安纳下令发射康格里夫照明火箭，军乐队齐奏“德圭耶罗”，墨军的总攻开始了！

墨西哥人为他们易激动的天性付出了代价。火箭的强烈白光、排山倒海的呼喊声和刺耳的军乐猝然打破了一触即发的凝重空气，也惊醒了睡意正浓的阿拉莫守军，他们来不及揉一揉惺忪的眼睛，就急忙向各自的岗位奔去。特



上：墨西哥战斗工兵以正规围城的步骤开掘战壕，使得墨军火炮在工事掩护下一步步逼近阿拉莫的堡墙



阿拉莫要塞遗址中的“特拉维斯之线”



右图：桑塔安纳在阿拉莫以北的围城炮兵阵地中观察阿拉莫堡场，准备进攻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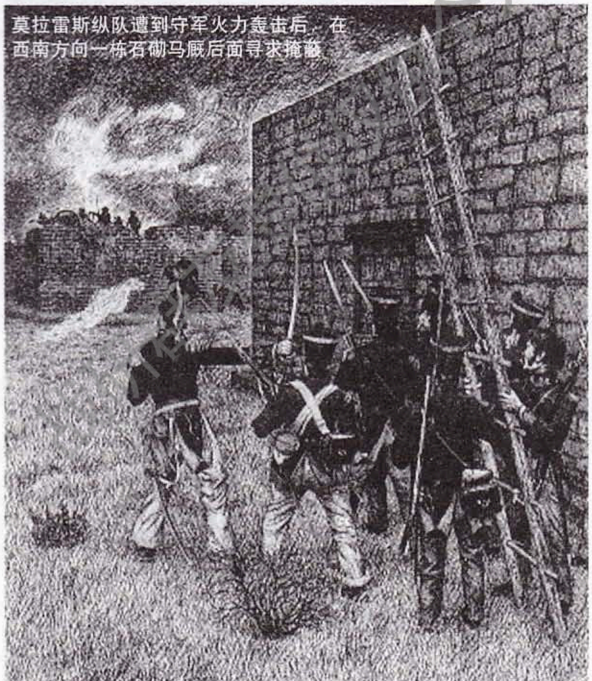

在总攻的最初阶段，墨军遭到守军炮火的轰击，死伤惨重，作战计划亦被打乱


上图：被霰弹打中的墨西哥士兵。据德拉佩纳描述，守军的一发霰弹竟然同时击倒了一个猎兵连中的半数士兵及其连长

拉维斯手持一杆双筒猎枪跑上北墙炮台喊道："来呀小伙子们，墨西哥人冲上来了，我们狠狠地打！"阿拉莫的炮手们开始紧张地准备发射那些令人生畏的火炮，他们在前 1 3 天的围城中节省弹药，就是准备着这一刻的到来。

由一把把的碎蹄铁、锈钉子、断铁链等金属碎片包以布袋制成的简易霰弹被装进炮膛，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炮响和大团的烟火，劈头盖脸的金属风暴向墨西哥人的密集纵队席裹而去。这种近距离发射的大量不规则弹丸造成了可怕的伤亡。在后方观战的德拉佩纳中尉惊恐地看到，守军的一发霰弹竟然将杜克纵队中来自托鲁卡营猎兵连的半数士兵及其连长约二十多人同时击倒在地。

实心弹的杀伤范围没有那么大，但是效果则更加可怕，被重型铁球击中的士兵顷刻间四分五裂，血肉横飞，迸开的碎骨茬打进了附近拥挤在一起的人体内。侥幸未被击中


莫拉雷斯纵队遭到守军火力轰击后，在西南方向一栋石砌马厩后面寻求掩蔽

的士兵喃喃祈祷着圣母和天主，埋头向前挤得更紧。

有好那么一会，似乎是防御一方占着上风。除了威力巨大的火炮，多数守军都事先准备了数支上好弹药的来复枪，劈面射来的连珠枪弹和猛烈炮火又准又狠，将墨西哥纵队打得一片混乱，桑塔安纳的战前计划变成了一堆空谈。

面对西北角炮台两门 8 磅炮的凶猛火力，原定攻击这里的科斯将他的纵队带向了阿拉莫的西墙，这一火线变向动摇了队伍的凝聚力，许多士兵逃离队形挤向北墙的墙根试图避开守军的射击。但那里早已经挤满了来自杜克纵队的避难者，这个负责攻击北墙的纵队除了西北炮台的两门火炮外，还遭到北墙炮台三门 8 磅炮的轰击。一发霰弹击中了杜克的腿部，这位上校痛苦地跌倒在地，慌乱的人群践踏着他们的指挥官，他好不容易才在几名士兵的帮助下撤了出来。老将军卡斯特里翁赶来接过了这个纵队的指挥权，大声喊叫着敦促士兵们奋勇向前。

在东面，长兵营外围场角上的火炮和教堂骑堡炮台上的 3 门火炮又将原定攻击东墙的罗梅罗纵队向北墙根下拥堵的人群之中压迫而去，进一步加剧了那里的混乱程度。最后，莫拉雷斯纵队也发现那道看似脆弱的木栅并不是好啃的骨头，不仅因为在其前方密密麻麻排列着由伐倒的树杈做成的鹿砦，还有木栅后和大门半月堡内的火炮轰击，而且还因为负责此处防御的是守军中枪法最好的部队——克罗基特和他的田纳西志愿兵。一筹莫展的莫拉雷斯同样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带着他的猎兵沿阿拉莫的南墙向西移动，在西南方向一栋守军未能及时摧毁的石砌马厩后面寻求掩蔽。

不过墨军并非完全被动挨打，纵队前方装备了贝克式来复枪的散兵一刻不停地向阿拉莫墙上那些被月色、曙光和枪炮的闪光映出的身影开火，由于他们的数量优势，阿拉莫的墙头变成了极为危险的地方，一个墨西哥人回忆说"在那些墙上呆不得一秒钟就会被打死"。

在墨军的集火射击之下，特拉维斯几乎是最早牺牲的守军之一，正当他探出身子，对着墙根下的杜克纵队发射他的双筒猎枪时，一发子弹贯穿了他的眉心，这位守军指挥官一头栽倒在炮台的坡道上，再未爬得起来。特拉维斯也许算不得是个真正的伟人，但他无愧于自己"不成功就

成仁”的诺言，手握武器在桑塔安纳大军的总攻中战死在阿拉莫的堡墙之上，用这种方式实现了他青史留名的英雄梦想。

在特拉维斯倒下的阿拉莫北墙根，蜂拥蚁聚着来自三个纵队的黑压压的墨西哥士兵。建制已被打乱，在枪炮和嘈杂声中，军官的命令无人听从，每个人跟着自己的本能行动，向看上去最安全的地方——墙根推挤而去，倒地者难逃被踩死的命运。射击纪律荡然无存，纵队后边的人在黑暗和混乱中胡乱向前开火，结果往往打中了前面的同袍。

在攻击部队身后是由战斗工兵和掷弹兵组成的预备队，他们奉命向阿拉莫城头发射排枪以掩护一线进攻，这些子弹中有不少同样击中了拥挤在墙根下的自己人，据菲力索拉将军也许略有夸张的估计，墨军在阿拉莫损失的人员中只有四分之一是敌方火力造成的，其他都是被友军误伤。

前后均遭到射击的墨军士兵被打得晕头转向，人潮你推我搡着向阿拉莫的北墙拍击，却没有人向墙头攀爬，因为事先分发的梯子均已丢失或损坏。见此情景，桑塔安纳做了此刻唯一能做的事：将他的精锐预备队投入战斗，但是预备队的压迫不过是进一步加剧了北墙下的拥挤程度，难道他寄予厚望的总攻真的会就此折戟沉沙吗？

此刻身先士卒的行动要强过一切命令和驱策。阿拉莫的北墙高达4 米，而且墨军的梯子均已不知去向，但墙头的守军已经被墨西哥散兵的火力所压制，而且墙上被之前的炮击轰出的坑洼破损，还有那些加固用的圆木都可以用作徒手攀爬的着力点。更何况，不管墙头上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身后推挤涌来的人群都已经阻断了一切后退的可能，现在只有一个方向可去。

就在这时，勇敢的古巴人胡安·阿马多将军(Juan Valentin Amador)头一个踩着砖块爬上了墙头，为墙下的士兵们做出了榜样，看到一位穿着耀眼军服的大官奋力先登，墙下的士兵们也鼓起勇气跟着向上攀去，终于，阿马多将军带着一小群士兵跳下北墙冲入堡场，有几个人倒在了守军的枪口之下，但他们成功地从里面打开了一扇侧门，门外的墨西哥士兵一拥而入。胜负的天平在一阵摇摇晃晃之后，终于不可逆转地倒向了一边。

接下去的战斗虽然越加激烈，但其结果实际已经失去



上图：《特拉维斯保卫阿拉莫》，鲁思·扎克雷森（Ruth Zachrisson）绘。特拉维斯无愧“不成功就成仁”的誓言，手握武器战死在阿拉莫的堡墙之上，在身后实现了自己青史留名的英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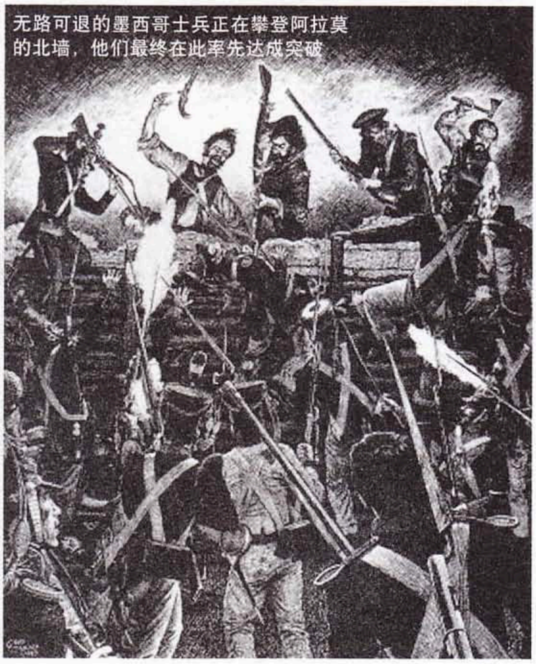
了悬念。预备队的战斗工兵和掷弹兵紧跟着一线部队，完全占领了阿拉莫的北墙，科斯的手下用长斧和撬棍砍开西墙上的窗户和小门杀入堡场。在西南角，莫拉雷斯得到掩护的猎兵将那门18 磅炮的炮手尽数射死在炮位上，然后爬上炮台。守军被迫放弃了各处的围墙，向事先准备好的“长兵营”和教堂战位撤去。他们在堡场中央遭到从四面八方涌进阿拉莫的墨西哥人的夹击，

在之前的战斗中为得克萨斯人带来巨大优势的来复枪此刻暴露出其致命的缺陷：由于膛线的存在，它的装填要比普通火枪缓慢得多，在这种情势下根本就来不及装填，更要命的是大多数设计用作打猎和狙击的长管来复枪都无法安装刺刀，因此一旦进入白刃战，得克萨斯人的来复枪就与木棍无异，他们所仅能依靠的猎刀和印第安战斧等短兵器并不是墨西哥士兵手持的连枪身在内总长近 2 米，寒光闪闪的刺刀的对手，更何况，他们还处在严重的数量劣势之中。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有些人的勇气表现为慨然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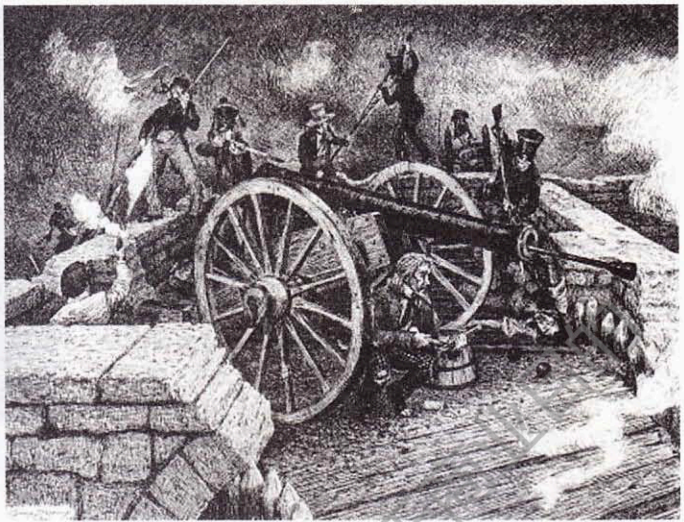


科斯纵队正在攻击阿拉莫堡场较为低矮的西墙



无路可退的墨西哥士兵正在攀登阿拉莫的北墙，他们最终在此率先达成突破





上图：莫拉雷斯纵队的猎兵爬上西南角炮台，将那门18 磅大炮的炮手尽数杀死在他们的炮位上

左图：冲出堡场、试图突围的阿拉莫守军遭到等候多时的墨西哥骑兵截击，并被斩杀殆尽

另一些人则表现为奋力求生。当墨西哥士兵如潮水般涌入堡场，一切守住阿拉莫的希望已告断绝之后，德拉佩纳中尉亲眼看到一名“高大英俊的金发男子”（*他错认为那是特拉维斯*）从容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像一名真正的勇士一样奋战至死。

但是也有为数约70 名的得克萨斯人越过了围墙，试图在夜色的掩蔽下突围。他们踏入了桑塔安纳早就准备好的圈套之中。离开阿拉莫两百米开外，拉米雷斯·塞萨马的墨西哥骑兵正勒马守候在通往冈萨雷斯的大路之上，一俟涌出堡场的得克萨斯人开始分散准备溜走，这些骑兵就像狼群一般扑了过来。走投无路的得克萨斯人进行了抵抗，但在旷野中四散的来复枪手面对骑兵的追击是没有任何机会的。他们如同被围猎的动物般逐个倒在墨西哥骑兵锋利的矛尖和刀刃之下，只有一个名叫亨利·瓦内尔(Henry Warnell)的人带伤逃出生天，但于三个月后伤重死在纳科多奇斯他父亲的家中。堡场外的荒野中还剩下最后一名得克萨斯人绝望地匍匐在灌丛深处长矛刺不到的地方，失去耐性的墨西哥骑兵从鞍桥前的皮套中拔出手枪开了一枪，于是一切都结束了。

回到堡场内部，外围堡墙和炮台已经完全被墨军占领，未能逃走的守卫者均被就地杀死，剩余的人撤入长兵营和教堂内等待最终命运的降临。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抵抗，从教堂内的炮台里，从长兵营的屋顶上，从墙壁上的枪眼中不时喷发出来复枪的闪光和白烟，到处都不断有墨西哥士兵被击倒在地。教堂边瞭望台的旗杆上飘扬着守军的1824 年宪法旗，这里是进攻者试图拿下的焦点，也是得克萨斯射手重点关照的位置，它的脚下横七竖八地躺着夺旗失败的墨西哥士兵尸体。最后一名年轻的战斗工兵少尉踏着前人的尸首终于将旗帜扯下，但当他试图升起一面墨西哥国旗时也被一发子弹打中，伤口是致命的，这位勇敢的小伙子于第二天死在圣安东尼奥。

旗帜的落下并未终结各建筑内守军的困兽之斗，如果墨西哥人要直接对那些房屋发动攻击，他们很可能会再次面临在堡墙下的艰难处境。但是得克萨斯人在匆忙之间留下了可以用来对付他们自己的威力巨大的武器——大炮，那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得克萨斯炮手在匆忙逃下炮台时，忘了或根本没有想到要钉塞大炮的火门或者炸掉其耳轴。在军官的指挥下，墨



直到最近二三十年之前，大部分有关阿拉莫之战的绘画都是相当不准确的，例如左图所描绘的墨军越过堡墙破口攻入阿拉莫的场景就从来没有出现过，阿拉莫的堡墙并未被轰塌。图中墨军身穿的军服是十年前的式样，而且阿拉莫之战发生在初春5 点昏暗的拂晓，当然不可能与图中一样亮堂





上图：杀红了眼的墨西哥士兵冲入阿拉莫医护所，将没有反抗能力的伤病员一一杀死在病床上

左上图：尽管墨西哥士兵已经涌入堡场，但长兵营屋顶上的得克萨斯狙击手仍在一刻不停地向他们射击

西哥士兵将大炮推下坡道，在仅仅十几米远的距离正对建筑的房门开火，这同时起到了现代城市作战中破门撞锤和手雷的作用，气浪、冲击力和迸射的泥灰砖瓦将门扇打得粉碎，也将屋子里面的人打得晕头转向，遍体鳞伤。未等他们回过神来，墨西哥士兵就端着刺刀冲了进来大开杀戒，见人就捅。在狭小黑暗的房间内进行了最混乱可怕的拼斗，一群群人们在一团团分不清敌我的暗影中用手枪、刺刀、匕首、枪托乃至拳头和牙齿互相屠戮，直到墨西哥人依靠源源不断的数量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彻底压倒了守军在绝望中生出的最后力量。

狂怒的墨西哥士兵毫不留情地将手无寸铁的病号杀死在他们的病床上，在南墙边上“矮兵营”的一个房间内，重病在床的詹姆斯·鲍威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位曾经的名满天下的猎刀斗士被杀的细节还不太清楚，有人说他英勇不屈被割舌而死，也有墨西哥军官回忆称他躲在床垫下面“死得像个女人”，但无论如何，在被可怕的高烧折磨近两个星期之后，鲍威曾经健壮的身体既已被酷烈病原的毒素摧毁殆尽，让他蜚声扬名的勇猛顽强也都化为神志不清的谵妄，对此时此刻的他，我们又能有何苛求呢？

长兵营旁的教堂是最后陷落的地方，这里成为了阿拉莫中的“阿拉莫”——最后防线的代名词。由于它的大门没有门扇，守军在门口修筑了沙包工事，躲在其后向堡场内的敌军射击，但墨西哥人推来了西南炮台上的那门18磅大炮，重型炮弹轻而易举地击碎了堵住教堂大门的工事。

教堂里的守军与冲进来的士兵展开了寡不敌众的绝望搏斗，在他们的脑海中也许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希求，只剩下在死前拉几个垫背的本能愿景；而在墨西哥士兵的脑海中，“俘虏”这个词的概念也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释放复仇和杀戮欲求的渴望。倒地的守军仍遭到反复捅刺，尸体被毁伤得血肉模糊。直到教堂内只剩下六七个已经精疲力竭，无力再战的得克萨斯人时，老将军卡斯特里翁赶到这里，他制止了杀红了眼的士兵，下令将这几个得克萨斯人好好看管起来。

教堂最内侧炮台上的守军很可能是最后倒下的，其中有格雷戈里奥·埃斯帕萨，那个与他各为其主的兄弟虽然在墨西哥军中，但并未参加最后的总攻；还有阿拉莫的炮兵军官，战前是冈萨雷斯的一名铁匠的迪金森上尉(Almeron Dickinson)。直到他们倒下后很久，仍有几名墨西哥士兵机械地向着教堂的暗影处不断开火，生怕那里再冒出一名手攥着刀，脸溅着血，要为自己的生命索求最高昂代价的得克萨斯人。

早上6点半，所有的战斗都结束了，枪炮声沉寂下来，硝烟渐渐散去，血红的朝霞映照在阿拉莫的堡墙与溅洒其间的血迹上，将可怕的一幕映入人们的眼帘。墙外的空地中，堡墙的墙头上，堡场中央，冒着烟的建筑内，到处是散落的武器、破碎的军服和狼籍枕藉的尸体，其中很多已经被战斗引发的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只有通过身形还能勉强辨认出他们的种族——得克萨斯人总体来说要比墨西哥人高大魁梧一些。

在尸堆所散发的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中僵立着墨西哥士兵的队伍，他们的行列已经比一天前单薄许多。剩下的人精疲力竭，神情恍惚，尚没有从杀戮的震惊和肾上腺素的刺激中恢复过来，仿佛还未相信自己居然能在这场大惨杀中幸存下来。

但这些士兵仍然必须尽可能直挺地站立着，因为整个晚上都安全地呆在堑壕中观战的桑塔安纳此时在一大群身着金光闪闪华服的护卫和军官随从下进入了阿拉莫。他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情在冒烟的尸体中间走动，对身旁一位名叫费尔南多·乌里萨(Fernando Urizza)的上尉说道：“这都是些鸡崽。是流了很多血，但战役



右图：困在长兵营中的“新奥尔良灰衣兵”。对这些人来说，生的希望已经断绝，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为自己的性命索取最高昂的代价

结束了，这不过是一件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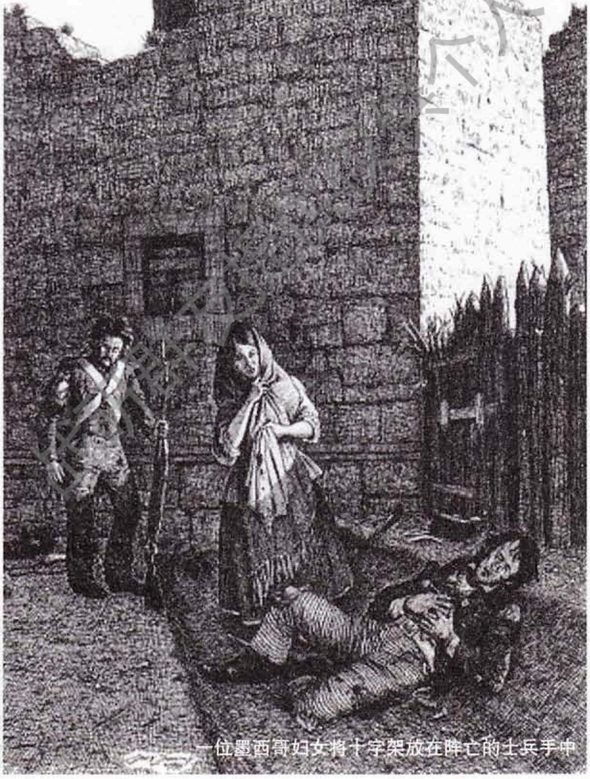
卡斯特里翁将军带着在教堂里捉到的那几名俘虏前来向桑塔安纳致意，不料却令他大动肝火，称这是对他战前不留俘虏命令的公然违抗，抬手下令将这些叛军就地处决，几名急着在独裁者面前表现自己的墨西哥军官对这些可怜的人进行了残酷的折磨，然后用刺刀和军刀将他们杀死。据乌里萨上尉的回忆，在俘虏的惨叫声中，卡斯特里翁将军“转过脸去，眼中含着泪水”。并非所有的墨西哥军人都与桑塔安纳抱有同样的战争观念。

桑塔安纳终于获得了他想要的荣光。可是为了这所谓的荣光，又付出了多少眼泪、鲜血和生命！

对于双方的损失，不同史料来源有着不同的说法，桑塔安纳自己宣称墨军只死70 人，伤约300 人，这当然是最最保守的估计。至于有人后来声言墨军死伤达1600 人，也不过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个数字超过了参加攻击的墨西哥士兵总数。一般认为墨军大约损失了参与总攻兵力的三分之一上下，也就是死伤500–600 人，以当时的标准而言亦可算得上是相当严重的伤亡，何况其中许多伤员都因得不到救护而恶化身死。

另一方面，被屠戮殆尽的阿拉莫守军人数也存在争议。通常所说的189 名守军并未包括在总攻中跑出堡场外被墨西哥骑兵杀死的人，实际上守军总数，当然同时也是他们的阵亡人数应在250 人上下。

3 月5 日晚还呆在阿拉莫里面的所有人中，仅有16 个在墨西哥士兵的刺刀下生还。其中只有两名成年男子，一个是特拉维斯的随身黑奴乔伊，这是桑塔安纳为了显示其作为奴隶解放者的姿态而留下的，乔伊亲眼目睹并讲述了特拉维斯的阵亡过程。另一人是一个名叫布里西多·格雷罗（Brigido Guerrero）的墨裔得克萨斯人，他欺骗墨西哥人相信他是被守军关押的囚犯，从而成为了唯一逃过天劫的阿拉莫战斗人员。



一位墨西哥妇女将十字架放在阵亡的士兵手中



上图：墨西哥士兵攻入教堂，教堂内炮台上的最后一名守军倒下了，至此战斗方告结束

阿拉莫剩下的14 名生还者都是妇女和儿童，其中包括鲍威的一位亲戚、埃斯帕萨夫人和她的4 个孩子、迪金森上尉的妻子，即后来被称为“阿拉莫女士”的苏珊娜·迪金森和她15 个月大的女儿，后来被称为“阿拉莫的女儿”的安吉丽娜·迪金森，这对母女也是生还者中仅有的两个美国裔，苏珊娜的回忆后来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所有的妇女都在与桑塔安纳会面后领到了两美元银币和一条毯子并得以释放，桑塔安纳派一名黑仆护送抱着孩子的苏珊娜和乔伊前往冈萨雷斯，要他们告诉那里的得克萨斯人在阿拉莫发生的一切。

战争的残酷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一对姓伍尔夫的少年兄弟，年纪分别是11 和12 岁，都在战斗中被杀死，据乔伊回忆有一名黑人妇女也死在乱军之中，苏珊娜腿上中了一颗流弹，不过没有大碍。必须指出的是，墨西哥人也许以折磨残杀败军战俘闻名，但他们对非战斗人员算是表现出了相当的克制，相比24 年前“铁公爵”威灵顿号称军纪严明的英国红衫军在西班牙对罗德里戈和巴达霍斯城中妇孺曾犯下的令人发指的暴行，这倒不失为是印第安式的服从和克里奥尔式的骑士风度所共同结出的一颗好的果实。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写到这里，我们尚未提到大卫·克罗基特是怎么死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可说是整个阿拉莫传奇中争论最多的一个谜，有整篇的论文和整本的书籍竞相探讨它的谜底。阿拉莫之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对克罗基特之死并没有确定的说法，

自然地，在美国大众的心中，这位伟大的西部英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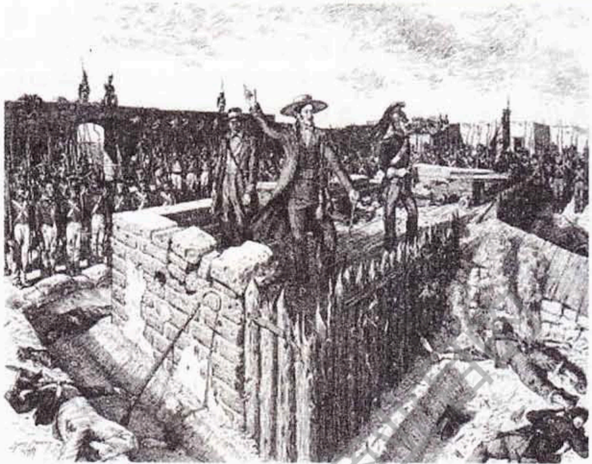
死除了像乔万尼奥利小说中的斯巴达克斯一样，倒在成堆的被他杀死的敌人尸体上，是不可能有其他方式的。但1955年在墨西哥城突然出版了以《得克萨斯的叛乱——一位桑塔安纳麾下军官未刊行的1836年手稿》为题的德拉佩纳手稿，在这份之前从未受到关注的史料中，德拉佩纳作为目击者明白无误地记载了克罗基特是教堂中被俘的守军之一，在桑塔安纳的命令下受尽折磨后被杀。

这一说法立即在得克萨斯独立战争史研究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部分人，特别是一些美国业余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对和批判，认为德拉佩纳手稿是蓄意伪造的赝品，但在这些人的反对中意气往往多过理智，在对手稿原件进行详细的检验，并对其他史料进行多方考证之后，多数严肃的历史学家还是认同了德拉佩纳手稿及其记载的克罗基特之死的真实性。

即使承认德拉佩纳手稿的记载，关于克罗基特之死仍有许多细节已经不再可考。但是与资料的缺乏同样妨碍人们对克罗基特传奇中最后几页之理解的，还有他那美国英雄的名声和随之强加在他身上的期望。换个角度想想，克罗基特不过是来得克萨斯寻找新的生活，要知道他已经整整22年没有打过仗了，他并不是什么见义勇为的江湖斗士，更不是令他扬名的那出戏剧中可以背起汽艇、跳过密西西比河、把短吻鳄当成坐骑，在一百五十码内用来复枪打掉苍蝇翅膀的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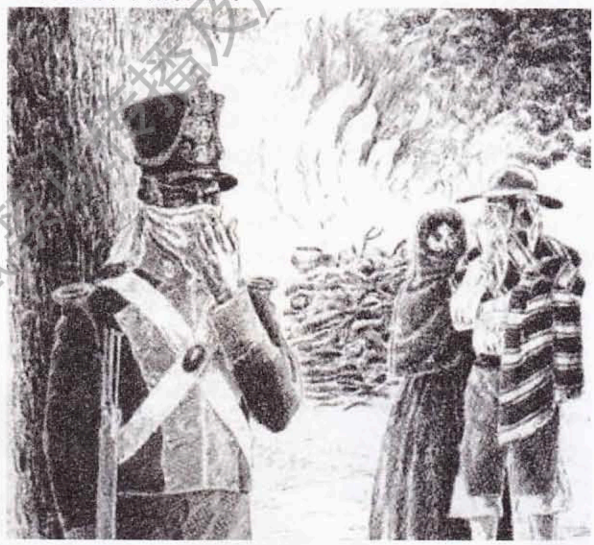
来看看始终抱着真诚而客观的意愿记录一切的德拉佩纳对克罗基特最后时刻的描写吧：“在他们（俘虏）中有一个了不起的人，身材匀称，面貌端正，脸上正映出他此刻的不幸境地，但同时又显现出一种听天由命式的高贵气度，这就是大卫·克罗基特，以他非比寻常的冒险生涯而闻名整个北美大陆。”这样的文字，难道真的会对那个质朴诚恳，风趣幽默，为穷人和印第安人的利益而奔走力争的“老大卫”的真正形象有所损害吗？

克罗基特的声望、鲍威的财富和特拉维斯的雄心都不能避免他们的肉体和其他守军一起化作尘泥，桑塔安纳要用这些“叛匪”的尸首再来一次以儆效尤。在他的命令下，所有守军的尸体都被搬到通往冈萨雷斯的大路旁，与一捆



上图：桑塔安纳发表演说，代表国家向参战的墨西哥士兵表示感谢，但这并不能使得疲惫不堪军队的士气振作起来

下图：在桑塔安纳的命令下，所有阿拉莫守军的尸体均被堆在大路上焚烧，残骸曝露示众。这种毫无必要的残酷激发了各界的义愤，反而对墨军战事起到了不利的反作用





苏珊娜·迪金森（1814–1883），阿拉莫要塞中唯一幸存的美国妇女



美国画家罗伯特·奥登多克1903年创作的油画《阿拉莫的陷落》，用浪漫而不准确的笔调描述了大卫·克罗基特的最后时刻：画中左方身穿边疆猎装的克罗基特正挥舞他那支打光子弹的长筒来复枪，把它当成棍棒继续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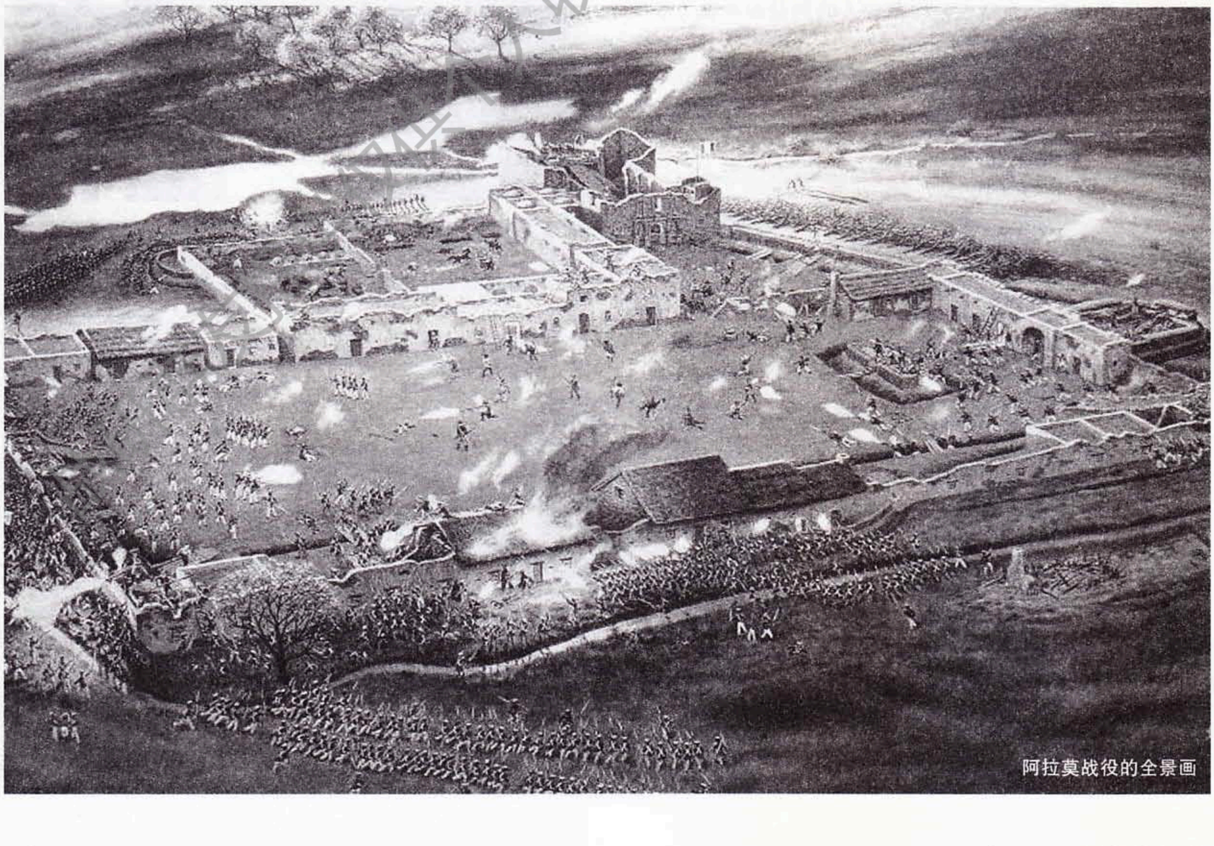
捆干柴一起砌成两座高达 3 米的巨大火葬堆，点火焚烧。在天主教盛行的墨西哥，火葬被视作对死者一种极其严酷的审判和羞辱。两座大柴堆整整燃烧了两天，滚滚浓烟和刺鼻的臭味冲向云霄，令盘旋在那里的黑压压的兀鹰失望不已。灰烬和未烧完的遗骸骨殖都不加收埋地留在原地，像是罗马人的十字架或者是帖木儿的骷髅京观一般警告所有经过的路人这就是叛乱者的下场。

阵亡的全部守军中只有一人免遭焚尸之辱，这就是格雷戈里奥·埃斯帕萨，他那投奔了桑塔安纳军队的兄弟弗兰西斯科·埃斯帕萨获准领回他的遗体，以天主教的葬仪加以安葬。格雷戈里奥当时 7 岁的长子恩里克·埃斯帕萨已经能够记事，后来一直活到 1917 年，他晚年回忆起那可怕的场景时说："它烙在我的大脑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焦痕，年龄和衰老都不可能让我忘掉这一切。"

后来的事实证明，得克萨斯人也许有很多缺点，但其中显然不包括怯懦。这些无谓的残酷不仅没有对得克萨斯人起到吓阻的作用，相反却激发了他们复仇的斗志。在桑塔安纳说出"这不过是一件小事"的同时，他低估了起义者的胆量，低估了这十三天围城的影响，低估了在阿拉莫发生的一切，的确，如果仅就战斗规模和纯军事意义而言，与他崇拜的偶像拿破仑那些波澜壮阔的战役相比，阿拉莫之战也许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那些倒毙在阿拉莫墙头或正哀嚎着渐渐死去的墨西哥士兵来说，阿拉莫不是一件小事；对那些父兄挚友在阿拉莫战死或被残杀的得克萨斯人来说，阿拉莫不是一件小事；对欧美各国因桑塔安纳格杀勿论的非人道行为而哗然的舆论来说，阿拉莫不是一件小事；而也许当桑塔安纳本人在两个月后的圣哈辛托河口面对高喊"记住阿拉莫！"的狂怒的得克萨斯人的时候，连他自己亦都不会再坚持认为阿拉莫"只是一件小事"。


大卫·克罗基特被俘。这是一幅作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通俗水彩画，不过画中克罗基特坚毅不屈的表情是与德拉佩纳的描写相符合的

阿拉莫是 1836 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中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但是它的耀眼光环也往往掩盖了在这之后发生的同样重要的事情。起义开始时得克萨斯最大的一支部队是如何在优柔寡断的范宁指挥下走向死亡的？桑塔安纳又是如何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在圣哈辛托河口阴沟翻船的？"孤星共和国"又是为什么在 9 年之后最终并入美利坚合众国的？读者将可以在本文的下半部分《1836 年得克萨斯独立战争始末（下）》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阿拉莫战役的全景画

曙光中的启明星

——1917年俄国革命（下）



○袁鹏　刘怡

（接战争史研究第38期）

七、第二个九三年

俄国革命的旺代

恩格斯在评论法国革命时曾经写道："那些夸耀自己进行了一场革命的人们，往往在第二天就发现：他们当初并不明白自己在做些什么，而革命的结果与他们当初的设想一点也不相同。"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春天曾经是俄国唯一一个知道自己政治目标和行动路线的政党，那么《布列斯特和约》就是对他们的第一次重创。新政权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但却是以丧失领土、资源、声望和体面为代价的，他们曾经鼓吹"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并向自己的人民承诺会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但第一项前提既然迄今尚未发生，列宁也只好审时度势，先谋求单独媾和。

《布列斯特和约》在政治上的最大冲击，不单是任由乌克兰、波罗的海诸国以及波兰的半独立状态变成了事实，它还使最后一个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其彻底决裂。美国头号俄国问题专家、"冷战政策之父"乔治·凯南对此有过相当独到的分析，在他看来，1918年时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并不担心来自保皇派和旧军人的军事威胁，因为这批代表了旧政权、旧制度的人得不到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的支持，早晚要垮台。

另一方面，当时孟什维克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外高加索地区。十月革命之后，齐泽赫曾经在那里炮制了一个"外高加索大会"，准备独立建国来和彼得格勒相抗衡，不过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个还没建立起来的国家就被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到1918年5月，外高加索形成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三个独立的共和国，他们邀请德国陆军少将冯·克雷森施泰因率3000多名德军进驻，充当苏维埃俄国和土军之间的缓冲，短期之内不可能采取攻势。同样，乌克兰也仅是肘腋之患。

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真正的、也许会致命的危险，来自1905年革命的领导者、全俄最激进也是最受拥戴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农民党。布尔什维克深知，尽管1917年革命首先爆发于城市，但这大部分是因为主要由农民构成的俄国军队士气低落、不愿再战。倘若布尔什维克希望巩固新政权、并将控制力延伸到两个革命中心（彼得格勒、莫斯科）之外的那些真空地带，就必须赢得农民的支持。为此，他们在十月夺权革命后立即就通过了平分土地的法令，把农民拉到了自己一边。

但这一举动在政治上存在风险，因为1亿多虔信东正教、有反犹传统、鄙视"城里人"和知识分子的俄国农民完全可以抛开区区7万名"犹太知识分子的"布尔什维克，把政权夺回来交给社会革命党。为此，布尔什维克一方面采取釜底抽薪之计，在1917年11月底解散了社会革命党占57%席位的立宪会议（这意味着俄国农民不可能通过议会斗争来合法夺权，也不可能与布尔什维克建立联合政府），一方面拉拢和克伦斯基等社会革命党右翼对立的斯皮里多诺娃、卡列林等人，让人数较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成为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政治盟友。

乔治·凯南认为，"这个同盟只存在了几个星期，但已足以在这段关键

性的时期内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提供一个获得多党支持——特别是农民支持——的假象”。

不过，农民性政党往往对土地有着近于狂热的执念，当左派社会革命党得知和平条约要以牺牲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主要支持者都集中在那里）为代价时，他们立即就震怒了；加上布尔什维克的“战时共产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前，左派社会革命党宣布：他们不承认这个“可耻的失败”，也不准备为此负责，随后就不再参加苏维埃的活动。就这样，布尔什维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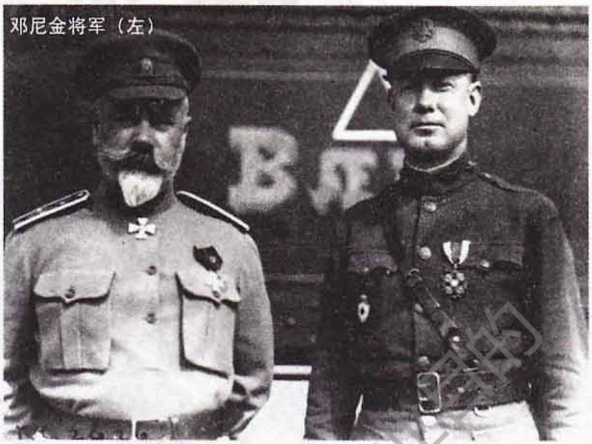
在过去几个月里被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治组合拳打得晕头转向的倒霉蛋们，现在也有几个已经回过神来了，他们发现彼得格勒政权的群众基础并没有多么稳靠，同时也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咄咄逼人已经引起了许多团体的反感，于是打算实施武装抵抗。克伦斯基固然已经出走（他在加契纳之战失败后就下野去了法国），但他过去的两位总司令阿列克谢耶夫步兵上将和科尔尼洛夫骑兵上将却又跑到了顿河军州（Oblast Voiska Donskogo），组织起一支4000 人的反共志愿军，也就是所谓“白卫军”。

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人大会自二月革命以来就不再受临时政府节制，他们推举科尔尼洛夫的支持者阿列克谢·卡列金骑兵上将（Alexei Maximovich Kaledin）为领袖，组建军政府，形成独立态势。彼得格勒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形，1917 年12 月13 日，一群亲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在狂热的黑海水兵援助下夺取了顿河下游重镇罗斯托夫的控制权。卡列金当即决定在顿河地区实施戒严，并与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联手。三位将军曾派一名哥萨克大会委员前往彼得格勒，企图劝说克伦斯基把临时政府迁到顿河军州的首府新切尔卡瑟（Novocherkassk）、以便在顿河地区组织国家政权。但这位信使随即发现克伦斯基已经不知去向，他干脆建议：“哥萨克不需要把自己的命运同这个无赖汉拴在一起……当然，应该把他作为钓某种鱼的诱饵拉在自己身边。在新切尔卡瑟组成的政府应该和莫斯科的社会人士联系。”

三位将军很快就把顿河哥萨克地区变成了俄国革命的旺代[注1]。邓尼金等高级军官响应科尔尼洛夫的号召，前往新切尔卡瑟参与整编白卫军，罗坚柯、米留可夫、古契柯夫等政治领袖也纷纷赶来会合。不过，他们开出的空头支票并不比彼得格勒更诱人，农民们一发现卡列金只会喊一些“顿河地区独立”、“哥萨克自治”的口号，在土地政策上甚至还不如布尔什维克敢拍板，立马倒向了红色政权。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于是以恐怖政策进行威吓，仅在顿涅茨克附近的一个村庄就屠杀了500 多名无辜村民，还破坏了当地的矿井，这反过来又迫使老百姓组建了反对白卫军的游击队。在这一阶段崭露头角的游击队员中，就有脾气暴躁的矿工尼基塔·赫鲁晓夫。

结果，科尔尼洛夫的志愿军一面要和布尔什维克及其支持的游击队作战，一面要提防正在有条不紊地占领整个乌克兰的德军（白卫军以继续战争作为向协约国求援的手段，而布尔什维克已经在和德方谈判停战），得不到国外的资金和军火援助，只能说是雷声大、雨点小。

到了1918 年1 月，顿河区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已经在罗斯托夫和塔甘罗格掀起了一系列罢工和暴动，并成立了一个“顿河军事革命委员会”来和白卫军对抗；彼得格勒也派陆海军事务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Vladimir Antonov-Ovseyenko）率一支亲布尔什维克的部队前往下顿河区，准备对科尔尼洛夫用兵。科尔尼洛夫见势不妙，于1 月28 日决定率志愿军主力南撤库班（Kuban），与那里的另一支哥萨克部队会师，而卡列金因为无法说服科尔尼洛夫，在绝望中自杀了。


邓尼金将军（左）

2 月10 日，布尔什维克军队开始进攻罗斯托夫，在24 日重新攻克了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瑟，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带着4000 名士兵沿着冰封的道路向南退去。这次冰上远征又被称为“第一次库班战役”，情形极为悲惨，白卫军有将近四分之一在中途冻死或被击毙，所幸又得到3000 名库班哥萨克部队的补充，才得以于4 月初进抵新成立的库班苏维埃共和国。

4 月10 日，科尔尼洛夫下令进攻库班首府叶卡捷琳诺达尔（今克拉斯诺达尔），但他自己却在三天后被守军的一枚炮弹炸死，随后还被反攻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焚尸扬灰。邓尼金被推举为继任总司令，他带着残余的志愿军在顿河地区窜来窜去，像一群绝望的流浪汉。当时留在俄国观察形势的英国代办洛克哈特在写给伦敦的报告中不得不强调：“在我看来，布尔什维克的内部力量比多数外国观察家所认识到的要强大的多，而且俄国也没有任何力量有能力取代它。”

不过，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二月革命后，过去由俄国沙皇兼任大公的芬兰宣布了独立，彼得格勒政权在1917 年最后一天确认了芬兰的独立地位。芬兰社会民主党人在

【注1】 1793 年3 月10 日，由于无法忍受大革命强制推行的“新秩序”，特别是不愿服从共和国政府的强制征兵令，法国下旺代省的马什库尔和上旺代省的圣弗洛朗地区发生农民暴动。暴动者的主体是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他们打出“天主教保王军”旗号，推举一些在地方上深受爱戴的旧贵族为领袖，以武力抗拒革命。暴乱随后扩展到整个旺代地区，并蔓延至普瓦卢、布列塔尼、诺曼底等地，共和国政府不得不派出重病加以镇压。直到当年12 月，这场叛乱才被平息，雅各宾派随后就在旺代地区实施了疯狂的报复性行动，在白色暴动和后来的红色恐怖报复中，仅旺代地区就有40 万到50 万人丧生。在那之后，“旺代”（Vandee）就成了“反革命基地”的同义词，而“九三年”、“旺代战争”也随着雨果的著名小说《九三年》的出版，成为残酷内战、革命恐怖最著名的意象之一。
在1917 年俄国革命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法国大革命的词汇被借用，如反布尔什维克分子所说的“弗拉基米尔·罗伯斯庇尔”，而克伦斯基和托洛茨基曾在不同的时期先后被称为“小拿破仑”。实际上俄国在二月革命后废除了君主政体的旧国歌《俄国人民的祈祷》（即《上帝保佑沙皇》）之后，曾宣布以1905 年革命时传遍全俄国的《马赛曲》为国歌，只是重新谱写了俄文歌词。1918 年苏俄改以同样来自法国的《国际歌》作为国歌，并在1922 年成为苏联国歌

他们的俄国同志鼓励下，准备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权。由保守的社会党领导的芬兰政府势单力薄，只能向德国求助。从2 月底开始，德国军队和瑞典志愿兵陆续涌入芬兰，有切断摩尔曼斯克－彼得格勒铁路的危险。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此时正自顾不暇，而白海地区虽然有前无畏舰“切斯马”号、老式巡洋舰“阿斯科利德”号和4 艘驱逐舰，但他们的舰员在十月革命后已经相继溃散了。在这种情形下，英国出于军事考虑，开始筹划对摩尔曼斯克这个北方不冻港实施保护性占领。

1918 年3 月6 日，英国北俄分舰队（这支舰队是一战爆发后为了保护通往俄国北方的海上交通线而组建的）的一艘巡洋舰出现在摩尔曼斯克海岸，送来了第一批200 名海军陆战队。11 日，英国海军旧战列舰“光荣”号（HMS Glory）和法国装甲巡洋舰“奥贝海军上将”号（Amiral Aube）也先后抵达。

英国人最初的干涉企图是比较单纯的：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之后，彼得格勒急于退出战争的意图已经很清楚了。伦敦既不希望之前运抵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的大量援俄军需物资被德国人或芬兰人染指，更不希望它们落入已经对德媾和的布尔什维克之手。

不过，在俄国的英国外交使团以及英国军事观察员在1918 年春天已经陆续撤退了，只剩下少数几个记者，电报要几天甚至几周才通一次，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抱怨说：“俄国就像一片茂密的丛林，没人说得清里头在发生什么。”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只能抱着试探性态度，首先尝试在俄国沿海地区建立几个落脚点、守住存放协约国军需物资的仓库，随后再相机而动。而劳合·乔治对俄国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他甚至一直以为“哈尔科夫”（乌克兰东部主要城市，在1919－1934 年是苏维埃乌克兰首都）是某个俄国将军的名字。

不过，也有一些人比劳合·乔治要“清醒”一些。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是第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彼得格勒政权抱有敌意的大国领导人，这主要是因为巴黎是沙俄政府最大的债主，而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十月革命之后公开宣布要把



两国间的债务一笔勾销。在克列孟梭看来，对俄国的干涉不仅具有军事价值（重建对德东线战场），而且能防止“赤色瘟疫”向欧洲中心地区蔓延。

同样对干涉俄国兴致勃勃的还有日本人，他们希望继续日俄战争未竟的“伟业”，不仅要把俄国的整个远东地区吞下来，还要把势力深入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日本军方与外贝加尔哥萨克领袖谢苗诺夫中将（Grigory Semyonov，他是临时政府委任的贝加尔地区专员）、中东铁路护路队司令霍瓦尔特等人频频接触，为出兵西伯利亚进行准备。

1918年1月1日，临时政府在海参崴的地方自治机关宣称布尔什维克势力发展迅速、己方无力抵挡，要求协约国派舰相助。英法两国遂建议由美国和日本派出舰队，保护海参崴港内堆积如山的协约国援助物资。大喜过望的日本陆军乘机提出单独出兵西伯利亚，这一建议得到了英国和法国的赞同，但在华盛顿碰了钉子。美国政府固然像英国一样对俄国内部的情况不甚了解，但也绝不愿意日本在远东取得过大优势（实际上美国主持1906年日俄和谈时也抱有相同的目的）。最终，两国决定一起派舰“协防”，暂不介入陆战。

3月1日，美西战争时的老式装甲巡洋舰“布鲁克林”号（USS Brooklyn）搭载美国海军陆战队驶入海参崴港，日本则派出了肥前号战列舰和石见号（两舰都是日俄战争中俘获的俄国旧舰）、朝日号海防舰，英国也派来了“萨福克”号装甲巡洋舰。协约国在对德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小心翼翼地踏进了俄国这片“丛林”。

开弓没有回头箭。4月4日，就像每一次日本对外扩张中会出现的那样，3名日本商人在海参崴街头被身着俄国军服的士兵抢劫并枪杀了。肥前号等三舰马上组成500人的特别陆战队上岸“护侨”，“萨福克”号和“布鲁克林”号随即跟进，协约国跨过了自己当初设定的红线。日本此时已经诱使中国段祺瑞政府签署《日华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3月26日），取得了在远东用兵的后勤和情报保障，只是苦于美国的克制，依旧只能把出兵范围限制在海参崴一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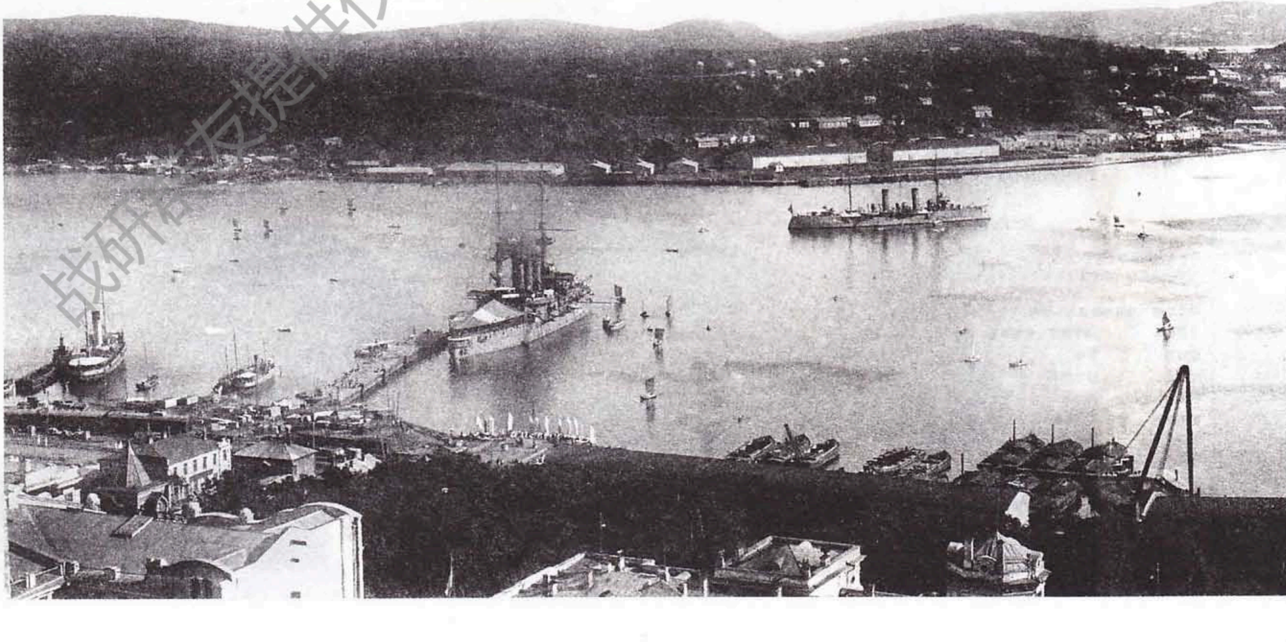
然而，美国人的态度在几个星期后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捷克军团叛乱的发生。

捷克军团的正式名称叫“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Ceskoslovensky sbor na Rusi），是沙皇俄国为瓦解奥匈帝国推出的一项发明——自1914年起，俄国就四处搜罗被俘的奥籍捷克战俘和匈籍斯洛伐克族战俘，以战后给予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独立建国的地位为诱饵，招募其编组志愿军参战。捷克军团最初以连、营、团为单位纳入俄军编制之下作战，1917年夏天扩编至旅级。到十月革命爆发前夕，归俄国西南方面军指挥的第1捷克军已经编成2个师、近4万人的部队，另有2万至4万人在西伯利亚的几个战俘营中等待编练（当时除了在俄国的捷克军团外，在法国和塞尔维亚另有两支小型的捷克军团）。

《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之后，俄国依照与德奥方面的协商，开始遣返关押在西伯利亚的同盟国战俘，而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会议”俄国支部也在和俄方谈判，拒绝将捷克军团的成员作为战俘遣返回奥匈帝国。彼得格勒方面最终同意为捷克军团单独出具一个安置方案。此时法国陆军主动提出他们愿意承担捷克军团的善后。

根据法国人的提议，捷克军团将从东部战线和西伯利亚的营地集中撤出，由铁路运送至阿尔汉格尔斯克，随后由进入白海的协约国舰队海运至欧洲，继续同德奥作战。不过法方随后就宣称，自己没有能力提供海运的船只（英国代办洛克哈特后来抱怨说，若不是法国人太蠢，捷克军团本来可以平安地从俄国撤出来的），德国人也威胁说要截断捷克人向阿尔汉格尔斯克转移的交通线，最终，彼得格勒当局在3月26日与捷克军团达成了一个新协议：乌克兰前线和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将在解除武装后，经西

1918年日美英联合出兵干涉俄国革命时的海参崴港，画面右侧是金角湾入口，港内几艘大舰由左向右依次是日本战舰肥前号、英国巡洋舰“萨福克”号、美国巡洋舰“布鲁克林”号、中国巡洋舰海容号、日本海防舰石见号



战研社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伯利亚铁路东运至海参崴，随后由协约国军舰运往欧洲。不过由于当时俄国的乱局，捷克人只交出了少量重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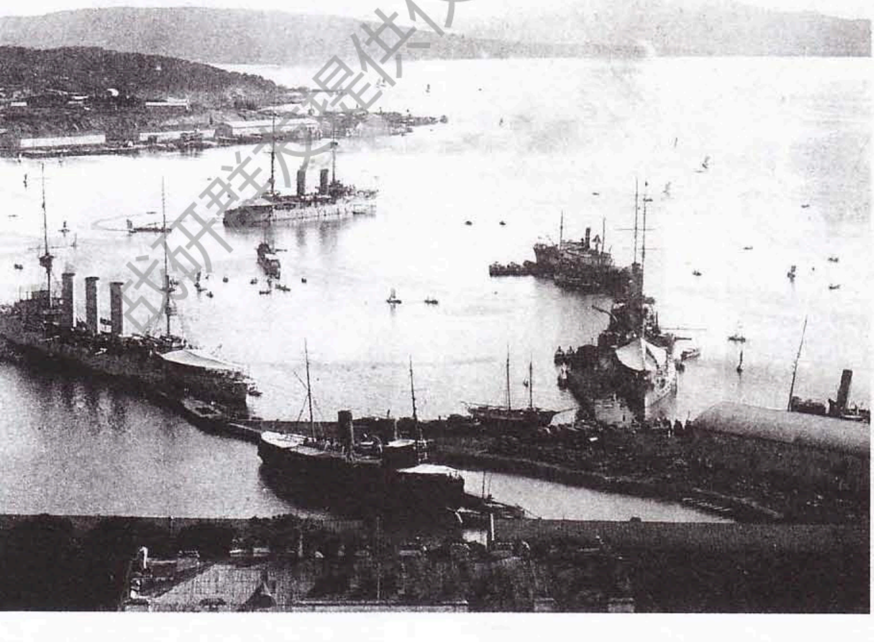
1918年从3月底到当年5月初，有14000多名捷克军人陆续经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至海参崴，另有8000人滞留在奔萨，8000人在车里雅宾斯克，4000多人在西伯利亚和其他地区。由于海参崴方面的协约国军队于4月初陆续上岸“护侨”，俄方对转移中的捷克人敌意日渐浓厚，在4月中旬，捷克军团的运输一度中断了一个多星期。

对于捷克人和原德奥战俘的区别处理更是让捷克人每天都会遇到麻烦——西伯利亚战俘营中的非捷克裔战俘此时正在向西遣返，他们对这些“叛国者”相当鄙视，乐于传播“俄国人已经重新决定把捷克军团交给德国人”的流言；而布尔什维克党在正规红军最终编成之前，不得不依靠像库恩·贝拉（Kun Bela）这样的匈牙利革命者从匈牙利战俘中招募“国际纵队”作为武装力量，这批匈牙利人和捷克人也有矛盾。5月14日，就有这样一群匈牙利人在车里雅宾斯克车站和一群捷克人发生了械斗。当地苏维埃自然不会得罪意识形态相同的匈牙利“同志”，于是马上下令逮捕闹事的捷克人。

此时车里雅宾斯克的捷克人有近8000人之多，他们马上劫狱救出了战友，解除当地赤卫队的武装，还占领了军火库。刚刚由彼得格勒迁移到莫斯科办公的最高军事人民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极为震怒，5月26日，他宣布捷克军团已经发动叛乱，命令红军部队立即予以镇压！


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捷克军团

发动兵变的捷克军团车里亚宾斯克集群一路向西，于5月28日攻陷了乌金斯克，31日夺下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与托木斯克，6月7日占领鄂木斯克，与先期抵达的西伯利亚集群（4000人）会合。在奔萨的8000人集群则于7月5日经过萨马拉和乌法，也向车里亚宾斯克突围而去。更重要的是，先期抵达海参崴的14000名捷克军团主力不愿坐视同胞在乌拉尔地区被消灭，他们转而经西伯利亚铁路再度西进，准备与西伯利亚集群会师。一时间，莫斯科以东的真空地带到处都是捷克军团的人马，其中只有少数在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其余则在漫无目的地游荡。



当捷克人占领了伏尔加河上的萨马拉之后，托洛茨基发出了第一道征召工人服义务兵役的命令，但这些人几乎没有受过基本训练，在开赴前线的途中才刚刚武装起来。在莫斯科，可供布尔什维克调动的只有瓦采季斯（Jukums Vacietis）指挥的“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师，以及库恩·贝拉领导的国际纵队。但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此时也在莫斯科发动暴动，因此在捷克军团发动进攻后的两个半月里，他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挡。

进入8月后，升任东方方面军司令员的瓦采季斯率拉脱维亚师和新组建的3个军向捷克军团发动进攻，但依旧没有取得像样的战果。8月6日，喀山也被放弃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捷克军团兵变是一个纯粹偶然性的事件，但在当时却成了协约国大规模干涉苏俄的诱因。美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值得一提——捷克军团事件发生之前，威尔逊总统是不主张在俄国这片“丛林”投入重兵的，在当年1月8日宣布的作为战后世界秩序基础的“十四点原则”中，他还公开倡导“外国军队撤出俄国，并保证俄国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但“十四点”又曾

战研群友提供仅供个人收藏禁止传播及用于


叶卡捷琳堡的“浴血大教堂”，建在沙皇一家被杀害的伊帕季耶夫宅原址上

宣称“允许奥匈帝国境内各民族自治”，这一条刚好和捷克军团要求返回欧洲、继续对德作战以便争取独立的诉求相吻合。这样一来，是否对捷克军团进行援助，就成了检验“十四点”和美国国际公信力的试金石。而美国这个最难缠的角色松了口之后，英法日等国当然乐得扩大对俄国的干涉。

进入6 月，当协约国诸强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扩大对俄干涉时，在顿河地区徘徊了两个多月的邓尼金志愿军也开始恢复攻势了。德罗兹多夫斯基上校的3000 名士兵加入了邓尼金的部队，使其总数恢复到近9000 人。6月23 日，邓尼金发起第二次库班战役，直逼尼古拉二世全家被软禁的叶卡捷琳堡。7 月16 日晚，行刑队闯入沙皇居住的小楼，将沙皇一家及仆从共11 人当场杀死，随即就地掩埋。末代沙皇一家就像拉斯普京在战前所说的那样，“被毁灭到最后一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处死沙皇的决定虽然是由叶卡捷琳堡当地苏维埃作出的，但事先依征求了政治局的意见。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这位“俄国的丹东”回想起了英国处死查理一世、法国处死路易十六之前排场隆重的审判，为了强调革命的正当性、尤其是要在俄国农民和国际舆论面前揭露沙皇的“罪行”，他建议设法把沙皇转移到后方，待时局稳定后再在莫斯科进行会审。托洛茨基甚至为自己选择了首席检察官的角色，他要在法庭上当众和尼古拉二世对质。不过其他政治局成员对这个戏剧感过于强烈的设定不太感冒，他们更担心沙皇落到邓尼金手里，从而使俄国境内一切反革命的军事力量找到一个政治领袖（当然，这个想法本身有些过虑），最终仍批准了处决行动。

批准秘密处决沙皇全家的那些人大概不会想到，在那之后二十年，他们当中活下来的大多数人自己会在莫斯科经历一场“世纪大审判”，他们的“罪行”在俄国农民和国际舆论面前被揭露出来，随后以残忍的方式处死。而渴望担任首席检察官的托洛茨基，则终究没能赶上他的大戏，他没有得到一场世纪审判，而是在1940 年的一个夏夜被突然闯入的凶手用冰斧暗杀——历史给予他们的，刚好是他们最不想要的东西。

7 月25 日，邓尼金的部队开入叶卡捷琳堡；8 月3 日，科尔尼洛夫丧生的叶卡特琳诺达尔也被攻下。红军节节败退的局势令这位将军十分兴奋，由于成功会合了库班哥萨克人，进入9 月，邓尼金志愿军已经增加到35000 人，改称“北高加索志愿军”。

除邓尼金外，顿河哥萨克大会推举的新首领克拉斯诺夫将军（Pyotr Krasnov，他就是1917 年11 月在加契纳指挥克伦斯基的部队向彼得格勒反攻的指挥官）现在也和德



左图：1981 年，流亡海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将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以及四位仆人封为殉道圣徒（另两名被害仆人一为天主教徒，一为路德派新教徒，未被封圣），2000 年被全俄东正教会重新确认。左图为俄国东正教会的罗曼诺夫家族殉道圣徒圣像。前排中央为阿列克谢皇储，身后是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皇后，左边是四位女大公。尼古拉二世右边修女装束的是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姐姐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女大公，其身后是约翰亲王、伊戈尔亲王、康斯坦丁亲王、谢尔盖大公等罗曼诺夫皇族，画面左侧是随皇族成员一道被害的秘书、侍女和修女。下图为尼古拉二世一家的陵墓，位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要塞教堂内。尼古拉等人的遗骸在1979 年被发现，1998 年经过DNA 检验得到确认（皇储和玛丽亚女大公的尸体未找到），并在当年7 月17 日，即沙皇一家遇害81 周年纪念日，举行了隆重的重新安葬仪式。2007 年，阿列克谢皇储和玛丽亚女大公的零碎遗骸被叶卡捷琳堡的一位建筑商人发现，并得到DNA 确认，也运往圣彼得堡安葬



国人达成谅解，开始武装一支近40000人、装备56门火炮和179挺机枪的哥萨克军队。邓尼金眼前浮现出了一幅令人兴奋的情形：“20个月了，北高加索终于同中心地区切断了联系，他们与全俄国的粮仓以及格罗兹尼油田的联系也断绝了。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基础将受到巨大破坏。”

“第三次革命”

邓尼金的兴奋绝非无中生有。四五月份本来是俄国农村收获的季节，但乌克兰和顿河流域的战事严重破坏了生产，而《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得俄国不可能从那里获得粮食；加上和产粮区的交通运输被隔绝，进入1918年之后，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俄国中央地区已经开始陷入粮荒。

1918年1月7日，莫斯科省的五位农民写信给列宁说：“新年好，俄国无产阶级高贵的领袖。我们莫斯科省季米特洛夫县的五个农民诅咒你，因为你们这些善人使我们陷入了绝境。我们连一小块面包也没有了……孩子饿得全身浮肿，娘儿们哭喊着给我面包”1月15日，来自前线的一封信更是对列宁发出了警告：“列宁同志，我们已经四个昼夜没有见到面包了。我们拖着饥饿的身体，光脚行走，而和平还是没有……列宁同志，您的良心何在，您做出的三天内就会有和平、土地和自由的承诺何在？您为了夺取政权做出过这些承诺，而您不想去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如果2月1日以前您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这就是敌人，你们将会像杜鹤宁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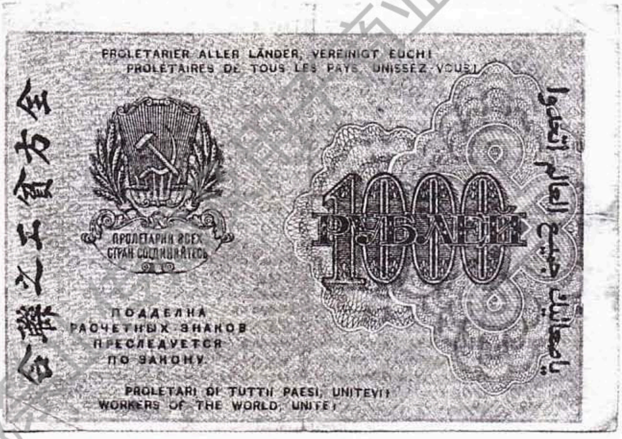
很显然，没有军队，苏维埃政权不能立足；而没有粮食，即使有军队，苏维埃也不能支撑下去。面对严峻的粮食危机局势，布尔什维克当局决定采用非常手段。5月9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法令，宣布实行粮食专卖。他们要求法令在各乡公布一周之内，“每个粮食占有者必须将超过种子粮和下次收获前的定额消费量的全部余粮呈报交售”，违者将受重罚，处以十年以上监禁并没收全部财产[注2]。在《关于粮食专卖法令的要点》中，列宁特别强调：“要摆脱饥荒，必须向囤积粮食的农民和其他资产阶级展开无情的恐怖的斗争”，并且要求“凡有余粮而不把余粮运到收粮站者，一律宣布为人民的敌人，判处10年以上的徒刑，没收全部财产，永久驱逐出村社”。

6月1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又下令各乡成立贫农委员会，负责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并协助各地粮食委员没收余粮。8月20日，粮食人民委员会向各地征粮队下发了严格的工作细则，要求每支队伍不得少于75人，并要配备2－3挺机关枪。当时乌克兰和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已经无法征集到粮食，因此列宁将目光对准了遥远的南俄，特别是顿河、库班和北高加索地区

【注2】 客观地说，粮食征集制度并非由布尔什维克发明。早在一战中期，为了应对国内的粮食危机，沙皇政府就曾在俄国中部粮食产区的农村实行过粮食征集制。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也几度发布粮食征集令，从农村强制征粮，以供城市和军队需要。不过，这几次征粮由于政府对农民缺乏强有力的恐怖动员手段，因此其效果和影响远不如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征粮来得显著。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沙皇政府还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他们都将粮食征集当作是急迫情势下不得已的临时举措。而对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来说，他们一度相信“粮食公有”乃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表现之一，而反抗征粮则是“落后”、“反动”的表现。这种信念反过来又给粮食征集制加上了革命浪漫主义的面纱。诗人叶赛宁就曾梦想参加征粮，而日后成为政治异见分子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更是直接参加了坦波夫省的征粮工作。而粮食征集制带来的恶果要到很长时间之后才被承认



对城市居民实行食品配给



上图：1919年苏维埃政权发行的1000卢布纸币，上面用俄、德、法、意、英、中、阿拉伯七种文字写出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当时俄国农村的无产者却拒绝用粮食去换取这种纸币，而是要印花布、糖、盐等商品，或者50卢布以下的小面额纸币

装备最好的是随斯大林南下的武装征粮队，达400人之多（包括斯大林的秘书、未来的夫人阿利卢耶娃），其中100名为拉脱维亚士兵。征集余粮的办法为：征粮队召开贫农大会，宣讲布尔什维克的粮食政策，揭露富农的“破坏敌对”行为，随后对所有人的粮食储备情况进行登记。正式收粮时，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对不执行任务的人则按定价的75%收购，隐藏者皆无偿没收。所有余粮被征集完毕并运出村之后，征粮队才离开，奔赴下一个村子征粮。

斯大林在察里津地区的征粮队是最忠实地贯彻了列宁的“无情的恐怖的斗争”指示的，将征粮完全变成了一场军事行动，抢劫、查抄、逮捕、杀人，一样也不少。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现实：当时农民拒绝接受一文不值的苏维埃卢布纸币，要求获得商品。面对激烈的反抗，斯大林依靠着他的400名士兵，一直没有敢进入察里津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斯大林一共在察里津地区搜集到了103车皮的粮食、95车皮的大牲畜、9车皮葵花籽油和19万只油粕，但这些“成果”大多被耽搁在了路上，对解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燃眉之急一点作用也没起——斯大林对此并不关心，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军事方面。

到1918年年中，粮食危机席卷了整个前线、城市和农村。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图拉、哈尔科夫和萨马拉等城

市出现了自发的抗议、罢工和示威游行，农村里农民的骚动也频起。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不断下降，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力量不断增强。该党1918 年4 月的人数只有24000 人，而到6 月就增加到了80000 人。在30 个城市的地方苏维埃选举中，18 个城市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获得了胜利。

粮荒是乌克兰战事、特别是《布列斯特和约》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虽然列宁一直没有改变他对和约的机会主义态度（例如不断号召德国和奥地利工人发动起义，授权组建红军），但他绝对不允许本方同志公开以武力再度对抗德国。在乌克兰秘密袭击德国占领军的布尔什维克被召回了后方，在和约划定的停火线以西，俄国赤卫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乌克兰同志被德国人打死，这反过来大大刺痛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感情。要知道，像斯皮里多诺娃和卡列林这样的老社会革命党人可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小跟班，斯皮里多诺娃22 岁时就因暗杀警察总监卢热诺夫斯基将军被判终身监禁，流放到西伯利亚，卡列林也是年轻时手持炸弹对抗专制政府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有着辉煌的革命史。他们作为一个著名民粹党派的领袖、同时也是殉道精神强烈的传统俄国人，根本不可能像布尔什维克那样从纯粹而又冷酷的政治现实主义角度看待问题。

对社会革命党人来说，既然事实已经证明布尔什维克在“背叛”革命，而“人民在苦难中”，那么只有再度操起炸弹，革布尔什维克的命。

7 月5 日，当全俄苏维埃全体代表从邻近前线的彼得格勒转移到相对安全的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第一天，左派革命党人从言论上开火了。乌克兰代表登上讲台，陈述乌克兰游击队正在拼死斗争、要求援助，卡列林和和斯皮里多诺娃则高声斥责布尔什维克的“叛卖行径”，叫嚣着要废除和约、进行“解放战争”。

当卡列林结束演讲、走过正在旁听辩论的德国驻俄大使冯·米尔巴赫伯爵（Wilhelm von Mirbach-Harff）所在的包厢时，他指着大使厉声咒骂德皇以及“条顿帝国主义”，这番冲动之举赢得了代表们的掌声。当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站出来指责乌克兰游击队员枪杀主张维护和约的政委时，卡列林打断了他的话，高喊道：“又一个克伦斯基！”“你这个新拿破仑！”



左图为1918 年俄国进行地方苏维埃选举的情景。当时俄国农民主要支持社会革命党，因此布尔什维克对此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例如在计票时规定农民的10 票才等于城市工人的1 票

身材矮小、疲惫不堪的斯皮里多诺娃站上了讲台。她先是指责托洛茨基是“波拿巴式的军国主义者”，接着又痛斥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叛卖行为”。最后，她要求革命者们捡起昔日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并且以不祥的宣誓做结：“我要像过去那样，手握左轮枪和炸弹。”多数代表此时还没有料到，这就是“第三次革命”的预警。

当时正在会场里的法国军事观察员萨多尔上尉注意到，讲台下的列宁“那张不可思议的罗马牧神似的脸像往常一样沉着冷静而略带讥笑”，“他从未停止过发笑，也不会不笑”。而站在列宁身旁的托洛茨基也试着要笑，但“愤怒、激动、焦急却使他的笑意一下子变成了痛苦的怪相，他那生气勃勃、富有表情的脸庞便黯然失色了”。萨多尔暗想，“他确实没有当家做主的统治意志、冷静的头脑和绝时的自制力。然而他……毕竟是一位比较宽容的人”。

比托洛茨基更少宽容、更多讥笑的列宁随即以凌厉的言辞回应斯皮里多诺娃的示威：“不，同志们，这不是争吵，这是真正的无可挽回的分裂……一切总得有个限度。”他开始一一列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要求的不合理性：首先，这些人念念不忘废除《布列斯特条约》、重新对德开战，这无疑会“在最短时期内终结由于布尔什维克政府批准布列斯特和约而形成的喘息时机”；其次，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自己依靠农民的传统，对布尔什维克的农村政策、特别是粗暴的粮食征集制非常不满，他们不仅公开表示异议，甚至意图阻挠征粮，干扰了日常行政；再次，他们还对契卡人员鲁莽逮捕和处决“反革命分子”（例如1918 年1 月7 日发生的原临时政府部长申加廖夫和科科什金在监狱医院被无故枪杀的事件）表示抗议，这无疑是对肃清破坏分子的阻挠。

在列宁看来，这些昔日的盟友犯了可笑的“幼稚病”，而这种“幼稚病”会把岌岌可危的苏维埃政权彻底推向毁灭，面对这种威胁，他并不畏惧和这些“农民之友”公开决裂。

单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列宁的决断不能说是过激：在内战正在无限制扩大的情况下，首先需要保证的是军事经济的运转，尤其是集中力量依次对几股反共武装用兵，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妨碍决策、影响军事行动的异见都是危险的信号，当这些异见分子还威胁要以武力作出反抗时，尤其要以强力弹压之。

除此以外，乔治·凯南还看出了另一层深意：布尔什维克党在二月革命之后一直以苏维埃作为唯一的权力机构和合法性代表，并且以苏维埃的名义发动了十月革命、解散了立宪会议，但因为苏维埃代表会议一直不是按宪法选举产生的，共产党实际上全面介入和控制了一切政府事务，把苏维埃变成了党组织的一个执行机关。当左派社会

革命党宣称要退出苏维埃之后，地方和中央苏维埃更是成了布尔什维克的禁脔。当斯皮里多诺娃们公然反对苏维埃的决议时，他们其实是在暗示自己要建立一个新的权力机构，至少是怀疑现在这个权力机构的合法性，这是已经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的布尔什维克党绝对不能容忍的。

当然，在1918年7月的莫斯科，没有人预料到左派社会革命党的“第三次革命”来的如此之快。7月6日14点15分，即全俄苏维埃五大召开的第二天下午，位于莫斯科银钱胡同5号的德国大使馆内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前一天刚刚被卡列林怒斥过的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被手枪近距离击中，当场毙命。

蹊跷的是，在米尔巴赫遇刺之后大约45分钟的时间里，德国大使馆的电话忽然拨不出去了。直到下午3时，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亲自坐车去外交人民委员会，向副人民委员卡拉汉通报了情况。卡拉汉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打了电话，契切林连忙给外交人民委员会事务管理局局长布鲁耶维奇打电话，布鲁耶维奇将米尔巴赫被刺的消息报告了列宁。列宁当即给绰号“铁人费利克斯”的契卡负责人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打电话，要他封锁所有的道路抓捕凶手。之后，列宁找来了斯维尔德罗夫，给托洛茨基打电话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米尔巴赫扔了炸弹！”几乎在同一时刻，斯维尔德罗夫和列宁分别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后来的部长会议主席和总理）的名义，签发了一份命令，宣布“今天，7月6日，约下午3时，两名英法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钻到德国大使米尔巴赫那里，利用伪造的捷尔任斯基同志签名的假证件，并在这一假证件的掩护下用炸弹杀死了米尔巴赫伯爵。干出了这次挑衅事件的一名恶棍……根据现有的材料，他是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捷尔任斯基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

一时间，莫斯科全城震惊，到处有人谣传“德国人很快就要派兵来保护大使馆”。捷尔任斯基奉列宁的命令亲赴现场调查，他马上就发现，行凶的两人果然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属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分别是契卡的高级特务、19岁的雅科夫·勃柳姆金（Yakov Blumkin）和安德列耶夫（N. A. Andreev）。这两个人手持契卡副主席、另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德罗维奇签发的通行证进入德国大使馆，声称前来调查大使的亲戚“罗伯特·米尔巴赫”的间谍案件。随后勃柳姆金就拔出左轮手枪向大使、书记官和翻译开了枪，不过无一命中。书记官和翻译躲到一张桌子背后，而米尔巴赫企图跳窗逃生，刚好被安德列耶夫一枪打中。两名刺客随后丢下一颗手榴弹，从后门跑出使馆、坐上一辆汽车逃之夭夭。

在一得知米尔巴赫被刺的消息之后，列宁便马上愤怒地断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米尔巴赫扔了炸弹！”他的判断一点不错，斯皮里多诺娃和卡列宁试图以此举诱使德国人重新和俄国开战，从而推翻布列斯特和约；左派社会革命党控制的部队也已经开始调动。为了阻止这一企图，



被暗杀的德国驻俄大使威廉·冯·米尔巴赫伯爵（1871–1918）



为契卡工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员、暗杀米尔巴赫的凶手雅科夫·勃柳姆金（1898–1929）。他1917年曾积极参与“红色恐怖”的处决活动，并受到契卡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和拉齐斯的赏识。他在刺杀米尔巴赫后顺顺当当地跑到乌克兰生活了好几个月，直到拉齐斯被调往乌克兰工作，才跑回莫斯科“自首”，并在1919年5月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赦免



Секретн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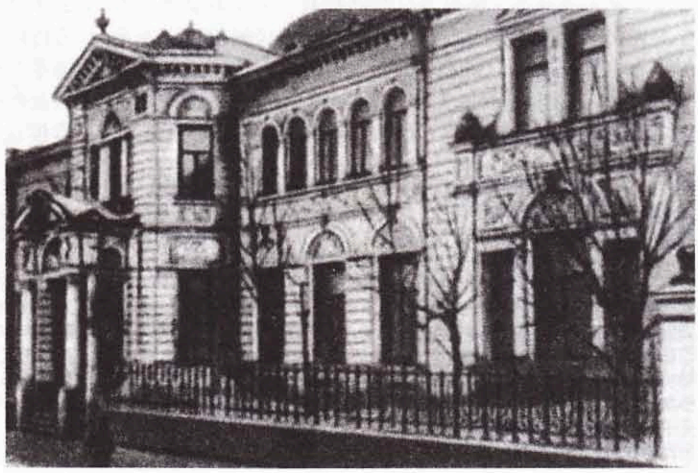
Всероссі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миссія

УДОСТОВѢРЕНІЕ.

Всероссі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миссія уполномачиваетъ ея члена Якова Блюмкина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Революціоннаго Трибунала Николая Андреева войти въ переговоры съ Господиномъ Германскимъ Посломъ въ Россі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ѣ по поводу дѣла, имѣющаг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отношеніе къ Господину Послу.

Предсѣдатель Всероссійской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Коммиссіи:

Секретарь:



勃柳姆金刺杀米尔巴赫时使用的假证件。
右图为莫斯科银钱胡同的德国大使馆




莫斯科大剧院，1918 年全俄苏维埃五大在此召开

左图：社会革命党的一张海报，图中文字“Partiya Soz-Rev”是社会革命党的简称

列宁下令契卡特工和拉脱维亚士兵马上包围苏维埃五大的主会场——莫斯科大剧院，450 名代表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员依次退出会场，留下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被直接逮捕，接受契卡的审讯。

与此同时，安然脱逃的勃柳姆金和安德列耶夫已经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执委德米特里·波波夫（D. I. Popov）会合，后者是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武装领袖，也是“第三次革命”的总指挥，统率着一支由芬兰士兵和水兵组成的契卡分队，数量约800-2000人。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莫斯科能找到的正规军差不多都被托洛茨基调去抵挡捷克军团了，因此波波夫的这个分队实际上就是莫斯科的卫戍部队，当他们突然发起暴动，自然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波波夫的一支部队捣毁了契卡总部，逮捕了契卡执行委员拉齐斯，把他抓到暴动总指挥部；而正在调查暗杀事件的捷尔任斯基刚好带着两个警卫闯入波波夫的指挥部、企图逮捕刺客，此时也被一并拿下。暴乱者占领了电话局和电报局，向全国其他地区发出了几份措辞凌乱的电报和宣言，他们声称列宁的政府已经被推翻，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控制莫斯科并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命令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对德国宣战。

不过，这只是波波夫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这些拥趸是很好的暗杀者和游击队员，但他们对城市巷战缺乏经验，指挥也很松散，没能形成配合。而当天深夜，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找到了最后两支可靠的部队——瓦采季斯的拉脱维亚师和库恩·贝拉的国际营，下令武装镇压。

7 月 7 日一早，拉脱维亚师陆续进入市区的预设阵地，并在波波夫的指挥部对面架起了大炮。经过一番不成功的谈判之后，拉脱维亚人开火了，第一发炮弹就摧毁了指挥部大楼。波波夫立即化装逃离了莫斯科，他后来潜往乌克兰，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马赫诺的武装，1921 年在内战中被打死。其余的暴动者在最初的抵抗之后，很快被布尔什维克说服投降了。

7 月9 日，托洛茨基向复会的苏维埃汇报了镇压暴动的情况，左派社会革命党作为“反革命团体”被彻底取缔，整个党团被从各级苏维埃中开除出去，给刺客签发通行证的亚历山德罗维奇等几名首要分子被契卡处决。

伴随着左派社会革命党烟消云散，刺杀米尔巴赫案件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列宁亲赴德国大使馆吊唁，信誓旦旦地宣称会保护大使馆的安全，挽回了濒于断裂的俄德关系。捷尔任斯基在7 月7 日递交辞呈，离开了契卡主席的职位，不过仅仅一个月后就官复原职。至于凶手勃柳姆金，契卡宣称他已经逃到了乌克兰，无从追捕【注】。

也有些额外的倒霉蛋因为卷入莫斯科暴动而稀里糊涂丢了性命。这当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将军（Mikhail Artemyevich Muravyov），他也是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当然刚刚被任命为东方方面军司令员，率兵抵挡捷克军团的挺进。十月革命爆发时，穆拉维约夫曾指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在加契纳击败克伦斯基的反攻，

【注】 对捷尔任斯基的象征性处罚和凶手勃柳姆金的下落不明使得人们对这起刺杀事件的真相表示怀疑。就像后来的在苏联发生的许多扑朔迷离的暗杀事件一样，在事发当天，德国大使馆的防卫较平日突然松懈起来。苏联解体后，随着对亚历山德罗维奇等人的审讯记录的开放，人们读到了与苏联当局一贯的宣传很不一样的陈述：亚历山德罗维奇声称由他签字的那张通行证是经捷尔任斯基批准的，当时被逮捕的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表示他们对暗杀行动毫不知情。不过现在公布的材料尚不足以证明勃柳姆金的刺杀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受人指使。
勃柳姆金此人的结局也很有意思：莫斯科暴动失败后，他逃往乌克兰，参加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契卡，策划对彼得留拉以及其他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暗杀行动。1919 年他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赦免之后不久便宣布退出左派社会革命党，在捷尔任斯基介绍下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随后前往乌克兰作战，并成为一个师的师长。1920 年他被捷尔任斯基派往波斯的吉兰省进行活动，在那里成为伊朗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参与组建“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并自任波斯红军总参谋长，获得了军功章，并被送到红军军事科学院学习。1922 年，勃柳姆金从军事科学院调到托洛茨基的军事事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工作，翌年被捷尔任斯基招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的外情局，负责苏联在中国北部、西藏、蒙古和中东的间谍工作。他成了苏联的风云人物，名字登上了百科词典，还成为诗歌、电影、小说的主角。1929 年，勃柳姆金在土耳其见到了托洛茨基，受后者委托向苏联国内的托派支持者转交一封信，结果因此而被捕，并在1929 年11 月3 日作为托派成员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枪决


列宁遇刺的情景

1918年1月则作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参谋长指挥过对顿河哥萨克的攻势，是内战初期著名的军事英雄。

当波波夫等人占领电报局时，他们给穆拉维约夫发了一份电报，命令这位将军进入乌克兰进攻德军。7月10日，不知道暴动已经平息的穆拉维约夫自称“对德作战军总司令”，下令部队调头朝莫斯科开去，准备支援他的同志们。不过穆拉维约夫的部队里几乎没有人响应他的号召，第二天，莫斯科派出的信使到达前线，宣布穆拉维耶夫为叛徒，他马上被逮捕枪毙了。

然而，暗杀和“第三次革命”的危机并没有彻底消失。7月30日，德军基辅集团军群司令兼乌克兰军事总督冯·埃希霍恩元帅（Hermann von Eichhorn）在基辅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鲍里斯·顿斯科伊暗杀。一个月后的8月30日，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Moisei Solomonovich Uritsky）被炮兵军校学员列昂尼德·坎尼吉塞（Leonid Kannegisser）打死[注]。

在莫斯科，暗杀浪潮在8月30日晚达到了最高潮——当晚11时，列宁结束在“铁锤与镰刀”工厂的演讲、准备坐车离开时，一个女人向他靠近，仿佛有什么话要说的样子。当列宁走近她想要听个究竟时，三声枪声突然响起。由于当时周围一片嘈杂声，因此，枪响的时候根本没人听见，只是当列宁倒下时，人群才一下子被恐惧所凝固。片刻之后，人们开始四处逃散，只有一个人十分沉着冷静———苏维埃步兵师政治委员助理巴图林。巴图林环顾四周，发现不远处的一棵树下独自站着一个妇女。只见她一只手拿着个破皮包，另一只手攥着把雨伞，一动不动地靠在树上，异常冷静地看着喊叫的人们从“铁锤与镰刀”工厂的大门里跑出来。

狂奔出来的水兵和年轻工人高喊“抓住她，别让她跑了！”这个时候，卡普兰先是在原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鞋子，后来又像一个高度近视眼的人那样眯缝起眼睛朝黑暗的地方望去。冲到她面前的人们看了看她，然后大声喊道：“就是她！就是她开的枪！”巴图林走过去，搜了搜她的身，对方没有反抗。他在这个女人身上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东西，但他最后还是问了句：“您为什么向列宁同志开枪？”这个女人没有否认，准确地说，她是没有任何表示。这个女人就是芬妮·卡普兰（Fanni Kaplan）。

受伤的列宁马上被送回克里姆林宫住所。经过检查发现，他身中两弹，第一发子弹击中肺叶，距心脏仅毫厘之差，第二弹击中左肩，另有一发打穿了衣服。由于担心还有其他刺客埋伏在城里、随时准备袭击他，列宁坚决不愿到医院进行治疗，医生们只好在克林姆林宫草草为他做了手术。枪伤最终缓慢地愈合了，但列宁的健康再也没能自这次暗杀中彻底恢复。一般认为，最终导致他过早死亡的中风与这次枪击有着直接关联。


芬妮·卡普兰（1890-1918），又名多拉·卡普兰，出生于乌克兰沃伦省的一个犹太家庭，1905年革命之后即投身左翼无政府主义运动，16岁时策划对基辅省省长的暗杀时被捕。基辅军事法庭原本打算判处她死刑，但是由于未成年，而且暗杀没有成功，因此改判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最近二十年中，随着苏联绝密政治档案陆续解密，许多历史研究者对卡普兰案件产生了一些疑问，其中一个关键疑点是卡普兰有高度近视，不戴眼镜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而在逮捕她时，无论在其身上还是在现场都没有发现眼镜。有人认为实际开枪的是另一位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的任务只是为其充当掩护

被契卡逮捕的卡普兰是一位16岁就参加反专制恐怖主义活动、在西伯利亚被关押过11年的老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之后才从流放地回到莫斯科。面对审判员尤罗夫斯基（亲手杀死沙皇全家的行刑人之一），她毫不隐瞒自己的袭击动机：“我很早就决定要杀死列宁了。我认为他是革命的叛徒。……我赞成立宪会议并且依然在为之而战。”她拒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同党，随后于9月3日在克里姆林宫院子里被枪决，尸体被塞进一个大铁桶，浇上汽油烧掉了。

列宁遇刺的消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它在时间上恰好和协约国开始扩大对俄干涉的决定相吻合，因此，共产党领导集团大为惊恐和震怒。当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拍急电给正在喀山前线指挥作战的托洛茨基，要他立即回京主持大局。狂暴的中央委员们纷纷要求立即采取“最坚决的行动”，对现实的和潜在的政敌实施报复，布哈林还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圣茹斯特的名言：“法治行不通，就必然要用武器进行统治！”

当晚10点40分，中执委向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发出号召书，要他们以

【注】 严格来说，坎尼吉塞暗杀乌里茨基这一事件并不属于有组织的恐怖行为。22岁的坎尼吉塞虽然也是左派社会革命党成员（同时也是犹太人），但他的暗杀行动更像一种个人报复，主要是因为他的一位同窗好友在乌里茨基（同为犹太人）主持的对“反革命分子”的清查中被无辜枪毙。但这个事件和列宁遇刺案恰好发生在同一天，加上刺客的左派社会革命党背景，很快就和埃希霍恩遇刺案、列宁遇刺案一起被视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施恐怖活动、意图使德俄再次开战的铁证。坎尼吉塞在1918年10月被枪决，他的父母随后逃到波兰避难


列宁遇刺后，俄国的工人和军人响应全俄中央执委的号召，组成赤卫队，开始执行“红色恐怖”政策

“对革命的一切敌人进行大量残酷无情的恐怖行动”来回应“令人发指的暗杀”。契卡随即开始了“从决议转向真正执行决议的时期”，也就是著名的“红色恐怖”时期。

在列宁遇刺后的几个月里，仅在彼得格勒就有超过800名被捕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中的“动摇分子”和其他“阶级敌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就被处决，另有6000余人被捕。

根据1918年9月的一份契卡内部通报宣称，此前一年在俄罗斯已经处决了10000–15000名“阶级异己分子”。乌克兰契卡在1918年内处决了3000–5000人，到1921年为止处决了20000人；在克里米亚作战的库恩·贝拉国际纵队则在1920年枪毙了50000名弗兰格尔白军的战俘，这是内战期间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行动。

按照一份最保守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18年夏到1919年上半年，遭到契卡处决的俄国公民多达8389人，另有大批政治犯被关入昔日沙皇囚禁革命者的监狱；而契卡内卫部队则膨胀到20000人以上。9月6日，契卡人员甚至闯入英国大使馆，将试图抵抗的海军代办克罗米上校当场打死。而后来令普通苏联人闻之变色的古拉格劳改营，也在此际开始设置，截至到1921年9月，它的“常住居民”已经超过了7万人。

“此后，这种恐怖统治以不同的严重程度待续了几十年，在1930年代甚至被斯大林用来作为在党内实行他个人独裁的工具。共产党在运用恐怖手段时如此残酷无情和猜忌异己，以致在短短三四年内，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在内的其他一些激进的社会主义政党和集团中所剩的最温顺的分子，也全部遭到镇压，甚至从地方苏维埃的工作中排斥出去。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则从1921年开始，共产党把与其他社会主义分子共同执政的最后伪装也抛掉了，党对权力的垄断已不再受到任何约束。”（乔治·凯南：《1917—1939年的苏联》）

破冰远航

作为革命时期俄国的缩影之一，俄国海军最大的两支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都承受了《布列斯特和约》带来的冲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拉兹沃佐夫少将在1917年12月被撤职，舰队司令这一职务也被取消，由波罗的海中央委员会代行指挥。由于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军官开始成群结队的离舰，水兵们则不声不响当了逃兵，舰队陷入了瘫痪状态。

乘着这个当口，德国陆海军开始朝波罗的海沿岸和芬兰逼近；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一行正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与德奥进行和平谈判。1月18日，俄国代表获知了德方的谈判要求：波兰、白俄罗斯、立陶宛以及乌克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都要交给德国，这样一来，停泊在雷维尔和赫尔辛基的波罗的海舰队主力就有落入德国人之手的危险。2月9日，德方提出了签订和约的最后通牒，托洛茨基在次日声明拒绝，他单方面宣布战争结束、开始复员。

当时俄国海军的全部6艘无畏舰中，4艘“甘古特”级此时悉数停泊在雷维尔（今爱沙尼亚首都塔林），2艘准无畏舰“圣安德烈”号和“保罗一世皇帝”号在芬兰的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由于当时黑海舰队的基地已经处在德国和乌克兰中央拉达军队的直接威胁下，因此波罗的海的这些军舰实际上成为了将来重建红色海军的最可靠支柱，因此无论如何都要保存下来。倘若在布列斯特的最终和约达成之前不能把军舰转移到喀琅施塔得，它们肯定会被爱沙尼亚人或者芬兰人解除武装，甚至作为抵押品交给德军。

但是军舰出航面临的困难甚至更多——2月10日的复员令颁布之后，七零八落的水兵们已经人心涣散，军舰自从二月革命之后就没有得到过像样的修理，潜艇和驱逐舰的保养状况尤其糟糕。而此时波罗的海已经封冻，要让上百艘大小舰只通过结冰的海面驶往内地，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破冰船和机敏勇敢的指挥人员是不可能完成的。

中央委员会找到了一位默默无闻的海军少将，阿列克谢·夏斯特尼（Alexey Schastny），这位37岁的日俄战争老兵此前是舰队的无线电通信负责人，也是极少数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主动出走的高级军官之一。夏斯特尼生性孤僻、不关心政治，唯一的出发点是保全已经为之服役了十年的波罗的海舰队。布尔什维克恳请他出力挽救这支舰队，他的回答很简单：中央委员会不得干涉他对水兵的调遣，不得发出和他本人相反的命令，其余的指挥事务则全部交给他。留给夏斯特尼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据可靠


阿列克谢·夏斯特尼（1881–1918）

消息，德国人将在2月16日恢复攻势，在雷瓦尔的舰队必须立即转移到相对安全的芬兰。

2月17日，包括4艘“甘古特”级无畏舰、炮术训练舰“共和国”号（原“彼得大帝”号）在内的波罗的海舰队主力由“叶尔马克”号破冰船开路，开始向芬兰的第一阶段转移。它们穿过厚厚的冰层、艰难前行，于2月27日到达赫尔辛基。由于“甘古特”级在设计时就采用了破冰艏，它们得以全部转移出来，为未来的红海军保留了基干。

2月24日，第二批从雷维尔撤出的军舰在德军地面部队开到前仅仅几个小时才匆匆离港，途中遭到德国飞机的轰炸，略有损失。就这样，在德国巡洋舰于3月初开入雷维尔港之前，港内的主要舰艇有56艘穿过冰海撤到了赫尔辛基。

然而，赫尔辛基也不是世外桃源。3月3日，俄国代表最终在布列斯特和约上签字；同月15日，芬兰政府军开始向俄国支持下的赤卫队武装发动总攻，由冯·德·戈尔茨伯爵指挥的德国援芬军主力也即将在芬兰登陆。这意味着波罗的海舰队还必须马不停蹄地撤出赫尔辛基，赶在德国人到来之前驶离《布列斯特和约》割让出去的领土、抵达喀琅施塔得。

比雷维尔－赫尔辛基航程更危险的是，芬兰现在已经宣布了独立，他们虽然还没有能力占领或者支配俄国的大型舰艇，但却可以近于随意地调用舰队的破冰船。而夏斯特尼的军舰上只有最低额度的水兵，既没有斗志、也没有决心公开和芬兰人撕破脸。最终，这位将军决定忍气吞声，避免节外生枝。3月12日，“沃利涅茨”号和“叶尔马克”号破冰船护送4艘“甘古特”级无畏舰和3艘装甲巡洋舰驶离赫尔辛基，破冰前行，于五天后抵达喀琅施塔得。



1918年波罗的海舰队的破冰远航

不过，“沃利涅茨”号在返回赫尔辛基之后就被芬兰人强征，与另一艘破冰船“塔尔莫”号一起调往雷维尔，夏斯特尼的剩余舰只不得不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分三批继续出航，提心吊胆地穿越险恶的冰海。留在芬兰的3艘俄国潜艇、1艘供应船、1艘巡逻艇以及6艘英国潜艇则在德军抵达汉科半岛之前由舰员自行凿沉了。

1918年4月22日，最后一批波罗的海舰只抵达喀琅施塔得，宣告了这次冰上远征的结束。在耗时近两个月的艰难航行中，波罗的海舰队的全部6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54艘驱逐舰和鱼雷艇、12艘潜艇、25艘巡逻艇、5艘布雷艇、28艘拖船、7艘破冰船以及68艘其他辅助船只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喀琅施塔得，保住了俄国海上力量的血脉。

不过，光荣并不属于阿列克塞·夏斯特尼海军少将，他在抵达喀琅施塔得之后不久就被逮捕了，罪名是“蓄意扩大海军和苏维埃之间的分裂；以救世主自居，给舰队带来巨大破坏；唆使水雷分队军官策划反共阴谋，公然以舰队独裁者自居”。1918年7月22日，夏斯特尼在莫斯科被枪决。苏联解体后，他的故乡乌克兰日托米尔以他的姓氏命名了一条大街。



1914年停泊在涅瓦河中的“甘古特”号战列舰。由于预定配属给波罗的海舰队活动，因此这一级战列舰像同时期德国建造的无畏舰一样，安装了大角度的倾斜破冰艏。正是这种良好的破冰性能使得“甘古特”级在1918年的波罗的海舰队破冰远航行动中成功驶往喀琅施塔得

黑海舰队就没有碰到第二个夏斯特尼来拯救他们。高尔察克中将离开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当地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舰队革命委员会枪毙了35 名军官，并把水兵编成一个陆战旅去和顿河的哥萨克白军交战，不过这支部队刚到前线就被击溃了。与此同时，德军和乌克兰民族军正节节推进，在3 月内占领了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1918 年4 月，德军又攻占赫尔松和佩列利普，到4 月25 日，除塞瓦斯托波尔港以外的整个克里米亚半岛都落到了德国人手中。

列宁和托洛茨基一直关注着黑海舰队的命运，这支舰队拥有当时俄国最新的战列舰“意志”号（原“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号，此前刚刚在尼古拉耶夫完成舾装）和“自由俄罗斯”号（原“叶卡捷琳娜大帝”号），2 艘准无畏舰“叶夫斯塔菲”号和“约翰·兹拉托斯特”号，3 艘前无畏舰“罗斯季斯拉夫”号、“三圣徒”号、“潘捷莱蒙”号（即革命名舰“波将金”号）以及大批辅助舰艇。

3 月22 日，全俄苏维埃下令黑海舰队司令部将全部可用舰艇调往新罗西斯克，并把炮械、机器和其他重要战略物资运出塞瓦斯托波尔，但这道命令遭到了新任舰队司令萨勃林少将(Mikhail Sablin) 的反对。这位将军过去是黑海舰队巡洋舰分队的司令，因为战功获得过圣格奥尔基十字勋章，是一位狡猾的机会主义者。在他看来，鉴于内战的前景尚不明朗，与其东奔西逃，不如和乌克兰人展开谈判，看看是不是有可能达成中立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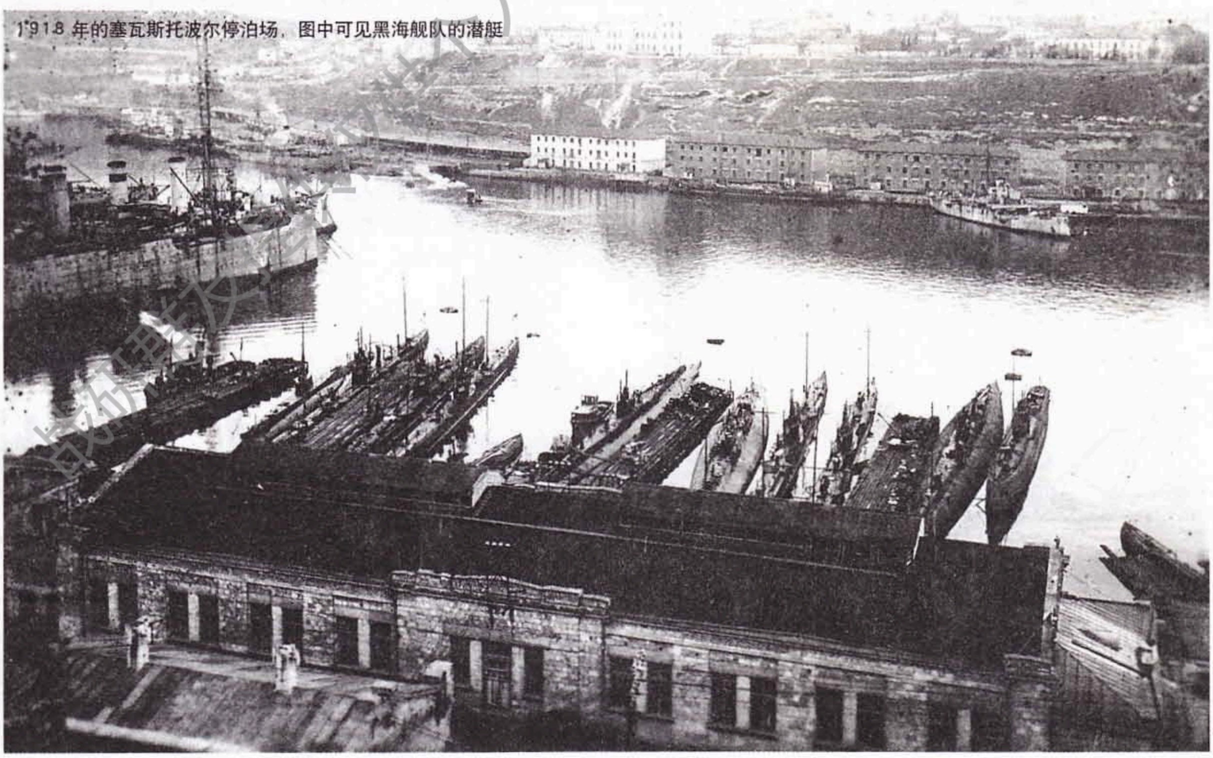
4 月12 日，为了宣示自己没有敌意，萨勃林自行声明黑海舰队已经成为“乌克兰共和国海军”，留下的大部分水兵鉴于德乌军队未到，也同意留下来碰碰运气。只有“卡利阿克里亚”号驱逐舰舰长格尔涅和其他几个布尔什维克军官对此强烈不满，4 月29 日德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陆上要塞之后，格尔涅在夜间拉走了14 艘驱逐舰、1 艘辅助巡洋舰、1 个鱼雷艇大队、几艘运输船和其他保障船只，他们在5 月14 日顺利抵达新罗西斯克。

萨勃林的机会主义策略看上去并没有赢得德国人的欢心。4 月29 日德军先锋进入塞瓦斯托波尔基地之后，“易帜”的黑海舰队代表受到了对方的冷遇。德方明确表示：要么无条件投降，要么继续作战，没有商量的余地；乌克兰中央拉达也没有派人来和他接洽归顺事宜。此时，由德国海军官兵驾驶的土耳其战列巡洋舰“严君塞利姆”号（即“戈本”号）也在朝塞瓦斯托波尔驶来。

首鼠两端的萨勃林担心失去舰队这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只得在4 月30 日中午下令朝新罗西斯克突围。临行前，他以旗舰“意志”号为先导，“自由俄罗斯”号率1 艘驱逐舰和潜艇殿后，同时留下奥斯特罗格拉斯基少将率领的120 人爆破组炸毁“三圣徒”号、“罗斯季斯拉夫”号、“潘捷莱蒙”号、“锡诺普”号、“常胜者格奥尔基”号等行动不便的旧战列舰。

不过，俄舰刚刚驶过塞瓦斯托波尔港出口的防潜栅，就遭到了德军控制下的岸炮的痛击。“意志”号逃之夭夭，“自由俄罗斯”号且战且退，“愤怒”号驱逐舰被炮弹击中后靠岸抢滩。各潜艇见势不妙，还没出港就返回了泊位，坐以待毙。至于负责爆破事务的奥斯特罗格拉斯基，他比他的上级更加识时务，不仅意识到舰队是自己向德国人和乌克兰人邀功的资本，还反过来解散了爆破队，命令各舰原地待命。

5 月1 日，“严君塞利姆”号驶入塞瓦斯托波尔港，俘获了已经挂起乌克兰蓝黄双色旗帜的3 艘前无畏舰、2 艘训练舰和12 艘潜艇，只有“珍藏”号驱逐舰在前一天晚上由舰员自沉。奥斯特罗格拉斯基因为“护舰”有功，被德军任命为被俘舰艇的临时总指挥。


1918 年的塞瓦斯托波尔停泊场，图中可见黑海舰队的潜艇

萨勃林带着“意志”号和“自由俄罗斯”号抵达新罗西斯克之后，再度接过了残余舰艇的指挥权，继续玩弄他那套左右逢源的把戏。此时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共有2 艘无畏舰、17 艘驱逐舰（包括此前由格尔涅带去的舰只）、10 艘巡逻艇和1 艘辅助巡洋舰，名义上归属于新成立的“库班－黑海苏维埃共和国”。由于新罗西斯克没有足够的泊位和燃料，舰艇也得不到检修，实际上依然不是久居之地。而萨勃林又开始玩花样——他命令各舰升起帝俄时代的圣安德烈十字旗，做出一副自立为王的模样。

布尔什维克当然早就想收拾萨勃林，只不过实在找不到合适的继任者，沉静的夏斯特尼倒是一个好人选，不过他已经因为“策划反共阴谋”被逮捕了。于是，萨勃林又过了将近一个月苟且偷安的日子，他命令各舰迅速检修主机和锅炉，做好两手准备，还搜集了一些出航所需的燃料，留下的布尔什维克军官们也表示了认可。

萨勃林抵达新罗西斯克之后一个多星期，德军基辅集团军群司令冯·埃希霍恩元帅给他寄来一封信，要求黑海舰队残部在一周内返回塞瓦斯托波尔，向德方投降，否则德军将继续沿海岸线前进。“严君塞利姆”号也在朝新罗西斯克挺进，做出张牙舞爪的姿态。

萨勃林深知，新罗西斯克已经是黑海中最后一个可供大型军舰停泊的港口（图阿普谢港只能容纳驱逐舰），要后退已无可能，要按照德军的指令返回就只能当俘虏。黑海舰队的代表试图向德军解释本方并没有违反布列斯特和约的行为，但德国人置之不理，每天派出飞机和潜艇进行袭扰，陆上的部队也一直推进到刻赤地峡。

6 月18 日，即德方最后通牒规定的最后一天，全俄苏维埃从莫斯科电告黑海舰队：立即沉毁所有舰船。但各舰水兵拒绝执行命令，当天凌晨，他们赶走了布尔什维克委员，自己举行了投票，大部分人赞成返回塞瓦斯托波尔（933 票对640 票）。不过新罗西斯克港内的防务是由当地苏维埃控制的赤卫队负责的，他们严厉斥责舰队的背叛行径，并派代表上舰抗议。

最终，水兵们决定兵分两路：主张向德军投降的一派驾驶挂起白旗的“意志”号、6 艘驱逐舰以及辅助巡洋舰“特罗扬”号离港驶向塞瓦斯托波尔，“自由俄罗斯”号、9 艘驱逐舰、1 艘供应船和8 艘猎潜艇则留下自沉。下午14 时45 分，“刺耳”号、“巴拉诺夫海军大尉”号、“敏捷”号、“神速”号等8 艘驱逐舰在泊位上打开了通海阀；入夜之后，“刻赤”号驱逐舰向“自由俄罗斯”号发射了4 条鱼雷，军舰在4 分钟内就倾覆沉没了。“刻赤”号随后驶往图阿普谢，将自沉各舰官兵送上岸，随后也引爆弹药库自沉。抵达塞瓦斯托波尔的“意志”号则被德国海军接收了。

顺带提一句萨勃林海军少将的下场：这位直接葬送了黑海舰队的司令官在6 月底被召往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打算好好清算他的罪行，不过萨勃林的运气实在太好，居然在当年8 月成功越狱，在克里米亚加入了斯科罗帕茨基的乌克兰白军。1920 年10 月17 日，萨勃林因为肺癌病死在雅尔塔，此时距夏斯特尼海军少将已经被处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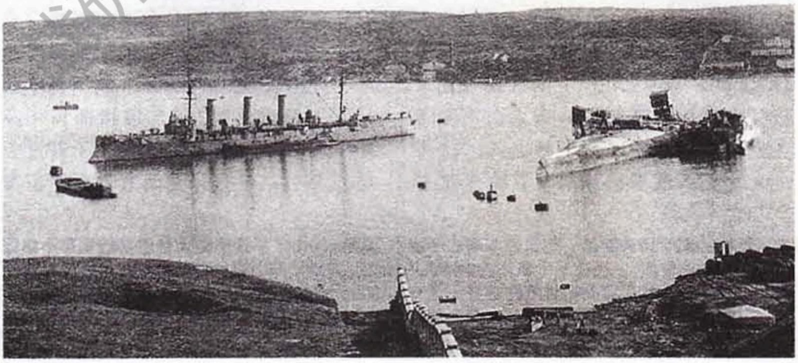
1918 年停泊在新罗西斯克的“意志”号无畏舰，原为“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号



“自由俄罗斯”号无畏舰，原“叶卡捷琳娜大帝”号



倾覆沉没的“自由俄罗斯”号无畏舰。1930 年苏联政府试图打捞这艘军舰，但是不小心引爆了弹药库，炸起的水柱高达150 米



了两年又三个月了。

八、难忘的一九一九

“军事反对派”

对每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1918 年的夏秋之交都是艰难的。布尔什维克的极端行为几乎将俄国所有的政治势力都推向了自己的反面，保皇派、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旧军人乃至地方匪徒都在奋起反抗，更不要说他们还得到协约国从财政到武力的直接支持。1918 年底军事形势最恶劣时，克里姆林宫所能号令的只有彼得格勒－莫斯科－察里津这一条狭长地带。布尔什维克们在内部要和“革命的叛徒”斗，在外部要和“国内外反动势力”斗，若无革命的激情和冒死的意志支撑，绝无生存的希望。

喀山沦陷后两天，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乘坐专列赶往前线，这是他长达两年半的内战指挥生涯的开端。这位“红色丹东”在伏尔加河西岸的斯维亚日斯克下车，发表演讲鼓舞那些精神近于崩溃的官兵，并亲率卫队投入战斗。自十月革命以来一直忠实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拉脱维亚师师长瓦采季斯被托洛茨基委任为东方方面军司令员，指挥第 5 集团军对捷克军团作战，一个名叫潘捷列耶夫的团政委则因临阵脱逃被当场处决。托洛茨基以此人为反例，警告前线官兵：“任何部队如擅自后退，首先枪毙该部队的政委，其次是部队指挥员。懦夫、损人利己者和叛徒一律处决。我将亲自监督本命令的实施。”



左：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他虽然军事才干出众，但最终由于不属于斯大林最初的军事小集团——“察里津集团”，而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丧命。有趣的是，斯大林虽然对政治对手冷血无情，但高加索人复杂多变的性格在他身上也有所体现。尽管许多人认为斯大林从不考虑念旧之情，但事实是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这两个最初随其一道发家的的军事伙伴（当然也是一流的马屁精）在斯大林时期始终没有遭到厄运，反而不断平步青云

在这一严酷的命令下，9 月10 日，红军克服喀山。两天后，由托洛茨基一手发掘的年轻将领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Nikolaevich Tukhachevskiy，*他和瓦采季斯、斯米尔诺夫等人属于以托洛茨基为中心的第 5 集团军军事系统成员，而斯大林周围的军事小团体则被称为“察里津集团”，在内战当中两者之间存在竞争和对抗*）率部队击退捷克军团，收复了辛比尔斯克。到10 月初，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已经重新回到苏维埃政权的控制下了。

9 月底，由于列宁被卡普兰击伤、短期内无法恢复工作，托洛茨基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把最高军事委员会改组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亲自担任主席。

革命军事委员会是红军的最高指挥机构，它下设14 个集团军分委会，分委会又由集团军司令和2 到3 名政工人员组成。14 个集团军依据实际的需要，编入东西南北四个方面军，在不同战场间调动。第5 集团军系统的干将瓦采季斯进一步升任红军总司令，斯米尔诺夫等人也都身居要职。

此时，红军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在南方：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的部队正在分头挺进，捷克军团的威胁也没有解除；和红军一样，白军此时也有新一代的军事领导人涌现出来，那就是邓尼金麾下的第1 骑兵师师长彼得·弗兰格尔中将（Pyotr Wrangel）。他来自立陶宛历史悠久的军事贵族弗兰格尔家族，已经在北高加索打了好几场胜仗。而在南方战线的要冲察里津（Tsaritsyne）指挥作战的并不是托洛茨基第5 集团军系统的成员，倒恰好是他的两个反对者——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

斯大林是在1918 年9 月升任南方方面军总政委的，此前，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chilov）的第10 集团军已经把克拉斯诺夫的4 万名白军阻滞在察里津城下近一个半月之久。这两个人对托洛茨基信赖旧军官的专业主



红军首任总司令尤库姆斯·瓦采季斯（1873－1938），十月革命时著名的拉脱维亚部队的指挥官之一。有趣的是尽管这位拉脱维亚人一生效忠于布尔什维克，却始终不是其党员。1919 年瓦采季斯被指控为“反革命白军同伙”并被捕，但不久即释放。1922 年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授，1937 年被捕，指控为“拉脱维亚间谍”，1938 年7 月28 日枪毙，1957 年恢复名誉

义作风和眼里专断的态度极为不满，暗地里讥讽他是“红军里的沙皇”。

在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心目中，理想的革命军队是不需要总参谋部和“专业”人员的，工人赤卫队、骑兵军和大队民兵足以承担“无产阶级战争”的使命。这两个人加上第4 集团军司令员伏龙芝（Mikhail Vasilyevich Frunze）和古谢夫（Sergey Ivanovich Gusev）组成了反对托洛茨基的“军事反对派”，一起指责后者全盘照搬沙皇旧军队的做法。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甚至公然抵制托洛茨基派来的军事专家，当察里津保卫战还在进行的时候，他们在伏尔加河上放了艘小船，把托洛茨基派来的斯涅萨列夫等旧沙俄军官统统关在里面。后来经莫斯科再三指示，斯大林才下令释放斯涅萨列夫等三人，但他却把剩下来的军官连同那艘“察里津驳船”一起炸进了伏尔加河。此举令托洛茨基极为愤怒，他不得不公开发出警告：“以后各级指挥员和政委中若有胆敢违反纪律者，不管过去功劳大小，应立即交南方方面军革命

战争群友提供 仅供个人收藏学习传播 不用于商业目的

军事法庭审判。”

鉴于“军事反对派”已经在南方战场造成了事实上的分裂，托洛茨基决定用一位旧军人瑟京担任南方方面军司令员，同时以施略普尼科夫取代斯大林为总政委，后者被召回莫斯科，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虚职。不过伏罗希洛夫继续仰仗斯大林的保护，无视新任司令员的命令。最后，刚刚伤愈的列宁不得不亲自对斯大林发出警告。在1919年3月的俄共（布）八大上，他严厉批评了察里津战役中的“游击习气”，并且声称：“如果那里有军事专家、有应该受到重视的正规军的话，可能都不会付出这6万人（的伤亡）。”

伏罗希洛夫的第10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被免除了，以托洛茨基的亲信奥库洛夫取代，而“红军沙皇”本人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往南线，部署对克拉斯诺夫的抵抗。最终，克拉斯诺夫在1918年内三次对察里津发动进攻，皆以败退而告终。

整个1918年冬天，当托洛茨基在南线指挥作战的同时，“军事反对派”成员在莫斯科对他进行了集中的人身攻击和诬陷。1918年12月25日，伏罗希洛夫的一个部下以假名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污蔑托洛茨基“把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政委交给行刑队”，托洛茨基也针锋相对地还击，他称这些人为“自高自大、一知半解的党内假行家”。

1919年初，托洛茨基在《军事杂志》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直称“军事反对派”成员为“苏维埃新官僚”，轻蔑地嘲笑这些人“在他们的任务面前发抖”，他们妒忌和仇恨每一个比他们有教养或比他们有技术的人。这类新官僚不愿学习，从来不愿在自己身上找失败的原因，总是寻找替罪羊，总是乐于大叫背叛；他们保守、懒散，对所有提醒他们应该学习的人表示不满。这种官僚已经成为破坏新国家的绊脚石。“这是对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真正威胁，这些人即使不搞阴谋犯罪，也是反革命的真正帮凶。”

在这封公开信中，已经出现了日后托洛茨基用以反对斯大林的那些政治主张，。当然，在内战正酣的关头，这类论战倒不至于发展成公开对抗，原因很简单——托洛茨基在南线取得的胜利让他的反对者们哑口无言。重用旧军人、参谋军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下去，到1918年底，红军中旧军官的数量为2.33万人，旧士官的数量为12.8万人；而红军正规军的数量则从1918年中期的37.8万人骤然扩充到年底的170万人。

除去军事政策上的分歧外，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两个人在个人气质上的差异也逐渐暴露出来。托洛茨基后来承认，他真正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时间不长，之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就居于领袖地位，主要是依靠的是个人才干、声望和时势的造就，而缺少党内根基。在党的四人执行委员会里，他和列宁既是棋逢对手的论敌、又是惺惺相惜的战友，和斯维尔德洛夫则是融洽的同事，但斯大林这个人“在十月革命之前是几乎察觉不到其人的存在的”（托洛茨基：《斯大林》）。

与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那种显明在外的才干相比，斯大林沉默寡言、口舌木讷，并不是一个出众人物。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多伊彻认为，斯大林表面上的暗淡无光使托洛茨基看不到这个人的力量，甚至在斯大林已经跻身核心的四人执委会和军事委员会之后，托洛茨基还是以习惯性的轻蔑来对待他。几年之后，这种随性将令托洛茨基付出沉重的代价。

不过，在1918年的初冬，托洛茨基还顾不上和那个“察觉不到存在”的斯大林内讧，一个新的机会已经出现了——1918年11月11日，在国内革命的巨大压力下，德国终于宣布停战。同一天，莫斯科声明除布列斯特和约，不再承认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独立地位。

兴奋的托洛茨基马上意识到，一旦德军撤出俄国占领区和乌克兰，南部和东南战线将出现一片巨大的真空



1918 年在察里津前线的斯大林

地带，他急于用红军去填补这个真空。但重新进军绝非易事：自当年9月起，邓尼金的北高加索志愿军对阿尔玛维尔－斯塔伏罗波尔一线发动猛攻，于10月13日攻陷阿尔玛维尔；11月1日，弗兰格尔的第1骑兵师拿下了斯塔伏罗波尔。邓尼金随后批准他把这个师扩充为集团军。

12月26日，重新控制了北高加索草原的邓尼金与刚刚在察里津吃了败仗的顿河哥萨克首领克拉斯诺夫达成协议，双方合编为“南俄联军”，以邓尼金为总司令，下辖高加索、顿河、克里米亚－亚速夫和土耳其斯坦4个集团军群，拥有51000名步兵、34000名骑兵、204门野战炮、682挺机枪和6列装甲列车，并且仍在不断扩充中。

在东方战线上，捷克军团的西伯利亚集群和海参崴集群已经顺利会合，法国陆军还派来了热南将军（Maurice Janin）担任他们的总指挥。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在向摩尔曼斯克

1918 年时的察里津



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增兵，日本人在西伯利亚东部挺进，从波罗的海到中亚则星星点点地分布着几十个反对莫斯科的“共和国”和“民族委员会”。

法国人甚至还打起了德军的主意——12 月 14 日，两支法军分别在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登陆，接管了原德军占领区；东线的德军经协约国许可，可以暂时不放下武器，以担负继续对抗布尔什维克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并不急于占领乌克兰，他对肃清顿河和北高加索的反布尔什维克游击队更感兴趣。

托洛茨基的真正对手，此时正在浮现。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东部一度冒出了十多个五花八门的政权组织：1918 年 1 月，“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在海参崴成立；6 月 8 日，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萨马拉建立了“立宪会议委员会”；同月，另一批社会革命党人又在鄂木斯克建立了另一个“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宣布西伯利亚地区脱离俄国的欧洲部分，实行自治；7 月 9 日，由一群流亡白俄组成的“全俄临时政府”也在哈尔滨宣告成立。这些“政府”或者只控制几个城市，或者依附于特定国家，既无党派性、又缺少财力和军力，和草台班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到了 1918 年 9 月 23 日，被布尔什维克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旧代表们和其他主要政治团体才在乌法（Ufa）达成协议，由来自 23 个政治团体的 150 名代表经选举产生 5 名执政和 5 名候补执政，组成了一个各派联合的“全俄临时政府”(Vremennoe Vserossiyskoe pravitelstov)。

10 月 9 日，临时政府从乌法迁往临时首都鄂木斯克。11 月 17 日，临时政府将领、哥萨克军人克拉西尔尼科夫（Ivan Nikolaevich Krasilnikov）因为对政党政治不甚感冒，在鄂木斯克发动了一场政变，赶走了政府里的社会革命党人。五执政之一、临时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沃洛戈茨基（Petr Vasilevich Vologodskiy）随后就推举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临时政府陆海军部长、原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中将为最高执政。

与此前那几个上不了台面的“临时政府”相比，高尔察克的政府至少在形式上具有更大的力量：首先，他控制着乌拉尔工业区，尽管这一地区的生产能力已经因为战乱而丧失的差不多了，但如果能得到稳定的补给和资金，则该地区有望建成长期作战的根据地。其次，全俄临时政府基本上继承了被布尔什维克废黜的旧立宪会议的合法性，在俄国知识分子、政党领袖和欧洲舆论心目中有一定地位，协约国也对该政权表示了善意。

高尔察克在出任最高执政后，不仅拼凑起了自己的部队，还获得了邓尼金等白军将领在形式上的效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高尔察克还获得了沙俄政府足足一半的黄金储备——这 505 吨黄金最初保存在喀山的金库内，当红军与捷克军团在伏尔加河下游交战时，黄金被运到了萨马拉，交给了“立宪会议委员会”。全俄临时政府成立后，这批黄金也经乌法运抵鄂木斯克，由高尔察克政府保管。这批俄罗斯帝国的黄金储备在当时的总价值高达 6.5 亿金卢布，高尔察克除了可以用它向国外购买武器和物资，还能以之为筹码，在协约国之间进行政治和金融投机（虽然并未进行）。对莫斯科来说，决定命运的一年终于到来了。



莫里斯·热南将军，协约国在西伯利亚的最高指挥官

决定俄罗斯命运之战

当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和高尔察克们养精蓄锐，准备在 1919 年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发动总攻时，协约国又在干什么呢？

德国停战之前，协约国对俄国的干涉是分几个方向分别进行的。远东方面，主导行动的日本政府于 1918 年 8 月 2 日发布出兵宣言，随即派出两个师团约 12000 人的兵力开往海参崴，此外美国派出 10000 人，英国派出 2 个营 1500 人，加拿大派出 4200 人，意大利派出 2500 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奥匈帝国军队中的意大利裔战俘），中国也派出 1 艘巡洋舰和一个团，由日

位于鄂木斯克的“临时政府”旧址



高尔察克海军上将



军将领担任远征军总指挥。但日军在海参崴登陆后，乘机与当地白俄武装勾结，深入西伯利亚内地，占领了俄国的滨海州、阿穆尔州和外贝加尔州，并在当地组织了亲日政权，企图以此屏护对满洲和朝鲜的统治，进而垄断西伯利亚的市场和经济资源。

原为俄国控制的北满地区此时也被日本满洲驻屯军趁机夺占，8 月13 日，日军占领满洲里，9 月6 日占领赤塔，9 月9 日占领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9 月18 日占领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到1918 年10 月底，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展开的日军已经多达7．2 万名，是计划出兵人数的6 倍，东西伯利亚南线全境基本上被日军占领，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抗议。1918 年9 月29 日，日本寺内内阁因此辞职，继任的原敬内阁决定将西伯利亚驻军的总人数由7．2 万人降到2．6 万人，并放缓扩张的速度。此后日本人专心扶植哥萨克领袖谢苗诺夫组织“外贝加尔政府”，不再采取军事冒进，而协约国的战线尚未与红军相接触，因此两军暂时相安无事。

最主要的干涉集中在北俄地区，即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1918 年8 月初，1200 名英、法、美三国军队正式进驻阿尔汉格尔斯克。到11 月德国停战时，三国在摩尔曼斯克铁路周边已经聚集了13000 名远征军，其中美军3000 人、法军2000 人、英军7000 余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另有11000 人，其中英军6000 人、美军3000 人、法军1000 余人、加拿大军500 余人，拥有航空支援。

整个1918 年夏天，协约国北俄干涉军司令、英国的艾伦赛德将军（Edmund Ironside）都试图把战线往南推进，但鉴于巴黎和伦敦都没有全面介入俄国的企图，战斗进行的极为小心。入冬之后，干涉军撤回到预设阵地，继续确保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环形地带。皇家海军在波罗的海、黑海和里海各有一支规模不大的舰队，此前被德军俘虏的“意志”号和“常胜者格奥尔基”号两艘战列舰也由英军接收了。

和协约国的瞻前顾后相比，新任全俄最高执政高尔察克的动作要迅捷的多。1919 年开春时节，鄂木斯克政府已经集结了近15 万人、1330 挺机枪、210 门火炮的力量，准备动用其中10 万人发起春季攻势。红军方面截获了高尔察克军队欣喜若狂的电报：“鉴于协约国运来大批炮弹和子弹，我命令：在与敌人交战时不要吝惜炮弹和子弹。”而红军内部则在不断发生叛变和暴乱：1918 年12 月，南方方面军所属第9 集团军的第11 师10000 余人裹挟35 门火炮叛变，投奔了邓尼金；1919 年1 月13 日，第4 集团军驻尼古拉耶夫的第4 步兵师发生暴动，打死了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林多夫；3 月12 日，驻守奥廖尔的第4 步兵师发动叛乱；4 月3 日，米尔哥罗德又发生暴动。危机已经颇在眉睫。

1918 年开入摩尔曼斯克的英国军队





开[illegible]海参崴的美军

公允论之，红军在1919 年出现的叛变和暴乱只有少数是直接针对布尔什维克党本身的，大部分还是因为战局不利带来的高压所致。例如，在1918 年7 月1 日，全俄苏维埃以“传播失败主义流言”、“影响军心”为由，查封了111 家较有影响力的报纸，其中包括原国际派和区联派的机关报《人民言论报》、《我们的声音报》，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喉舌《无政府报》、《俄罗斯自由报》、《火星报》等。

1919 年3 月14 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组织局又签发指示信，要求红军和地方当局在顿河哥萨克人聚居区实行没收物资、坚壁清野的政策，并且向该地区迁入外族移民，以压制哥萨克人、震慑暴动者。针对叛逃旧军官和异议分子的恐怖政策也在进一步扩大。但这些政策本身是带有阶段性、非常性的，倘若红军能在战场取胜，



出兵西伯利亚的协约国将领在海参崴合影

则大部分措施有望取消或至少缓解。

另一方面，包括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在内的反布尔什维克阵营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军人、政客、贵族、哥萨克，本来是目标各异的力量，只是因为反对革命这个共同目标才勉强结合到一起。除此之外，政治家们鄙视旧军人的保守和缺乏现代政治素养，而他们自己则在会场里为了个人私利喋喋不休地争辩，好像身处悠闲的巴黎咖啡馆。军人们则看不起自由主义政党的浮夸，认为就是他们摧毁了沙皇制度、给俄国带来了灾难。在科尔尼洛夫战死一周年的纪念会结束时，一名将军愤愤地评论说：“是的，我恨不得亲手绞死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罗坚柯。”但这些军人又对罗曼诺夫家族的那几个帝位觊觎者敬而远之，并不希望真正出现一个会影响自己扩充势力的新沙皇。文人和军人互相敌视，前者在农民和知识阶层中有声望、也有号召力，但缺乏武力和行政管理技术；后者只有暴力工具但声名狼藉，若无前者的支持，根本不能指望从农民中征兵扩充部队。换言之，他们只有彻底联手才有打败布尔什维克的希望。

然而，这种联手的可能性实际上在一开始就遭到了破坏。以高尔察克政权为例，最初它是由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组建的，并得到军人的拥护；但随后军人篡夺了政权，把社会革命党人赶了出去。而社会革命党人恰恰是得到捷克军团拥护和亲近的，这意味着“全俄临时政府”从捷克军团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打了折扣的。

至于高尔察克本人，他是一位声望不错的传统军人，谦恭内敛，但既不擅长也不热心政治，尤其缺乏行政管理经验。临时政府的财政、物资和交通状况都是一片混乱，高尔察克精疲力竭，依然政令不出宫门。他的军务部长冯·布德伯格男爵不无怜悯地表示：“这是一个完全不了解局势、不明白周围发生的一切和以他的名义所做的一切的人。”

尽管如此，战局对鄂木斯克政权依然非常有利：1919 年开春之后，邓尼金在克拉斯诺夫的支持下攻占了沃罗涅茨和库尔斯克，托洛茨基被迫将东方方面军最精锐的部队调往南方。借此良机，高尔察克以汉任将军（Mikhail Vasilevich Khanzhin）指挥西方集团军 50000 人向乌法、萨马拉方向突击，以图击破红军第 5 集团军的 12000 名守军，随后直趋莫斯科；作为策应，捷克军团的西伯利亚集团军约 50000 人则向伊热夫斯克、喀山方面反击，进攻红军第 2、第 3 集团军（总兵力 42000 人）。

高尔察克上将检视白军士兵





1919 年莫斯科城的红军

攻势的开端进行的相当顺利：3 月 14 日，西方集团军占领乌法，随后相继攻占了比尔斯克、布古利马和布古鲁斯兰，在 30 天内推进到谢尔吉耶夫斯克，威胁萨马拉。捷克军团也攻占了奥汉斯克、奥萨、萨拉普尔和伊热夫斯克。在西方集团军南面，高尔察克的南方集群和以哥萨克军队为核心的奥伦堡集团军、乌拉尔斯克集团军迫使红军第 1 集团军和土耳其斯坦集团军放弃了奥尔斯克、阿克纠宾斯克，后撤至伏尔加河流域。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托洛茨基只能节节后退。

不过，“红色丹东”此时的心态比前一年要镇定的多，这不仅是因为“军事反对派”的阻挠已经被排除了，更是因为红军的数量正在以火箭般的速度上升——当全俄苏维埃在 1919 年 4 月颁布第二次征召令后，50% 的工会成员开始应征入伍；到当年 10 月，红军的总人数已经增加到 150 万人。由于实施了冷酷而高效的余粮收集制和政委负责制，这支军队只要稍经沙场就能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战斗力。而高尔察克的部队是没有后方、也得不到补充的，战线拉的越长，战斗力也越低下。

到 4 月中旬，红军东方方面军已经重新集结了 14 万人的兵力，拥有机枪 2455 挺、火炮 511 门，在兵员人数和火力上都超过了来袭的白军。东方方面军新任司令员加米涅夫经过精心策划，决定在敌军南线的侧翼实施包围。从 4 月 28 日到 6 月 20 日，红军分别发动了布古鲁斯兰、别列别伊和乌法三场反攻战役，高尔察克的主力部队受到重创，红军前进了 350－450 公里，逼近乌拉尔山麓，夺回了战略主动权。

反击高尔察克之役进入到中期之后，兴奋的加米涅夫急于挺进西伯利亚、直抵远东，而相对谨慎的红军总司令瓦采季斯则认为，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有协约国远征军作为后盾，纵深追击危险太大，应当在乌拉尔停止追击。托洛茨基照例对瓦采季斯表示了支持，在他看来，东方问题应当放在肃清欧洲部分的白军之后再予以解决。

由于加米涅夫一再抗命，托洛茨基和瓦采季斯决定联名将他撤职。不过这一次列宁和斯大林站到了加米涅夫一边——7 月 3 日，瓦采季斯突然被解除总司令之职，由加米涅夫接任。托洛茨基依然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但他的“第 5 集团军伙伴”们则被清理出去了，由“军事反对派”成员斯米尔家和古谢夫顶替。

托洛茨基的情绪当时就失控了，他当场宣布辞去政治局委员、军事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但列宁在此时还没有准备好失去这位战友，根据他的提议，

继任红军总司令的加米涅夫



政治局拒绝了托洛茨基的辞呈，并以决议的形式力劝他继续负起南线“极其困难、危险但至关重要的工作”。

南线的战略决战就是在这样风云诡谲的气氛下开始的。当年4月，南俄联军由第聂伯河流域向伏尔加河下游全线进攻，先后占领了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而弗兰格尔指挥的高加索集团军为了早日同高尔察克会合朝察里津前进，在6月17日攻下了这座去年曾三次抵挡克拉斯诺夫骑兵的名城。6月20日，邓尼金下达了著名的“直指莫斯科”命令。

在南线，克拉斯诺夫的顿河哥萨克占据着伏尔加河和顿河间的东部防区，而邓尼金本部则在中部及西部防区推进。在红军应对哪一部分防区进行反击的问题上，新任总司令加米涅夫提议对东部防区、沿顿河流域向察里津以及邓尼金在北高加索的根据地进行反击，目标是从侧翼包围邓尼金部队，并切断他们与主要根据地的联系。加米涅夫还打算把邓尼金的部队和高尔察克分开，这样，高尔察克即使能重新取得主动、再一次从乌拉尔挺进，他也不能和邓尼金会师。承担进攻的将是从乌拉尔前线撤下来的红军，他们转向邓尼金的东线侧翼移动历程并不远。

托洛茨基则强烈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两人不合，邓尼金现在气势汹汹、迫不及待地要推翻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克拉斯诺夫是个本位主义者，他只想把红军赶出哥萨克村镇之外，根本不愿意离开顿河流域，也不关心邓尼金进攻莫斯科的计划。如果红军把主力投入顿河流域，反而会激怒哥萨克、迫使他们作困兽之斗，无意中弥合了敌人阵营的裂痕。况且即使初战得胜，红军也不得不在缺少交通工具的情况下穿越怀有敌意的居民住地前进，那是邓尼金一定会对力量薄弱的中部防区发起袭击（该处离莫斯科路程最短）。

托洛茨基提议，红军主力应调到中部防线，以哈尔科夫和顿涅茨盆地为主攻方向，那里的公路和铁路网都很密集，此举旨在分割哥萨克部队和北高加索志愿军，迫使前者保持中立。但当这两个完全相悖的计划提交政治局时，加米涅夫获胜，政治局批准对东部防区进行主攻。托洛茨基后来愤愤不平地抱怨，加米涅夫“以他在东线的胜利赢得了列宁，挫败了我”；而斯大林还要火上浇油——在论战刚刚结束的那个星期，斯大林突然指控前任总司令瓦采季斯犯了叛国罪，并将他逮捕。又过了几天，瓦采季斯因为证据不足很快被释放了——这个莫名其妙的事件几乎完全是为了羞辱托洛茨基。

这一次，又轮到敌人的刺刀来“拯救”托洛茨基了，因为邓尼金的主力正朝着战线中西部的乌克兰直杀过来。8月30日，他占领了基辅和乌克兰大部，随后攻击红军最薄弱的中部防区，朝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推进，直逼莫斯科。此时托洛茨基再度提出将预备队从东部防区调往中部，但再次被政治局和总参谋部拒绝。10月13日，邓尼金部将马耶夫斯基的部队占领了奥廖尔，距莫斯科只有400公里。直到这个时候，托洛茨基才开始在中央防区集结预备队，但此时邓尼金已经冲到了图拉，几乎就将打开莫斯科的门户。与此同时，另一位白军将军尤登尼奇（Nikolai Yudenich）在爱沙尼亚武装了一支20000人的部队，进逼到彼得格勒郊区。

英国海军把从德国人手里接收的原俄国战列舰“意志”号（更名为“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号，这是为了纪念北高加索志愿军的创建者之一、在1918年10月病逝的阿列克谢耶夫步兵上将）、“常胜者格奥尔基”号、1艘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交给了交给了邓尼金的部队，这支舰队先后为邓尼金运来了10万支步枪和300万发子弹，为尤登尼奇运去了3万步枪、2000万发子弹和近6万发炮弹。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刻，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已经随身带上了假证件和现金，随时准备逃亡，继续革命前东躲西藏的生活。

然而，邓尼金的部队此时已是强弩之末。他后来自己承认：“南方的军队免不了普遍的社会弊病，他们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玷污了他们的声誉。在仇恨的气氛中，内心的仇恨愈来愈严重。集体迫害使犹太人蒙受痛苦，但也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扭曲了他们的心灵，破坏了军纪。”他的大将弗兰格尔也认为：“志愿军因为抢劫和暴行丧失了信誉，我们最终因此丧失了一切，甚至不能试图沿着同样的道路、打着同样的旗帜再一次进军。”

和高尔察克一样，邓尼金的部队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

邓尼金攻占奥廖尔后，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在总参谋部广场前举行动员集会





莫斯科市民街垒，准备抵御白军进攻

战研精品提供(仅供个人收藏学习交流，严禁用于商业目的)

红军向高尔察克军队发起冲锋



大后方，过长的战线使得他们只能靠劫掠来获得粮秣，弹药补充也跟不上。况且南俄联军本来就是由几支互不相干的武装临时拼凑而成的，在推进变得缓慢之后，他们又恢复了各自为战的“传统”。结果，当东部方面军的预备队于 10 月下旬逐步就位、开始反击时，邓尼金的部队就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突然崩解了。

11 月，红军开始朝哈尔科夫、基辅和波尔塔瓦挺进，于12 月17 日克复基辅，将4 万名南俄联军驱赶到克里米亚半岛。邓尼金随后宣布下野，将指挥权移交给弗兰格尔，后者在那里继续负隅顽抗了一年，然后率残军乘“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号和“常胜者格奥尔基”号去了君士坦丁堡。巨大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号后来搁置于法属突尼斯的比塞大港，在一天一天的风吹日晒中逐渐朽坏，到1936 年出售给废铁商拆除。它的12 门主炮在1940 年卖给了芬兰，其中4 门又被纳粹德国截获，充作海岸炮。到二战结束之后，苏联红海军找回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号12 门主炮中的 10 门，终于物归原主。

终局与开端

在南线红军对邓尼金部队发起进攻的同时，按照加米涅夫的预定计划，8 月20 日，红军第3、第5 集团军开始追击高尔察克残部。在托洛茨基的爱将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挥下，第5 集团军在托博尔斯克挫败了高尔察克军队最后的攻势。这位山穷水尽的海军上将带着数十万军民和剩余的沙皇国库黄金，坐着长达40 节车厢的专列，冒着零下四五十度的严寒，沿着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朝东撤去。1920 年 1 月5 日，当高尔察克一行抵达伊尔库茨克时，热南将军授意捷克军团夺取了高尔察克专列上价值4.09 亿金卢布的黄金，准备以其为筹码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谈判；至于失去利用价值的高尔察克及其随员，捷克军团把他们交给了伊尔库茨克当地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成的新政权“政治中心”。

这位海军上将曾经默许其支持者以武力驱逐临时政府里的社会革命党人，现在，轮到他自己尝到苦果了。1 月 21 日，“政治中心”把伊尔库茨克市连带被软禁的高尔察克一起移交给了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同年2 月7 日，当一支白军残部逼近市区时，高尔察克和全俄临时政府部长会议主席佩佩利亚耶夫一起被枪决，尸体投入冰窟。

列宁曾这样评价说：“批评高尔察克是愚蠢的，那只是民主的粗俗口号而已，而高尔察克以他自己的方式行动。”但时代已经不属于这些“以自己方式行事”的中世纪骑士了。

“胜利之父”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他在那里部署对最后一支白军——尤登尼奇部队的阻击。此前的北方方面军司令员季诺维耶夫因为兵力不足而心怀沮丧，列宁也小心翼翼地建议，必要时可以准备撤退，安排炸毁发电厂并凿沉波罗的海舰队的军舰。只有托洛茨基本人始终坚信他能够获胜。他的反对者、“军事反对派”成员之一拉舍维奇注意到：“像新的援军到达一样，托洛茨基一到现场，立刻出现了新气象：严格的纪律恢复了，军事机关和行政机关又能胜任工作了。凡办事效率低的人都被降职，高、中级指挥人员均已撤换。……参谋部的工作进入正常运转之中。一直不行的联络工作现在也变得令人满意了。后勤供应部门开始发挥职能，没有任何故障。前线开小差的事显著减少。所有部队的战地法庭都在开庭办公，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只有一条路——前进。”

一个星期之后，尤登尼奇开始向爱沙尼亚撤退了：和邓尼金、高尔察克一样，他也遇到了给养不足的问题。眼看托洛茨基的到来使得招降守军成为不可能，他只有调头撤退。托洛茨基命令守军转入反攻。11 月7 日，他回到莫斯科，向苏维埃执委会报告胜利。这一天是十月革命两周

下图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运兵列车。在其归国前夕，捷克军团从高尔察克手里获得了从喀山撤往远东的沙俄黄金，并把其中的7 节车皮金砖（装有黄金的车皮共8 节）、连同高尔察克本人和其政府班子成员全都交给了布尔什维克当局，充当“买路钱”，另外一节车皮的黄金用作租船返回欧洲的费用。捷克军团归国后，利用剩下的黄金开办了“军团银行”(Legionarska banka)。1945 年5 月，苏军接管并关闭了这家银行，将其所有资产运往苏联，军团银行大楼也被改为捷克斯洛伐克对外出口银行



战研群友提供 个人收藏 禁止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年纪念日，也是列昂·托洛茨基40 周岁的生日。

当高尔察克在春天发动大规模反击的时候，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英美远征军也进行了一次象征性的进攻，在战死600 多人后，他们停止了前进。这一年6 月，也就是邓尼金向莫斯科逼近的关头，意兴阑珊的协约国已经开始从北俄撤军；到这年10 月，最后一名英军离开了摩尔曼斯克。海参崴方面的英美部队也在1919 年底撤退完毕，只有日本人依旧留在那里。他们还将在那里继续呆上4 年，花去8.8 亿日元的巨额军费，最后还是两手空空地离开。

在1919 年这个生死攸关的年头，内线位置保证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他们可以比较迅速地将部队从一个战区调到另一个战区，而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又使这些部队可以获得相对充足的给养。相反，各支白军在漫长分裂的战线上各自为战，他们的战略互不协调，他们的领导人由于个人意见的对立和政治分歧而互不相让。同时他们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后方和战时经济，这使得每一次攻势在最初虽然气势汹汹，但最终不过三鼓而竭。至于协约国诸强，他们同样也是四分五裂，法国人主要关心强化新建立的波兰共和国，以便向东抵挡“赤色瘟疫”、向西充当反德堡垒。日本人一心要在西伯利亚扩张，这在美国和英国人那里都得不到支持。最重要的是，没有哪个协约国政府有一个目的明确、首尾连贯的对俄政策，他们在一战结束前匆匆忙忙来到那里，在战争结束后又急于撤走，最终什么也没得到、什么也没留下。


托洛茨基视察红军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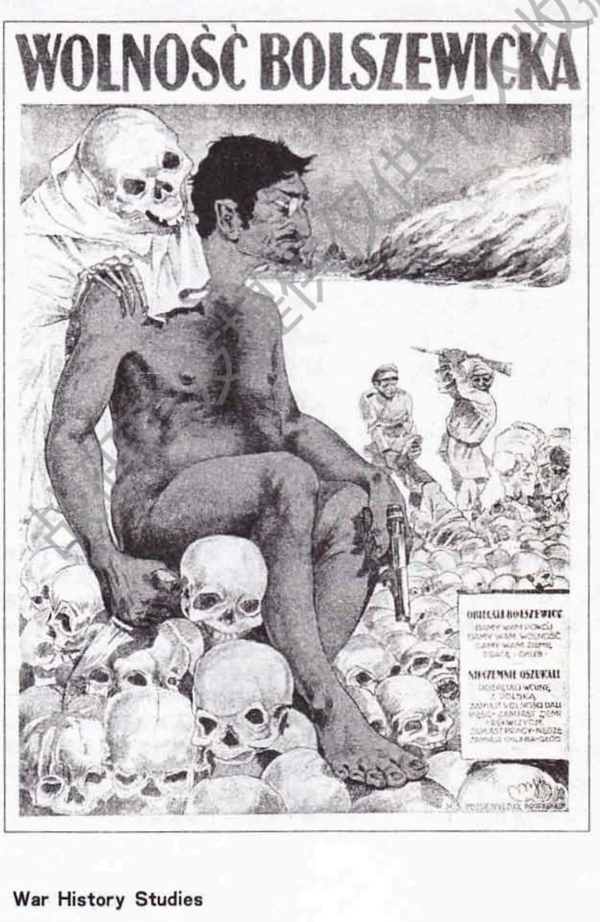
1920 年的春天，俄国内战的大势已经奠定。尽管弗兰格尔的部队还盘踞在克里米亚，尽管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仍有日本士兵出没，尽管那几个从沙俄独立出来的边境国家——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已经没有重新收回的可能，并且中亚和外高加索还存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分离主义政权，但布尔什维克在付出了近100 万红军伤亡、约2000 万人口减少之后，依旧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伴随着胜利的到来，另一种情绪也正在酝酿。1919 年3 月，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共产国际，它被设计成世界所有共产党的中央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的一个执行委员会将对这些党行使最高权威，后者被要求遵行该委员会确立的政策，并且弃绝对其母国的一切忠诚。外国共产党被赋予双重作用：促进在它们各自国家的革命；给正在与反革命作斗争的苏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它们在决定性时刻应当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援助革命，由此履行它们对党的义务。”

与共产国际的设立相伴随的是这样一种情绪——既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解放设想成无政治的超然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物质必然已经达到极其丰裕的程度，使得人们可以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内战后破败的俄国是不可能满足这个条件的，唯一的希望是“国内战争”在西欧那些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爆发，最终取消国家机器、甚至民族国际本身。

仿佛是为了给这种浪漫理想添上现实的注脚，在共产国际成立前四个月，一场短暂而血腥的暴力革命已经在中欧强国的中心——德国爆发；一年半后，革命的洪流又将在欧洲的门户华沙戛然而止。又过了半年，在十月革命的摇篮——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爆发了1917 年以来最令人意外的一次水兵暴动，“它像闪电一样照亮了现实”（列宁语）。苏维埃俄国及其缔造者们的命运，从那一刻起走上了另一条轨道。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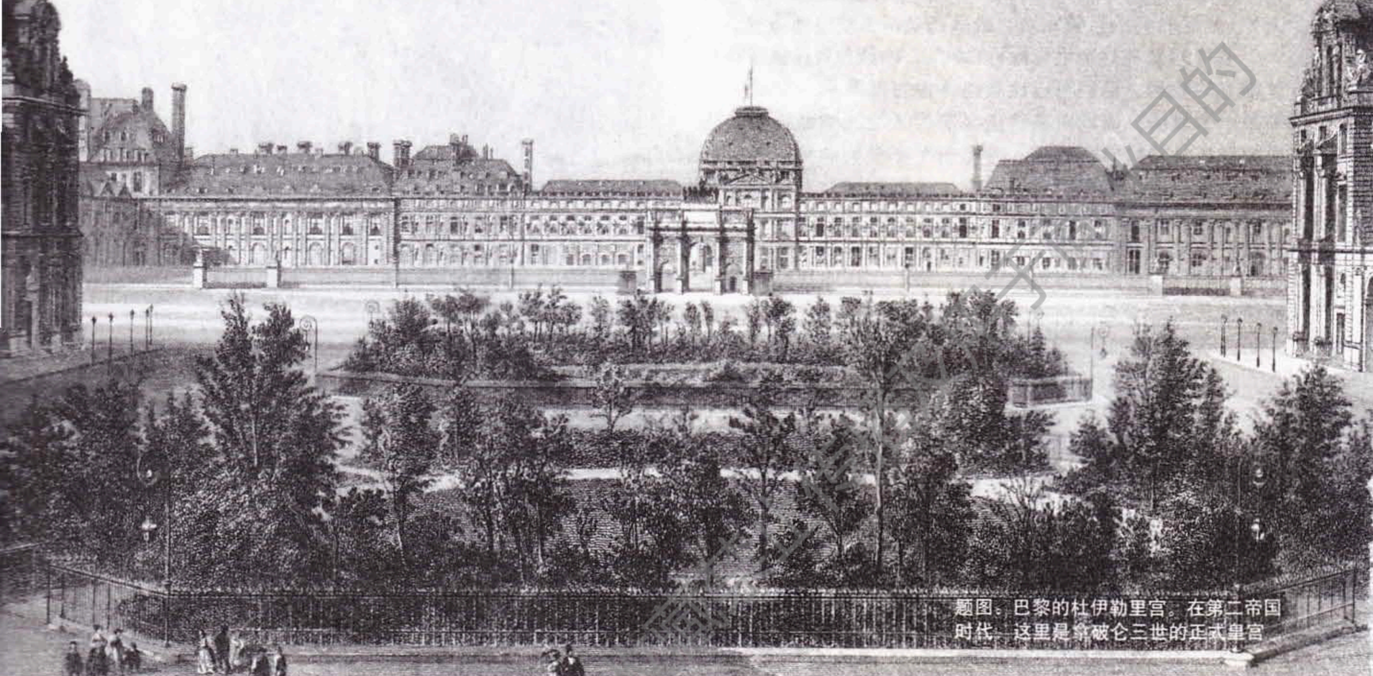


左图为波苏战争时期的一幅波兰海报，标题为“布尔什维克的自由”。红军首脑托洛茨基被描述为红色的撒旦，脚下骷髅遍地

○沧海

法兰西杜鹃

——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兴亡（四）



题图：巴黎的杜伊勒里宫。在第二帝国时代，这里是拿破仑三世的正式皇宫

七、皇帝的加冕礼

拿破仑，第三个

1851年12月20日的公投给予了路易·波拿巴这位“十二月人”（l'homme de decembre，这是他在12月2日政变后获得的新绰号）以下新权力：

（1）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指定继承者；

（2）总统独揽行政权，内阁成员不得身兼立法院议员，而由总统直接提名，总统还可以直接任免其他行政官员；

（3）已经解散的国民议会不再恢复，改一院制为两院制：立法院由普选产生，成员共275人，任期六年，负责表决立法和预算事务，但不拥有法律创制权，只能对行政法院（其成员由总统任命）提交的法案进行表决；另设一个终身制的参议院，成员150人，由总统自政坛耆宿和社会名流中提名，负责监督立法院的行动是否违宪。参议院有权否决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并与总统协同修改宪法。

1852年1月14日，这些条文被正式载入了宪法[注]；爱丽舍宫同时还宣布，在当年3月中选出新的立法院之前，由总统一人专政。

尽管路易·波拿巴矫情地宣称“偏离合法性是为了恢复公正”，但新宪法那叠床架屋的设计除了把权力集中到他一个人之手外，再也没有其他目的了。由于规定内阁不向议会负责，完全由总统个人任命，因此拿破仑就独揽了行政权，此外作为国家元首，他还拥有对外宣战、谈判、缔结盟约和商约的权力。

由于新宪法下的法兰西立法院既不创制、也不颁布法律，只能机械地进行表决，因此总统就和他本人提名的行政法院、参议院一起分享了立法权；而在一人专政时期，他还掌握着司法权。

在这种体制下，由普选产生的立法院是唯一带有“分权”色彩的机构，但总统随时可以解散它。当然，人民可以通过公投对政府的举动表示不满，但人民往往轻信而情绪化，不大有耐性对每一件小事都搞一回公投。于是，公投很快就变成总统炫耀“上下同心”的一种点缀物了。

总统在专政时期干的第一件大事依然是关于钱的：1852年1月23日，他宣布禁止奥尔良王室成员在法国拥有任何才占，并将路易·菲力浦登基前分赠给子女的地产收归国有。没收的土地和资产随后分给了工人住宅－土地信贷银行、残废教士基金保管处、荣誉军人团等组织，以收买人心；当然，也不乏用于填补内廷亏空的。莫尔尼的情妇勒翁伯爵夫人讥讽说：“这是鹰的第一次飞翔。”（C'est le

【注】 有趣的是，制宪委员会的成员除了波拿巴党的死忠成员佩西尼、欧仁·鲁埃以及两位法学家之外，居然还有莫尔尼的生父、弗拉奥伯爵夏尔·约瑟夫（Charles Joseph, comte de Flahaut）——也就是小拿破仑的母亲奥当丝的老情夫。这位伯爵称得上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但对宪法问题显然一无所知。小拿破仑把这样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弄进委员会，除了满足莫尔尼的虚荣心，也是因为弗拉奥曾担任拿破仑一世的侍从武官。不过莫尔尼过于张扬的举止还是引起了总统的不满，他后来长期把这位拖油瓶兄弟放在了冷板凳上。

premier vol de l' aigle. 鹰自然是波拿巴家的政治标志；法文中vol一词有“飞翔”和“盗窃”两个意思）由于这桩盗窃影响实在太坏，莫尔尼、鲁埃和富尔德都从政府中辞职了。不过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干涉总统的决定，所以富尔德们很快又灰溜溜地滚回来了。

老迈昏聩的热罗姆·波拿巴亲王现在当上了参议院议长，他在卢森堡宫搭台升帐，领导着一帮红衣主教、元帅和海军上将，总统给他们开出每年3万法郎的薪俸；由总统本人任命的行政法院参事（数量约40到50人）每年也可从政府预算中领到2.5万法郎的薪水。总统本人的新年俸标准是每年1200万法郎，150位立法院议员则一毛钱都没有——这是路易·波拿巴对老议会再三控制他个人开销的下作报复。

在忙着填补赤字的同时，总统拿破仑也没有忘记继续揽权：国民自卫军被改组缩编，不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所有工厂和区县的工会都被解散，只保留由市长和教士领导的“互助会”；就连教会提出的自由传教、结婚必须举行宗教仪式的许可也被否决了，因为总统不希望有一个政府之外的第二权力存在。2月17日，又一项新的新闻出版法出台，除去维持1850年出版法的高额保证金和印花税制度外，还要求任一新设报刊的出版人须由政府审查其资质，现有出版物的董事会和编辑部成员变更也须报批；任一报刊只要连续三次出现“违规”情况，就要被停刊两个月。该法令颁布的同一个月，巴黎就有好几家报纸倒闭了，其余七八家政治刊物则要像搞外交一样谨慎从事。



热罗姆－拿破仑·波拿巴（1784-1860），第一代蒙福尔亲王，拿破仑一世幼弟。早年在海军中服役，1807被拿破仑一世指定为威斯特伐利亚国王，并娶符腾堡国王之女为妻。热罗姆生性浮夸、治国无方，1813年因威斯特伐利亚被反法联军占领而失位。他随后自岳父处获得蒙福尔亲王的头衔，并移居意大利。1848年路易－拿破仑当选法国总统时，热罗姆是拿破仑一世的兄弟中唯一在世者，先是被封为残老军人院院长，帝制复辟后又获得元帅军衔和终身参议员职位。不过他权力欲不强，满足于政治吉祥物的地位，直至1860年去世

在这种制度下，尽管不存在正式的新闻检察机关，编辑们却要天天“自我检讨”才能保住饭碗。便衣警察、密探这些在七月王朝和共和国前期不甚活跃的势力开始大行其道，禁止一切民间政治集会，广场和会堂总有监视者布控，人民因此噤声，公论无由伸张。

虽说旧立法议会已经荡然无存，但是鉴于3月份的立法院选举依然可能影响政府的前途，路易·波拿巴责成佩西尼（他取代莫尔尼成了内政大臣）草拟新的选举方案。2月2日，总统签署了这个新政令，它规定：凡年满21周岁、在某地住满六个月以上的法国公民皆具有选举资格。这实际上恢复了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的主张，也是路易·波拿巴标榜“人民主权”的手段。

不过，比较过去事先出具候选人名单（这有利于社会名流和著名政治家）、按纳税人选区投票的情况，新政令将全国每个省划分为若干选区，每个选区辖25000到35000位选民，在投票率过半时，当选者需获得有效选票的半数以上才可当选；如果无人当选，则对第一轮投票中得票前两位的候选人进行再度投票，得票较多者当选。

对农民和大字不识几个的工人来说，这套新规矩当然太复杂了。“善解人意”的政府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马上推出了实质上的官方候选人。这些人自己不用做任何事情，国家机器会为他们张贴海报、召开宣讲会、分发传单、请客拉拢；而意图参与竞争的民间候选人或“不安定分子”，既不能公开集会喊口号，又不能在报纸上登广告，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加上议员没有一个子儿的津贴，实际上，



1851年法国政治漫画：蠢驴路易－拿破仑穿起伯父的制服、挂上军刀，竭力扮演狮子（拿破仑一世）的角色



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英国报纸刊登的漫画：波拿巴派的巨蜥以佩西尼为发言人，以全民公投为装饰，背后的支持者则是军队的刺刀

只有那些在七月王朝时代不受宠、如今却投靠了新政权的旧贵族、工厂主、金融家以及二流军人愿意出来参选。

3月中旬的正式投票最后变成了波拿巴党的庆功仪式——总计275名当选者里，只有6个人是公开的反对派，他们包括3名正统派代表（其中有蒙塔朗贝尔，他因为总统否决了扩张天主教权力的提案而与之决裂）和小卡诺、埃农、卡芬雅克三个共和派。卡芬雅克等三人因为拒绝按照新宪法向总统宣誓效忠，在正式就职前退出了立法院；在随后的补缺选举中，他们的席位也被波拿巴派占据。这样一来，尽管蒙塔朗贝尔和一些奥尔良党余孽时不时否决一些无关痛痒的法

案，立法院实际上还是成了政府的应声虫。

3月29日，新立法院在总统和奥尔良派议长比约（Adolphe Billault）主持下正式成立，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的元帅厅接见了立法院代表，随后宣布自己的“一人专政”暂告结束。他对这种半终身制的总统安排还算满意，于是宣称：“让我们维持共和制吧；它不威胁任何人，它能使所有人放心。”

只有两个人对此愤懑不已，一个是蒙塔朗贝尔，他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波拿巴党搞掉旧议会，但绝不甘心做路易·波拿巴的附庸，因此吵吵嚷嚷要反对这个“社会主义的代理人”；另一个是佩西尼，这个“唯一一位真正的波拿巴主义者”着了魔地要把《拿破仑观念》里的理论付诸实施，尽快把总统推上皇帝的宝座。为了显示“民心所向”，这位内政部长在5月5日拿破仑一世忌辰这天安排了一场盛典，总统首先前往荣军院附属的圣热罗尼莫小教堂（Chapelle Saint Jerome，拿破仑一世的遗体当时安放于此，尚未举行奉安大典）拜谒，随后在战神校场（Champ de Mars）为首都卫戍部队颁发旧帝国的鹰徽。在好事之徒的“点拨”下，兴奋的士兵们放声高喊：“皇帝万岁！”

现在，路易·波拿巴已经被人们称作“亲王总统”，新宪法使得他成为实际上的独裁者，每年1200万法郎的年俸也称得上丰厚；既然如此，立即宣布复辟好像还没什么必要。6月底立法院休会之后（新立法院每年的开会时间只有三个月），总统决定照例到全国走一走，听一听“人民”怎么说。7月份，他到阿尔萨斯为巴黎－斯特拉斯堡铁路落成剪彩，回程中，军官和市民们高呼“帝国万岁”；8月15日，在纪念拿破仑一世诞辰（即所谓“圣拿破仑节”）的庆祝活动上，全巴黎到处挂满了装饰有皇冠的字母“N”招牌，凯旋门上挂起了煤气灯组成的巨大鹰徽。

鹰旗、鹰徽这些属于旧帝国的印记现在遍布全国，“平等、自由、博爱”的格言则从建筑物上消失了——这一切当然都出自佩西尼的摆布。他公开宣称，“这个国家对革命已经如此厌倦，以至于它如今要求的无非就是专制主义”，既然如此，政府应当“带头掀起拿破仑热”；与此同时，邮政总署也预备发行印有总统头像的邮票和纪念币。

路易·波拿巴最初的反应相当谨慎。当他经过里昂时，1849年被马尼昂的骑兵肆虐过的市民冷眼相对，使他对恢复帝制略有些胆怯；不过当总统一行经过罗纳河流域时，欢呼、喝彩、旗帜和劝进书层层包围了车队。工业家和银行家也乐于襄助，因为路易·波拿巴虽然对经济学理论不甚通晓，但一直是经济自由主义、信贷宽松和铁路建设的支持者。

这样一来，“亲王总统”开始觉得，既然“人民”统统把他视为拿破仑姓氏和拿破仑事业的继承者，那么或许是时候恢复拿破仑帝国的名号了。不过比起国内民意，他更担心英国、奥地利和俄国这三个以欧洲秩序维护者自居的国家会干涉他复辟帝制。因此，10月9日，他在波尔多做



上图为拿破仑的鹰徽，是其“大军”的标志，被拿破仑三世沿用。下图为1852年铸造的拿破仑头像20法郎金币





左：巴黎的战神校场，位于塞纳河左岸，其名字来源于古代罗马城举行阅兵和庆祝活动的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1765年作为军事学院正门前的阅兵场修建。1783年夏尔和罗贝尔曾在此升起第一个载人氢气球。1791年反君主制民众曾在此遭枪击，巴黎市长为此被革命政权斩首。1889年，为配合巴黎世界博览会，在战神广场的滨河一端建造了艾菲尔铁塔

了一番言有所指的演说，宣称："法国似乎想恢复帝国……出于怀疑心，某些人觉得帝国就是战争。而我要说，帝国就是和平。"这就暗示了他不会倒向极端的民族主义，不会为了恢复拿破仑帝国的昔日版图去向欧洲扩张。他还表示："我们有广阔的荒地需要开发，道路需要开辟，港口需要疏浚，河流需要通航，运河需要竣工。我们的铁路网需要完善……你们大家和我一样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你们都是我的战士。"工商业者也从中嗅到了利好消息。国内和国外都没有反对意见传来——复辟已正当其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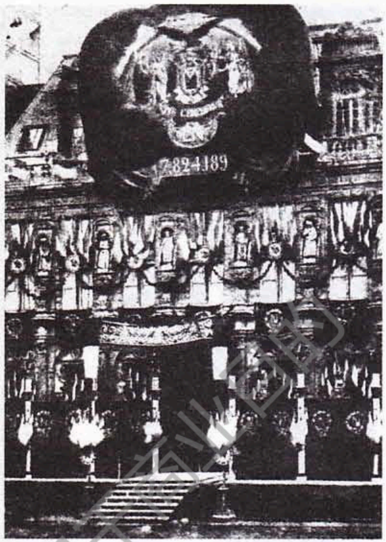
当总统一行在10月16日返回巴黎时，全体政府高官都在奥尔良车站欢迎他。两位一度与他有隙的心腹拿破仑－热罗姆亲王和莫尔尼也热烈拥抱了路易·波拿巴，和他重归于好。佩西尼事先安排的人群蜂拥在林荫大道和凯旋门周边，他们中有家庭主妇和工人，也有拿破仑一世时代的老兵，人人手持彩旗、国企和鹰徽，以欢迎得胜归来的英雄的礼遇迎接总统的马车。当路易·波拿巴偶尔前往巴黎歌剧院看戏，或者途经卫戍部队的营房时，"皇帝万岁！"的呼喊都会自动响起来：显然，这里的"皇帝"已经不是指圣热罗尼莫教堂里那句棺材，而是这位留着可笑胡子的亲王了。

现在，轮到参议院里领着干饷的主教和将军们出场"劝进"了（立法院没有法律创制权）。可笑的是，这群遗老遗少居然倍感担忧，因为现任总统目前既无合法婚配、又无婚生子，一旦他意外膑天，排在继承顺序第一位的将是他的堂弟、热罗姆·波拿巴亲王的儿子拿破仑－热罗姆亲王。这位亲王本是共和派的拥趸，思想左倾、推崇民族主义，完全不合佩西尼及其党羽的胃口，路易·波拿巴也对这位言语尖刻的堂弟不太感冒。

最后，路易·波拿巴与参议院达成妥协：拿破仑－热罗姆亲王和他的父亲老热罗姆都被保留在帝位继承人序列之中，但优先度低于路易·波拿巴未来的嫡子和继子；假如他本人没有合法的嫡子，则可以选择过继拿破仑家族中其他堂兄弟的子嗣为后，不过不包括"非正式"家族成员（例如拿破仑一世的私生子瓦莱夫斯基的子女；路易·波拿巴自己的几个私生子因为不属于"婚生嫡子"，所以也没有继承权）。

路易·波拿巴还坚持要将自己未来的头衔定为"拿破仑三世皇帝"，这主要是为了显示他的帝位不是来自波拿巴家族内部的私相授受，也不是路易十八和路易·菲力浦两位国王的延续，而是"全国人民"依法许可的、对第一帝国及其两位皇帝（拿破仑一世和"拿破仑二世"莱希施塔特公爵）的恢复。另外，据说"三世"看上去比"二世"显得年代久远：这倒符合路易·波拿巴那肤浅脑瓜的思维。

11月7日，参议院议长热罗姆·波拿巴亲王发布一道法令：全国人民将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建帝政，并推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皇帝。两个星期后，人民总投票如期举行，全国表示赞成帝制者共7824189人，反对者仅253145人，另有200余万人投了弃权票（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南部地区）。波拿巴家族的


1852年12月2日，即政变一周年之后，准备举行拿破仑三世加冕庆典的巴黎市政厅。正门上方的条幅特地标出了全国选民投票赞成恢复帝制的总人数：7824189

复辟事业已告大成。但路易·波拿巴还要再装腔作势一番，他指示立法院这个基于普选的机构公布投票结果，并"恭迎"他本人登基，以进一步突出其合法性。而登基的日子又选在了"奥斯特里茨日"12月2日，即推翻立法议会的政变一周年那天。

1852年12月1日深夜，立法院议长比约带着200位议员（蒙塔朗贝尔等少数人拒绝参加劝进活动），在手举火把的骑兵簇拥下乘车前往近郊的圣克卢宫。在这座行宫的大厅里，比约恭恭敬敬地称总统为"陛下"，肉麻地劝进曰："在对（拿破仑）战争的伟大业绩留有骄傲回忆的同时，国民尤其在和平的伟大业绩方面寄希望于您……为了在这方面协助您，他们给予您完全的支持并把一切托付于您。收下吧，陛下，请从法国手里收下这顶她奉献给您的光荣的王冠吧。从未有任何国王头上戴过更合法、更孚众望的王冠。"

路易·波拿巴回答曰："我的统治不始于1815年（即"百日王朝"结束之年），而是始于您刚才告知我全国国民意志之时。"这一年他44岁，和拿破仑一世第一次退位时年纪相仿。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了。

拿破仑一世的加冕礼是由教皇庇护七世主持的，为了尽可能模仿伯父的派头，拿破仑三世从1852年夏天起就和教皇庇护九世展开谈判，希望这位由自己提供军事保护的教皇前来巴

巴黎西郊的圣克卢宫，1852年路易·波拿巴在此接受劝进。在第二帝国时代，这里是拿破仑三世的主要行宫之一，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被炮火摧毁，原址现为圣克卢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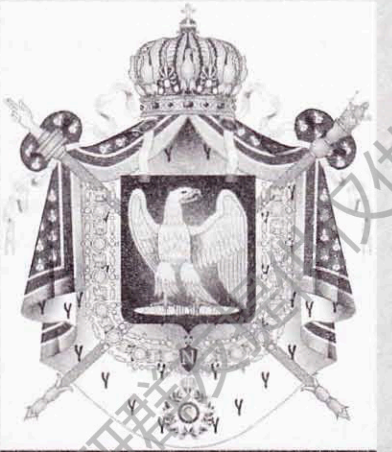

荣登大宝的拿破仑三世，画家弗朗茨·温特哈尔特在1855 年创作的油画

黎。但教皇对此不甚热心，他表示：法国政府应善待蒙塔朗贝尔和天主教党，满足他们在传教和教育事务上的要求，随后才肯前来法国。这一要求当然被爱权如命的拿破仑三世拒绝了。

还有人建议路易·波拿巴自己前往罗马，但后者觉得这比伯父的“威仪”差的太远，索性作罢。不过他在另一件事上的派头已经远远超过了伯父——仅在登基的那一天晚上，他就把圣阿尔诺、马尼昂和卡斯特拉纳三位波拿巴派将军晋升为元帅；在那之后几年，阿希尔·巴拉盖·迪利埃、圣－让·丹热利、甚至庸才热罗姆·波拿巴亲王也都获得了元帅称号：如果说第一帝国的元帅主要是在和反法联军的战场上建功，那么第二帝国的元帅们就是路易·波拿巴的家将。

顺带的，新皇帝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困扰他半辈子的金钱问题：在参议院下达公投法令之前，爱丽舍宫的头面人物就和元老们讨价还价，以图对皇帝的年俸作出妥善安排。富尔德建议继续维持1852 年初确定的总统年俸标准，即每年1200 万法郎，拿破仑三世本人也表示赞同。但“热心”的佩西尼却不干了，他引经据典的指出：波旁王朝复辟后的皇室费每年多达2500 万法郎，就连路易·菲力浦这个“平民国王”每年也要开销1800 万法郎；为“面子”起见，第二帝国的皇室费绝不应低于这两个前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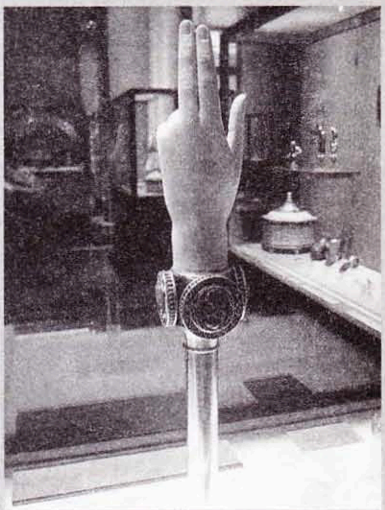
拿破仑三世本人对金钱自然是来者不拒，他对奢侈排场和资助文学艺术事业的偏好也需要额外的补贴。最后，佩西尼想到一个方案：他把路易十六在1789 年时的年俸折算成1852 年的币值，算出了2500 万法郎这个数字，并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个数额一直保持到第二帝国终结。



拿破仑三世实际上并没有举行正式的加冕典礼。不过他命人打造了一顶皇冠（左下图）。除了路易十五的王冠外，历代法国国王的王冠、权杖和宝球全部毁于法国大革命，王室珠宝收藏也全部散失。1824 年波旁王朝末王查理十世加冕时（他哥哥路易十八也未加冕）用的是路易十五的王冠，拿破仑一世打造了一顶皇冠，但路易·波拿巴不想用这一顶，也许是觉得其大伯后来的下场有些不祥。拿破仑三世还为欧仁妮打造了皇后冠，但没有像拿破仑一世那样制作权杖和宝球。不过，他继承了复辟王朝和第一帝国的皇家珠宝收藏，并加以扩充，其内容包括51403 颗完美切割钻石、21119 颗玫瑰型切割钻石、2962 颗珍珠、507 颗红宝石、136 颗蓝宝石、250 颗绿宝石、528 块绿松石、22 块蛋白石、235 块紫水晶和500 块其他宝石。这些宝石大多在1885 年被第三共和国拍卖，还有一些送给了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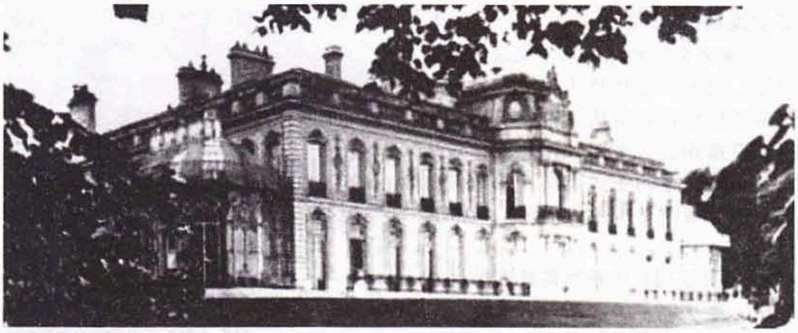
左图为第二帝国的国徽，完全仿照拿破仑第一帝国的国徽。中央为鹰徽，环以荣誉军团勋章，下面是字母N。鹰徽背后左右交叉着两根权杖，分别是用象牙雕刻的“正义之手”权杖（下图左）和有查理曼大帝纯金雕像的查理五世权杖（下图右）。这两根权杖如今和拿破仑三世的皇冠一道收藏在卢浮宫中







战研群友藏书仅供个人收藏学习传播及用于商业目的



右图为拿破仑三世1848—1853年时的情妇哈莉叶特·霍华德（1823—1865），原名伊丽莎白·安·哈耶特，“霍华德夫人”是她早年混迹欢场时的化名。1848年前后，她是小拿破仑在经济上的主要赞助者，尽管后者最终没有选择她作为第二帝国的皇后，但出于感激，还是封她为“博尔加尔女伯爵”，两人的私生子马丁也被封为“布雷谢伯爵”。霍华德后来嫁给一位马术教练，1865年病逝于法国的勒阿弗尔。上图是拿破仑三世赠给她的博勒加尔城堡，她的爵位封号也是来自这座城堡的名字



拿破仑三世后来对他的朋友说，每年2500万法郎“刚好能维持收支平衡”。作为答谢，每位参议员3万法郎的年俸在帝国时代照常发放，就连215位立法院议员在每年三个月的会议期里也可以领到2500法郎的月薪——这主要是为了奖励他们“劝进”有功。

赖汉与娇妻

还在和参议院讨价还价的间隙，拿破仑三世的婚姻就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了。皇帝已经44岁，有三个私生子（13岁的博纳旺蒂尔·卡勒，9岁的欧仁·比尔，7岁的亚历山大·比尔），两个公开的女朋友，但这两位显然都不适合成为皇后——霍华德夫人一度成功地“隐居”在爱丽舍宫隔壁的马戏团大街，但在路易·波拿巴借她的资财打倒立法议会之后，她决定为自己要个名份。那段时间里，霍华德夫人不仅频频出现在杜伊勒里宫举办的舞会上，甚至在皇帝的圣克卢行宫也有一个房间。

巴黎社交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新皇后的候选人是个离过婚的交际花也就罢了（毕竟拿破仑一世的头一位皇后、拿破仑三世的外祖母约瑟芬也有过婚史），居然还是个连法语都说不了几句的英国人！霍华德夫人的皇后梦在开始之前就被判了死缓。

不过路易·波拿巴对霍华德夫人终究是有亏欠的：她不仅一直替他照顾欧仁·比尔和亚历山大·比尔这两个私生子，还为政变活动前前后后垫付了数十万法郎的经费。于是，路易·波拿巴决定从金钱和名位上补偿她。霍华德夫人先被送到勒阿弗尔，后来在圣克卢宫附近得到了一座城堡。她从法国财政部获得了600万法郎的现金，拿破仑三世还授予她“博勒加尔伯爵夫人”(Comtesse de Beauregard)的头衔。

博勒加尔伯爵夫人后来又有过一次婚姻，不过仍以失败告终，拿破仑三世也一直和她保持着私下来往。伯爵夫人和第一位丈夫的儿子马丁·哈略特（有资料认为他也是拿破仑三世的私生子）后来也得到路易·波拿巴的厚待，受封为伯爵，并与一个匈牙利贵族之家联姻。

另一位候选人是皇帝的堂妹和曾经的未婚妻玛蒂尔德公主。这位公主仪态典雅，思想自由，经常举办沙龙款待艺术界人士（普鲁斯特的名著《追忆似水年华》中就多次出现玛蒂尔德家沙龙的场景）。和深居简出、不善交际的皇帝相比，热情奔放的玛蒂尔德讨人喜欢，也很有主妇派头。从1848年到1852年，她一直以爱丽舍宫女主人的身份出现，并获得了社交界的认可。

但一旦涉及到婚姻问题，事情就变得复杂了：路易·波拿巴始终记恨热罗姆·波拿巴亲王在斯特拉斯堡事件后解除了他和表妹的婚约，内心愤愤不平；而玛蒂尔德正与新情夫纽韦凯尔克处在热恋中，不甚乐于嫁给规矩繁琐、为人无趣的皇帝。拿破仑三世一直和她维持着亲密关系，但对她的文艺腔和不修边幅则不以为然。

在路易·波拿巴看来，娶一个法国女子总是有风险的：平民皇后不合拿破仑家族的“身份”，但要是娶了哪个正统派或奥尔良派旧贵族家的女儿，暗流涌动的政局会变得愈加复杂。因此，最好的选择是娶个外国女



玛蒂尔德·波拿巴（1820—1904），路易·波拿巴的堂妹，也是他追求的对象之一



瓦萨的卡罗拉（1833—1907）。拒绝小拿破仑的求婚后，她在1853年嫁给萨克森王储阿尔伯特。1873年阿尔伯特继承萨克森王位，但两人没有生育，后分别于1902年和1907年病逝。萨克森王位绝嗣后，阿尔伯特之弟格奥尔格一度担任摄政，但他在1904年也告去世，由其子腓特烈·奥古斯特继位。腓特烈·奥古斯特在即位前已经与妻子离婚，后未再娶，直至1918年被废黜，因此卡罗拉也是萨克森的最后一位王后

子，并且必须出身欧洲的古老家族，这对拿破仑三世进入欧洲几大王室的圈子也有好处。

第一位候选人是瑞典瓦萨家族的卡罗拉公主（Carola of Vasa），这位年方19的姑娘是欧洲王室中公认的美女，爱慕者众多。卡罗拉的祖父是1809年退位的瑞典废王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外祖母斯蒂芬妮·德·博阿尔内则是路易·波拿巴的外祖母约瑟芬首任丈夫的侄女。这样算起来，卡罗拉既是拿破仑三世的表妹，又是他的外甥女（因为拿破仑三世既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又是他的继外孙），这桩婚事可以说是亲上加亲。

不过，当路易·波拿巴的代表在1852年6月前往黑森大公国的达姆施塔特和卡罗拉的父母见面时，法国的帝制复辟工作还没有最终完成，这使得他的政治前景不太明朗；加上卡罗拉的父亲瓦萨亲王极为憎恶拿破仑一世[注]，因此求婚行动以失败告终。卡罗拉后来嫁给萨克森王储阿尔伯特，并在1873年成为萨克森王国最后一位王后。

第二位候选人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甥女、德意志霍恩洛厄－朗根堡公国的阿黛拉伊德公主（Princess Adelheid of Hohenlohe-Langenburg）。这位公主比卡罗拉还小两岁，她的母亲、雷宁根的费奥多拉公主是维多利亚女王同母异父的姐姐，但不是英国王室成员。

拿破仑三世此前从未见过阿黛拉伊德，之所以选择她为求婚对象，一是希望借此拉近英法王室的关系，便于外交操作；二来阿黛拉伊德毕竟还不是英国王室的正式成员，倘若被她拒绝，不像吃了卡罗拉的闭门羹那么丢脸。

不过法国代表刚到霍恩洛厄－朗根堡，维多利亚女王就在伦敦表态：她不绝对禁止两家联姻，但不希望出身“革命王朝”的法国皇帝成为自己的外甥女婿，也不愿用外甥女做筹码搞什么英法“和亲”。阿黛拉伊德本人倒是不讨厌法国皇帝，但费奥多拉公主在得知妹妹的看法后，马上回绝了法国代表。法国外交大臣德鲁安·德·吕伊随后又派一个代表团到伦敦去活动，不过拿破仑三世自己也有些心灰意冷，很快中止了求婚。阿黛拉伊德后来嫁给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腓特烈八世，德国统一后，他们的大女儿成为德皇威廉二世的皇后。

事到如今，拿破仑三世决定以一贯的出人意料方式结束关于婚姻问题的肥皂剧。1853年1月22日，他突然召集文武百官，宣布自己很快就要结婚，并且这位女子既非法国贵族，又不是欧洲哪个皇室的公主：“我喜欢这位我所爱、所尊重的女子，更甚于一位陌生的、与其联姻将利弊兼得的公主。”

为了挽回被卡罗拉和阿黛拉伊德拒绝而丧失的颜面，拿破仑三世摆出暴发户的架子，宣称自己“通过一个伟大民族自由选举而得到的是最光荣的称号”，不屑于当其他王室的女婿。不过他随后宣称新娘“将会复活约瑟芬皇后的美德”，就像个冷笑话了——所谓“约瑟芬的美德”，究竟是指夫丧再嫁，还是风流不羁，抑或被打入冷宫呢？

新出炉的法兰西皇后候选人来自西班牙，唤作欧仁妮·德·蒙蒂若（Eugenie de Montijo），拥有包括第十六代泰瓦女伯爵（Countess of Teba）和第十五代阿达莱斯女侯爵



阿黛拉伊德公主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腓特烈八世

（Marchioness of Ardales）在内的一长串头衔，年已26岁。

欧仁妮的出身很符合拿破仑三世的期待：她的父亲唐·西普里亚诺·德·帕拉丰·波托卡雷罗（Don Cipriano de Palafox y Portocarrero），也就是老蒙蒂若伯爵，曾是伊比利亚半岛著名的波拿巴主义者。拿破仑战争期间，老蒙蒂若志愿加入法军、成为一名炮兵军官，不仅协助法国人在伊比利亚半岛镇压西班牙游击队，1814年还指挥巴黎高科的学生军参加了巴黎保卫战。在战争中，他失去了一只手和一只眼睛。

拿破仑帝国败亡后，像老蒙蒂若这样的“afrancesado”（亲法派）在波旁王朝复辟的西班牙已无容身之地，只得四处流浪。1817年，老蒙蒂若和美国驻马拉加岛领事的女儿玛纽埃拉·基尔巴特里克（Maria Manuela Kirkpatrick），后者有二分之一苏格兰血统、四分之一比利时血统和四分之一西班牙血统，受过良好教育，聪明伶俐、善于玩弄阴谋。她随后给老蒙蒂若生了两个女儿，一个是1825年出生的玛丽亚·弗朗西斯卡（Maria



THE EAGLE IN LOVE.

一幅讽刺拿破仑三世婚史的英国漫画，标题为“恋爱中的鹰”

【注】 卡罗拉公主的祖父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在1809年被军事政变废黜，政变将领不接受阿道夫传位给其子古斯塔夫王储（即卡罗拉的父亲瓦萨亲王）的请求，改立阿道夫的叔叔为王，即查理十三。查理十三有二子，皆早夭，因此向当时权倾欧洲的拿破仑一世征询意见，拿破仑竟钦点法国元帅贝尔纳多特为查理十三的王储。1818年贝尔纳多特正式登基，称查理十四约翰，开创了瑞典的贝尔纳多特王朝，实际上也断绝了瓦萨亲王的复辟之路。这位亲王因此极为仇视拿破仑家族，二十年后，当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失败退位后，瓦萨亲王还兴高采烈地告诉卡罗拉：“我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Francisca de Sales)，昵称“帕卡”，后来继承了蒙蒂若女伯爵的头衔；另一个就是欧仁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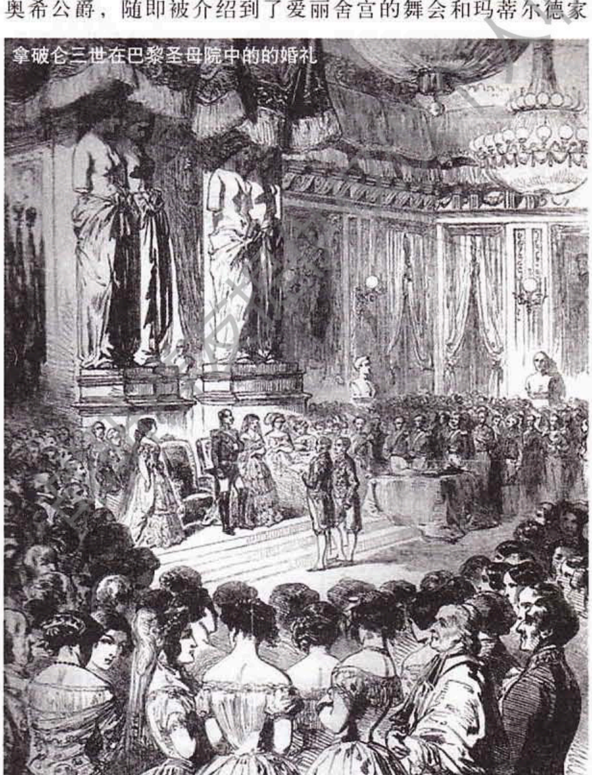
1834 年，老蒙蒂若的哥哥格拉纳达公爵去世，他把头衔、庄园和财产都留给了弟弟一家，欧仁妮和帕卡因此得以受到贵族小姐式的教育。受父亲影响，她们从小就把法语当作母语，直到 12 岁才开始学习西班牙语。不过这两位小姐和一般的贵族女子很是不同，从小就会骑马、打猎、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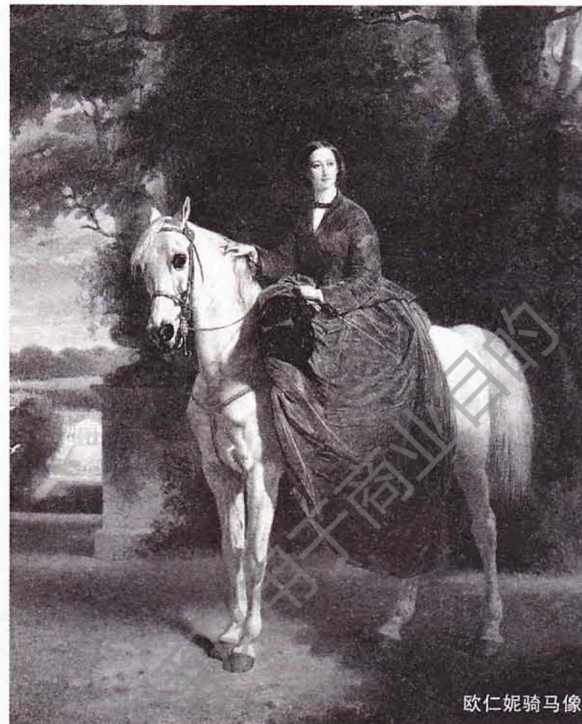
1836 年，玛纽埃拉把两个女儿带到巴黎接受教育，经自己当外交官的法国姐夫介绍，这一家早早进入了巴黎社交圈，还结识了大作家梅里美和后来的第二帝国元帅卡斯特拉纳。据说，梅里美就是根据玛纽埃拉的形象创作了传世经典《卡门》。

帕卡和欧仁妮也对巴黎的纸醉金迷极为向往，1837 年玛纽埃拉一度把她们送到英国上学，但两姐妹讨厌学校的呆板气氛，居然伙同女教师一路逃回了家。于是，她们继续跟随母亲留在巴黎，直到 1839 年父亲去世。玛纽埃拉随后一度成为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的宫廷女官，她带着两个女儿在欧洲各国首都和度假地之间盘桓，挥金如土、四海为家。

1849 年，出生在西西里的阿尔巴公爵向蒙蒂若家族求婚，欧仁妮喜欢上了这位 27 岁的年轻人，但玛纽埃拉认为性格安静沉稳的帕卡更适合当公爵夫人，因此安排了姐姐嫁给公爵。

失恋的欧仁妮一度变得疯疯癫癫，她有时男扮女装，在马德里大街上一边抽烟一边走正步，有时光着身子骑马在城里乱跑，有时着男装在斗牛场抛头露面，把所有淑女应有的礼数抛之脑后。这样的折腾持续了一年多，欧仁妮又随母亲前往巴黎，结识了拿破仑三世的专职皮条客巴西奥希公爵，随即被介绍到了爱丽舍宫的舞会和玛蒂尔德家


拿破仑三世在巴黎圣母院中的的婚礼


欧仁妮骑马像

的沙龙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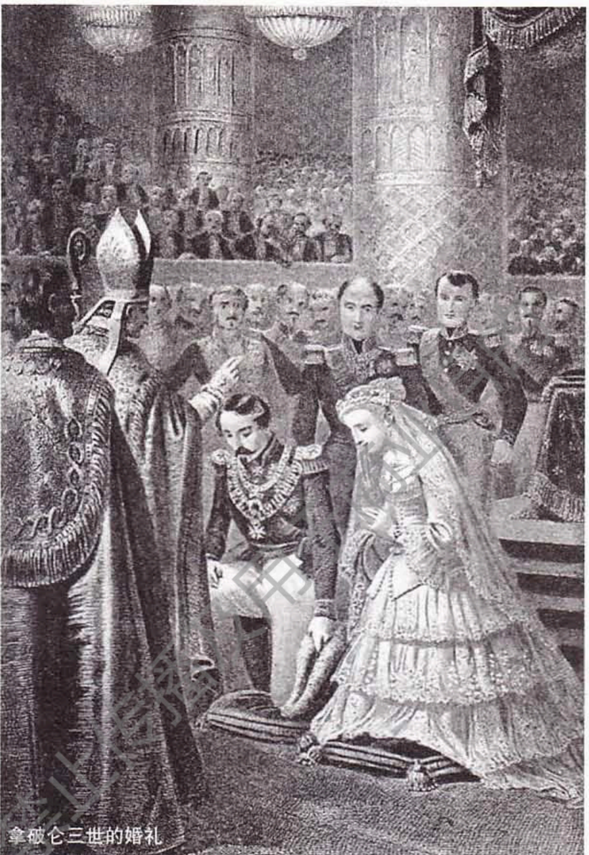
这位皮肤白皙、一头金发的姑娘年龄已经不小了，虽说异于常人的气质和捉摸不透的表情会吸引不少情场老手，但正经的名门贵胄是不会公开追求她的。只有刚刚抛弃了霍华德夫人的拿破仑三世会对欧仁妮感兴趣——后者从父亲口中听过不少老拿破仑的故事，对波拿巴家族十分向往；而路易·波拿巴和欧仁妮同样有一位工于心计的母亲，同样经历过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同样性情乖戾、敢于冒险，也同样债台高筑，自然会有许多共同语言。

还没称帝之前，路易·波拿巴总统就邀请欧仁妮参观阅兵式；1851 年之后，欧仁妮越来越频繁地现身于枫丹白露、贡比涅和爱丽舍宫的宴会。而1852 年12 月帝政复归之后，这两个人的关系更是愈发密切，拿破仑三世尽管依然在追求阿黛拉伊德，但同时还希望欧仁妮做他的“备胎”。欧仁妮马上拒绝了——皇帝对她的偏爱已经在巴黎社交界引起了非议，波拿巴党中不少权贵并不喜欢她，贵妇人们则把她看作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外国女人”。

终于，在1853 年1 月12 日的一次舞会上，由于一位大臣的妻子粗暴地占用了欧仁妮预订的座席，她向拿破仑三世摊了牌：要么正式求婚，要么她就离开法国去意大利。路易·波拿巴立马就服软了。

1 月29 日，即拿破仑三世发表“复活约瑟芬皇后的美德”讲话后一个星期，他和欧仁妮在杜伊勒里宫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世俗婚礼，国务大臣兼皇室总管富尔德是主婚人，内阁成员和波拿巴家族的成员悉数到场。为了表示亲善，欧仁妮还宣布自己不会接受巴黎市民“敬奉”的几件钻石首饰，她要将这些首饰拍卖、所得款项用于资助孤儿院，这一举动赢得了不少法国人的好感。日后她频频以这类善举和呼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声望远远超过了真正古老王室的公主。

为了表现对传统和天主教的尊敬，部分也是应皇后的



拿破仑三世的婚礼



拿破仑三世、欧仁妮皇后和拿破仑·欧仁－路易王储

请求（欧仁妮一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规模较大的宗教婚礼在1月30日才进行。这一天，巴黎全市张灯结彩，到处是披挂着三色饰带的杉树和鹰徽，围观皇帝夫妇的人群挤满了林荫大道。

婚礼的议程是严格模仿拿破仑一世和奥地利的玛丽－路易莎的婚礼进行的，婚车由过去查理十世的座车改装，拉车的马则是从英国王室的马厩租来的。中午时分，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乘着婚车，在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的簇拥下，由杜伊勒里宫前往巴黎圣母院，钟声、礼炮声、军号声和鼓声响成一片。抵达圣母院前庭时，欧仁妮特地向人群行屈膝礼，这赢得了巨大的喝彩声。

庇护九世依旧拒绝踏足巴黎，所以婚礼是由法国主教主持的。仪式结束后，新娘新郎又带着浩浩荡荡的人马返回杜伊勒里宫，接受各国使节和社会各界代表团的贺喜，最后在郊外的圣克卢行宫举行晚宴。拿破仑三世随后按旧例宣布特赦3000名政治犯，梯也尔等人得以离开流放地、重新回到巴黎，不过像雨果这样的1200名“罪大恶极者”依然在流放和逃亡中。

齐家大业给拿破仑三世带来的最大价值是解决了储君问题——1856年3月16日，皇储拿破仑·欧仁－路易·波拿巴出生，参议院、佩西尼和整个波拿巴家族都松了一口气。随后，皇帝又开始四处发情，到形形色色的情妇那里去发泄他那“安得列斯式的欲望”了[注]。

有趣的是，1856年，拿破仑三世曾经从伦敦找了一位医生罗伯特·弗格森给自己做健康检查，这位医生诊断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并认为这对他的性功能影响很大（英国政府后来专门从弗格森那里购买了这份病历）。除此之外，他还患有慢性肾炎、膀胱结石、膀胱炎、前列腺感染、关节炎、痛风、肥胖症和肺炎，在五十岁之后身体每况愈下。

或许是因为这些原因，生下皇储之后，欧仁妮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了，她开始学习她那野心勃勃的母亲，把注意力转到政治上来。皇后是天主教的拥趸，教权主义者和保守派对她存有好感，尽管她除了骑马打猎之外毫无政治天份，在中年之后还是成为了宫廷政治中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1865年之后，欧仁妮与拿破仑三世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只是政治算盘以及随后到来的1870年的灾难才让他们没有决裂。

除去帝国元首的职务之外，称帝后的拿破仑三世还扮演着波拿巴家族族长的角色，他的手段依然是金钱和权位笼络：68岁的热罗姆－波拿巴和他的儿子都获得了亲王头衔，虽然因为参议院的反对，热罗姆辞去了议长之职，但他继续担任残老军人院院长，并获得了元帅头衔和一座宫殿。拿破仑－热罗姆亲王虽然反对帝制，但依然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长期在参议院据有一个席位，后来他去了意大利。拿破仑三世安排他和撒丁国王维克托·埃曼纽尔二世的女儿结了婚。

拿破仑－热罗姆的姐姐玛蒂尔德虽然不再是爱丽舍宫的女主人，但依然扮演着巴黎社交圈的要角。皇帝甚至打

【注3】　18－19世纪，法国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法属安得列斯群岛的居民因为气候和饮食原因，性欲较一般人更强烈。拿破仑三世的外祖母约瑟芬皇后就出生在圣安得列斯的马提尼克岛，她和女儿奥当丝、外孙小拿破仑都有私生活放荡的名声。有趣的是，欧仁妮皇后据说有性冷淡的心理疾病，自诞下皇储之后，她就很少与拿破仑三世同房了。

算替热罗姆的私生子认祖归宗——1803年，19岁的热罗姆曾经在美国和马里兰州一位大富翁的女儿伊丽莎白·帕特森（Elizabeth Patterson）私订终身，两年后在伦敦产下一个私生子。拿破仑一世因为无法说服教皇为这桩婚姻公证，拒绝承认帕特森小姐和他的儿子为波拿巴家族成员，此后这个名为杰罗姆·拿破仑·波拿巴（Jerome Napoleon Bonaparte）的年轻人一直随母亲生活在美国。

1854年，拿破仑三世把杰罗姆和他的大儿子杰罗姆二世（即热罗姆－波拿巴的长孙）请到巴黎，恢复他们的法国国籍，允许他们合法使用波拿巴这一姓氏，并给予两人每年分别为7万法郎和3万法郎的年金。杰罗姆·拿破仑·波拿巴二世此时刚刚24岁，毕业于西点军校，一表人才，拿破仑三世任命他为法军上校，随皇帝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在法军中服役至1871年。拿破仑三世还想给杰罗姆封一个爵位，不过遭到了拿破仑－热罗姆亲王的反对。

1856年，波拿巴家族在杜伊勒里宫就杰罗姆的问题开了一次会，由于拿破仑亲王的坚持，杰罗姆·拿破仑·波拿巴及其后代只允许保留姓波拿巴的权利，此外不享有任何皇室津贴和爵位，也不被算作波拿巴家族的正式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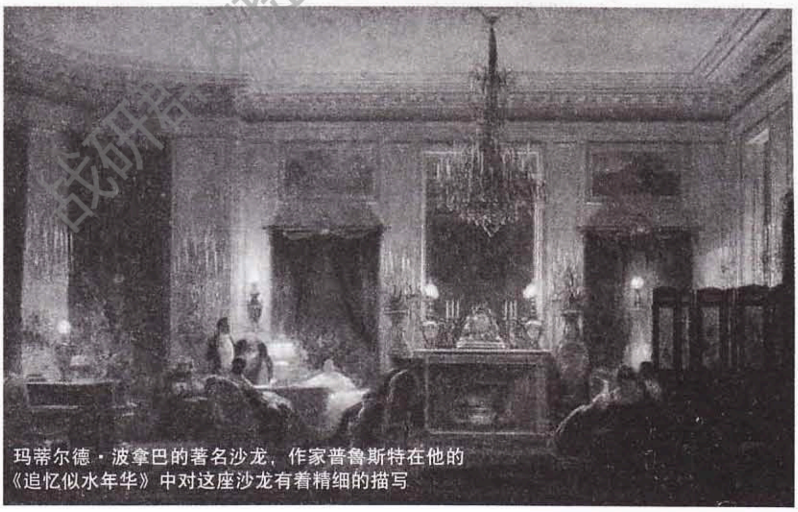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伊丽莎白·帕特森和她的家族并不是无名之辈，在美国甚至还是大名鼎鼎的望族。伊丽莎白的父亲威廉·帕特森来自爱尔兰，曾是马里兰州排名第二的富翁，她的哥哥罗伯特娶了头号富翁、卡罗尔顿的查尔斯·卡罗尔（独立宣言签字者之一，马里兰州议会首任议长，联邦终身参议员）的孙女玛丽安娜为妻。罗伯特死后，玛丽安娜改嫁给英国威灵顿公爵的长兄、曾任印度总督的理查德·韦尔斯利侯爵（Richard Wellesley）。而热罗姆亲王的幼孙、杰罗姆·拿破仑·波拿巴的小儿子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则在美国投身政界，从1905年到1909年，他先后担任了美国海军部长和司法部长，一手创建了联邦调查局（FBI）。

除去热罗姆家的成员外，为了报答少年时代在瑞士帮助过自己的外祖母约瑟芬的家族，路易·波拿巴在爱丽舍宫也给约瑟芬的堂兄妹留了房间，并安排了一些领干饷的宫廷职位给他们。

和波拿巴家族其他成员关系比较疏远的吕西安·波拿巴（拿破仑一世最年长的弟弟，第一帝国时受封卡尼诺和穆西格纳诺亲王，其婚姻受到波拿巴家族的排斥）、甚至缪拉（拿破仑一世的小妹卡罗琳之夫、法国元帅，第一帝国时受封那不勒斯国王，后背叛拿破仑）的子孙，也获得了长期津贴和杜伊勒里宫的关注。当然，皇帝的慷慨只有150万法郎是自己买单的，那就是贴补约瑟芬的家人那部分，其余的所有开销——热罗姆和他的子女每年150万到220万的年金，爱丽莎·波拿巴一家每年20万的津贴，缪拉家族每年20万的津贴，莱蒂齐亚·波拿巴一家每人2.4万法郎的津贴——通通是由帝国财政部买单的。拿破仑三世还会以赠送房子、现金等方式显示自己的慷慨。从1852年到1866年，仅缪拉家族获得的现金馈赠总额就高达436.2万法郎，而同一时期巴黎一名成年男工的平均日工资还不到5法郎！



被称作“拿破仑亲王”的拿破仑·约瑟夫·波拿巴（1822–1891），绰号“普隆普隆”。他是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的次子，玛蒂尔德公主之弟，1840–1848年是小拿破仑的政治伙伴是支持者。1848年革命后，拿破仑亲王当选制宪议会议员，为堂兄竞选总统立下大功。但他在1851年强烈反对后者称帝，与皇后欧仁妮也有矛盾，因此在第二帝国时代不很受宠。拿破仑亲王后来担任过一阵阿尔及利亚总督，娶了撒丁国王维克托?埃曼纽尔二世（1861年之后为意大利国王）的女儿，晚年在意大利定居。拿破仑亲王头脑聪明，但言语刻薄、容易冲动，被视为波拿巴家族中的左翼分子，帝国参议院曾因他可能成为拿破仑三世的继承人而困扰不已



玛蒂尔德·波拿巴的著名沙龙，作家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对这座沙龙有着精细的描写

八、杜伊勒里宫的斯芬克斯“专制帝国”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既不像卡芬雅克或尚加尔涅那样拥有显赫的战功，也不像基佐或梯也尔那样富于政治统治的经验。他只是一个法国版的福斯塔夫，一个从头脑到长相都平庸不堪的丑角：五短身材、长胡须、小眼睛，走路外八字，肩膀向左歪，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掩盖住年轻时养成的浪荡子习气。

玛蒂尔德沙龙上的常客德·日拉

丹夫人尖刻地评论说：“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而这个“面首”之所以被推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只是因为他有一个稀罕的姓氏——自1830年以来，陆陆续续被正统派、奥尔良派、共和派、激进派各色人等折腾的七荤八素的农民、教士和商人已经不再相信政治了，他们需要的是魔术，是不费任何代价就能令万象更新的奇迹。而在法兰西，没有什么能比拿破仑这个姓氏更适于承担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了。

然而，第三位拿破仑本人并没有自负到妄想他能拥有点石成金的本领。1853年时他已经45岁了，在这个年纪，第一位拿破仑已经结束了光芒万丈的前半生，正在去往圣赫勒拿岛的路上。他留下的这个姓氏给自己的侄子提供了通往皇帝宝座的天梯，但能否不从爱丽舍宫的“乐土”中跌落下来就要看自己的手腕了。通常来说，这些手段都是丑陋而直接的：外来者的身份使他难于钻入笼罩着浓厚奥尔良王朝风气的政治家圈子[注]，志大才疏的个性又使他不可能审慎精细地依靠自己一个人的头脑解决所有问题，只有以赤裸裸的收买去换取那些利欲熏心之辈的效忠。

说到底，路易·波拿巴是一个头脑停留在旧时代的人物，对1814年之后法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既不懂也不屑于去懂；一半是出于对伯父的效仿，



波拿巴党干将欧仁·鲁埃（1814–1884）。早年是律师，1848年革命后先后入选制宪议会及立法议会，1849–52年几次出任第二共和国司法部长，并参与1851年12月政变的策划和1852年宪法的起草。第二帝国成立后，他受到拿破仑三世的信任，先后担任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55–63）、国务大臣（1863–69）和参议院议长（1869–70），第二帝国崩溃后流亡海外，继续致力波拿巴派的复辟活动

一半是出于无奈，他不断尝试和“人民”直接对话，抛出一连串或者异想天开、或者宏伟浮夸的计划。这一切叠加起来，使得法兰西第二帝国不到二十年的历史呈现出一种怪异和夸张的外观。

历史学家把1859年之前的第二帝国称作“专制帝国”，这主要是因为皇帝一人集权的特征，拿破仑三世自己则把它概括为“满足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的利益并使高层阶级归附于我”。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852年12月30日，立法院通过了行政法院提交的帝国宪法草案，这个草案实际上只是对1852年宪法做的一种简单调整，也就是把最高统治者的头衔由总统改为皇帝，任期从十年延长到终身，同时其继任者改为世袭。这样一来，拿破仑三世本人就成了整架国家机器的原动力。

在称帝后的前八年，拿破仑三世至少表面上相当勤政，整天忙忙碌碌地阅读报告、作出批示，但他毕竟没有伯父的天才，在许多事情上不得不仰仗内阁。不过，内阁中的10多位部长是作为个人而不是机关向皇帝负责的，这意味着他们更像一个执行委员会，而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以独立的意志去和皇帝相对抗。

为了达到控制一切的目的，拿破仑三世甚至仿照第一帝国设立了“警政大臣”这个新职务，由自己的亲信、巴黎警察局长莫帕担任，其耳目一直伸到各大城市的区一级。不过，莫帕很快就因为试图兼并宪兵惹恼了陆军大臣和内政大臣，警政部随后不得不撤销。但拿破仑三世依然通过其他特务机关和私人情报网搜集朝臣们的经济和家庭隐私。

一场典型的第二帝国时代的内阁会议是这样召开的：每周一和周三的下午，大臣们被召到办公室，挨个就某一问题或者各自分管的事务发表看法。每个人讲完之后，皇帝往往会提出质询或疑问，还经常做出和大多数与会人所持看法截然不同的决定，否定掉大臣们的意见。如此一来，大臣们或者被迫根据皇帝的裁断变更已有的决策，或者要进行改进和补充，这些工作不可能在会上完成，只能在事后以单独呈文或者个别觐见的方式再行处理。这样一来，等于每次内阁会议只是毫无内容的清谈，真正有内容



查尔斯·约瑟夫·波拿巴（1851–1921），杰罗姆·拿破仑·波拿巴幼子，热罗姆·波拿巴亲王之孙，拿破仑三世的堂侄。出生于马里兰州，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巴尔的摩从事过多年法律事务和民间政治改革活动。西奥多·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查尔斯·波拿巴于1905年被委任为海军部长，1906年改任司法部长，任内创建司法部调查局（FBI前身）。从照片上看，他的长相带有波拿巴家族成员的典型特征（也有些像《丁丁历险记》中的杜邦侦探）

的决定都是皇帝以一对一的形式嘱咐给大臣的。这当然不是因为小拿破仑对每一件事情都有独到的看法，更不是因为他真的那么喜欢吹毛求疵、精益求精，只是为了时时提醒官员们：这个国家只有一个最高决策者。当然，鉴于皇帝本人偏好细节而忽视整体，这些决策的科学性往往是打了折扣的。

“即使是在实行个人统治的时期，帝国也不像人们根据其组成而有理由想象的那样大搞压制之风，因为拿破仑三世统治中的铁杆保皇派从来就为数不多。”（保罗·法默：《法兰西第二帝国》）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拿破仑三世“天才”地创造出了“抢椅子”的办法——到1869年为止，第二帝国10多个部长职位几乎一直是从不到30个人的小圈子里产生出来的。例如，

【注】 这可以说是拿破仑三世流放梯也尔、雷缪扎等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说，任用七月王朝时代的旧臣最有利于塑造第二帝国既开明又富于秩序的形象，但奥尔良党的资深政治家们从1830年起就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和一套独特的政治潜规则，运行了近二十年之久。这些人并不在乎法国采用何种政体，唯一的目标在于维护并扩大其自身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政治和经济权势。倘若小拿破仑任用了这批政客，就不得不忍受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上的掣肘，所以他干脆将其悉数罢黜、另起炉灶

佩西尼这位“世界上唯一的波拿巴主义主义者”曾在1852–1854年和1860–1863年两度出任内政大臣；阿希尔·富尔德这位政变的会计师四次出任财政大臣；欧仁·鲁埃和巴罗什都担任过司法大臣，此外还有比约、马涅、福图尔等人。他们的年纪大多在50岁左右，在七月王朝时代担任过不算很显赫的公职，几乎都做过律师，是一群注重事务而又缺乏名望的办事员，不像基佐或梯也尔那样是能言善辩、才华横溢的国务活动家。他们深知自己离开皇帝就将一无所有，总是小心翼翼地迎合拿破仑三世多变的口味；每当后者觉得有必要调整一下部长的人选时，他就在这20几个人里随机拿下几个、换上另外几个，乐此不疲。有时大概连他自己也觉得没趣了，在“抢椅子”的信号发出之后，坐在部长椅子上的那个人只是象征性地晃晃脑袋、做出要走人的姿态，随后又心安理得地坐稳了。

当然，皇帝是很擅长用金钱来弥补朝臣们这种被呼来喝去的屈辱感的：他给各部部长开出每年4万法郎的年俸；倘若此人同时还是参议员，则在此基础上再加3万。像欧仁·鲁埃这样的红人由于兼任几项公职，每年仅工资收入就高达26万法郎。1860年，他还一次性赠给比约和马涅每人一幢价值60万法郎的别墅，连带10万法郎的家具。不过皇帝那位同母异父的弟弟莫尔尼却不在此列——这位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关键人物在1854–1856年和1857–1865年两度出任“花瓶”立法院议长，一直没能掌握实权。莫尔尼身材高大、目中无人，据说小拿破仑相当不满意他的血统【注】。

当然，皇帝本人很清楚：他能完全掌握的仅仅是这群听差式的办事员，既存的共和主义、奥尔良主义和正统主义的思潮及其代笔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被取消的。不过在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只有他——皇帝本人——有能力和资源在这些派别之间纵横捭阖、左右逢源。而他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就是当年基佐当年的那句口号：“先富起来吧！”(Enrichissez–vous!)即通过国民经济的繁荣增加政府的公信力，进而使百姓乐于适应僵化的政治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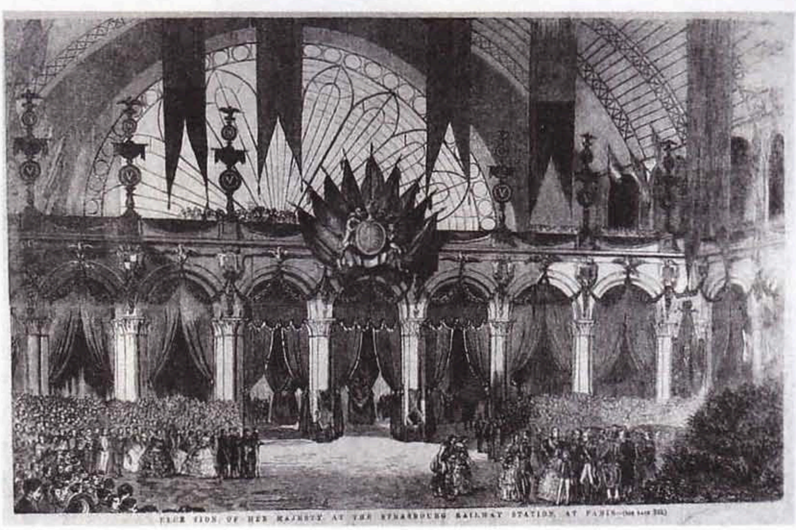
从1850年起，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新开采的黄金开始涌入欧洲，当时法国的贸易处于顺差状态，因此这些黄金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法国。早在临时政府时期，鼓励信贷、利用黄金贷款发展大企业就成了法国政府的既定方针。1848年创办的贴现银行已经证明，它在满足商业往来中短期贴现的需求方面非常有效，于是拿破仑三世重新向该行颁发了特许状，允许其扩大业务范围。为了对新开办的生产性企业进行长期投资，政府于1852年给佩雷尔兄弟经营的动产信贷银行和另一家地产信贷银行颁发了信贷特许状，此后佩雷尔兄弟给铁路、航运、煤气照明、采矿等许多企业提供了资金；地产信贷银行则专事经营土地价值抵押业务，他们投资巴黎的房地产，促进了首都和其他大城市的重建。

早在七月王朝时代，法国就开始修建众多铁路支线，并制订了通过铁路将全国各地连结起来的“蜘蛛网计划”。但因为资金不足、政府也不重视，铁路主干线的修建工作一直没能进行。临时政府曾计划修建由首都通往南部和西南部的中央大铁路，但直到这个政府倒台也没有建成几公里。到1851年底为止，法国投入营运的铁路线总长仅有3600公里，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普鲁士。而拿破仑三世为了显示自己的魄力，从一开始就采取果断行动：1857年，公共工程大臣欧仁·鲁埃把参与中央大铁路建设的无数家地方小公司合并成6家大企业，政府与这几家公司分别签署协议，由每家负责修建并专营某一地区的铁路网。为了鼓励企业把铁路支线拓展到运量不足、无利可图但是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政府还承诺提供补贴，或者把租借权转交金融界。



1851年政变前后，英国报纸刊登的莫尔尼画像。小拿破仑的这位同母异父弟弟早年和奥尔良王室关系良好，只是在1848年革命爆发、经济破产之后才重新投靠哥哥，并成为1851年12月政变的策划者之一。莫尔尼作风粗暴、无所顾忌，小拿破仑忌惮他的野心，多次将他免职。第二帝国时期他担任过内政大臣（1851–52）、立法院议长（1854–56、1857–65）和驻俄大使（1856–57），1862年受封为第一代莫尔尼伯爵

【注】 莫尔尼是奥当丝王后和弗拉奥伯爵的私生子，而弗拉奥伯爵本人又是拿破仑一世的外交大臣、以机敏狡诈而著称的贝内文托亲王塔列朗的私生子。在深受大革命精神影响、男女作风开放的法国，非婚生子并不被认为有伤名誉，但莫尔尼过于自负，公然在社交场合炫耀自己的家系，引起了拿破仑三世的不满。塔列朗曾在第一帝国覆亡时转而投靠路易十八，随后出任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和首相，因此拿破仑三世认为莫尔尼的血统中也有不忠的遗传因素。莫尔尼贪财的毛病也使他的公众形象极其狼藉：1853–1857年他是中央大铁路工程总负责人，当他离职时，整个项目已经濒于破产



右图：1853年巴黎斯特拉斯堡火车站的落成典礼。这座车站的落成标志着连接法国与普鲁士的铁路的通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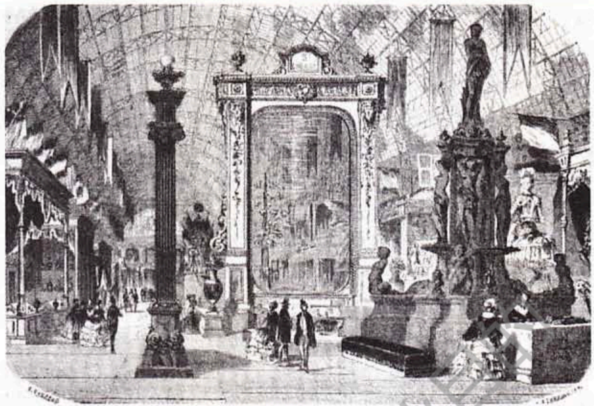
自1853年起，巴黎和普鲁士之间已经有铁路相连；1855年，连结首都和地中海沿岸的铁路竣工；1860年，干线延展到西班牙边境。到1870年初，法国全国的铁路运营里程已经超过17000公里。全国铁路运输旅客总人次由1851年的2000万增加到1869年的1.14亿，货运总吨次由460万增加到4400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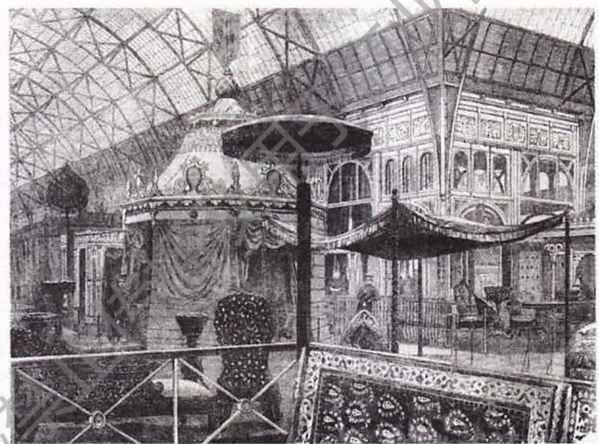
拿破仑三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不过自打年轻时代起，他就很喜欢追逐时兴的经济学思想，并以维护公平的社会主义者自居。流亡伦敦的经历让他对英国社会产生了好感，以至于他刚刚当上总统时，就雄心勃勃地要给法国这座大厦“加上自由派的屋顶”。

为了表示对自由贸易理论的推崇，同时也是为了改善法英关系，皇帝责成经济学家谢瓦利埃去研究降低关税的可行性，后者认为，这种做法对法国经济利大于弊，因为它既可以降低进口原料的价格，又可以鼓励法国制造商为降低成本而采用现代化生产方法。拿破仑三世随即命令他和英国经济学家科布登一同起草英法通商条约草案，并于1860年批准了这一草案。之后，第二帝国和荷兰、西班牙、德意志同盟也缔结了类似的条约。

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位官员曾以满足的笔调描绘过“专制帝国”时期城市的社会风貌：“城里穿行的不再是一群群起义者，而是三三两两前去上工的泥瓦匠、木匠和各种工人；倘若人们翻起铺路石，这不是为了堆砌，而是为了疏通地下水和煤气管道；房屋不再受到大炮和火灾的威胁，当政府最终决心拆除它们时，总会给出优厚的征购赔偿。”

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拿破仑三世把物质进步和政治保守调和起来的承诺基本上已经成为现实。在十二月二日政变后的十年里，共和运动在法国几乎销声匿迹，那些从流亡地返回的领袖们保持了沉默。奥尔良党的干将如巴罗什、比约现在已经成为皇帝“抢椅子”游戏的成员，而构成七月王朝基层骨干的外省资产阶级早就不再向奥尔良家族效忠了。正统派依旧愤愤不平，不过他们远在千里之外，用于不可能拿出那么多实实在在的利益去收买人心。





上图为1855年巴黎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的情景。这是仿照1851年英国伦敦的首届世界博览会举办的，会场设在塞纳河畔新建的“工业宫”（Palais d' Industrie）里，目的是展示各国的工业和文化成就。著名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品级标准就是在这次博览会上确定的



1855年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访问法国的情景，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王后在杜伊勒里宫为女王夫妇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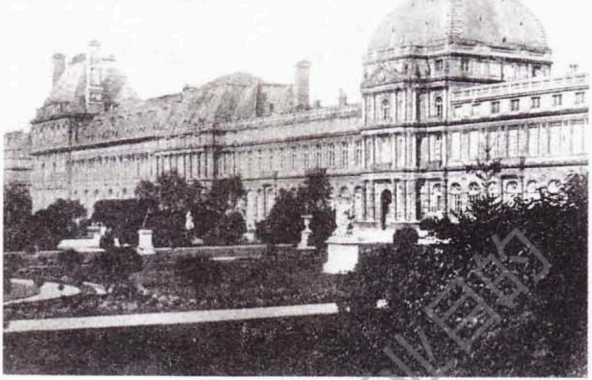
1855年，第二帝国的国际形象因为巴黎万国博览会被推向第一个高潮。为了在气势上不输给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拿破仑三世责成公共工程部在改造中的巴黎塞纳河畔修建起一座可与英国水晶宫媲美的工业大厦，由热罗姆·拿破仑亲王担任工程总督导。5月份世博会开幕那天，皇帝本人亲临现场致辞。为了让尽可能多的外国游客看到法国的“成就”，相当一部分巴黎市民被迁到外省。当年7月第一个周末，参观博览会的英法两国游客达到了8万人之多。

乘着世博会的机会，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开始了她在位期间第一次访法之旅，收到拿破仑三世极为隆重的欢迎。女王对这位“篡位者波拿巴”的侄子印象很奇特，她认为：“这个人根本不像一个法国人，而且其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实法国人也觉得皇帝“不像一个法国人”，他深居简出，经常沉默不语，经常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决定。人们给他起了许多绰号：“沉默者”，“斯芬克斯”，“杜伊勒里宫之谜”……全欧洲都带着惊奇注意着这位斯芬克斯的一举一动，一般来说，人们愿意相信法皇深谋远虑、颇有手段。只有一个三十来岁的普鲁士议员对此不以为然，这

个人就是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早在1850年，他就公然讥讽说："此公（指拿破仑三世）惯于喜怒无常，人们因为捉摸不透，只好高估他的智慧。"

第二帝国时期的杜伊勒里宫，自杜伊勒里花园中拍摄



"乐土"里的生活

如果说拿破仑一世主要因横扫欧洲的战功而名垂青史，那么使拿破仑三世闻名于世的则是其别开生面的宫廷生活，特别是以皇室为中心的巴黎社交圈和文化界的繁荣。当然，这种繁荣和美第奇式的或路易十四式的奢华显然大不相同，因为第二帝国本质上并非昔日波旁专制王朝的延续，而是奥尔良王朝式的资产阶级小朝廷（甚至像奥尔良王朝一样沿用了象征共和的三色旗），第二帝国和契约王朝的区别只在于，七月王朝时代的法国还没有这么丰裕的物质条件可供挥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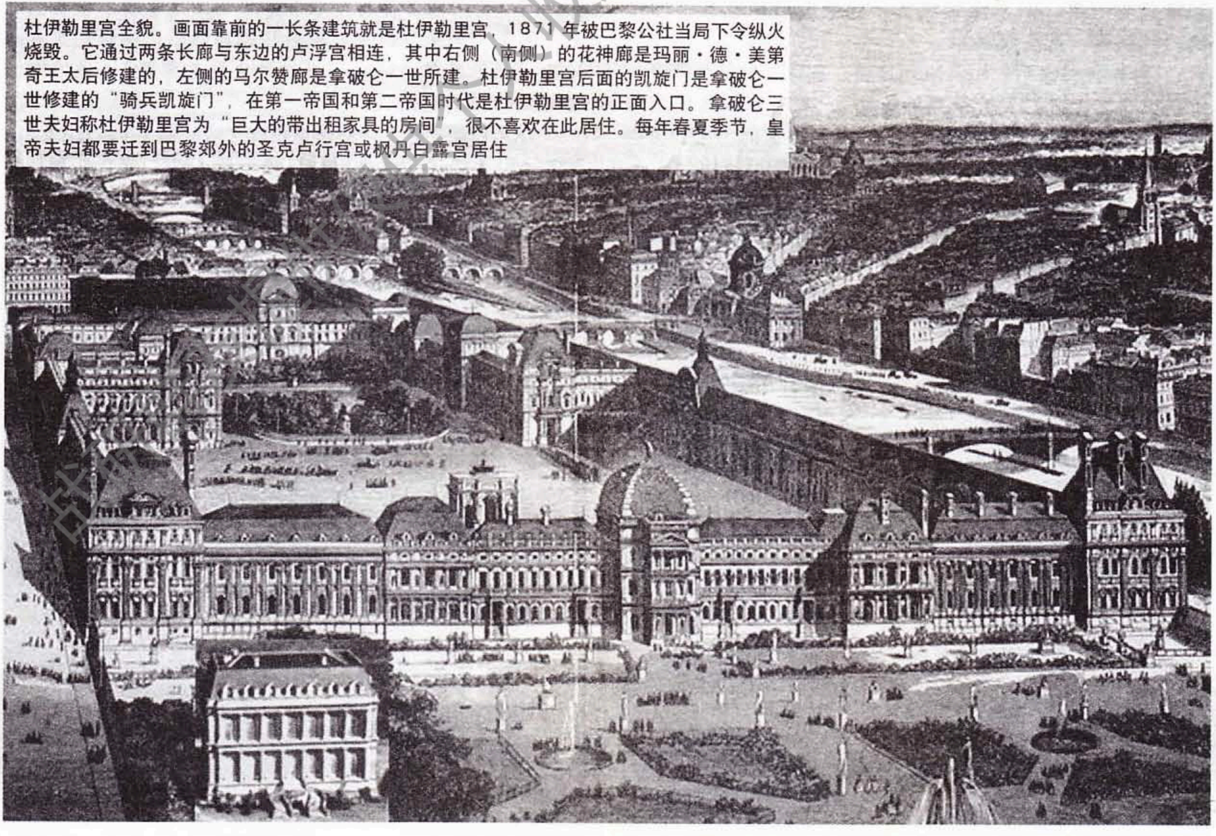
第二帝国的君王和显贵们都有着暴发户和附庸风雅者的双重个性：他们既喜爱金钱和纯粹的感官刺激，又喜欢装出高雅而有品位的腔调。当时巴黎的头面人物则是这么一群人：放荡的知识分子，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者，麻木不仁的年轻律师，歌剧院的戏霸和食客，衣冠楚楚的掮客和当铺老板，热衷精致晚餐的饕餮客……

像过去的几代君王一样，拿破仑三世一家住在杜伊勒里宫。不过大概是嫌皇宫不够"阔气"，他下令用一连串的走廊和长墙把杜伊勒里宫和卢浮宫连接起来，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城堡状的东西，其中不仅有皇室的生活空间，还有几个大臣的办公室、卫队营房以及专用的电报室。

这个大而无当的设计刚好体现了小拿破仑那糟糕的审美趣味。他的表妹斯特凡妮·德·塔歇嘲笑说，巨大的皇宫根本只是一串连着的客厅和走廊，这些客厅和走廊"如此千篇一律，因此虽然配得上一座豪华的宫殿，虽然布置整理得极其华丽之能事，但住在里头的人也很难得到什么赏心悦目的舒适或者多姿多彩的享受"。皇帝喜好差遣仆役的老毛病这个时候越发变本加厉，以至于宫里到处住着人，活像一个蜂箱。

杜伊勒里宫各层之间以螺旋形的楼梯相连，过道中24小时点着石油灯。被元帅厅占据的钟楼位于宫殿中央，皇帝夫妇住在南翼（塞纳河和钟楼之间），其中皇帝的套间占用了底层毗邻花园的一侧，内侧的卧室里挂着据说是查理曼大帝的护身符，外侧的办公室里则挂着巴黎地图和安格尔的恺撒画像。这个套间安装有整个皇宫唯一一套采暖设备，不过弄巧成拙，使得整个屋子总是温度过高，加上拿破仑三世经常在卧室里抽烟，整个房间永远乌烟瘴气。

皇后的住所在皇帝起居室的正上方，一直延伸到毗邻的



杜伊勒里宫全貌。画面靠前的一长条建筑就是杜伊勒里宫，1871年被巴黎公社当局下令纵火烧毁。它通过两条长廊与东边的卢浮宫相连，其中右侧（南侧）的花神廊是玛丽·德·美第奇王太后修建的，左侧的马尔赞廊是拿破仑一世所建。杜伊勒里宫后面的凯旋门是拿破仑一世修建的"骑兵凯旋门"，在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代是杜伊勒里宫的正面入口。拿破仑三世夫妇称杜伊勒里宫为"巨大的带出租家具的房间"，很不喜欢在此居住。每年春夏季节，皇帝夫妇都要迁到巴黎郊外的圣克卢行宫或枫丹白露宫居住

平台，占用了整整十二个房间，光客厅就有三个——从浮夸这一点上说，这对夫妻还真是气味相投。欧仁妮皇后的房间采用十八世纪风格的装饰，三个客厅中，绿色的用以招待贵妇，玫瑰色的用以招待皇亲，蓝色的则用来接见外国使节夫人和民间代表。

皇后套间的另一侧是一连串客厅和走廊，还有宽大的路易十四客厅，那里是君主夫妇共进午餐的地方，招待贵宾的晚宴则在月神走廊举行。不过据当时参加过杜伊勒里宫招待的达官所记，皇宫二层以上经常弥漫着一种腐败的臭味：它的通风设备依然停留在18 世纪的水平，也没有自来水。

在太平无事的时候，第二帝国的一整年是以杜伊勒里宫的新春舞会作为开端的。这样的舞会一般会发出3000 到4000 张请柬，吸引到全巴黎近百万人的关注。室内装饰有黄金葡萄架，上面缠着真的常春藤，还有特制的小型喷泉和鲜花。男客们必须身着十八世纪式的齐膝裤和长筒袜，女客们着晚礼服，军人则穿军礼服。当皇帝夫妇在元帅厅或月神走廊向宾客们致意时，整个皇宫都回响着掌声和嘈杂声。侍从长依次把有名望的法国来宾介绍给皇帝夫妇（这类宾客有时可以达三四百人之多），外国贵宾则由本国大使引荐。这种舞会从1 月到4 月差不多每个月都会举行。

许多外国人抱着看热闹的心理，寻找被邀请入宫的机会，在拥挤的人群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交相出现。在这一点上，拿破仑三世倒是表现出了平民作风：他好像很喜欢这种乱糟糟的热闹场面，而不在乎刻板的老人批评“宫廷不应当像大公馆的沙龙”。狂欢节的化装舞会更是成了名副其实的炫耀，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服装都会在那里出现。巴黎普通人家的漂亮女孩会以极高的价钱收买参加舞会的门票，只求出尽风头；而皇后居然也会不顾体统，和高手一起引吭高歌。

每年5 月之后，一俟风和日丽，皇帝夫妇便会溜出杜伊勒里宫这个“散发着臭味的蜂箱”，到近郊风景优美的圣克卢宫小住，并在那里举行晚会。6、7 月间，他们会邀请两三位近臣和亲友到枫丹白露宫，每日散步泛舟。8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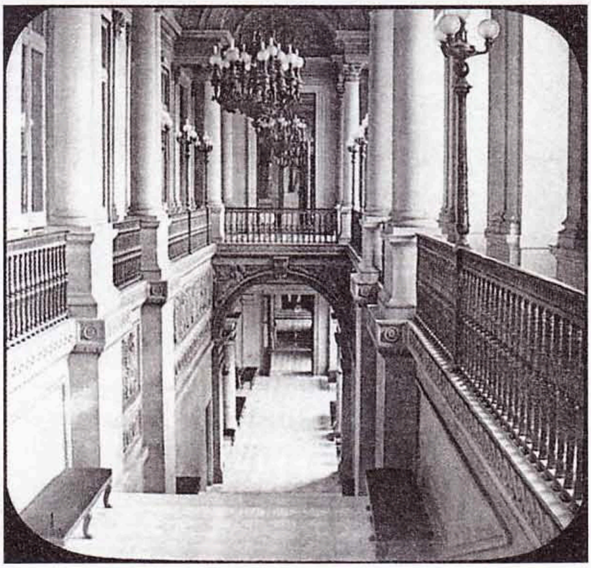
第二帝国时期杜伊勒里宫的舞会和招待会

则是例行的温泉疗养时间，有时去普隆皮埃尔，有时去维希，有时去夏龙营地。9 月是去比亚里茨（Biarritz，位于法国西南部比斯开湾沿岸，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欧洲上流社会的避暑胜地）看海的日子，皇帝喜欢在那里会见外国贵宾和使节，大家观看喜剧和舞蹈，唱唱德文和法文歌（一般来说拿破仑三世的德文歌更强些），也抽空谈谈重要的外交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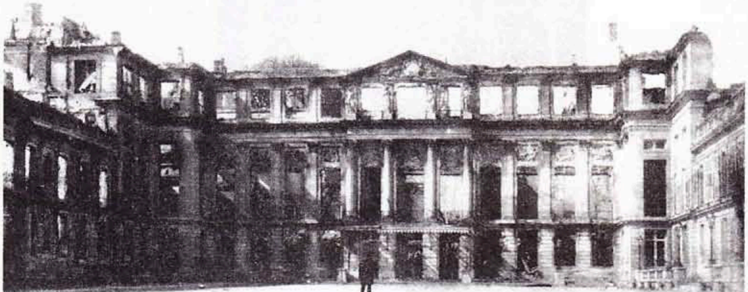
结束海滨之旅、回到圣克卢宫之后，到了11 月15 日，皇帝夫妇又要去往贡比涅作冬季度假，他们喜欢在那里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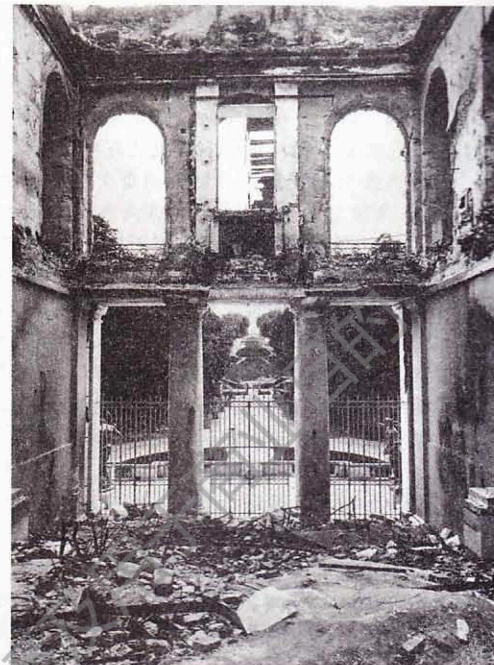


杜伊勒里宫的大走廊（下图）和召开政务会议的元帅厅（左图）



位于巴黎西郊圣克卢森林中的圣克卢宫，始建于1570年，1701年最终完工。1785年由路易十六买下送给玛丽·安托万王后，法国大革命期间充公。1804年拿破仑一世在此称帝，48年后他侄子拿破仑三世也在此接受了劝进。1870年巴黎围城期间，普军占据了圣克卢宫所在的高地，在与城中法军炮战时，宫殿建筑被法军炮火摧毁，残骸于1891年拆除。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一世买下了部分建筑构件和雕塑，用于装饰他在黑海的行宫





待文艺界人士，每周一批，持续一个月。整个场景依然像一出没有编排好的蹩脚戏——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宾客在火车站换乘马车，提着大包小包准备献给皇帝夫妇的破烂，穿过森林来到夫妻俩住的别墅。有时行李实在太多，贵宾们只能挤在阁楼上住宿。皇帝夫妇会以轻松的态度和这些大学者、画家、作家、医生们共进晚餐，并用打猎、野餐和业余戏剧打发时间。不过据说客人们并不领情，因为皇帝对美食品位很差，并且天气太冷。

这样冗长的会见通常会持续到12月中旬，到那时候，皇帝一家才会返回杜伊勒里宫的大“蜂箱”，准备正事——立法院会议（当时在法国尚没有庆祝圣诞节的习俗）。这种严肃的场合当然不会出现乱七八糟的歌舞，不过礼节性的宴会还是需要的。晚宴通常从7点钟开始，不到8点就结束，菜式很简单，餐具是铜、镍和银的合金制成的，因为皇帝嫌银餐具太贵。晚饭过后，皇帝会一个人在套间玩一阵牌，或者邀请几位大臣私下交流，不过他们多半不愿进到那个热气腾腾、烟雾呛人的房间。直到午夜时分，皇帝夫妇才辞别客人。如是一年才算告终，到1月2日举行新春招待会时，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除去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等几个国事繁忙的年头，皇帝夫妇的“档期”总是安排的这么满。



1856年夏天麇集在枫丹白露宫的拿破仑三世宫廷小圈子

自打波旁复辟王朝的“老人宫廷”和奥尔良王朝的“平民宫廷”以来，巴黎乃至整个欧洲都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般排场的皇室了。欧仁妮皇后尤其改变了法国民众对于“国母”的一般印象。她总是在一群锦衣华服的女官的簇拥下亮相，这些女官“是一群长着金色和栗色头发、脸上搽了粉、不太严肃的漂亮女舞蹈家和健壮女骑士，她们没什么思想，但擅长上流社会的油嘴滑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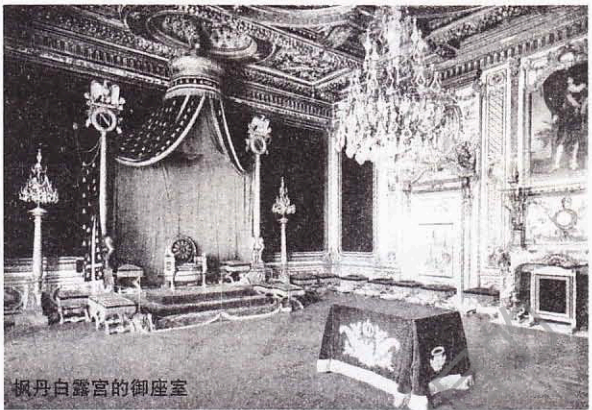
油画：被宫廷贵妇簇拥的欧仁妮皇后

欧仁妮皇后还很喜欢以时尚界先锋人物的形象出镜，服装史研究者认为，出现于1849年的带钟形裙撑的节日裙正是由欧仁妮大作推广才流

行起来的，她本人还首创了多种假花和连衣裙造型，这类连衣裙的订做价格在700到800法郎之间，而一套齐全的晚宴女服需要花费1300法郎，相当于普通工人家庭一整年的收入。因此，尽管拿破仑三世皇帝口口声声以“文艺界之友”自居，但法国的官样文化在整个第二帝国时期都没有什么像样的成果，只留下消费主义的一地鸡毛。

拿破仑三世本人已经自诩为当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从1860年起，他搜罗了一批历史学家和御用文人当帮手，开始撰写两卷本的《恺撒生平》。1865年和1866年，这部不温不火的著作问世，官方报纸用了好几个版面来大吹大擂，皇帝还请人将之译成多国文字，分寄给欧洲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当然，纪念恺撒不过是为了抬高“法国的恺撒”拿破仑一世，继而让人们对同样使用这个姓氏的皇帝本人高看一眼；会用这么曲折离奇的办法来自我夸奖和自我抬高，也只有小拿破仑这位“杜伊勒里宫之谜”想得出来。普法战争前夕，他还计划写一本小说，描述一个在美国度过了大半生的法国人回国所见的“建设成果”，不过随着法国的战败，小说创作也就搁浅了。

当然，若要说拿破仑三世的“乐土”腐蚀了社会风气，倒不如说它本来就是世风的写照和缩影。农民们选择小土地所有制的保护者路易·拿破仑来当法国皇帝，商人和市民阶层就选择杜伊勒里宫的狂欢来展现他们的财富和生活品位，只有两个群体暂时还无事可做，一是教士，二是军人。不过皇帝并没有忘记他们，称帝后不过一年，他就以教士的名义调动军队，挑起了一场重构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外交版图的大仗——克里米亚战争。WHS


枫丹白露宫的御座室


枫丹白露宫的皇帝寝室


位于巴黎东南塞纳－马恩省的枫丹白露宫是拿破仑三世的主要行宫之一。1137年法王路易六世下令在此修建狩猎行宫，后经历代君王改建，尤以16世纪时弗朗索瓦一世的扩建规模最大。由于十七世纪以后法国王室长住凡尔赛宫，因此枫丹白露宫在法国大革命前已趋破败。大革命期间宫内家具陈设全被变卖，以筹措政府经费。拿破仑称帝后对其加以修复，并曾将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囚禁在这里。1814年拿破仑在枫丹白露宫被迫签字退位，并对其近卫军团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拿破仑三世时代枫丹白露宫再次得到修缮和扩建，欧仁妮皇后在宫中修建了“中国博物馆”，陈列法军从圆明园掠夺的中国文物。1945年－1965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总部设于枫丹白露宫，其围墙外至今还残留有“NATO”的标记